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一

西亚考古史

（1842-1939）

拱玉书　著

文物出版社

90042575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一

西亚考古史

（1842-1939）

拱玉书　著

90042575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2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编辑　谷艳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亚考古史:1842～1939年/拱玉书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4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7-5010-1293-8

Ⅰ.西…　Ⅱ.拱…　Ⅲ.考古学史-西亚-1842～1939　Ⅳ.K88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8525号

西亚考古史
拱玉书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市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年4月第一版　2002年4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印张:16.75
ISBN 7-5010-1293-8/K·548　定价:80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经费资助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伯谦

副主任：王天有　王邦维　程郁缀　郭之虞

　　徐天进　赵化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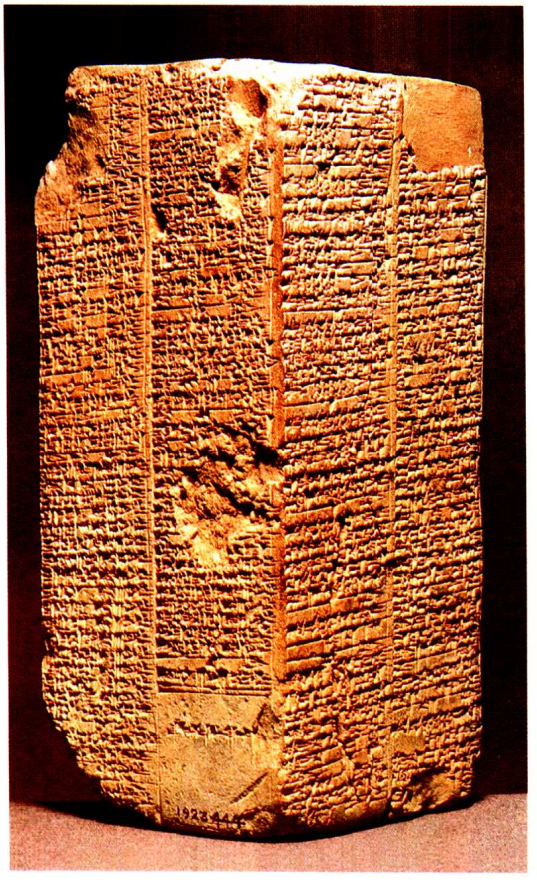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长　王天有　王邦维　李伯谦

　　严文明　宋豫秦　何芳川　赵化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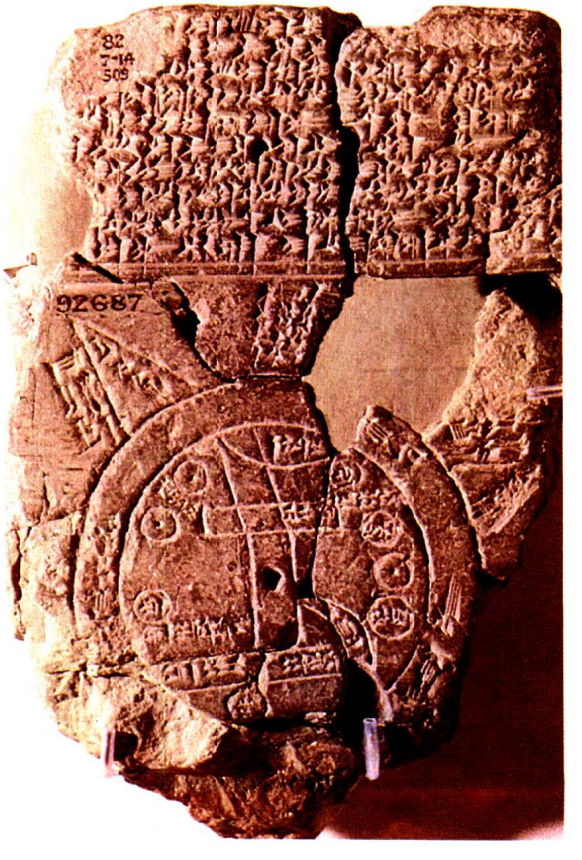
　　赵　辉　拱玉书　高崇文　郭之虞

　　徐天进（常务）　夏正楷　程郁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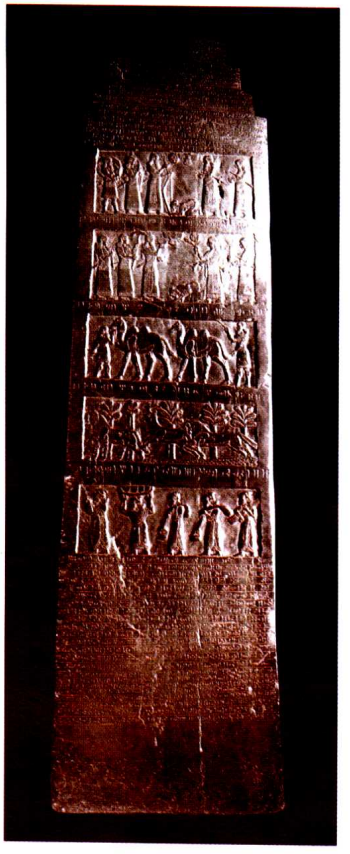
彩版 1

刻有“苏美尔王表”的四面泥柱。基本包括了从“洪水前”到伊辛第一王朝结束为止的各主要王朝的国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Hrouda 1991，58 页）



彩版 2

新巴比伦时期（约前 7~前 6 世纪）的世界地图。当时人们认人世界是个圆盘，周围是“苦海”（Hrouda 1991，25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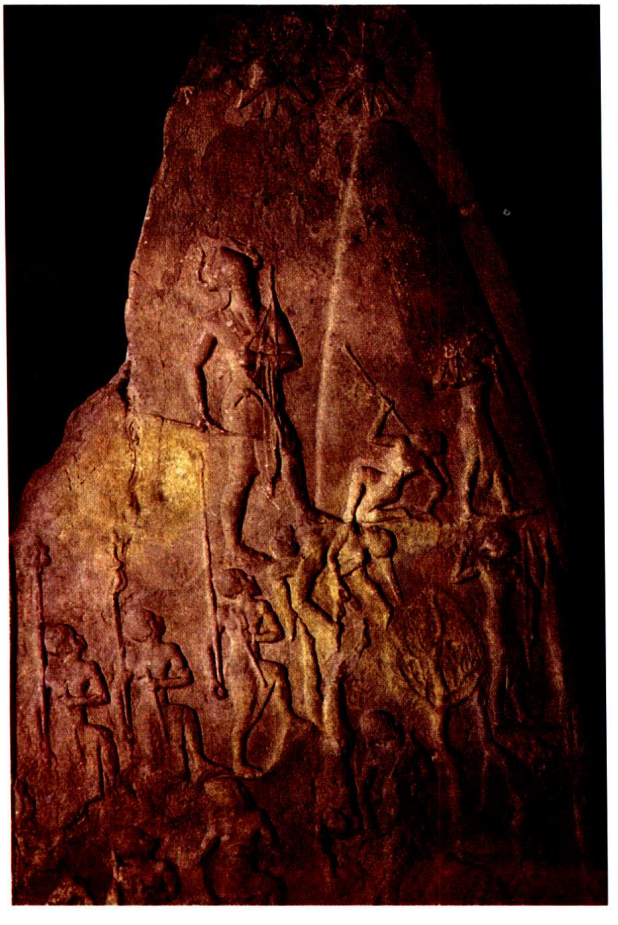
彩版 3—1、2

黑色方尖碑。1846 年由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发现，高 2 米，创作于萨尔曼纳萨尔三世统治时期，是亚述人留给后世的图文并茂的重要历史文献（Hrouda 1991，134/135 页）

彩版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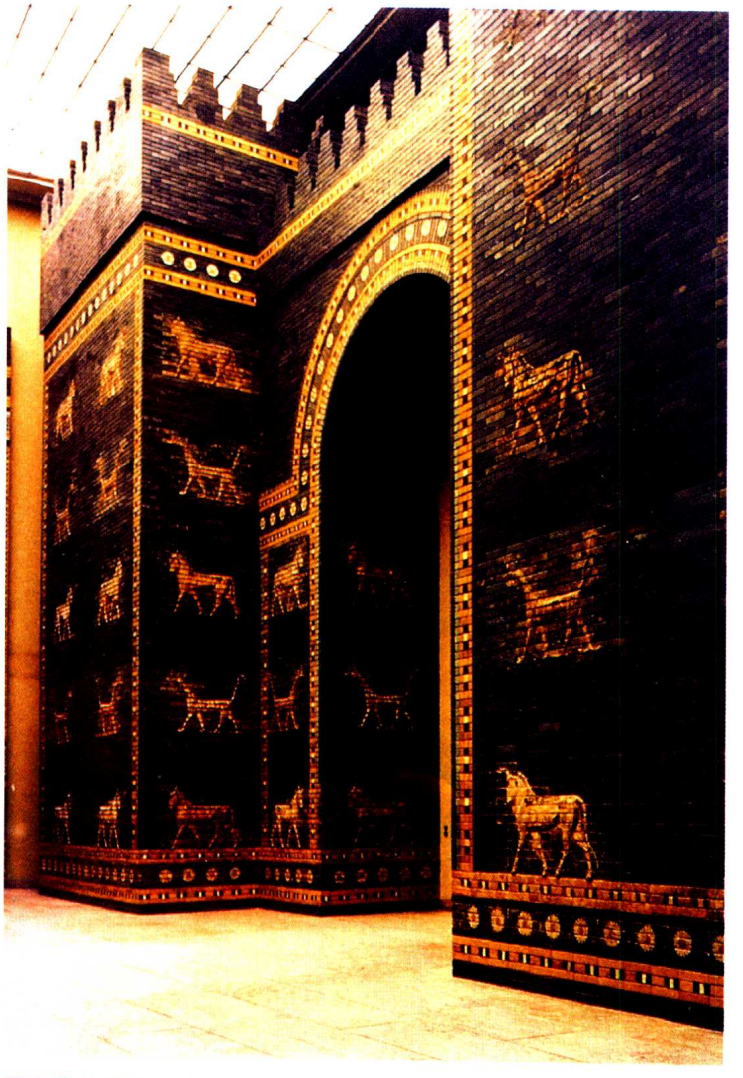
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发现的亚述石板浮雕（Hrouda 1991，347 页）

彩版 5　安纳吐姆鹫碑残片。石灰石碑刻，原高 1.8 米，宽 1.3 米，上部为半圆形，是第一个通过文字和图像记载历史事件的石碑（Hrouda 1991，74 页）



彩版 6

在苏萨发现的纳拉姆辛胜利纪念碑。沙石质，高 2 米。纳拉姆辛是阿卡德王朝第四个国王，石碑是为纪念战胜居住在扎格罗斯山区的卢卢拜人而创作的，公元前 12 世纪被远征巴比伦的埃兰国王掠夺到埃兰首都苏萨（Hrouda 1991，33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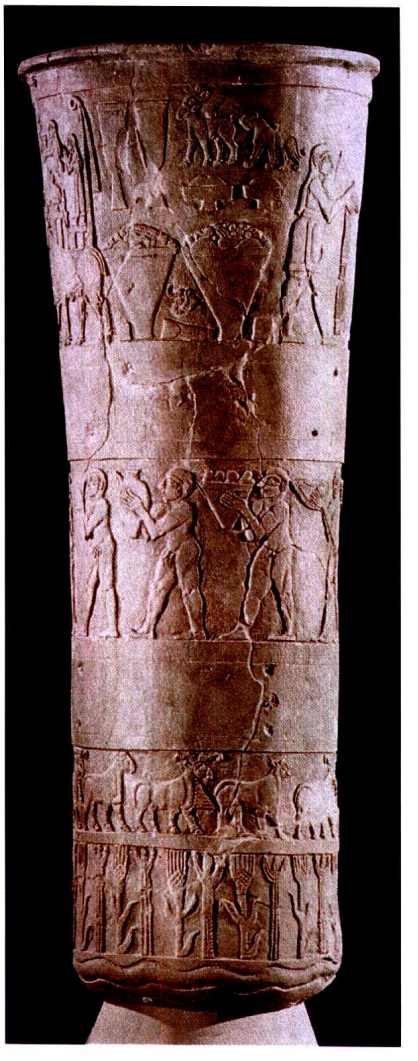
彩版 7

德国柏林近东博物馆的伊施塔城门复原图。复原的城门高 14.3 米，原始高度不详。建筑材料为彩釉烧砖，神兽由彩釉浮雕砖镶嵌而成，反复出现的神兽是“龙蛇”和公牛（Roaf 1998，193 页）

彩版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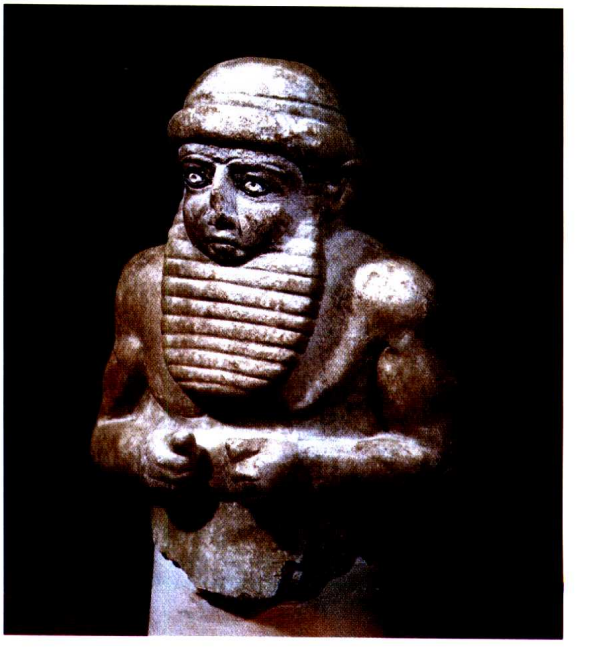
巴比伦南宫正殿正面墙上用彩釉浮雕砖镶嵌的雄狮（Wilhelm 1998，2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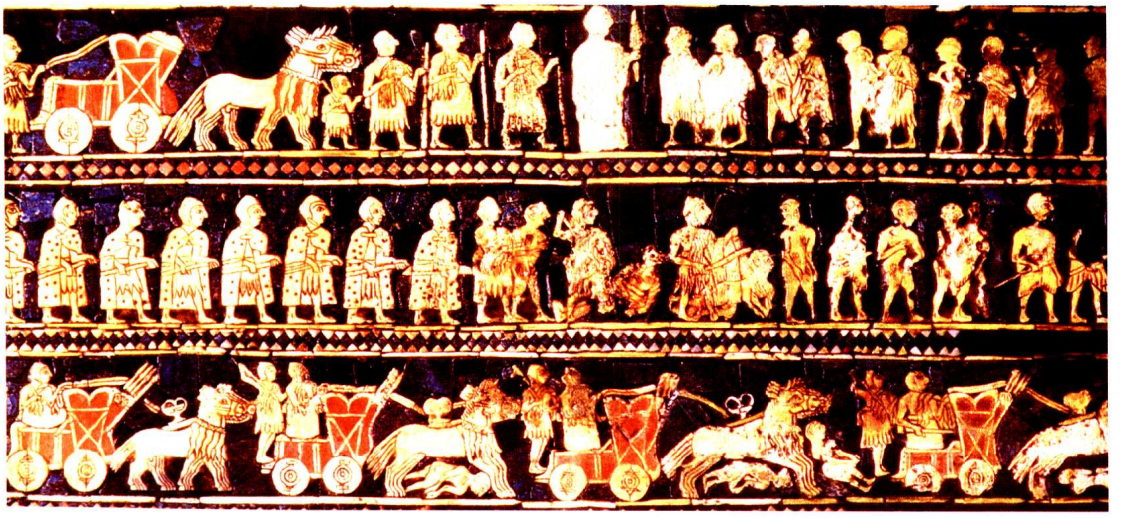
彩版 9—1、2
乌鲁克石膏石瓶。高 105 厘米，瓶口直径为 31 厘米（Hrouda 1991，328/32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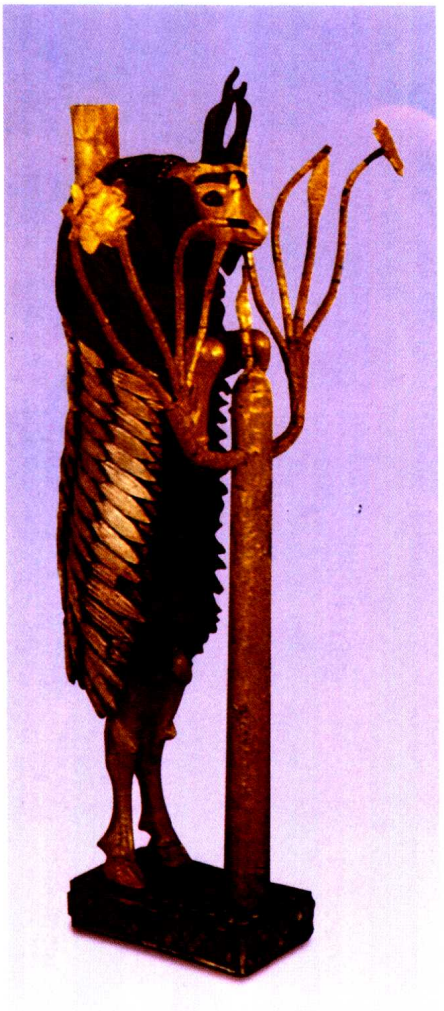
彩版 10
乌鲁克出土的滚印。“钮”为山羊形，年代在公元前 3100～前 2900 年（Wilhelm 1998，4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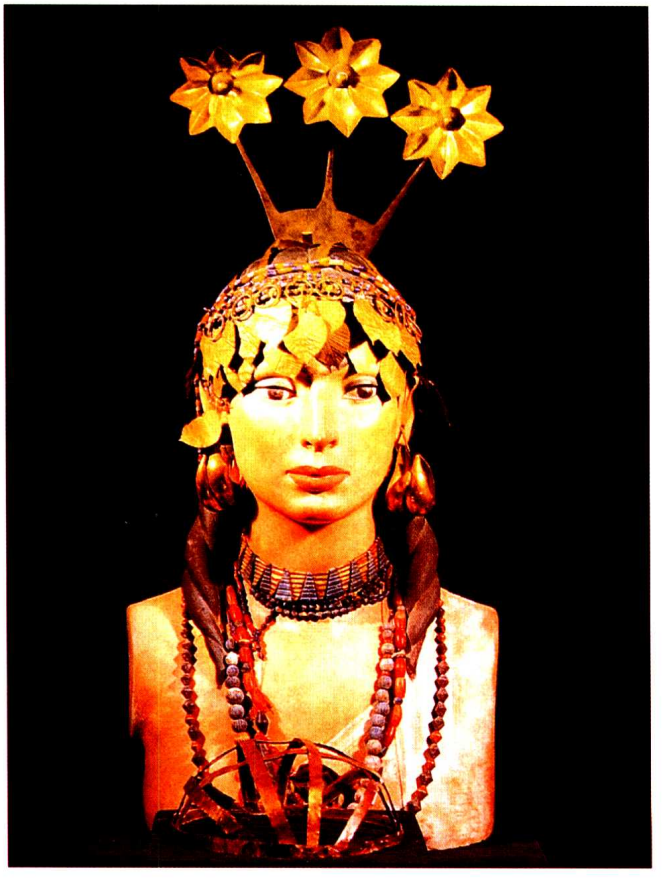
彩版 11
乌鲁克的祭司王。石膏雕塑，残存部分高 18 厘米（Hrouda 1991，315 页）





彩版 12　乌尔王陵出土的镶嵌板，学术界一般把它称为“乌尔军旗”。它可能是一种乐器音箱的装饰，长 47 厘米，高 20 厘米（Hrouda 1991，334/33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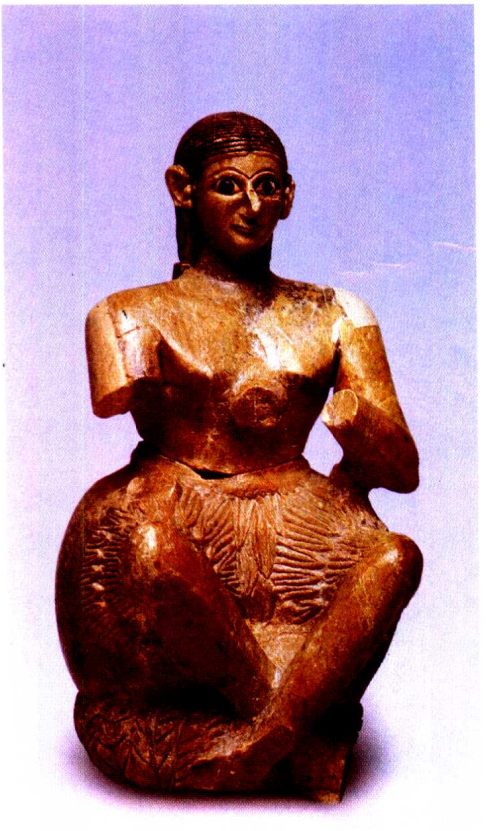
彩版 13　乌尔王陵出土的金银首饰（Hrouda 1991，64 页）

彩版 14

乌尔王陵出土的殉葬品：山羊与生命树。高 47 厘米（Roaf 1998，93 页）

彩版 15

拉尔萨出土的青铜像。手部和面部镀金。为卢然纳为汉穆拉比长命百岁而祈祷（Hrouda 1991，216 页）



彩版 16

马里出土的石雕像：歌手乌尔南希（Roaf 1998，91 页）

彩版 17

在伊施查里得到的(不是通过发掘)“四面神”青铜像。年代属公元前 2 千年代早期，高 17 厘米（Hrouda 1991，229 页）

彩版 18

用失蜡法浇铸的四马双轮战车。高 7.2 厘米（Hrouda 1991，267 页）

序

刘家和

这是拱玉书博士所撰的《西亚考古史》。一看到这样的书名，有人大概就会觉得它是和自己关系遥远的一部学术专著。它是一部学术专著，这一点没有问题；不过，它是否就和自己关系遥远呢？这还要具体地加以分析。如果一个人读书太过于注重直接的研究对象，那么，只要他的专业不是西亚考古史，他是会把这本书看得很遥远的。且不说非历史或考古学界的人，就是从事中国考古研究的学者，他的具体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的遗址与文物，他也有可能觉得西亚的考古与他关系遥远；就是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他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历史，他也有可能觉得西亚考古与他关系遥远。对于这样的有“心远地自偏”学术习性的人，只要不是直接的，就会是遥远的。当然人们对自己的治学途径都有选择的自由，专心致志地在一点上求精，也是必要的。可是，非直接性的、从而似乎遥远的事物，有时恰好在更深的层次上与我们所直接关心的对象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问题在于人们的注意力是否深入到了这样的层次上了。只要注意到了这样的层次，不仅治中国考古和世界古代史的学者会觉得此书对自己关系重要，而且，即使是一般非专业的读者，也会对此书有兴趣的。承玉书博士好意，把《西亚考古史》书稿及有关背景资料带来给我看，并嘱写一篇序。我并非这一方面的专家，也没有什么专业方面的独到见解要借此机会说明，恰好相反，我甚感在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足，而作为一个从事古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人，又有对这一方面的知识加以了解的迫切需要，所以愿意略述几点感想，以欢迎此书的出版，并就教于读者诸君。

第一，凡是从事于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人，都会知道，在我们对于古代近东的历史知识里，尤其是关于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以前的历史，从传统的文献所得的确切信息寥寥无几，基本史料都出于近百余年来的考古发现。我们做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于此更有深切体会。为了教学、编写教材或写文章，我们总不能不掌握必要的史料。一般治古史的学者都认为，史料来源越古越好，因为它切近历史的发生过程，所以治科技者书唯求新，而治古史者则惯于书唯求旧。可是，到了古代西亚史的领域，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史料书也必须求新。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于考古的进展。再则，做研究少不了要看一些有关的专著，以掌握有关问题研究发展的历史。而在古代西亚史的领域，研究史又几乎是与考古史紧密结合的。这样，我们就又不能不注意于考古的进展。在我们看不同时期的学者著作时，常会发现，对于许多事情本身及其分

析，前后的学者的根据与议论就常有不同。譬如，我们过去常会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以后此书以单册的形式出第二版，以后又陆续出了第三版。关于近东、西亚的史料及论断，新本对于旧本的补充和纠正的地方真太多了，简直令人要刮目相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尽量追踪人家研究的新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常常感到被动，总是跟在别人后面，难以在学术上有主动创新的余地。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与那里的考古相当隔膜，尤其是对于那里的考古发展的进程和趋势缺乏必要的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本书当然会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第二，如果既做世界古代史研究，也做中国古代史研究，同时还试图做一些比较研究，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考古学对于中外古史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同样重要的。尽管在《圣经旧约》、希罗多德《历史》等书中都有关于巴比伦的故事，西亚文明早期的信史还是靠考古发现建立的；同样，尽管早在《尚书》、《诗经》等书中就有关于尧、舜及三代的记载，而中国文明早期的信史仍然离不开考古学。不过，如果具体地考察中国与西亚的考古发展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同中之异。发掘地下文献并加以解释，在中国和西亚考古研究工作里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双方的具体情况却有十分值得注意研究的差异。当中国学者最初看到甲骨片上的符号时，他们尽管对其中的许多符号并不认识，但是能够确认那是古代文字，并且能够释读其中的一些。而在西亚，当学者们最初看到楔形文字的时候，他们可以推想那是古代的文字，可是根本不知道那些到底是记录什么语言的、什么人的文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中国学者不仅认识楷书体汉字，而且认识楷书体由之而来的隶书体汉字；不仅认识隶书，而且认识隶书由之而来的篆字；而认识了篆字，便有了认识青铜器上的金文的桥梁；认识了金文，就又有了认识甲骨文的桥梁。所以，尽管一般识楷书字的人不能认识金文或甲骨文，但是其间的文化信息桥梁连续未断，学者们完全可以循着这一桥梁由已知推求未知。所以中国学者对于古文字做的是考释工作，考旧以知新，推陈而出新。在西亚古文字研究中，情况就另是一样了。学者在那里最初面临的是茫然一片，没有任何现存直接的文化信息桥梁，所以他们做的是一种破读（decipher）的工作。他们只是在经过曲折的途径寻找到那种古今间的文化信息桥梁之后，才解决了文献释读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对中国与西亚古文明做比较的研究，那么了解与分析中国与西亚双方考古研究途中的异同就具有深层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本书同样会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第三，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里，中国考古学家为我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卓越贡献，使我们的古史研究有了许多新天地、新成果。但是，我们的考古学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年轻的，比西方国家起步要晚。西方人在西亚所取得的考古成绩，对于我们的考古学来说是会很有借鉴作用的。就此一点而言，这一本书对于中国考古学界也应当

是一份珍贵的礼品。还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的考古成就还只局限于中国境内，还没有能像西方人那样到海外去开拓新天地。于是，我们在研究世界考古发展史上就落后于人。当然，这不是我们学者的问题，而是近百余年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压迫下国力不振的结果。只要看一看这本书，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西方人在西亚的考古是随其东指的殖民势力而兴起的。当然这只是说明一个事实，而绝无贬低西方学者考古成就的意思。现在，旧的殖民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国家也逐渐地发展起来，我们的学术界也逐渐地和国外学术界建立起友好的联系，我们的学者到西亚参加考古工作并做出自己的贡献的时节已经不会太远了。而要参加在西亚的考古工作，不了解西亚考古的历史，那怎么行呢？这样，这一本书就更加具有新的意义，我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在西亚的考古贡献的一枝报春的花！

第四，我不认为这一本书对于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就是一件奢侈品。随着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和普及化，现在中国人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眼界和水平，已经远非过去可比。知道在中国以外还有其他文明古国，并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感性知识的人，在人口中的比率大概不会比电视普及率低。对于对西亚古文明已经有一定感性知识的人来说，他们难道就不会想一想这些知识是从什么途径得来的吗？现在我们正在强调人的素质教育，人的素质对于我们国家在新世纪的全球性的竞争中的成绩将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样，这一本书对于广大的有一定文化的读者来说同样是需要的。

玉书博士此书，不仅在国内是垦荒之作，在国外也未见有任何现成的外文的蓝本。他作此书，如蜜蜂之酿蜜，采集多书然后以己意成之。此书之内容结构与分期，均为作者自己研究之心得，实为难能可贵。当然此书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只写到二次大战，而战后的部分目前尚付阙如。所以在欢迎此书出版之同时，也希望其续篇不久后将会面世。

2001 年 10 月

目　　录

序 …… 刘家和（Ⅰ）

前言 …… (1)

第一章　自然环境和资源 …… (4)
第一节　地质 …… (4)
第二节　地形 …… (6)
第三节　海岸线 …… (8)
第四节　盐碱化 …… (9)
第五节　气候 …… (10)
第六节　植物 …… (11)
第七节　动物 …… (14)
第八节　水 …… (14)
第九节　“丘” …… (17)

第二章　古典著作与《旧约》 …… (20)
第一节　古典著作 …… (20)
第二节　《旧约》 …… (28)

第三章　欧洲人的实地考察（1160～1842 年） …… (31)

第四章　文字考古——楔形文字的解读（1802～1857 年） …… (47)
第一节　古波斯语铭文的解读 …… (47)
第二节　埃兰语铭文的解读 …… (57)

第三节 阿卡德语铭文的解读 …… (60)

第五章 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1842～1855 年） …… (68)

第一节 法国 …… (69)
第二节 英国 …… (72)
第三节 结语 …… (80)

第六章 向科学考古学迈进（1873～1898 年） …… (83)

第一节 英国 …… (84)
第二节 法国 …… (92)
第三节 德国 …… (96)
第四节 美国 …… (98)
第五节 土耳其 …… (102)
第六节 结语 …… (103)

第七章 科学考古学的诞生（1898～1914 年） …… (107)

第一节 法国 …… (107)
第二节 德国 …… (108)
第三节 美国 …… (130)
第四节 英国 …… (132)
第五节 结语 …… (137)

第八章 西亚考古的黄金时代（1919～1939 年） …… (142)

第一节 英国 …… (142)
第二节 德国 …… (156)
第三节 法国 …… (157)
第四节 美国 …… (163)
第五节 其他国家 …… (185)
第六节 结语 …… (186)

附录：

1. 西亚考古学大事年表 …… (192)
2. 年代表 …… (214)

3. 参考文献及其缩写 …… (221)
4. 名词对译表 …… (230)
5. 古今地名对照表 …… (242)

前　言

早在公元前4000年代，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就产生了高度发展的苏美尔文明并出现了作为这一文明主要标志的楔形文字、圆柱印章、大型宫殿建筑和神庙建筑。公元前3000年代中叶，一支讲塞姆语的民族，即阿卡德人，在两河流域南部诸城邦争夺霸权的长期混战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统一各个城邦，建立统一帝国，阿卡德语也随之代替苏美尔语成为主要交际工具，而苏美尔语降到次要地位。公元前3000年代末，苏美尔人重新主宰巴比伦尼亚，迎来了“苏美尔复兴”。公元前18世纪，阿摩利特人在历史的大动荡和大演变中成为整个两河流域地区的主宰，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即汉穆拉比帝国，亦称古巴比伦帝国。之后，凯喜特人从伊朗高原西下，入主巴比伦尼亚，从而开始了包括赫梯人、胡里特人、亚述人以及埃及人在内的近东各大民族为争夺古代叙利亚地区而展开混战的时期。进入公元前1000年代后，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人开始主宰两河，楔形文字文明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随着亚述帝国的灭亡，以楔形文字和塞姆语为标志的巴比伦—亚述文明开始衰落。迦勒底王朝被古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灭亡后，楔形文字文明的主要载体在民族的相互征服和同化中逐步泯灭，最后从历史舞台上完全销声匿迹。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发展史，一个高度发达、延续时间如此之长、涉及的民族如此之多、包括的地域如此之广、对人类总体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甚至一直产生深远影响的古代文明——楔形文字文明，也随之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其物质遗产被埋在地下，默默无闻了2000年之久，有的甚至长达几千年。至今，不知还有多少仍然深埋地下，期待着考古学家的锄头。

大概由于希波战争的缘故，希腊人早就对当时已经成为神秘过去的亚述和巴比伦文明产生了兴趣，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最早的有关描述。由于亚述和巴比伦人都对犹太人进行过征服和掠夺，所以，在《旧约》中也留下一些有关记载。在近代西亚古物学和考古学产生以前，人们了解西亚历史和文化的途径主要就是这两个：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著作和《旧约》。

从12世纪的西班牙犹太教经师本杰明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欧洲人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来到他们所谓的近东地区，记载下他们见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古物古迹。这标志着西亚古物学的开始。

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出现自古典时代以来又一次重新发现和认识“东方”的热潮，许多人争先恐后来到东方探险和考察，有的单枪匹马，有的三五结伴。他们或著游记，或临摹铭文，或绘制图片，或把一些可携带的实物带到欧洲，以各种形式向自己的同胞展示神秘而古老的东方。

从19世纪开始，楔形文字解读工作取得长足进展，随着这个进展，长期不断的古物搜集逐渐向考古发掘演变。1842年法国摩苏尔副领事博塔发掘尼尼微遗址，标志着由古物学而考古学这一演变过程的结束。从而，第一个大规模考古发掘时代——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拉开了帷幕。不久，博塔就放弃尼尼微遗址（当时博塔并不知道他发掘的就是尼尼微遗址）的发掘，转而发掘附近的另一遗址豪尔萨巴德。这时，英国的莱亚德趁虚而入，开始发掘尼尼微遗址。从此，英法两国考古学家开始逐鹿美索不达米亚。

1877年法国人发掘位于两河南部的古代城市吉尔苏遗址，遂把开始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考古角逐扩大到南部。不久，美索不达米亚的荒丘野地中又增加了新的逐鹿者——德国考古学家和美国考古学家，使美索不达米亚真正成为群雄逐鹿的战场。随着法国的基尔苏发掘和美国的尼普尔发掘，亚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苏美尔学逐步建立起来。

1898年，刚刚诞生的德国东方学会组织一支由经验丰富的建筑学家率领的考古队伍，开始对巴比伦遗址进行发掘。这不但标志着由学术团体资助和组织的西亚考古发掘的开始，也标志着西亚科学考古学的诞生。随着巴比伦遗址的发掘，德国西亚考古史进入黄金时代，接下来的一系列重大发掘——亚述、乌鲁克、法拉、博阿兹柯伊等——都使它更加辉煌。一战的枪声宣告了这个黄金时代的永远结束。此后至今，德国的西亚考古学虽然又经历了几个春天，考古学家们也曾几度争创辉煌，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面对昔日之辉煌，只能望洋而兴叹。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国的考古发掘都被迫停止。但翘望战争早日结束的考古学家们在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之时就又开始重操旧业，战胜国英、美、法的考古学家尤为活跃。战后，参加西亚考古的国家和考古机构越来越多，包括的地域越来越广，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先进，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两战之间各国考古学家在西亚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多不胜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考古学家吴雷主持的乌尔发掘、美国芝加哥大学对伊拉克迪亚拉地区的阿斯马尔等遗址的发掘和法国考古学家对叙利亚境内的马里遗址的发掘。这些发掘都分别解决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使这个时期成为西亚考古史上的黄金时代。

对于上述内容，本书分别在八章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和总结。至于二战至今的西亚考古史及今后的考古前景，由于内容过多，不能包括在本书之内。关于这些内容，

本人将竭尽微力，今后另献拙著。

由于在书中不能对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次考古发掘都面面俱到地进行详细论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为了弥补这种缺漏，也为了检索方便，本书附录了“西亚考古学大事年表”。为了弥补抽象叙述的不足，使读者更生动形象地了解西亚考古史，本书还插附了大量图片。

本课题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在此，我对国家的投入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毕波、欧阳晓莉和曹明玉同学，他们在本书的审稿、定稿和复制图片等方面给予我很多帮助。

感谢许文彪同志，他为我翻拍了许多图片，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方便。

感谢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全体成员，特别是吴宇虹教授和周秀文女士，他们在我搜集资料过程中给我提供许多方便。

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她们的理解和关爱也就没有本书。

我的老师林志纯先生阅读了本书的书稿，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使我受益很多。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阅读了本书的书稿，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同时决定把本书纳入“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丛书”系列，并在各方面给本书的出版以大力支持。对此，本人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第一章　自然环境和资源

本书使用的“西亚”，不是一个严格的地理学概念。在这里，“西亚”不确指地理学上的“亚洲西部”，而是指西方人所谓的“近东”[①]。在西方人眼里，“近东”是“五海之地”，即被五海环绕之地。五海指地中海、黑海、里海、波斯湾和红海。然而“海”对西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比较而言，大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海”对文明的影响。“近东文明”（即“中东文明”或“古代东方文明”）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此相同，本书将要谈到的“西亚考古”、“西亚历史”和“西亚文明”也有特定的内涵：时间的下限至亚历山大征服古波斯帝国（前331年），地域包括现代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伊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和土耳其大部分地区（安那托利亚）。

西亚的地形多种多样。从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到约旦和叙利亚境内的玄武岩沙漠，从两河下游的冲积平原，到土耳其境内终年积雪的高山，形形色色，富于变化。生态环境影响到人的生存方式，生态环境不同，人的生存方式也往往有别，譬如：平原有利放牧，山区适于采集和狩猎，而沿河地区则适于捕鱼。单一的生活来源往往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于是，各地人民很早就学会了相互学习和借鉴，而这种相互学习和借鉴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从而产生了古代西亚的高度文明。

第一节　地质

大约在2亿年前的古生代末期，冈瓦纳大陆和劳亚古大陆开始分裂，分裂之后的陆地后来又向一起漂流。蒂锡斯海（Tethys，即古地中海）处在两个大陆之间，具有厚厚的海洋沉淀层。当两个大陆漂撞在一起时，它们崩裂成许多碎片，而当这些碎片又漂流到一起时便形成现在这样的地中海地貌。当阿拉伯大陆块向伊朗大陆块漂流时，其中的一部分被伊朗大陆块压在下面，于是形成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低洼平原；这时北水南流，西亚的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便形成了。

---

① Near East，亦称“中东”（Middle East）、“前亚”（Vorderasien）或“古代东方”（Ancient Orient/Alter Ori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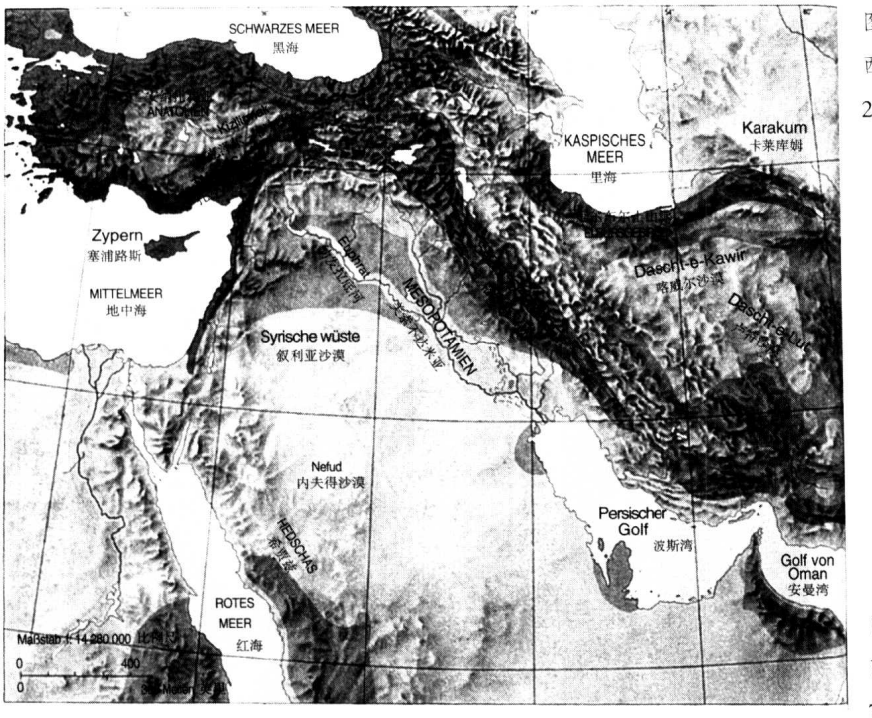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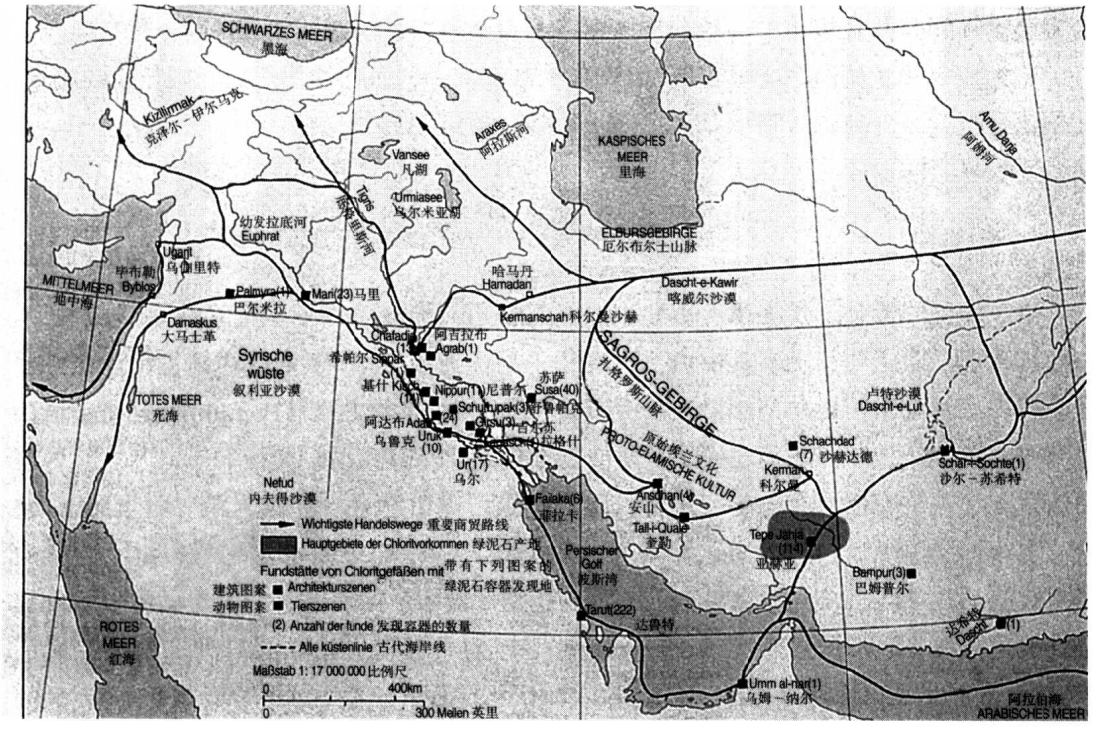


图 1a
西亚地图（Roaf 1998，22 页）①

图 1b
西亚地图（Roaf 1998，79 页）



① 括号内为此图的出处，下同，不复说明。

扎格罗斯山脉（Zagros Mts.，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和西亚地区的其他山脉也是在这次地壳运动中形成的。非洲大陆漂撞在小亚细亚陆地时形成土耳其境内的托罗斯山脉。阿拉伯大陆和非洲大陆向外延伸时撞碎冈瓦纳大陆的组成部分阿拉伯—努比亚地块而形成红海。阿拉伯大陆的北移又形成阿喀巴湾（红海北部）的地堑、瓦迪阿拉伯、死海和约旦谷。

图 2　约旦东北地区的玄武岩沙漠（Hrouda 1991，25 页）

各大陆块的准确界限尚不可知，不过，火山活跃和地震常见的地方可能是大陆块相互连接的薄弱点。西亚有些地区的地表大面积地被火山石，如玄武岩和黑曜岩（即火山玻璃）覆盖，说明这些地区曾有过火山爆发。西亚的地表岩石大都是沉淀形成的，它们有的曾是海底的石灰岩，有的是淤积起来的腐蚀岩石，如砂岩和土岩。腐蚀岩的淤积直到今天仍在继续。阿拉伯半岛将继续被沙和沙丘覆盖，内地的许多河谷和盆地将继续增加从山区冲下来的沉淀物。

旧大陆有个所谓的“干旱带”，大致指从非洲北部的大西洋海岸起、经撒哈拉沙漠、到中亚地区为止的地带，西亚是这个“干旱带”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　地形

由于地壳的运动，加上水、山和冰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西亚地区多种多样的地形。在西亚北部，即伊朗和土耳其境内，有高山平原，海拔 2000 多米，四周群山环绕。土耳其境内有两大东西走向的山脉，一是靠黑海海岸的本都山脉（Pontus），一是靠地中海海岸的托罗斯山脉。它们之间是从西向东伸延的土耳其高原，海拔约 500 米。这两座山脉在土耳其东部汇合在一起，并与伊朗境内的两座山脉——伊朗北部（即里海南岸）的厄尔布尔士山脉（Elburz Mts.）和扎格罗斯山脉——连接起来。厄尔布尔士山脉的最高峰德马文（Demawend）海拔 5605 米。扎格罗斯山脉是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它是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的分水岭，海拔 4000 米，而最高峰不止 4000 米，是座死火山。与扎格罗斯山脉相连的是亚拉腊（Ararat）山，海拔 5165 米，地处土耳其与伊朗和亚美尼亚交界处（在土耳其境内）。伊朗高原的中部有两个沙漠，一个是喀威尔沙漠（Dascht-e-Kavir），一个是卢特沙漠（Dascht-e-Lut）。

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境内的地中海沿岸，亦山峦起伏，绵延数百里。其中最高部分在黎巴嫩，有些山峰海拔 3000 米以上。这里的地形也多种多样，不一而足：高地被南北走向的地堑拦腰斩断，组成地堑的约旦谷、死海（低于海平面 300 米）和瓦迪阿拉伯与高地形成鲜明对比。

图 3　亚拉腊山。屹立在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原，自 1840 年后成为死火山（Hrouda 1991，21 页）

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沿岸亦有山脉挺立。红海东岸的汉志山（Hedschas/al-Hijaz，即希贾兹）海拔 2000 多米。坐落在也门、靠近红海南部出口的阿西尔山（Asir）的最高峰海拔 3500 米。波斯湾入口处的安曼境内也有高山，最高峰海拔 3000 多米。

扎格罗斯山和托罗斯山脉以南，地势渐趋平坦。从西北起，至东南的波斯湾，地势越来越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就沿着这个方向蜿蜒流入波斯湾。

幼发拉底河发源于土耳其境内，有两个源头，都在凡湖（Lake Van）和埃尔祖鲁姆（Erzurum）之间。幼发拉底河初为东西流向，在埃拉及泽（Elazig）汇流后，始向南流，从卡赫美什流入叙利亚，再经叙利亚的马里（Mari）流入伊拉克，最后与底格里斯河汇合后，流入波斯湾，全长 1780 英里（2720 公里）。

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凡湖以西约 100 公里的哈扎尔—古律（Hazar Gölü）湖。先向东流，然后转向东南流，经尼尼微和亚述高地，在伊拉克南部的古尔奈（al-Qurnah）与幼发拉底河汇合，形成阿拉伯河（Shatt al-Arab），流入波斯湾，全长 1150 英里（2032 公里）。[①]

大约在北纬 36°/东经 37°（即叙利亚境内的古城卡赫美什）附近，两河相距约 250 公里，中间为大草原。在巴格达附近，两河最为接近，但还没有汇合。在这里，幼发拉底河的河床比底格里斯河的河床高出许多，这里是古代灌溉系统最发达、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之一。

按照自然地理的不同特点，可大致以幼发拉底河的希特（Hit）和底格里斯河的萨马拉（Samarra）为界，把两河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两河的河床为较坚硬的石灰岩

① 两河名称已见于楔形文字泥板文献。苏美尔语称幼发拉底河为 Burannu，阿卡德语称之为 Puratu；苏美尔语称底格里斯河为 Idigna，阿卡德语称之为 Idiqlat。

和页岩，河道较深较窄（底格里斯河比幼发拉底河宽）。因此，两河北部自古以来从未改道。昔日的沿河古城，如卡赫美什、尼尼微、尼姆鲁德和亚述城等，均受益于此，久盛不衰。希特—萨马拉以南为冲积平原，地势极其平坦，从这里至波斯湾大约有750公里，南北的高度差仅为30米，坡度为1:25000。这样，两河不但流速极其缓慢，而且携带大量沉积物，河床不断升高，甚至高出周围的平原，以致于河水溢出河床，改道而流，以河为生的城市和乡村居民不得不弃家迁徙，傍河重建家园。西亚考古已证明，许多昔日繁荣一时的古城都曾坐落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它们的衰落和被遗弃与河流改道密切相关。

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前64～21年）在他的《地理学》中已把两河流域划分为两部分。他的划分大致以巴格达为界，以北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以南称为“巴比伦尼亚”，从此，“巴比伦”（城市）的名称被区域化，变成了区域名称。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ius，23～79年）用“美索不达米亚”一词指整个两河流域，包括南北两部分。此后，人们都沿用了老普林尼的用法，即用“美索不达米亚”指整个两河流域，如今亦然。

大约于公元前4000年末来到两河流域南部定居的苏美尔人（Sumerians）已把两河流域南部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大致以古代城市尼普尔（Nippur）为界，北部为“基乌里”（KI-URI），阿卡德人称之为“阿卡都”（Akkadu），今日所说的“阿卡德”（Akkade）即由此而来；南部为“基恩基”（KI-EN-GI），阿卡德人称之为“苏美鲁”（Šumeru），今日所说的“苏美尔”（Sumer）即由此而来。

第三节　海岸线

在最后一次冰期末期，海平面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在冰期期间，南北两极地区大面积被厚冰覆盖。由于很多海水集结于极地冰川，所以，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的海平面低100多米。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16000年。之后，海水开始上涨。有时上涨的速度相当快，一世纪超过一米。大约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海平面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就是说，6000年来，海平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海水上涨可能淹没了两河流域南部和波斯湾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①]

波斯湾的海岸线问题曾是亚述学上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以伊拉克南部城市纳西里耶（Nasiriyah，北纬31°03′，东经46°15′）为界，其北，重要遗址星罗棋布，而其南则了无一址。仿佛有人在此划过一条线，规定其北可居，而其南不可居。于是，人们的猜

① Roaf 1998，p.23.

测油然而生：纳西里耶以南可能曾被大海淹没。这个观点还得到文献的支持。楔形文字文献有道：埃利都（Eridu，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城市）“坐落在海岸边”；又有楔文文献道：在乌尔（Ur）的“码头，海船往来，装卸货物”。而这两个遗址距今日的海岸线都在一百英里左右。这不恰恰说明今昔的海岸线不同吗？

然而，1952 年，两个地质学家联合发表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地理史”[①] 一文，推翻了纳西里耶曾为海岸线的推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历史时期，波斯湾的海岸线没有发生过较大变化。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楔形文字文献的说法。英国的著名考古学家劳埃德认为，埃利都所处的较浅的低洼地曾是现代该地区湖泊系统的一部分，当时这些湖泊通过深灌渠与幼发拉底河相连，而乌尔当时可能坐落在幼发拉底河岸。[②]

图 4　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区的一个渔民村（Roaf 1998，51 页）

第四节　盐碱化

除洪水泛滥会给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带来严重不良后果外，在其他不利于农业的因素中土地的盐碱化问题最为突出。这个自古就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一直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在现在的伊拉克，仍存在沃土变废地的问题：大片昔日的良田，如今地表结了一层白色硬壳，不能再耕，遂被遗弃。

造成盐碱化的直接原因是灌溉。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降雨量非常少，不能靠天吃饭，农业生产必须依靠灌溉。灌溉使靠农业生产养活较多的人口成为可能，但它的负作用也不容低估，古代尤其如此。由于灌溉用的河水中含有大量盐分，水在炎热的阳光下蒸发，盐沉淀下来，土壤的肥力遭到破坏，此是其一。其二，长期灌溉会导致地下水位的增高，水中的盐分也就逐渐随之上升到地面。

据美国著名亚述学家雅各布森（Th. Jacobsen）的研究，[③] 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城邦

① Lees 1952.

② Lloyd 1984, p.16.

③ Jacobsen 1958; Jacobsen 1982.

拉格什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就开始出现土地盐碱化问题，之后盐碱化趋势朝幼发拉底河的方向西延。千年之后，盐碱化成了整个巴比伦尼亚农业面临的严峻问题。他在研究泥板文献时发现，公元前24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小麦产量约占这一地区粮食总产量的16%，3个世纪后，下降到2%，而在公元前2000年到1700年间，小麦已不见于文献。就是耐盐碱的大麦，产量也急剧下降。他认为，农业的减产造成人口北徙，政治优势也随之北移。不过，雅各布森的土地盐碱化研究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美国学者鲍威尔认为，从他的研究方法到对历史文献的解释都存在问题，因此，把苏美尔文明的消失归咎于土地盐碱化没有足够根据。[①]

的确，人工灌溉引起的土地盐碱化不一定必然给农业带来毁灭性打击，如果采取一定对策，盐碱化的程度和速度都会得到一定控制。改进灌溉技术和实行两年一次的休耕制，都可能是为了避免和减缓盐碱化而采取的有效措施。目前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早在盐碱化开始成为问题时起，人们就开始采取上述对策，而且收到良好效果。苏美尔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有关的珍贵遗产，即约属公元前21世纪的一部《农人历书》，就以一个农人教子的口气，详细讲述了如何对“休耕”[②]地进行平整和灌溉、以达到高产的具体方法。[③] 看来，土地盐碱化的问题不一定是政治优势北移的原因。

第五节 气候

对古代气候的研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从海洋中氧同位素O^{16}和O^{18}的比例中，可以知道来自极地冰冠的水量，以及全球的温度。厚厚的沉积层意味着较强的河水运动，说明降雨很多。不过，最常见的方法是对古池塘的沉积层中保留的花粉进行分析。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大致确定当地植被的变化。

大约距今18000年前，全球的气温开始上升，地球被冰覆盖的面积缩小，海水增多，海平面升高。在公元前12000～前8000年的4000年间，全球气温升高了10℃，最高时比现在的平均温度高出1～2℃。在冰期期间，北部山区较干燥和寒冷，植被也主要是大草原型植被。气候变温暖和潮湿以后，才长出茂密的森林。到了公元前4000年前后，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的山坡上长满了橡树和其他树木，今亦如此。西亚南部地区也经历了天气由干冷而温暖潮湿的变化，也曾生长着各种树木。不过，大约从公元前11000年起，降雨量开始减少，遂出现大草原和沙漠。约距今10000年前，西亚地

① Powell 1985.

② Postgate 1992, p.167.

③ Civil 1994；杨炽 1982。

区的气候和植被变得大致与现在相同。不过，尚存在地区性气候变化。有证据表明，在两河流域南部的一些地区气温发生过变化：古巴比伦时期（前1800～前1650年），大麦的收获时间在3月底和4月初；到了新巴比伦时期（前600～前400年），麦收的时间推迟了1个月，即推迟到4月底和5月初；而现在的同一地区的麦收时间在二者之间。[①]这说明，这里的气温曾一度变低，后来又有些回升。再如，10世纪时，伊拉克北部的辛贾尔等地，枣椰树十分茂盛，而且硕果累累。而如今，希特以北，枣椰树不结果实，[②]说明气候有所变化。

按气候的不同特点可把西亚划分为四个区域。一曰高山区，这里冬天寒冷潮湿，而夏天干燥。二曰副山区，即地中海沿岸地区和扎格罗斯山脉以及托罗斯山脉的余脉地区，这里冬季温暖潮湿，而夏季炎热干燥。三曰大草原地带，即副山区以东、以南及伊朗和土耳其境内的高原地区。这里冬季温和干燥，而夏季炎热干燥，于是形成开阔而无树木的草原。四曰沙漠地带，都在阿拉伯和伊朗内地。这里冬季温和干燥，而夏季炎热。

大部地区冬季降雨，只有阿拉伯半岛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夏季也降雨。沙漠地带的年降雨量远低于100毫米，大草原地区的年降雨量在200～400毫米之间，山区的年降雨量最多，部分地区超过1000毫米。许多地区有时连续几年不下雨。两河南部平原的年降雨量一般在115～135毫米之间。

地中海沿岸和伊朗高原年平均温度在15～20℃，安纳托利亚中心地区的年平均温度在10～15℃，而在高山地区，年平均温度不超过10℃，山脊地区不超过5℃。阿拉伯半岛的年平均温度高于25℃，个别地区的最高温度超过50℃。

“尘暴”（dust devils）是西亚干旱平原地区的标志之一。“尘暴”起处，风卷沙土，天昏地暗，犹如一团云雾。它遮天蔽日而来，铺天盖地而去。“尘暴”卷起的“土墙”可高达几百米。

第六节　植物

由于西亚各地区的气候不一样，所以，各地的植被也不尽相同。再加上各地的土质、地形和水源方面的差异，各地区的植被就更加多种多样。不过，在过去的1万年里，由于人为因素，如开荒造田、无节制地放牧、乱砍乱伐、拦河筑坝等，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和改变着各地的自然生态，原始生态已很少见。

地中海沿岸：地中海东岸地区主要生长开阔的常青林和稀疏的针叶林，其中包括地

① Neumann 1978, p.249.

② Oates and Oates 1977, p.117.

图 5 黎巴嫩雪松。在古代就遭到大量砍伐，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大片雪松林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仅在个别自然保护区才能见到雪松(Hrouda 1991,27页)

图 6 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大沙漠（Hrouda 1991，29 页）

中海橡树和两种松树，即意大利五针松（Pinus pinea）和阿勒波松(Pinus halepensis)。但由于人们自古就毁林造田和伐木建筑，所以常青林早已变成了通常只有 2～5 米高的常绿灌木林（Macchia)。它们茂密丛生，其中没有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此外，地中海东岸地区还生长莓实树（Arbutus unedo/andrachne)、月桂树（Laurus nobilis)、笃蓐香（Pistacia terebinthus)、欧石南（Baumheide)、桃金娘（Myrtaceae)、角豆树(Ceratonia siliqua）和野生橄榄树(Olea europaea)。橄榄树是地中海地区的标志树，它们自古就是人类食油的来源。人工培植的植物有葡萄（Vitis)、无花果树（Ficus)、扁桃树（Prunus amygdalus）以及从东亚引进的柑橘树（Citrus)。

黑海和里海沿岸：组成黑海和里海沿岸亚热带森林的树木主要有欧洲鹅耳枥（Carpinus betulus)、橡树（Quercus)、梧桐树（Platanus)、椴树（Tilia)、欧洲白蜡树(Fraxinus excelsior)，也有少量榆树（Ulmus）和欧洲山毛榉（Fagus silvatica)。各种攀缘植物与树木盘结在一起，像热带丛林一样，人几乎无法穿过。人工培植的植物主要有玉米、茶和欧洲榛子(Corylus avellana)，果树主要有苹果、梨、李子和樱桃。如今，在里

海低地，通过灌溉，可以获得水稻、棉花、茶叶和柑橘的高产。

高山区：西亚的山区植物属稀疏的干旱森林型，但较潮湿的小亚细亚的本都山脉例外。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区，已开始出现耐寒的针叶树，如冷杉（Abies）和云杉（Picea）。在海拔2000～2500米的高山区，由于气候一年四季比较湿润，所以，常有封闭的高山草原存在。由于托罗斯山脉、扎格罗斯山脉和厄尔布尔士山脉的高山森林地带夏季干燥，冬季寒冷多雪，所以，这里只能生长橡树、欧黑松（Pinus nigra）以及欧洲刺柏（Juniperus communis）等热带稀树。最能反映托罗斯山脉气候特征的树是奇里乞亚冷杉（Abies cilicia）和黎巴嫩雪松（Cedrus libani）。由于过于干燥，这里连高山草原都没有。地中海东岸山脉的森林自古就多遭农耕者砍伐，结果森林多变为耕地。《旧约》中描述的、由常青橡树和针叶树组成的茂密的乔木林，早已不复存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西部山区的特征树——黎巴嫩雪松，迄今已所剩无几。名副其实的森林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常绿灌木林或其他稀疏的灌木丛。地中海东岸山脉的很大一部分由于土壤腐蚀而变得光秃秃，现在多为不毛的“喀斯特牧场”，只偶尔在石缝中长出一丛小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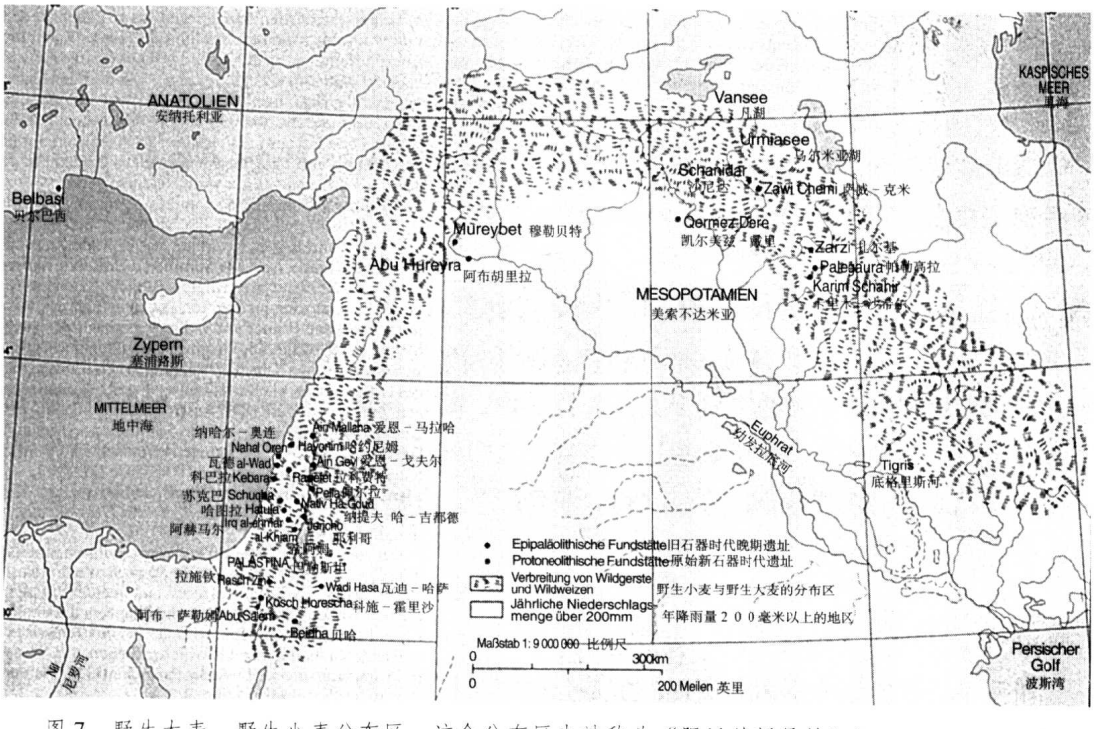


图7　野生大麦、野生小麦分布区。这个分布区也被称为“肥沃的新月地”（Roaf 1998，24页）

大草原与沙漠：大草原不生长树木，而只生长矮小灌木，譬如蒿属植物（Artemisia herba alba）和各种禾本科植物，譬如细茎针茅（Halfagras/Esperatogras）等。原始的草原植物早已牧尽，取而代之的便是蒿属植物草原。而如今，越来越多的草原变成耕地。

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原被阔叶树林覆盖，主要树木是橡树，与之共生的有代表草原特点的蒿属植物。伊朗境内的草原植物主要是灌木丛。越往东，气候就越干燥，就越接近沙漠，植物也就逐渐转变为沙漠型植物。属于“新月沃地”的大草原，年降雨量在200～300毫米之间，比较潮湿，所以，植物生长也相对茂密。不过，自青铜时代起就不断有人在这里开荒种田和放牛牧马，因此，这里的生态也发生很大变化。从这里开始，越往南就越接近半沙漠地带，气候就越干燥（年降雨量在60～100毫米之间），植物之间的空间就越来越大。阿拉伯大沙漠（Rub'al-Hali，Nafud）和伊朗境内的砾漠和盐漠，即喀威尔沙漠和卢特沙漠，有时几年不雨，所以，这里几乎什么都不长，可谓是地道的不毛之地。一场雨过后，地面会稀稀拉拉长出一层小草，不过，绿色的光临很短暂，几日即逝，可能一去几年不再光顾。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低洼平原的植被以水生植物为主，其中主要有河滩林（Auenwald）、芦苇丛（Roehricht）、柽柳灌木丛（Tamariske，Tamarix-Gebuesch）以及生长在河岸的茂密的芦苇（Schilf，Phragmites communis）。

第七节　动物

西亚地区的动物种类很多。羚羊、野驴和野牛主要生活在草原，野绵羊、野山羊、鹿和狍主要生长在山区，野猪则喜欢比较潮湿的地带。猛兽有亚洲胡狼（Canis aureus）、狼（Canis lupus）、熊、猞猁（Lynx）、鬣狗（Hyaenidae）、猎豹（Acinonyx jubatus）、豹（Panthera pardus）、虎和狮。较小的哺乳动物有狐、兔、野猫、刺猬以及各种啮齿目动物（Rodentia）。骆驼和马这两种动物在冰河纪已灭绝，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又出现。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也非常多见，如龟、蛇、蜥蜴和蛙。在河、湖、海里，生存着各种鱼类和贝类动物。鸟类动物也十分丰富，其中候鸟很多，因为地中海沿岸和波斯湾是候鸟从欧亚大陆飞往非洲的必经之路。鸵鸟、鸨、山鹑、鸭和鹅是人类的重要食物。

第八节　水

西亚不缺水的地方不多。所以，水是选地定居和择地耕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可以长期受益于河水的地区只有安纳托利亚北部的沿海地区和两河流域。

在北部高原地带，雨季一到，干枯的河床里便又有水流动。在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干涸河道在雨季又蓄水的情况却不常见。这里，偶有大雨降临时，干涸的瓦迪里顿时激流汹涌，大水卷带沙土碎石，向低处急流，把过去的小水沟冲成深沟，有时还会冲毁街道。这些由雨水形成的激流最终或渗入沙土中，或流入盆地。流入盆地的水在炽热的阳

图 8　狗。尼尼微“北宫”的石板浮雕（Roaf 1998，3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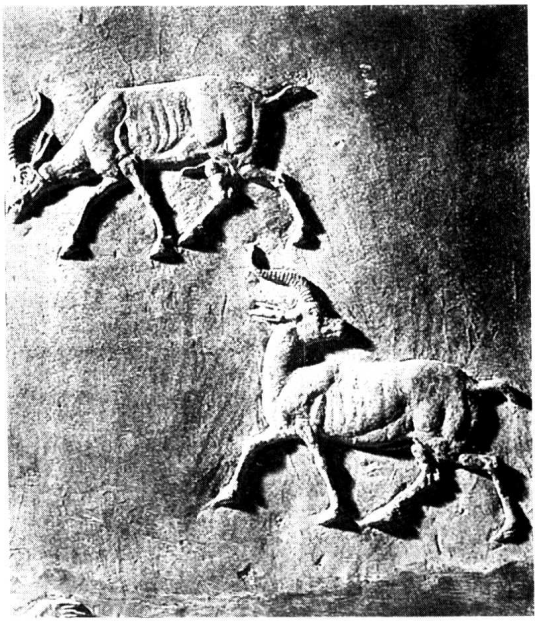


图 9　羊。尼尼微“北宫”的石板浮雕（Roaf 1998，3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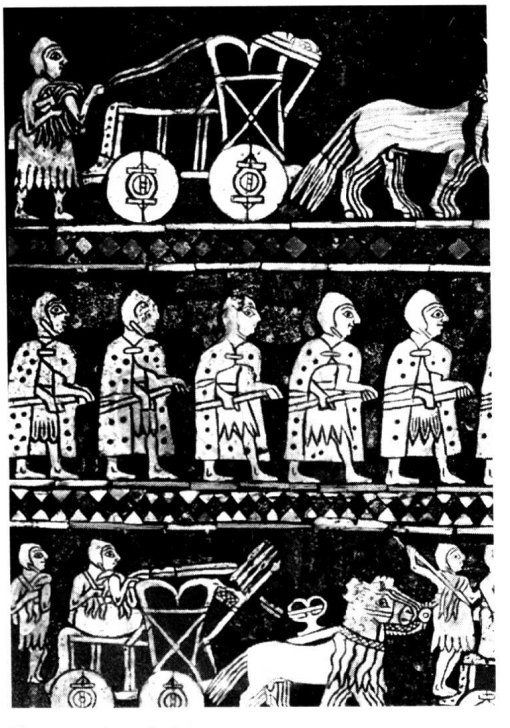


图 10　驴。镶嵌工艺“乌尔军旗”中的一部分（Roaf 1998，9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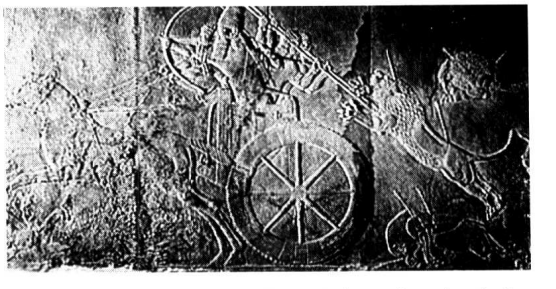


图 11　狮与马。尼尼微“北宫”的石板浮雕（Hrouda 1991，353 页）

图 12　“埃及”（?）进贡给亚述的动物。萨尔曼纳萨尔三世的“黑色方尖碑”浮雕中的一部分（Roaf 1998，37 页）

光下蒸发，然后，地表会形成一层闪闪发光的盐壳。如果一个盆地的积水在每年的雨季都会得到其他地方流来的雨水的补充的话，这个盆地就会逐渐变成盐湖。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凡湖和死海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不流入海洋的内陆排水形式是西亚的一些高原地区和阿拉伯半岛的河流特点。

大草原与沙漠地带的地下水是古生的，即在潮湿的更新世形成的。那时，这里的植物很茂盛，阻止了水的横向流失，把水引导到地下。目前，只有在潮湿的山区和大河的平缓地区才有可能有新的地下水形成。幼发拉底河东部的沙米耶沙漠（Shamiyah），地下水位深至距地表 200～400 米，因此，打井取水是完全不可能的。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叙利亚草原北部地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里的地下水位距地表只有几米。因此，早在青铜时代人们就开始掘井取水，井水不但作为饮水，还被用于灌溉。自从掘井技术发明以后，“新月沃地”北部的居民就不再像以前一样依赖河水，从而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不过，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北部的地下水平均含盐较多，原因在于中新世时这里的地下形成含盐和石膏较多的地层。

在石灰岩山区，大量喀斯特泉构成主要水源。雨水从喀斯特化岩石的裂缝中流入地下，之后，由地下的喀斯特系统储存起来，终有一日，这些被储存起来的地下水又涌出地面，形成水源。仅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哈布尔河就有 13 个这样的水源，都在叙利亚境内的拉斯艾因（Ras al-'Ayn）附近。

在沙漠地带维持生命全靠泉水，然而泉水水源并不多见。有泉水的地方，一般就有沙漠绿洲。叙利亚境内的沙漠草原中的巴尔米拉（Palmyra）就是个典型的沙漠绿洲。虽然水中硫磺的含量很高，但它还是使这个地方先变成了沙漠贸易的中转站，后来成为重要的商城。

图 13　出土于尼尼微辛纳赫里布宫殿的石板浮雕。用“沙杜夫”把水提到灌溉渠里的灌溉方法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就开使广泛使用（Hrouda 1991，201 页）

缺水迫使人们采取有效措施，高效地利用水。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明和完善了多种行之有效的灌溉技术，譬如，某些山区农民很早就采用把水储蓄在地坑里、需要时再引水灌田的灌溉方法；又如，早在古罗马时代，人们就开始在大河流域利用戽斗轮引水灌田：先把河水用戽斗轮提到高架渠中，然后再引入田地。当今，不论在奥龙特斯河岸的哈马（叙利亚境内），还是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安纳（Ana，伊拉克境内），都还能见到这种戽斗轮。最新研究结果表明，早在新亚述时期，哈布尔河两岸就有人工蓄水渠存在，目的在于把水从水源丰富的托罗斯山脉的山前地带引到干旱的平原地区。现在，人们用水泵抽水灌溉，或拦河筑坝，以求充分利用水源，解决缺水问题。然而，在提高了用水效率的同时，也出现种种不良后果：地下水位下降，古代生成的地下水枯竭，土地盐碱化，泉水闭流等等。急功近利，危害无穷。

第九节　“丘”

1840年，英国年轻律师、后来成为考古学家和外交家的莱亚德（A.H.Layard）来到两河北部，准备在现代城市摩苏尔以西的一个叫阿法尔（Tell Afar）的小镇过夜。“傍晚，我爬上山丘，来到城堡，……从墙上放眼望去，我可以看到一个一望无边的平原缓缓向幼发拉底河西岸延伸过去，最后消失在朦胧中。古代村镇遗址四面八方平地而起，太阳落山时，我数了数遗址丘，多达一百多个，它们长长的黑影在平原上交错。它们是亚述文明和亚述繁荣昌盛的见证。”[①] 莱亚德对他见到的遗址的数目丝毫没有夸张，但他把看到的所有遗址都说成是亚述繁荣昌盛的见证却不尽正确，因为许多遗址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斯特拉波在他的《地理学》中也谈到“在这整个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山丘”。[②] 从30年代末开始，伊拉克考古工作人员对伊拉克境内的遗址进行了普查，到1949年为止，已经在地图上标明了5000个遗址的准确位置。[③]

“丘”在阿拉伯语里被称为Tell（如Tell Asmar），库尔德语称为Tepe（如Tepe Gaura），土耳其语称为Hüyük（如Acemhüyük或Acem Hüyük）。[④]

“丘”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以土坯为建筑材料，二是长期在一个地方居住。在正常情况下，土坯房屋的平均使用年限不超过30年。[⑤] 即使没有人为破坏（如部落战争或遭到强盗洗劫），土坯住房也要代代翻修。铲平旧房，在此基础上再造新居，

① 转引Lloyd 1963，15页。
② 转引Brackman 1981，11页。
③ Lloyd 1963，p.99.
④ Hrouda 1971，p.304 note 2.
⑤ Lloyd 1963，p.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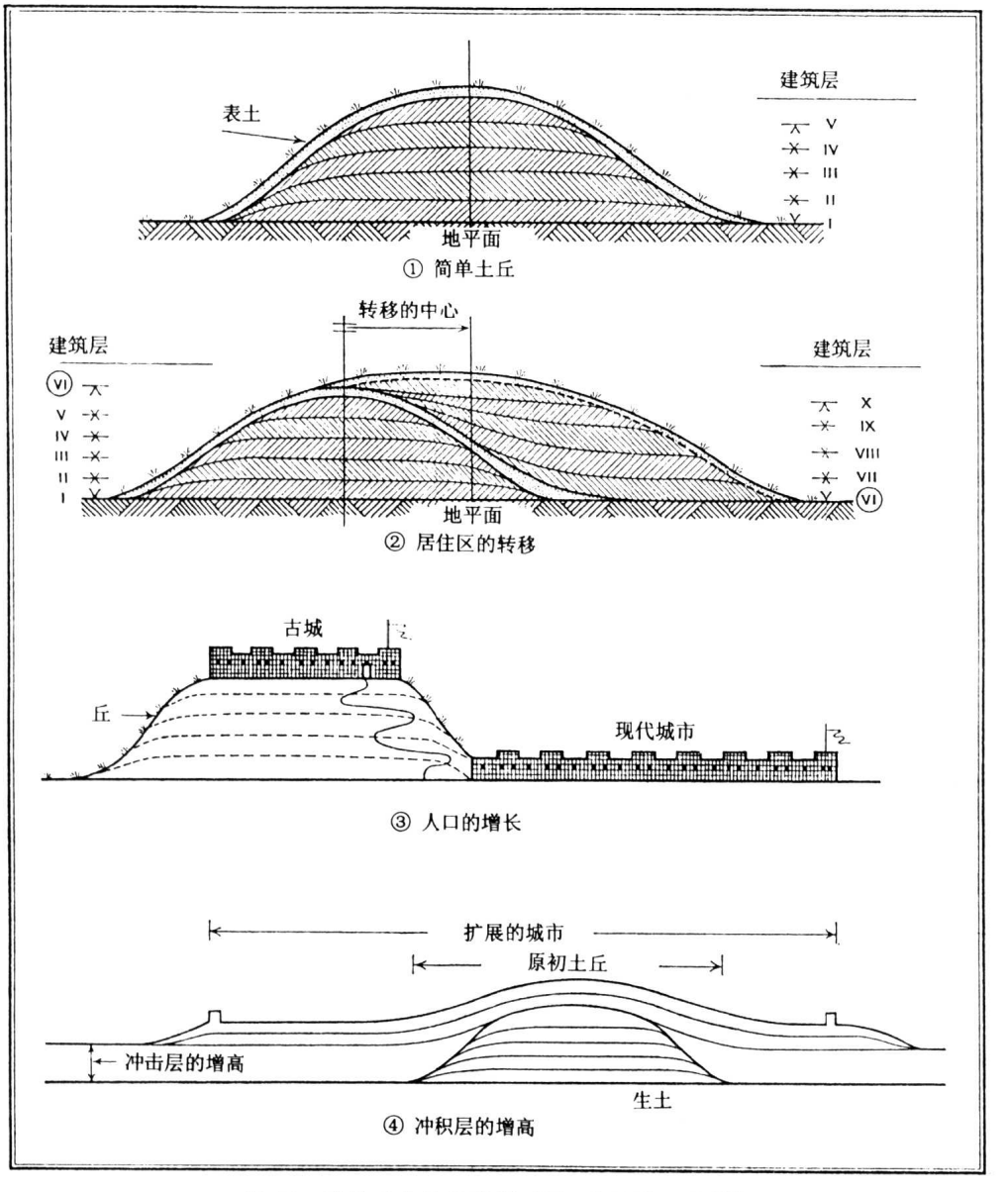


图 14 遗址丘结构示意图（Lloyd 1963，19 页）

其结果是新居的基础比旧房高了一些。[①] 在战争等灾难性情况下房屋遭到破坏时，往往是房顶被焚烧后与围墙和隔墙一起坍塌。灾难过后，人们往往铲平残垣断壁，然后在此基础上再造新居。这个坍塌层有时可能会达到原来房屋高度的 1/3，在这个基础上建起

① 德鲁加斯在发掘海法吉的辛神庙时，发现该神庙在第二次重建后的 16 年里，地面高度增加了 75 厘米。见 Lloyd 1963，43 页。

的新居的高度就不言而喻了：水多高船就多高。就这样，人们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的住地也就逐渐地拔地而起，最后竟然形成了“丘”。这样形成的“丘”，其平面图形可能多种多样，或为圆形，或为椭圆形，也可能是正方形等等，但不论什么形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下大上小。这就与人口的增长形成了矛盾：一方面居住面积在逐渐缩小，而另一方面人口却在不断增长。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大概有三个：一是完全放弃旧地，在其他地方重新开辟新的居住点；二是走下来，在“丘”的下面重新开辟新的居住地；三是部分居民仍然居住在“丘”上，部分移居“丘”下，形成老城和新城两个部分。当然，除上述原因外，人们放弃“土丘”家园可能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河流改道。尤其是在靠人工灌溉才能维持农业生产的地区，河水如同生命，是万万不能没有的。所以，河流一旦改道，人们就不得不放弃家园，人随水走，逐水而居。在不存在河流改道和人口增长问题的情况下，人们也不能在一个“丘”上永久居住下去，因为这个“丘”终有一天会小得和高得无法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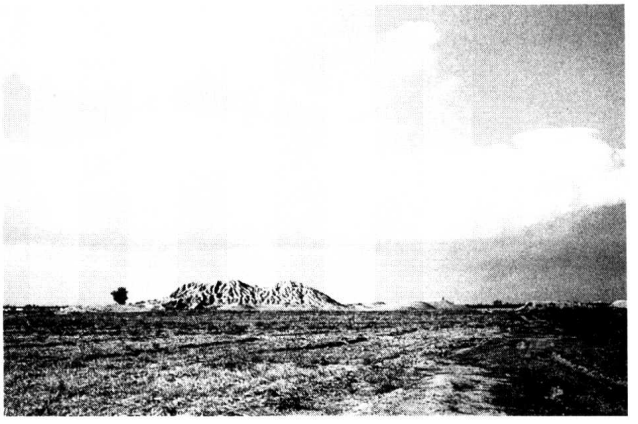


图 15　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者遗址（Hrouda 1991，121 页）

图 16　布拉克遗址（Curtis 1982，36 页后，Pl.4a）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两河流域的平原上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的“土丘”。这些曾使早期欧洲探险家和游客感到茫然、而令后来的欧洲挖宝者和考古学家垂涎三尺的“土丘”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标志，是古老文明的见证。

第二章　古典著作与《旧约》

第一节　古典著作

在近代西亚古物学和考古学产生以前，人们了解西亚历史和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作家，一是《旧约》。古典作家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撰写的著作中多有涉及西亚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之处，《旧约》中也多处讲到亚述的历史与文化。亚述学的诞生过程实际上就是西方近代东方学者不断脱离古典著作和《旧约》中的有关西亚历史文化的叙述而逐渐取证于西亚考古新材料的过程。亚述学诞生以前，人们靠古典作家和《旧约》来重构西亚历史和文化，亚述学诞生以后，人们只是到古典著作和《旧约》中看看它们描述过西亚的哪些历史与文化。古典著作和《旧约》的史料价值虽然由于西亚考古学和亚述学的诞生而降低了，但它们仍是我们研究古代西亚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辅助）史料。有些古典作家的材料是通过实地考察得来的，他们已经开始进行西亚“考古”。因此，我们的西亚考古史就从他们开始讲起。

涉及古代西亚历史与文化的古典著作有史著、文学以及自然科学论著三类。

一　史著

最早的有关史著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30/420年）的《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该书是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也因此被古罗马作家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年）誉为“历史之父”。

《历史》用埃奥尼亚方言撰写，共九卷。前五卷（至Ⅴ.28）叙述希腊各地区及西亚—北非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山川河流。第五卷之后（Ⅴ.28以后），叙述希波战争的详细经过，止于公元前478年。该书“史料丰富，载录古代世界二十余国及地区概况，犹如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全书叙事流畅，文笔生动，颇具文学价值。作者虽迷信天命，有浓厚的宗教思想，且疏于考证，但此书仍不失为西亚、北非及希腊地区之‘通志’，是今人研究世界上古史的重要史书。”[①] 不过，希罗多德笔下的历史不尽

① 《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326页。

可信，[1] 笔者甚至对希罗多德到过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说法持怀疑态度。[2]

关于希罗多德著《历史》的目的，一说是为了追溯希波战争的历史根源，一说是为了以赫卡泰厄斯（Hecataeus，约前550～前478年）的著述方式撰写一部全球通史。[3]

《历史》叙述巴比伦尼亚的主要部分集中在第一卷的第178至200节（Ⅰ178～200），其他有关章节分别是Ⅰ103～106、Ⅱ141、Ⅲ150～160、Ⅳ1、Ⅳ11～13等。

稍晚于希罗多德的编年史作家勒斯玻斯的赫拉尼科斯（Hallanicus，前480～前395年?）也对西亚的历史文化有所叙述。

其后就是色诺芬（Xenophon，前430～前354年）。他的《远征记》不但记述了他率领万余名希腊雇佣军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反对其兄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Ⅱ，前404～前359年在位）的库那克萨之战（前401年），还记述了他在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见闻，是今人研究这些地区历史、民俗和地理的重要史料。他的著述很多，与西亚有关的还有《居鲁士的教育》。

与色诺芬同时代的有关作家是忒息阿斯（Ctesias）。他是尼多斯（又译克尼多）人，家里世代为医，他本人也是医生。自公元前405年起给波斯王室当御医。他不但给王子公主治病，还为政治上十分活跃的太后帕丽撒提斯（Parysatis）治病。他是以什么身份和由于什么原因到波斯的都不详。据色诺芬《远征记》（Ⅰ,8:26），他参加了库那克萨战役，当然是站在“大王”阿塔薛西斯二世一边。公元前398年，成为波斯王与雅典统帅科侬（Conon）的联络员。此后不久，返回故乡。由于曾为波斯人效劳，受到斯巴达人控告。此后情况不详。

忒息阿斯著有《波斯志》，共23卷，其中一至三卷为亚述史，四至六卷为米底史，其余为波斯史，止于公元前398年。原著失传，片段散见于狄奥多鲁斯（Diodorus，前90～前21年）、大马士革的尼古拉（Nikolaos，Nicholaus，约前64～?年）和福提斯（Photius，820～891年）等人的著作。忒息阿斯被誉为“历史文学的创始人之一”，[4] 他的著作是古典时代以及其后的几百年里人们了解西亚历史的重要史料。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希腊人对西亚的兴趣越来越大。随同亚历山大东征的克利塔科斯（Cleitarchus），著了一部浮夸的东征史，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只是散见于他人的引述。

随亚历山大东征的托勒密（Ptolemaios）亦曾著《亚历山大大帝传》（《东征战史》），

---

① 参见 Wilhelm 1990。

② 参见拱玉书“《贝希斯敦铭文》与《历史》”，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9～38页。也有迹象表明，希罗多德可能游历过两河南部，见 RlA 4（1972～1975），332页。

③ RlA 4（1972－1975），p.332.

④ RlA 6，p.254.

也没有以原貌流传于世，而只是见于后世史家（如阿里安和狄奥多罗斯）的著作。

随同亚历山大东征的亚里士多德的侄儿和学生加利斯色尼斯(Callisthenes，前360?～前338年）著《波斯志》，亦大部散失，今只存片断。

据狄奥多鲁斯《世界史》，阿利斯托布尔（Aristobul of Cassandreia）也有过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巴比伦）的著述。

最后一位亚历山大传记作家阿里安（Arrian，95～175年）所著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有关古代西亚历史和民俗的详细材料。

大马士革的尼古拉著世界史144卷，其中论述东方古史的部分主要取材于希罗多德、忒息阿斯和赫拉尼科斯。

巴比伦贝尔—马都克（Bel-Marduk）神庙的祭司贝洛索斯（Berossos）用希腊语撰写《巴比伦尼亚志》。他本人不是希腊人，但由于他的著作被许多晚于他的古典时代作家所引用，影响很大，所以，当我们谈到古典时代作家论述西亚史时，不能不谈到贝洛索斯。

贝洛索斯生于公元前350～前340年间，亚历山大统治巴比伦时期（即前331～前324年间），他已成年，[1] 但具体生卒年代不详。他的《巴比伦尼亚志》据说是为塞流古的安条克一世而作，写作时间大约在安条克一世统治（前281～前261年）的某年至其移居希腊的科斯岛以前。有人认为，他的著作完成于公元前275/4年之前，而他移居希腊是在第一次叙利亚战争结束以后（前273/2年）。这样，他的生年可能在前340年前后，而移居希腊时大约65岁。[2]

《巴比伦尼亚志》共三卷，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卷：首先介绍了作者本人和他著《巴比伦尼亚志》所具备的条件，然后有重点地描述了巴比伦尼亚的自然环境，之后讲到文明的起源，其中包括创世神话和欧阿涅斯(Oannes）教化愚民、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的故事：欧阿涅斯是个半鱼半人而又非鱼非人的神话人物，他从海里来到巴比伦。当时，巴比伦人尚未开化，其生活方式与禽兽无异。于是，欧阿涅斯便教他们书写、制器、立法、务农、测量和建筑等，使他们摆脱了愚昧，从而走向文明。Oannes来自苏美尔语的Uanna，阿卡德语为Umanna，是一个巴比伦语的创世神话中的文明始祖阿达帕（Adapa）的别名。

贝洛索斯在第一卷中还介绍了巴比伦人的“月球说”：1.月亮是个球体；2.月球的一半发光而另一半黑暗；3.月球有三种运动，即（1）与宇宙一起纵向运动，（2）像其他行星一样横向运动，(3)自转，月球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朔望月；4.月相是月球自转

① 希腊语的成年指18岁。

② RlA 2，p.3.

图 17　人鱼。沙鲁金堡出土的石板浮雕（Black and Green 1992，131 页）

图 18　“库都鲁”石碑（约前 1100 年）。其中有些符号可能代表星座（Hrouda 1991，253 页）

时人们看到发光的那一半发生变化的结果；5. 月蚀是月球发光的那一半面向大地时被大地阴影遮蔽的结果。①

第二卷：逐一介绍巴比伦尼亚的历代国王：1. 洪水前的远古十王；2. 洪水故事；3. 洪水之后的八十六个“史前王”；4. 有史的各个朝代，直到那布那希尔（Nabu-nasir 前 747～前 734 年在位，贝洛索斯著作中的 Nabonassar）及其之后的两个不重要的统治者。贝洛索斯笔下的洪水前的远古十王，与《苏美尔王表》基本相符，不但人的名字形式基本相同，就是天文数字般的统治年代也多相吻合，如《王表》中的“18 SARS”（即 64800 年）也同样出现在贝洛索斯的著作中。洪水故事也与我们所知的楔文洪水故事同出一辙。楔文洪水故事中免于水灾的主人公是吉乌苏德拉（Ziusudra，阿卡德语为乌特纳皮施提/Utnapištim），贝洛索斯洪水故事中的主人公是西苏托罗（Xisuthros），显然是苏美尔语的 Ziusudra 的希腊化。不过，楔文洪水故事的主人公吉乌苏德拉的家乡是舒鲁帕克，而贝洛索斯却把它变成了巴比伦。

第三卷：叙述那布那希尔以后的历史，其中讲到辛纳赫里布（Sennacherib，亚述国王，前 704～前 681 年在位）与希腊人进行的战争和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Ⅱ，

① 巴比伦的天文学有三个学说，一是巴比伦学说，二是乌鲁克学说，三是希帕尔学说。巴比伦学说是纳布里阿诺斯 Naburianos（Naburi'anni）于前 508 年提出的，是三种学说中最早和最不科学的一种。乌鲁克学说较巴比伦学说有进步。三种学说中最晚和最科学的是希帕尔的基底努于前 379 年提出的。贝洛索斯是文学家和星占学家，但不是天文学家，在他著述的年代，“巴比伦学说”已过时。

图 19 天文学泥板（约前 200），上面刻有天文符号（Hrouda 1991，254 页）

巴比伦国王，前 604～前 562 年在位）的建筑功绩，包括空中花园。

由于贝洛索斯是巴比伦的贝尔—马都克神庙的祭司，他的《巴比伦尼亚志》主要“志”的是巴比伦（城）史，为巴比伦歌功，为巴比伦的护城神马都克颂德，宣扬巴比伦中心论。[①] 由于他把亚历山大视为把巴比伦人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救出来的救世主，所以，他对波斯持否定态度。他的名字本为 Bel-ussur 或 Bel-usur（巴比伦尼亚语，意为“神佑”）。古波斯语常把巴比伦尼亚语中的“l”译为“r”，因此，他的名字转写为古波斯语时就成了 Berussur。他在极力回避波斯人的影响的同时，也只字不提他本人名字受到的波斯语的影响。

贝洛索斯的著作没有完整流传下来，只是散见于几位后世作家的描述和引述。在这些作家中，亚历山大·波利希斯托（Alexander Polyhistor，大约生于前 100 年）是惟一读过贝洛索斯原著的作家，[②] 他也是所有引述贝洛索斯作品的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

亚历山大·波利希斯托是希腊人，在苏拉统治时被作为战奴俘往罗马。后被卖为家奴，最后被释放。他死于火灾，逝世时年纪已很大。他的著作很多，大都是地理历史著作，与我们有关的是他援引贝洛索斯著作的部分。不过，他的引文也没有以本来面貌流

① 贝洛索斯的“巴比伦中心论”多处都有反映，如洪水前的远古十王中的第一王和第二王本是埃利都的“国王”，而贝洛索斯却把他们说成是巴比伦王。又如，据泥板中有关洪水故事的描述，免于洪水劫难的吉乌苏德拉的家乡是舒鲁帕克，而贝洛索斯却把它变成了巴比伦。

② RlA 2，p.4.

传于世，而是散见于其后的其他史著。转引亚历山大·波利希斯托援引贝洛索斯的部分的作家主要有约塞夫·弗拉维（Josephus Flavius，37～98年）、伪阿波洛多（Pseudo-Apollodor，公元1世纪）和阿比德诺（Abydenos，公元2世纪，他也是最后一位修古代西亚史的古典时代作家），以及基督教史学家攸西比厄斯（Eusebius，约260～340年）。攸西比厄斯在其《编年史》中较详细地转引了亚历山大·波利希斯托援引贝洛索斯的部分，是所有转引亚历山大·波利希斯托著作的作家中转引最详细的一位。

直接引用过贝洛索斯著作的古典作家还有波塞多尼乌斯（Poseidonius，前135～前50年，主要引用了有关天文学部分）和尤巴二世（Juba Ⅱ，前50～20年）。转引波塞多尼乌斯援引贝洛索斯有关天文学部分的古典作家有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和罗马统治时期西西里的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等。

狄奥多鲁斯的著作[①] 讲到亚述人、迦勒底人、米底人、印度人和塞种人等，保留了一些否则必将失传的神话故事，如关于国王尼诺斯（Ninos）和色米拉米斯（Semiramis）的传说。

二　文学

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都渗透着古代西亚的影响。荷马（Homer，前9～前8世纪）和赫西俄德（Hesiod，前8～前7世纪）可能已听到过从腓尼基传来的“东方”的故事和传说。赫西俄德作品中的母题：神谱、父子为仇以及阉割，都见于赫梯神话“天上王权”。

自公元前5世纪的赫拉尼科斯起，许多古典作品中都讲到洪水故事，其滥觞亦在古代东方。迄今所知最早的“洪水故事”见于苏美尔人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吉尔加美什史诗》。

埃利安（Aelianus，约170～240年）的吉尔伽美什出生神话，实际上是萨尔贡出生神话的翻版。

寓言和谚语也多有源于古代西亚者。《伊索寓言》的作者伊索（约前6世纪）不但到过吕底亚，据说也到过巴比伦，见过巴比伦国王。《伊索寓言》中的许多寓言故事与楔形文字泥板中某些寓言故事如出一辙，显然不是偶然的。

卡里马科斯（Callimachus，前305～前240年）的作品和巴比里欧斯（Babrios，约公元1世纪在世）的作品中也保留了古代西亚的寓言。

---

① 他的《世界史》共四十卷，用希腊语撰写。起于远古，止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内战时期。今存有第一至第五、第十一至第二十卷以及一些残篇。头三卷主要介绍“蛮族”的历史文化。第二卷依据的蓝本是忒息阿斯的《波斯志》。

图 20 古巴比伦时期的赤陶浮雕。吉尔伽美什与恩启都战胜雪松林的看守胡瓦瓦（Hrouda 1991，286 页）

谚语主要保留在“阿奇卡尔说教”中。在本世纪初的 1906 至 1908 年间，人们在埃及的埃勒凡泰尼（Elephantine）发现用阿拉美亚语书写的纸草，内容包括书信、法律文书和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关于阿奇卡尔（Achiqar）的故事。故事说：阿奇卡尔曾是亚述国王埃萨尔哈敦（Asarhaddon，前 680～前 669 年）的宰相。他年迈后，国王念他功高，允许他把职位传给儿子那丁（Nadin）。可是，他的儿子不但不报答父亲的恩德，反而在国王面前诬陷其父。国王盛怒之下，立遣刽子手那布苏米斯坤（Nabusumiskun）去诛杀阿奇卡尔。当阿奇卡尔在花园中散步时，刽子手们一拥而上，把阿奇卡尔围住。阿奇卡尔向那布苏米斯坤求情。由于阿奇卡尔曾救过那布苏米斯坤的命，为了报答救命之恩，那布苏米斯坤便放过了阿奇卡尔，而杀了一个阉人作为替罪羊。后来的情节由于纸草残缺而不详。根据后世作家的评注，阿奇卡尔后来又得到国王的信任，其子受到惩罚。

在“阿奇卡尔说教”中，保留了很多极富教育意义并脍炙人口的“谚语”。这个故事中的人名都是地道的亚述语人名，人物的生活年代也与史实相符，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个故事的蓝本应是用亚述语撰写的，而阿拉美亚语版本可能是亚述语原著的译本。阿奇卡尔的故事在西方古典时代广为流传。据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Clemens Alexandrinus）讲，公元前 5 世纪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os）“智慧说”的根据就是阿奇卡尔的一篇碑铭。知道阿奇卡尔故事的古典作家还有以弗所的米南德（Meanderus，约前 2 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特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前 371～前 287 年）以及斯特拉波。

三 自然科学

在希腊古典时代，人们把天文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以至于“迦勒底巫术”的发源地都追溯到巴比伦尼亚和亚述。这时出现许多研究“巴比伦科学”的学者或受益于“巴比伦科学”的科学家。

其中较著名的有曾预言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那次日食的[①] 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前546年），据说，他的计算方法是从巴比伦学来的。

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或Anaximander，约前611～前546年）曾绘制天体图和地形图，发明日晷。他的天文知识也建立在“巴比伦科学”的基础上。[②]

阿那克西曼德的弟子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85～前528年）进一步发展了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论。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前500年）虽然到过埃及，但他却以“迦勒底人的学生”著称于当时。

图21　古巴比伦时期（约前1800年）的数学泥板。这时，人们已经知道勾^2+股^2=弦^2，但没有形成公式或定理，这个桂冠被2000多年以后的毕达哥拉斯夺了去，成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Hrouda 1991，249页）

尼多斯的攸多克罗斯（Eudoxos，约前391～前338年）考察埃及多年，获得丰富的天文数据，进一步发展了巴比伦的天文计算方法。

卡里波斯（Callipos，约前4世纪在世，是攸多克罗斯同时代人）也是著名的“巴

① 希罗多德《历史》Ⅰ:74。
② 希罗多德《历史》Ⅱ:109。

比伦学者”。

被誉为“西方天文学之父”的希帕库斯（Hiparchos，亦译伊巴谷，约前190～前125年）同样是著名的“巴比伦学者”，但他了解和掌握巴比伦天文学的方式和渠道不详。不过，早在100年前贝洛索斯就在科斯岛建立了天文学校，[①]而希帕库斯所在的罗得斯岛距科斯岛很近，所以，希帕库斯与贝洛索斯的学生有直接交往是可能的。希帕库斯在天文学上有多种发现，其中有“岁差”（回归年短于恒星年的现象）的发现。不过，德国亚述学家勒曼豪普特（C.F.Lehmann-Haupt）认为，“岁差”的发现不应归功于希帕库斯，而应归功于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帕尔（Sippar）的基底努（Kidinnu，希腊语为Cidenas），因为他早在公元前379年就在他署名的楔文泥板中叙述了“岁差”现象。[②]

公元前1世纪的基米诺斯（Geminos）仍然熟悉“巴比伦月球说”。

一些不见于楔形文字文献的巴比伦尼亚天文学家的名字反而以希腊语形式保留下来，如纳布里阿诺斯Naburianos，（巴比伦语应为Naburi'anni）等。

希腊人在学习引进巴比伦天文学的同时，也学习引进了巴比伦数学和几何学。第一个引进巴比伦数学和几何学的人也是米利都的泰勒斯。不过他很快就超越了巴比伦人，把许多算式用“定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公元前2世纪的数学家希普西克利（Hypsikles）把圆分为360度也是受巴比伦数学的影响而得出的结果。[③]到公元前1世纪的基米诺斯时，希腊人的水平远远超出了巴比伦人。

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情况主要反映在斯特拉波[④]的《地理学》里（第11～16卷）。此外，生活于奥古斯都时代（前27～14年）的伊西多（Isidor，原本美索不达米亚人）也描述过帕提亚（安息）帝国。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亦译《博物志》）和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克罗丢（Ptolemaios Claudius）的著作中保留了大量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情况。

第二节 《旧约》

《旧约》是近代西亚考古活动开始以前人们了解古代西亚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不过，《旧约》中涉及的西亚史，只是新亚述和新巴比伦帝国及古波斯帝国向外扩张领土、

① RlA 4，p.416.

② RlA 2，p.17.

③ RlA 3，p.646.

④ 就其语言和所受教育而言，他是个希腊人；就人种而言，他是个亚洲人；在骨子里他是个罗马人。Brackman 1981，p.11.

征服和压迫其他民族过程中的一些片段，只是与犹太历史有关的部分。虽然这些历史记载在有关考古材料出土以前非常可贵，但它们远远不能反映西亚史的全貌，充其量是管中窥豹。

《旧约》中除谈到巴贝尔塔（亦译巴比伦塔，Tower of Babel）的建造外，与美索不达米亚有关的章节还有多处。《旧约》中提到尼尼微20次，提到亚述132次。[①] 亚述国王和巴比伦国王对以色列和犹大（Judah）发动过战争，给那里的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对其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旧约》自然对这些国王和事件要有所记载。《旧约》中提到的亚述国王和巴比伦国王有许多，如提格拉特帕拉萨尔（Tiglatpileser Ⅲ，前744～前727年在位）、萨尔曼纳萨尔（Salmanassar Ⅴ，前726～前722年在位）、辛纳赫里布和尼布甲尼撒。辛纳赫里布曾施行移民政策，而尼布甲尼撒曾把犹太人俘往巴比伦。“流放巴比伦”是犹太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灾难，因此，《旧约》对此记载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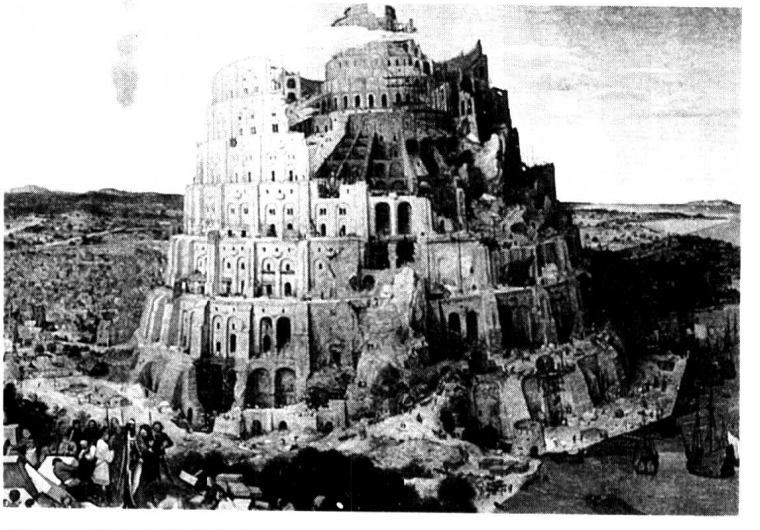


图22　巴贝尔塔的建造。老布鲁盖勒的油画，与真正的巴比伦塔庙相去甚远，与古罗马的圆形剧场倒很相似(Roaf 1998,223页)

“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具有战斗力的（男人）都掳去了，共一万人，包括所有的木匠和铁匠。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Jojachin）和王母、后妃、太监和国中所有贵族，都从耶路撒冷掳到了巴比伦。……”[②] 尼布甲尼撒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Mattanja）为王，改名为西底家（Zedekia），统治耶路撒冷。9年后，西底家背叛尼布甲尼撒，致使尼布甲尼撒再度攻陷和洗劫耶路撒冷，第二次把犹太人俘往巴比伦。直到波斯的居鲁士统治时期，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才又得以重返家园。[③]

---

① Brackman 1981, p.12.

② 《列王纪》下，24章:13～15；《历代志》下，36:章17～20。

③ 《以斯拉记》1～2章。

图 23 火烧巴比伦。16 世纪德国木刻（Roaf 1998，223 页下）

犹太人对亚述国王和巴比伦国王攻陷和洗劫耶路撒冷及其他的城市、奴役其居民的暴行，时刻怀恨在心，无时不在伺机反抗，并期盼这些压迫者有朝一日受到报应。所以，《旧约》对尼尼微和巴比伦的“倾覆”大着笔墨，[①] 详细叙述了压迫者终遭报应的惨相。

① 《以赛亚书》21 章:1～9;《那鸿书》1～3 章。

第三章　欧洲人的实地考察

（1160～1842年）

希罗多德、色诺芬、忒息阿斯等希腊古典作家，代表了欧洲古典时代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水平，亚历山大东征后，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不过，他们认识的只是“东方”当时的现代，对其辉煌的过去，仅停留于记录传闻，没有任何人做过深入研究。亚历山大时代过后，直到文艺复兴以前，欧洲人对“东方”古代的认识几乎停滞不前。史家著史多依据希罗多德、色诺芬、忒息阿斯和贝洛索斯等古典作家，未尝有超越者。

文艺复兴后，欧洲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出现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封建生产关系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立；批判教会和神本思想，崇尚自然科学；发展海上交通，扩大认识世界的范围等等。人文主义的蓬勃发展和师古、访古、收藏古籍行为的蔚然成风，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特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洲出现自古典时代以来第二次重新发现和认识“东方”的热潮，其表现之一就是很多人争先恐后来东方探险和考察，或单枪匹马，或三五结伴。起初，到东方探险访古完全是个人行为，自1761年丹麦国王派遣探险队起，东方探险开始向国家行为转化，到19世纪中叶，西亚考古已经完全变成国家行为或带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经济利益的集团行为。

不过，第一个来到东方的欧洲人远不是在近代，而是早在12世纪，这个人就是犹太人拉比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①] 他出生于西班牙的纳瓦拉(Navarre)。于1160～1173年，游历了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和埃及，大约于1173年经亚述和巴比伦尼亚到达波斯，后又东行，几乎到达中国边界。他到过尼尼微和巴比伦，他也像许多后代学者一样，认为比尔斯—尼姆鲁德（Birs Nimrud[②]）的塔庙就是《旧约》中讲的巴贝尔塔，即“通天塔”。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旧约》中讲的巴贝尔塔在巴比伦，与贝尔神庙“埃桑基拉”（Esagila）相毗连。那么，为什么本杰明到了巴比伦却没有见到“通天塔”呢？我们知道，早在亚历山大东征时与“通天塔”相连的埃桑基拉神庙就已成为废

---

① A. Martinet, Reisetagbuch des Rabbi Binjamin von Tudela, Berlin 1918. 本杰明的游记于1543年问世。

② 即古代的博尔希帕 Borsippa。

墟,[1] 亚历山大曾下命重建，可他壮志未酬身先亡。是否巴贝尔塔也像埃桑基拉那样早在亚历山大以前就成为废墟？这个问题目前无法解答。不过，可以肯定，在本杰明到达巴比伦时，那里的塔庙，即《旧约》中“通天塔”已遭到严重破坏，面目皆非。相反，比尔斯—尼姆鲁德的塔庙在本杰明时代尚保存完好。所以，人们当时把比尔斯—尼姆鲁德的塔庙误认为是《旧约》中的“通天塔”，张冠李戴，实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14世纪到过巴比伦的一个修道士奥多里库斯（Beatus Odoricus），也把比尔斯—尼姆鲁德的塔庙误认为是《旧约》中“通天塔”。后来的许多探险家都犯过同样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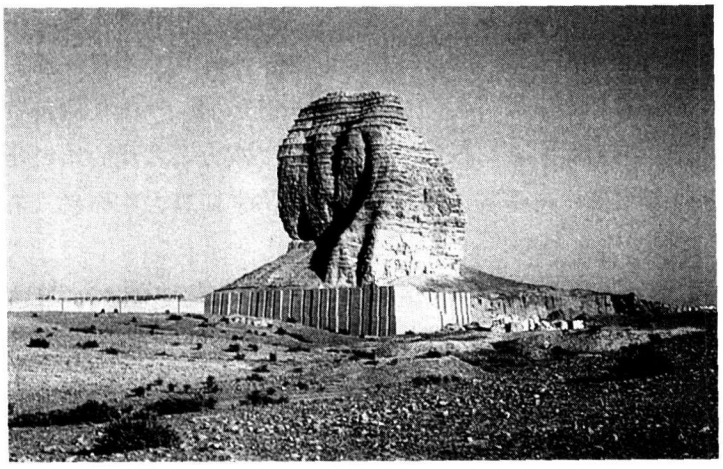


图 24 杜尔—库里加尔祖塔庙。这个由凯喜特国王库里加尔祖一世（前 14 世纪）建立的塔庙常被近代欧洲探险家误认为是巴比伦塔（Roaf 1998，141 页）

1271 年，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 年）前来中国，途经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波斯等地。他在其游记中也提到了摩苏尔，但对这些地方的古代遗址却只字未提。

1394～1425 年，德国巴伐利亚的骑士席尔特贝格尔（H.Schiltberger）成为战俘后，滞留西亚。这期间，他游历各地，曾到过美索不达米亚。返回家园后，著游记，于 1475 年出版。

1472 年，巴尔巴罗（Giosafat Barbaro）作为威尼斯派往波斯的使节到达波斯。他到过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帕萨尔加德和纳克什—卢斯坦，对那里的遗址和古迹进行了考察,[2] 成为第一个描述波斯古迹的欧洲人。不过，他对某些古迹的解释不正确，如把纳克什—卢斯坦的沙普尔雕像解释为参孙（Samson）[3] 的雕像等。

15 世纪时，许多英国人和意大利人都经美索不达米亚到过波斯和印度，他们大都是商人，对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古物古迹没有发生兴趣。

从16世纪后期开始，访古求知的游客多起来。其中主要有意大利人弗雷德里克

① Arrian, Anabasis, Ⅶ:17.

② 著 Viagi fatti da Vinetia alla Tana，于 1545 年发表。

③ 或译桑松，古犹太人领袖之一，以身强力大著称。

(C. Frederik, 1563 年)、德国奥格斯堡的医生劳沃尔夫 (L. Rauwolf)[①]、威尼斯珠宝商巴尔比 (C. Balbi, 1579 年)、英国人牛百利 (J. Newberrie, 1581 年)。英国人埃尔德雷德 (J. Eldred)、菲奇 (R. Fitch, 1550～1611 年)、珠宝商李兹 (W. Leedes) 和画家斯托里 (J. Story) 于 1583 年同乘一艘"老虎"号游轮，破浪向东。埃尔德雷德在游记 (于 1598 年出版) 中写到，当他从摩苏尔沿底格里斯河而下的时候，他看到了坐落在右岸的巴贝尔塔。其实，他看到的是杜尔—库里加尔祖 (Dūr Kurigalzu) 的塔庙，建于凯喜特时期。劳沃尔夫也似乎对巴比伦遗址作了仔细观察。不过，他对巴比伦的描述有些不着边际。他说他见到了巴贝尔塔的遗址，其直径为半里格 (约 2.4 公里)，其中多有"菱形洞"，并认为，这些洞的功能是用于通风或排水。他描述的这个坐落在巴比伦的巴贝尔塔与罗林森 (H. Rawlinson) 在比尔斯—尼姆鲁德见到的塔庙十分相似。可能劳沃尔夫也错把比尔斯—尼姆鲁德当成了巴比伦。

图 25　巴比伦塔庙遗址。塔庙外面的烧砖在塞流古时期就被作为建筑材料挪为他用，后来，被挖空的地方渗出地下水，并长出芦苇(Wilhelm 1998, 14页)

在上述游客中，虽不乏细心的观察者和出色的游记作家，但他们的游记多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对后来的考古发掘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1602 年，修道士、果阿学院的神学教授德·古维阿 (Antonio de Gouvea) 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派往波斯的使者来到波斯。他利用机会遍访古迹，发现楔形文字，成为向欧洲报道楔形文字的第一个欧洲人。他说，"没人能读懂它 (指楔形文字铭文)，因为其文

① 他于 1574 年来到巴比伦考察，归后著游记，于 1583 年出版：Leonardi Rauwolfen zu Augspurg Aigentliche Beschreibung der Raiss in die Morgenländer, Augsburg 15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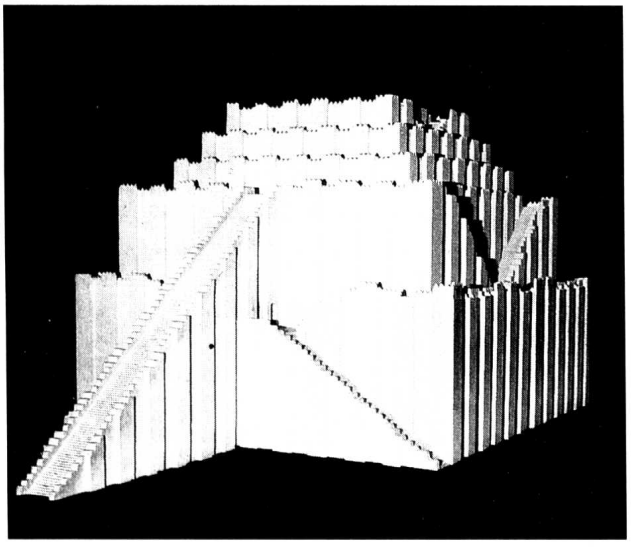


图 26 根据考古发掘和希罗多德的描述而制作的巴比伦塔庙模型（Hrouda 1991，160 页）

字既不是这个地区使用的语言中的波斯文字，也不是阿拉伯文字、亚美尼亚文字或希伯来文字。”[①] 不过，他对古迹的描述多有疏误，如错把波斯波利斯遗址当成了设拉子（Shiraz）古址。

1611 年，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也发表他的《传教士游记》[②]，描述了他的波斯之行。他也错误地认为，设拉子是建立在波斯波利斯遗址上的现代城市。

1617 年，顿·加西亚（Don Garcia de Silva Figueroa）来到波斯。他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正确指出，塔赫提—贾姆希德（Takht-i Jamshid）就是波斯波利斯。这样，他便成为第一个正确辨认出波斯波利斯遗址的人。[③] 他对那里的宏伟建筑赞叹不已，但同时对自己的正确判断也有些犹豫不决，因为根据古典作家的描述，波斯波利斯的建筑风格应该是“科林斯式、爱奥尼亚式、多立克式或混合式”。而他所见到的建筑，其风格与古典作家描述的相去甚远。他在描述他见到的文字时说，这样的字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所有的字都是“三角形，不过有点长，形如金字塔或小小的方尖碑”。陪他一起到波斯考察的一位画家还绘制了许多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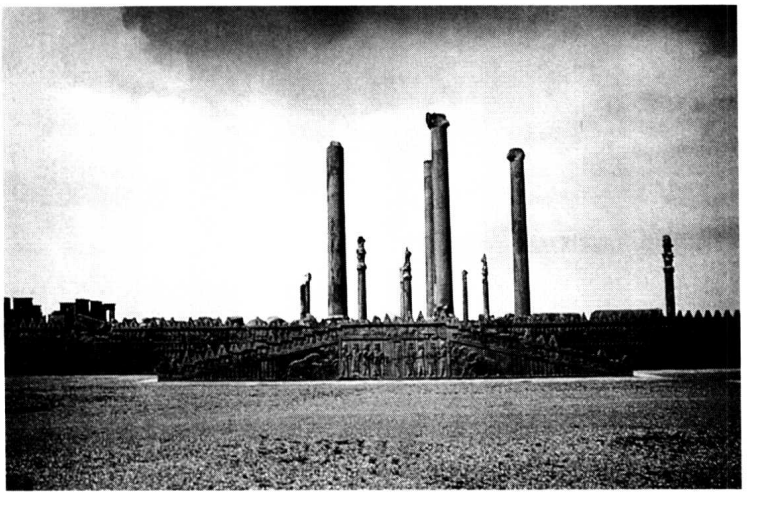


图 27 波斯波利斯的阿帕达纳宫殿遗址（Hrouda 1991，434/435 页）

① P. Fr. Antonio de Gouvea, Relaçam em que se tratam das guerras, Lisbon 1611, p.32. 转引 Bermant 1979, 70 页。

② The Preacher's Travels.

③ Garcia de Sylvay Figueroa, De Rebus Persarum Epistola, Antwerp 1620.

遗物图，并临摹了一段铭文，可惜这些图片从未发表。所以，这个第一个临摹楔形文字的人从未闻名于世。

1616～1621 年，一位名叫彼特罗·德拉·瓦莱（Pietro della Valle）的意大利古董商和学者游历了西亚，到了两河流域的巴比伦（1620 年）、乌尔和比尔斯—尼姆鲁德等地，后经波斯到过印度。他不但熟悉《旧约》，更精通希腊古典著作。所以，他很快就会把他见到的古迹与《旧约》或古典作家的某些叙述联系起来。他仔细地考察了巴比伦塔庙遗址，并把它与斯特拉波描述的贝鲁斯（Belus）陵墓联系在一起。他没有提到比尔斯—尼姆鲁德的塔庙，所以，他是否真的到过比尔斯—尼姆鲁德，还值得怀疑。他搜集了一些带有楔形文字铭文的砖，托人带给他的意大利朋友。他于 1621 年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时，在信中提到楔形文字，并随意从波斯波利斯的古波斯铭文中抄写了 5 个古波斯楔形文字符号。他的这封信于 1658 年在罗马发表，第一次把楔形文字形象地展示给了欧洲读者。他在其《游记》[1] 中还首次做了解读的尝试，即根据组成文字的楔形笔划的走向，猜测这种文字是从左向右书写的。他的这个正确猜测可被视为人们在漫长的楔形文字解读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正确的第一步。不过，他从未提到他在巴比伦搜集的刻字砖上的楔形文字，这颇有些令人不解。他很可能没有把刻字砖上的文字视为文字，而是当成了一种装饰图案。

图 28　彼特罗·德拉·瓦莱肖像（Wilhelm 1998，16 页 14b）

图 29　彼特罗·德拉·瓦莱临摹的五个楔形文字字母（Rogers 1915，22 页）

1626～1627 年，英国的赫伯特（T. Herbert）游历了波斯的帕萨尔加德、波斯波利

[1] Viaggi, Rome 1650. 他的《游记》于 1674 年被译成德文：Petrus Della Valle, Reissbeschreibung in unterschiedliche Theile der Welt。

斯和纳克什—卢斯坦，临摹了一些楔形文字铭文，并较详细地描述了楔形文字。他说，这些文字由各种“图形——方尖碑形、三角形和金字塔形”组成，它们组合得如此巧妙，决非“野蛮”人能为。不过，他一直把他所到的塔赫提—贾姆希德错误地当作古代设拉子，不知道它就是古代的波斯波利斯。他的游记于1634年发表。[①]

1638年，德·曼德尔斯罗（J.A.de Mandelslo）仔细考察了波斯境内的遗址。他是由德国东方学家厄尔施莱格（Adam Oelschläger）派往波斯进行考察的。他的考察结果由厄尔施莱格于1647年发表。[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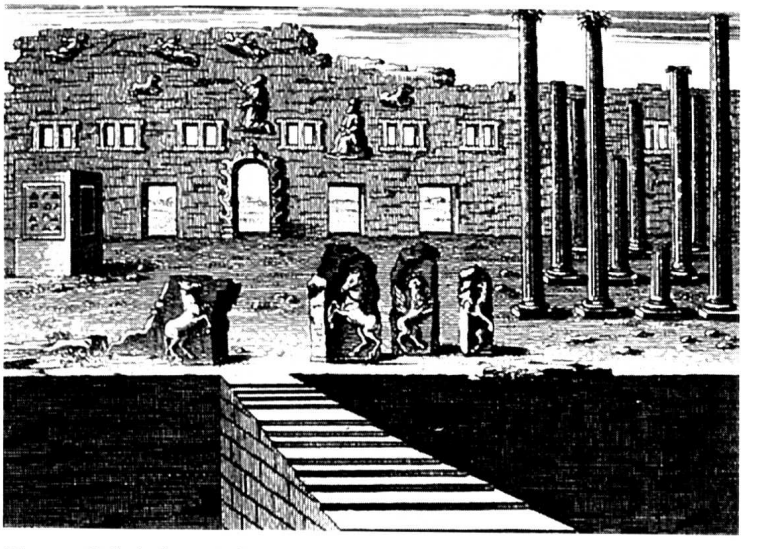


图30 曼德尔斯罗绘制的波斯波利斯宫殿“复原”图(Sancisi-Weerdenberg/Drijvers 1991，12页)

17世纪后半叶，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皮埃尔·埃马努埃尔(Pere Emanuel de Saint Albert)详细考察了巴比伦和巴比伦塔庙遗址。他离开巴比伦时越过幼发拉底河南下，随身带了几块在巴比伦塔庙遗址发现的刻字砖。不久，他又来到一个“山丘”，在这里他也发现了刻字砖，几乎和他带在身边的那些刻字砖一模一样。实际上，这里就是比尔斯—尼姆鲁德，古代的博尔希帕。当地人告诉他，这里就是古巴比伦遗址，而这个“山丘”就是巴贝尔塔遗址。但他没有相信当地人的说法，而坚持认为他到过的前一个遗址是巴比伦。当地人还给他讲了许多有关塔庙的传说，不过通通都是无稽之谈。

也是在17世纪后半叶，另一位意大利学者文森佐·玛丽亚(F.Vincenzo Maria)考察了两河流域：从摩苏尔到巴格达，又从巴士拉到希拉。他否定了杜尔—库里加尔祖的塔庙就是巴贝尔塔的说法。他的理由很简单：《旧约》中讲的巴贝尔塔，坐落在幼发拉底河岸，而他在巴格达附近看到的塔庙(杜尔—库里加尔祖塔庙)则更靠近底格里斯河。但他也没有辨认出真正的巴贝尔塔，而是像以前的许多人一样，错把比尔斯—尼姆鲁德当成了巴比伦。

1664年，年轻的法国画家德朗德（Andre Daulier des Landes）陪同塔韦尼埃

① T.Herbert, A relation of some years travaile, London 1634.

② Beschreibung der muscovitischen und persischen Reise, Schleswig 1647.

(J.B.Tavernier，1605～1689 年）考察波斯古迹。这是塔韦尼埃第六次到波斯。[1] 不过，那里的古迹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注意，他甚至认为，波斯波利斯的断壁浮雕是次品。对德朗德来说，这还是第一次来到波斯。他对残垣断壁、碑铭雕塑等发生极大兴趣。1665 年，他由因首次把咖啡引进法国而闻名的泰唯诺（J.de Thevenot，1633～1667 年）陪同，再次考察波斯。他绘制了许多图片，于 1673 年发表。[2]

1666、1667 和 1674 年，法国的夏尔丹（J.Chardin，1643～1713 年）到波斯的波斯波利斯和其他地方访古。他的游记于 1711 年发表，[3] 成为到那时为止最好的遗址记。书中的图版由格莱罗（G.J.Grelot）绘制，第一次试图再现阿黑门尼德王朝宫殿的风格、格局和规模。1674～1711 年间，夏尔丹仔细地研究了波斯楔形文字，确信它们是铭文，而不是装饰。他认为这些铭文应从左向右读，但同时也错误地认为，它们也可以从上往下读。他是第一个发表用三种语言文字书写的古波斯铭文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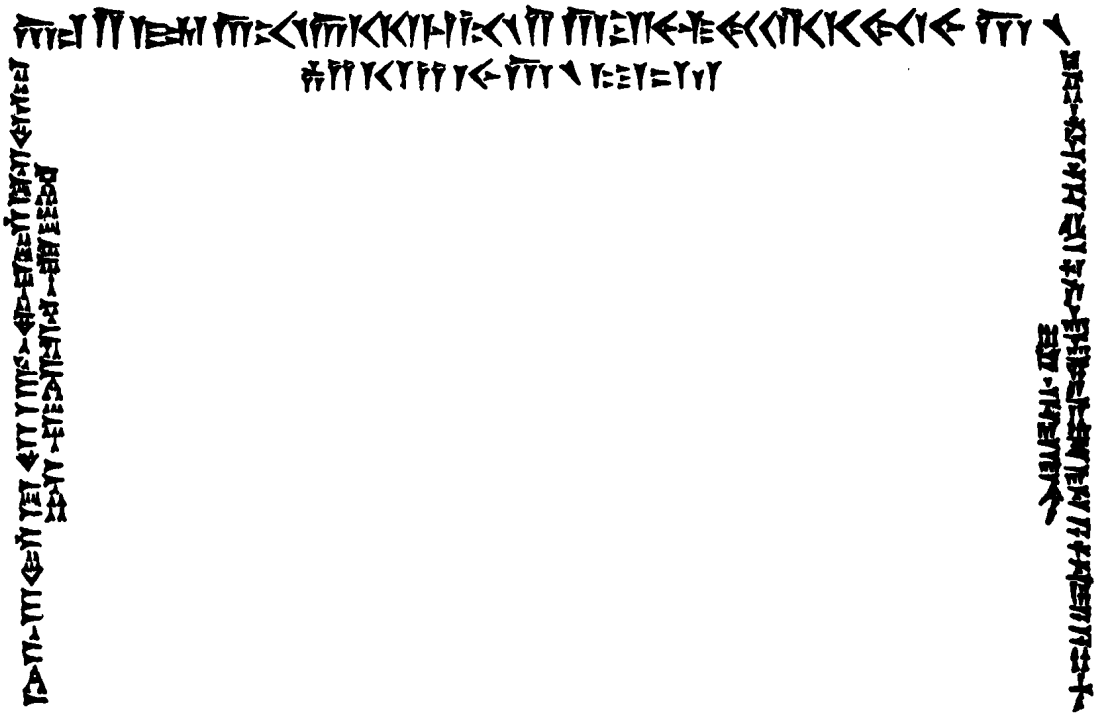


图 31　夏尔丹在其游记中发表的楔形文字铭文，上为古波斯语铭文，左为埃兰语铭文，右为阿卡德语铭文（Rogers 1915，32 页后）

① 他的游记于 1712 年发表：Les Six Voyages，Utrecht 1712。

② Les Beautes de la Perse，Paris 1673.

③ Voyages，Amsterdam 1711.

1667年，东印度公司代理弗劳尔（S. Flower）在波斯的诺克图雷斯坦（Nocture-stand）的一块大理石铭文上临摹两行楔形文字，于1694年发表。[①]这是第一次在欧洲用英文发表楔形文字。后来，这两行字被牛津大学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教授海德（T. Hyde，1636～1703年）收入他的《古波斯宗教史》。[②]海德称这种文字为“金字塔形或楔形”（dactuli pyramidales seu cuneiformes），是第一个使用Cuneiform“楔形”一词的人。不过，海德认为，这种“金字塔形或楔形”的东西不是文字，而是一种装饰。

1686年，肯姆普夫尔（E. Kaempfer，1651～1716年）[③]到波斯考察，他很重视铭文，并临摹了一段较长的巴比伦语铭文，他成为第一个发表巴比伦语铭文的人。[④]

17世纪末，威尼斯商人本波（A.Bembo，1652～1705年）游历波斯，见到贝希斯敦铭文和雕塑，成为最早发现和记述贝希斯敦铭文的欧洲人之一。

17世纪最后一位考察过波斯并著有游记的欧洲人是施特劳斯（Jans Janszoon Strauss）。但他的游记[⑤]没有为人们提供什么新信息。

时到18世纪，欧洲的游客、探险家和学者越来越多地把有关西亚的信息带到欧洲，游记已汗牛充栋，但是仅仅记游、记山川河流、记文物遗址和风土人情的游记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求知心理。人们渴望揭开神秘的帷幕，看到历史的真实，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神秘的文字说话。可是，那时楔形文字犹如天书，令人望而生畏，不但没有任何人能够解读，甚至没人相信能够解读。这些因素大概对欧洲人的探险热情产生了影响，因此，18世纪前半叶出现了探险低潮。直到18世纪60年代，才又有更多的人东游探险。从这时起人们对文字越来越关注。

18世纪上半叶和我们有关的探险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荷兰的勒布伦，一个是瑞典的奥特尔。

1704年，荷兰人勒布伦（Cornelis Le Brun de L'Aia，1652～1728年）到波斯考察，临摹了一些铭文。他从一个三行的窗楣铭文中发现，这个铭文只能横读，不能竖读，从而得出楔形文字只能横读的结论。他搜集了许多古物，托人带给阿姆斯特丹市长，其中有一个刻有楔形文字的石碑。他于1714年发表游记。[⑥]在谈到塔赫提—贾姆希德遗址时，他认为这些遗址不是神庙遗址，而是宫殿遗址，毁于亚历山大。

1734～1744年，瑞典东方学家奥特尔（J.Otter，1707～1748年）沿着一个世纪以

---

①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XVII (1694), pp.776－777.

② Historia religionis veterum Persarum, Oxford 1700.

③ 他出生在德国，也是在德国受的教育。后来长期居住在荷兰并在荷兰任职，所以，他常被视为荷兰人。他曾在日本学习植物学，Iris kaempferi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也学习过汉语。

④ E. Kaempfer, Amaenitates Exoticae, Lemgro 1712.

⑤ Les Voyages de J.Struys, Amsterdam 1681.

⑥ 1714年发表的游记用荷兰语书写，1726年出法文版：Voyages de Corneille Le Brun, Paris 1726。

前的赫伯特的足迹，游历了波斯的帕萨尔加德、波斯波利斯和纳克什—卢斯坦。但他没有特别重视铭文。他也发现贝希斯敦铭文，不过他的描述没有任何参考价值。[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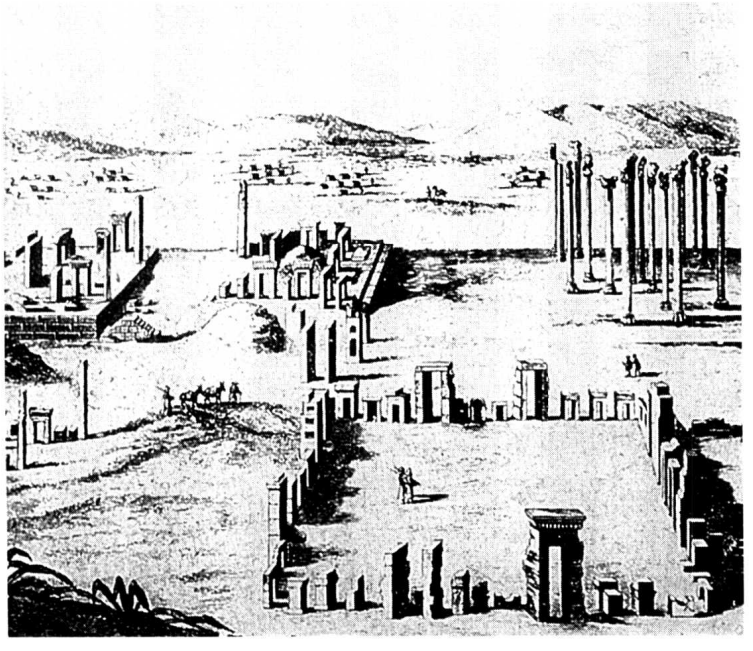


图 32　尼布尔绘制的波斯波利斯遗址图（Roaf 1998，218 页）

1761 ～ 1767 年间，尼布尔（Karsten Niebuhr, 1733～1815 年）考察了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和埃及。他是 1761 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派遣的阿拉伯探险队的五个成员之一，也是这个探险队的惟一生还者，其他人都在旅途中（分别于 1762、1763 和 1764 年）死于非命。尼布尔精通阿拉伯语，而且他每到一处，便接受当地习俗，着当地衣装，食当地食物，这大概是他之所以能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1765 年，他独自来到波斯波利斯，在此逗留三周，绘制了遗址图，表明了各建筑的相对位置。他利用大部分时间临摹铭文，他临摹的铭文准确、完整。他著《阿拉伯及其临近国家游记》[②] 并在其游记中发表了他在波斯波利斯临摹的 11 个铭文。他对这些铭文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它们系用三种不同“字母”书写，书写方向是从左向右。他认为第一种字母体系（古波斯文字，当时尚不知）最简单，只重复使用 42 个符号。他的解读虽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仍不失为人们继彼特罗·德拉·瓦莱之后在解读方面迈出的可喜的又一步。他发表的楔形文字铭文，后来成为格罗特芬（G.F.Grotefend，1775～1853 年）部分地成功解读古波斯语铭文的主要材料。19 世纪初，许多欧洲人在读了尼布尔的《游记》后都产生访古波斯的愿望，并把愿望付诸行动，其中有莫里埃（J.J.Morier）、欧塞利（Sir G.Ouseley）、凯尔·波特（R.Ker Porter）、白金汉（J.S.Buckingham）和里奇（C.J.Rich），这些人后文都将分别提到。

---

① J.Otter, Voyage en Turquie et en Perse, Paris 1748. 有关贝希斯敦铭文，见第 187 页。

② Reisebeschreibung nach Arabien und andern umliegenden Ländern, 1774 – 1837 Kopenhagen（共 3 卷）. 法文版：Voyage en Arabie, Amsterdam 1780。

尼布尔来到巴比伦遗址考察时，亲眼目睹了当地居民挖掘遗址、用古代建筑材料营建私房的情景。他认为巴比伦的卫城和“空中花园”[①] 应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希帕尔曾经也是巴比伦的一部分。他还到过摩苏尔和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库雍基克村（尼尼微遗址），但却不知身在何处，与尼尼微失之交臂。

1781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塞斯提尼（Sestini）考察巴比伦，其游记于 1786 年发表。[②]

1784～1785 年，巴比伦代理主教博尚（J.Beauchamp，1752～1801 年）考察巴比伦尼亚，[③] 也像尼布尔一样，亲眼目睹了当地居民挖掘遗址、用古代建筑材料营建私房的情景。他在挖砖的当地人的帮助下，[④] 发现一个石狮和所谓的为“空中花园”提供水源的供水室。他还发现刻有符号的砖、泥柱和石碑，并确信这些符号是文字。他还把刻字砖托人带给巴黎的朋友巴泰勒米（Barthelemy）。

这样，到 18 世纪末，巴比伦刻字砖至少在罗马（由彼特罗·德拉·瓦莱托人带回）、阿姆斯特丹（由肯姆普夫尔托人带回）和巴黎（由博尚托人带回）都有，但皮埃尔·埃马努埃尔把刻字砖带到什么地方不详。1801 年，东印度公司在巴士拉的代理也派人把十多块巴比伦刻字砖送到伦敦。18 世纪末，东印度公司的布里奇（Sir H.J.Bridge）也到巴比伦搜集过刻字砖，其收藏下落不明。

图 33 刻有楔形文字铭文的砖（Walker 1990，Fig.33）

1793～1799 年，法国著名动物学家奥利维埃（G.A.Olivier，1736～1814 年）考查西亚和埃及。他在描述他游历巴比伦遗址时说，到处都是用巴比伦砖建造的房屋，很难区分哪是昔日的城镇，哪是今日的村庄。他也见到贝希斯敦铭文，对此进行了一番研究，绘制了铭文雕塑图。由于他是站在地面制图，没有攀缘悬崖，所以，他的绘图很不准确。[⑤]

1807 年，德·加尔丹（P.A.L.de Gardane，1765～1822 年）作为法国政府派往波斯

① 关于空中花园近年来有不同说法，见吴宇虹：“‘空中花园’新说”，《人民日报》，1996 年 2 月 4 日。

② Viaggo da Constantinopoli a Bassora fatto dall abbate Sestini，Yverdun（Schweiz）1786.

③ Mémoire sur les Antiquités babyloniennes，Journal des Savants 1790，p.797 以下。

④ 一说他曾雇佣了三个当地人帮助他进行发掘。见 Pallis 1956，267 页。

⑤ Voyage dans l'Empire Othoman，l'Egypte et la Perse，Paris 1807. 贝希斯敦铭文图，见 Vol.Ⅲ，24 页。

的使节的秘书来到波斯，见到贝希斯敦铭文和雕塑。他把悬崖上的阿胡拉·马兹达浮雕看成了十字架，把下面的九个叛王、大流士以及两个侍卫，误解为十二使徒。[①] 由此可见，站在地面用肉眼观看贝希斯敦铭文和雕塑，连雕塑都看不清，铭文大概就更看不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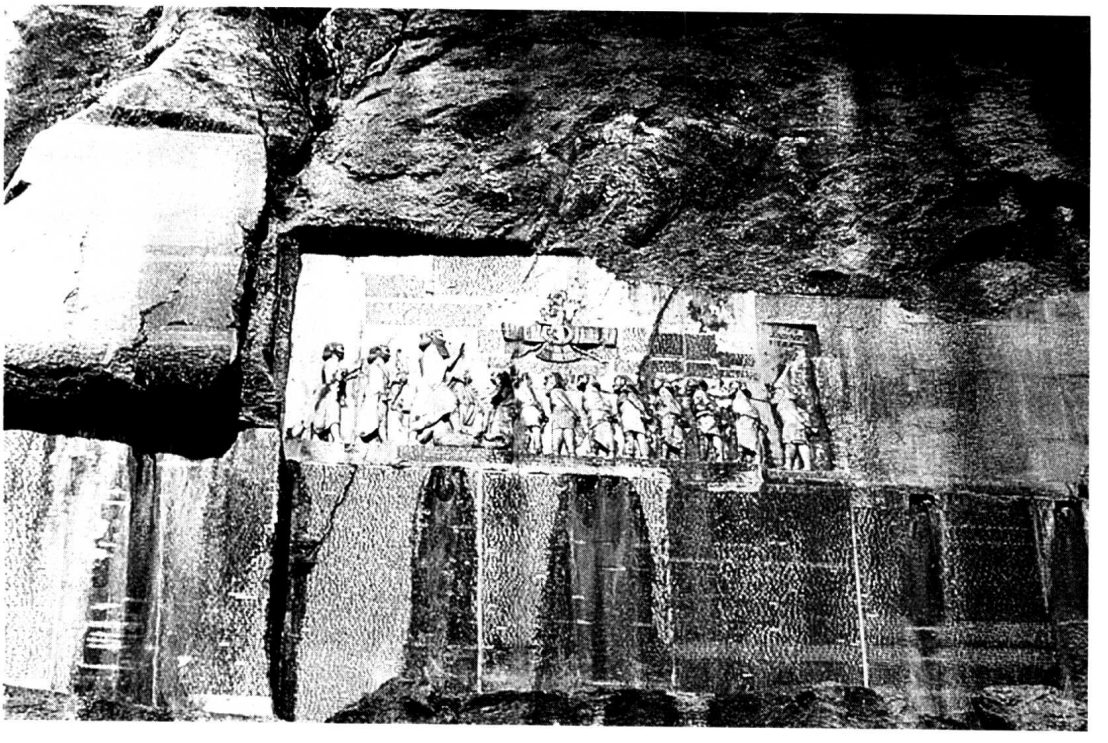


图 34　贝希斯敦铭文与浮雕（Hrouda 1991，174/175 页）

1808～1809 年，莫里埃（1780～1849 年）[②] 考察波斯、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③] 详细描述了埃克巴坦那（Echbatana）。他是第一个正确否认帕萨尔加德有“索罗门母陵”的人，他指出，“索罗门母陵”为居鲁士陵墓之误。他的这一正确判断帮助了格罗特芬解读楔形文字的居鲁士名字。1811～1816 年，他再度东游，后著《再游记》。[④]1813 年，他发现阿勒万德山（Alvand Mts.）铭文。据他讲，这个铭文被当地人称作“宝藏书”，因为他们认为，谁能解读这个铭文，谁就能按照铭文的指引找到宝藏。

1808～1810 年，金内尔（J.M.Kinneir，1782～1830 年）陪同英国将军马尔科姆经

① 德·加尔丹著有：Journal d'un Voyage，Paris 1809。关于贝希斯敦铭文和雕塑在 83 页以下。

② 其父伊萨克·莫里埃（Isaac Morier）曾任英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和东印度公司代表。

③ J.J.Morier，A Journey through Persia，Armenia and Asia Minor to Constantinople in the Years 1808，1809，London 1812.

④ A Second Journey，1818.

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著《波斯帝国地理志》，[1] 详细描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地理地貌。他也见到贝希斯敦铭文和雕塑，是第一个认为贝希斯敦铭文和塔赫提—贾姆希德（波斯波利斯）铭文是同一时代铭文的人。1810 年，他发现阿勒万德山铭文，成为发现和描述阿勒万德山铭文的第一人。1813～1814 年，他再度东游。[2]

1811 年，英政府派著名东方学家欧塞利到波斯完成一项外交使命，他借机考察了波斯和亚美尼亚，搜集了很多古物，包括阿黑门尼德时期的雕塑，制作了很多文物图片，发表在他的游记里。[3] 阿黑门尼德时期的雕塑后被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里奇来到两河流域的时间比欧塞利还早，不过，他在头几年里对伊拉克境内的前伊斯兰文化没有发生兴趣。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巴格达代理，也是英政府派驻巴格达的总领事（自 1807 年）。1811 年，也就是在他来到巴格达任职几年后，他才听说法国的博尚曾在巴比伦遗址发现过重要文物。在这个消息的吸引下，他于 1811 年专程来到巴比伦遗址进行考察。[4] 他雇佣了 10 个当地人，东挖几下，西挖几下，结果收获甚微。之后，他放弃巴比伦，来到比尔斯—尼姆鲁德，仔细测量了当时公认的巴贝尔塔。他曾一度认为这个塔庙不是巴贝尔塔，巴贝尔塔应在幼发拉底河对岸的巴比伦，但后来又不十分肯定。他没有想到，亚历山大曾命令铲平贝尔神庙“埃桑基拉”（可能包括与之相毗连的巴贝尔塔），以便重建。

自 1811 年后，里奇再没有在巴比伦尼亚进行任何“发掘”，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亚述地区。他四次到摩苏尔考察，当地居民告诉他，他们在隔岸的库雍基克（即尼尼微遗址）挖砖时，曾发现大型石板雕像，有的为人像，有的为兽像。他们认为，不论是人是兽，通通都是魔鬼。他们作为善良的穆斯林，当然不能允许这些魔鬼存在。所以，他们先毁坏雕像，然后把石板烧成石灰，用于建筑。于是，里奇在库雍基克进行了“试掘”，发现许多陶片、古砖和楔形文字泥板。

他到处搜集购买古物，包括一些较大的文物，分别运往伦敦和格拉茨（奥地利）。不过，他搜集的大部分文物都是他在希拉向当地居民购买的，而当地居民显然是由于受了博尚的影响而开始对文物的价值有所认识，并开始收藏文物、待价而沽的。1825 年，大英博物馆出资 1000 英镑从他遗孀手里购买了部分文物，[5] 其中有四个烧过的圆柱铭文、十三块刻字砖和一块较大的铭文界碑。

1802 年，德国的格罗特芬部分成功地解读了古波斯的楔形文字，引起轰动。里奇

---

① A Geographical Memoir on the Persian Empire, London 1813.

② Journey through Asia Minor, Armenia and Koordistan, London 1818.

③ 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 London 1823.

④ 顺路还购买了一个玄武岩界碑，现存大英博物馆。

⑤ Budge 1925, p.26.

确信格罗特芬的解读结果正确，因此，他把他见到的所有铭文都复制一份送给格罗特芬，有时是他自己亲自送去，有时则派他的助手贝利诺送去。他对巴比伦和尼尼微等古代遗址进行了详细描述。[①] 正是他的这些著作激起了法国人的考古兴趣，直接把法国人引到了尼尼微，使法国人成为西亚考古的先驱。

贝利诺（K.Bellino，1791～1820年）出生于德国的罗藤堡。他在维也纳学习东方语言时与里奇相识，里奇收他作秘书。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他随同里奇来到巴格达，很快就成为一名临摹楔形文字铭文的好手。他曾临摹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的一个圆柱铭文，这个铭文后来被命名为“贝利诺圆柱铭文”（Bellino-Cylinder），珍藏在大英博物馆。贝利诺临摹的这个圆柱铭文，也首先被送到格罗特芬的手里。不久，格罗特芬把它发表在格廷根科学院的“论文集”上。1851年，莱亚德也临摹和发表了这个圆柱铭文，凯尔·波特也曾临摹和发表过这个铭文，但谁都没有超过贝利诺。英国摄影技术的先驱、对成功解读阿卡德语言文字（楔形文字）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塔尔博特（W.H.Fox Talbot，1800～1877年）称贝利诺临摹的铭文是“考古学史上体现耐心和精确的最好一例”。[②] 贝利诺是第一个准确临摹长篇亚述铭文的人。1820年，贝利诺死于摩苏尔。[③]

贝利诺的英年早逝对里奇是个沉痛打击。此后，里奇放弃美索不达米亚，转向波斯。1821年，他来到波斯，遍访古迹，临摹铭文。不幸的是，他同年在设拉子染霍乱而死，终年仅34岁。

1816年，当里奇在巴格达任东印度公司代表时，凯尔·波特和白金汉来到美索不达米亚，考察了巴比伦遗址。他俩都是精通希腊古典作品和《旧约》的学者。他们测量了比尔斯—尼姆鲁德的塔庙，并试图证明这座塔庙就是希罗多德、狄奥多鲁斯、斯特拉波等古典作家描述的巴贝尔塔。虽然他们很有学问，但还是判断失误，像以前的许多人一样，错把比尔斯—尼姆鲁德当成了巴比伦。1818年，凯尔·波特来到波斯，考察了所有重要遗址。他在波斯波利斯停留三周多的时间，专心绘制图片，临摹铭文。由于他本身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画家，所以，他的两卷本游记《格鲁吉亚、波斯、亚美尼亚和古巴比伦尼亚游记》[④] 被视为到那时为止用英语发表的最佳游记。他见过贝希斯敦铭文，绘制了铭文中的雕塑图，并做了详细解释。他认为浮雕的中心人物是亚述国王萨尔曼纳萨尔

---

① 他的著述有“Memoir on the Ruins of Babylon”，Fundgruben des Orients，Ⅰ－Ⅱ，1812；“Memoir on the Ruins of Babylon”，Archaeologia，London 1818；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Koordistan and on the Site of Ancient Nineveh，London 1836；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Site of Babylon in 1811，London 1839。

② JRAS 18（1861），p.76.

③ Budge 1925，p.27. 但在同书32页又有：贝利诺被遣往阿勒万德山临摹铭文，尚未到达就死于哈马丹。

④ Travels in Georgia，Persia，Armenia，Ancient Babylonia，London 1822. 白金汉著《美索不达米亚游记》（Travels in Mesopotamia，London 1927）和《亚述游记》（Travels in Assyria，London 1829）。

(实际上是大流士)，纪念的事件是“全面战胜以色列”(实际上是平定叛王)；萨尔曼纳萨尔面前站着的人是“十部落”(实际上是九个叛王，加上脚下踩着的高墨达，共十个)；人物浮雕上的铭文是经文护符匣(phylactery)。[①] 有人认为，凯尔·波特的这番解释是代表那个时代“考古学想象”(archaeological imagination)的典型一例。[②] 他也见到阿勒万德山铭文，但没来得及临摹铭文。

1824年，凯佩尔伯爵(G.T.Keppel，1799～1891年)游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一座古地亚时代石雕，成为第一位发现古地亚石雕的人。这座闪长岩雕像大小与真人相仿，于19世纪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他也见到贝希斯敦铭文和雕塑，并用很多笔墨对此加以描述和解释。但他的解释并没有超出前人。[③]

图35 西亚的滚印和平印(Collon 1990，封面)

1827年，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米格南(R.Mignan)从巴士拉北上，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考察了许多古代遗址，[④] 还雇佣了30名当地民工对巴比伦遗址进行了发掘，挖了一个12英尺(3.66米)见方、20英尺(6.1米)深的“探方”，发现一个保存完好的、用土坯建造的平台，发现四个滚印、一些宝石、银币和铜币等，这是第一次在欧洲人手下出土滚印。[⑤]

1826年，德国吉森大学教授舒尔茨(F.E.Schulz)受法国政府的委托来到亚美尼亚考察凡湖铭文，他于1827年来到凡湖附近，临摹了42篇楔形文字铭文。[⑥] 后来，他还临摹了阿勒万德山铭文。舒尔茨于1829年被库尔德人暗杀，幸好在此之前他已把拓制和临摹的铭文副本寄给圣·马丁(J.A.Saint Martin)。后来由于圣·马丁的逝世，阿勒万德山楔形文

① Travels in Georgia, Armenia, Ancient Babylonia, Vol.Ⅱ, London 1822. 所引在159页以下。

② Budge 1925, p.31.

③ G.T.Keppel, Person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England by Bassorah, Baghdad, the Ruins of Babylon…, London 1827. 关于贝希斯敦铭文和雕塑，见Vol.Ⅱ, 80页以下。

④ Travels in Chaldaea, Including a Journey from Bassorah to Baghdad, Hillah and Babylon in 1827, London 1829.

⑤ Pallis 1956, p.53; Jastrow 1980, p.14.

⑥ Journal of Asiatique 1840. 所引在257页以下。

字铭文又转到布尔瑙夫（E.Burnauf）手里，由他于1836年发表。[①]

1833～1838年和1844～1847年间，罗林森多次在波斯临摹贝希斯敦铭文，为解读楔形文字奠定了基础。[②]

1834～1837年，德国人罗斯（J.Ross）考察亚述和塞浦路斯，并在塞浦路斯发现萨尔贡二世铭文碑和一个石膏瓶，现存柏林帕加蒙博物馆。

1834～1842年，弗雷泽（B.Fraser）游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在游记中记录了许多古代遗址。[③]

1835～1837年，英国上校切斯内（F.R.Chesney）组织“两河考察”队，为欧洲人全面了解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环境提供了可靠依据。[④]爱恩斯沃斯（W.F.Ainsworth）是“两河考察”队的医师和地理顾问。他在完成“两河考察”使命后，于1838年独自考察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⑤]

1833～1837年，法国的建筑师泰克西埃（C.Texier）考察小亚细亚，绘制很多城市遗址图和建筑图。[⑥]1834年7月28日发现哈图沙（Hattuša）遗址。1839～1840年，他再次东游，考察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临摹了许多铭文，同时绘制许多文物图。[⑦]

图36　泰克西埃于1837年发现哈图沙遗址时绘制的大神庙图（Wilhelm 1998，93页）

1835年，英国的业余地理学和地质学家哈密顿（W.J.Hamilton）考察小亚细亚地区，包括哈图沙遗址。[⑧]

---

① E.Burnauf, Mémmoire sur deux Inscriptions Cunéiformes, Paris 1836.

② 本书第四章对罗林森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③ Travels in Koordistan, Mesopotamia…, London 1840.

④ F.R.Chesney, The Expedition for the Survey of the Rivers Euphrates and Tigris, London 1850; Narrative of the Euphrates Expedition, London 1868; W.F.Ainsworth,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Euphrates Expedition, London 1888.

⑤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Asia Minor, Mesopotamia, Chaldaea and Armenia, London 1842.

⑥ Description de l'Asie Mineure Ⅰ－Ⅲ, Paris 1839－1842.

⑦ Description de l'Armenie, la Perse et la Mesopotamie, Paris 1842－1852.

⑧ W.J.Hamilton, Researches in Asia Minor, Pontus and Armenia, 1842.1984年再版。

也是在1835年，英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勃兰特（J.Brant）考察哈图沙遗址。他大概是看了法国的建筑师泰克西埃绘制的图片后来按图索骥的。[①]

1840年，莱亚德考察波斯西部，对这里的地理和遗址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②]

1839年，法国画家弗朗丹（E.-N.Flandin，1809～1889年）[③] 受政府委托考察波斯。1840～1841年，他与科斯特（P.Coste）到达波斯。绘制了波斯境内所有重要的城市遗址图、石碑图和建筑遗址图。[④]1843年，博塔（P.E.Botta）发掘豪尔萨巴德时，急需一名画家，弗朗丹被选中，从此开始参加法国的西亚考古活动，成为法国的西亚考古先驱之一。1890年，弗朗丹的儿子按照父亲的遗嘱，把弗朗丹的全部考古绘图（十二本）捐献给政府。

在上述游历西亚的欧洲人中，有的是神职人员，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普通游客，有的是东方学家，有的是画家，有的是建筑师、地质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或军官，有的身兼几职。他们有的作游记，有的搜集古物，有的既作游记、又搜集古物。他们不断把西亚地区古代遗存情况反馈给欧洲，又不断地把古代文物带到欧洲。这不但使欧洲人对西亚古物古迹产生极大兴趣，还把欧洲的考古学家吸引到了西亚。1842年在亚述地区开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实际上就是上述这些人的记述和搜集古迹古物行为的不同形式的延续，二者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一个是古物学，一个是考古学，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它们有机相连，不能分割。

① JRGS 6（1836），218页以下。

② JRGS 12（1842），102页以下；JRGA 16（1846），1页以下。

③ 他出生于意大利，因此，也常常被视为意大利画家。见 Rogers 1915，168页。

④ Voyage en Perse，Paris 1843.

第四章　文字考古——楔形文字的解读

（1802～1857 年）

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商人、传教士和世俗学者来到西亚，他们中的很多人详细记录了见到的古迹，通过文字描述把西亚的古迹展示给欧洲；有的还在游记中插入大量图片——地图、建筑图、遗址图和临摹的铭文等等，形象地把西亚的文物古迹展示给欧洲；有的还把文物（如刻字砖）带回欧洲。这些文字描述、图片和实物使欧洲人对西亚古老而神秘的过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从东方的这些古迹、古物中隐约看到了西方文明的渊源。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揭开这些古迹、特别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的古物（尤其是铭文）的背后隐藏着的奥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参与西亚古物考察的学者早就做了解读的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个别的解读尝试逐渐地演变成由众多欧洲大学者参与的一场会战，学者们的共同顽敌就是神秘的楔形文字。这场会战最后以欧洲学者的胜利而告终。楔形文字的成功解读是 19 世纪人文科学领域取得的划时代成果，是人文科学的历史性胜利。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的楔形文字文献开始说话后，一个被遗忘的古代世界又开始活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个失落的文明又开始重放光彩。

第一节　古波斯语铭文的解读

第一个对楔形文字的解读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是尼布尔。他不仅在其《阿拉伯及其邻近国家游记》中发表了准确、完整的铭文，为后人成功解读古波斯语铭文提供了必要资料，还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后来的解读者提供了许多通向成功之路的宝贵线索。他发现，波斯波利斯的铭文都用三种不同“字母”书写，书写方向是从左向右。他是第一个编制古波斯字母表的人，他的字母表包括 42 个字母，其中 32 个正确。英国著名亚述学家巴兹（Sir E.A.Th.W.Budge）对尼布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如果他（指尼布尔——引者注）不发表他临摹的铭文，不发表他那富于启发性的评论，楔形文字的解读至少要推迟到两三代人以后。”①

第一个根据尼布尔发表的铭文试图解读楔形文字的人是提赫森（O.G.Tychsen,

① Budge 1925, p.39.

1734～1813年)。他是著名希伯来学专家，但其兴趣非常广泛。1790年就发表了《古埃及人的字母文字》一书。[1]1798年出版了关于波斯波利斯铭文的小册子。[2]他多处沿用尼布尔的说法。但他不像尼布尔那样谨慎，武断地给楔形文字字母加上音值，然后，按照他的音值组词，再参照其他塞姆语和印欧语中类似的发音取义。按照他的解释，波斯波利斯铭文是帕提亚（安息）王朝的创建者阿尔萨克斯（Arsaces）铭文，而实际上是大流士和薛西斯铭文。他的解读方法过于简单和武断，解读的结果也不正确。不过，他武断地强加给字母的音值竟有4个正确。但在当时无从判断哪些正确、哪些错误的情况下，正确的部分对后人的解读也没起到任何帮助作用。他认为，这些铭文是用三种不同语言书写的，这是正确的。不过，他认为这三种语言分别是波斯语、米底语和巴克特里亚语，则又不完全正确。

第二个根据尼布尔发表的铭文试图解读楔形文字的人是丹麦神学家明特尔(F.C.C.Münter，1761～1830年)。他首先否定了提赫森的铭文断代，认为，这些铭文只能属于阿黑门尼德王朝。理由有二：其一，尼布尔所描绘的出土铭文的遗址与狄奥多鲁斯[3]描绘的波斯波利斯十分相像；其二，在尼布尔的游记中发表的一幅臣民图中有埃塞俄比亚人，而从希罗多德的《历史》[4]中人们知道，波斯帝国的版图只有在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才远达非洲。他也认为，这些铭文都是用三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书写的，而且书写的是同一内容。第一种文字是字母文字，语言是阐德（Zend）语[5]（实际上是古波斯语)；第二种文字是音节文字，语言是钵罗钵（Pahlavi）语[6]（实际上是埃兰语)；第三种文字是表意文字，语言是帕西（Parsi）语[7]（实际上是阿卡德语)。他对文字的猜测已很接近事实。他在解读古波斯语铭文时，首次发现“隔字符”的功能。他仔细地记下每个符号在铭文中的出现频率，认为，出现频率高的符号一定是元音a、e、i、o、u。他根据这个原则，给出现频率高的符号加上了音值，其中竟有两个正确。他还发现“国王”(当时尚不知其义）这组符号（共7个符号）出现频率很高，他先认为这组符号可能是一个国王的名字，后来又认为它们可能是一个王衔，大概是“王中王”，而在这组符号之前的一组字可能是国王的名字。他还发现了“王”后面的“屈折变化”，但他解

① Über die Buchstabenschrift der alten Agypter, Gottingen 1790.

② De Cuneatis Inscriptionibus Persepolitanis, Rostock 1798.

③ Diodorus Ⅰ:46; XⅦ·69－72.

④ Ⅵ:70.

⑤ 这里是指《阿维斯陀》用语。Zend是根据Zend Awesta而来的。“Zend”作“注释”解，不代表语言。在明特尔的年代，人们仍把Zend误解为一种语言。

⑥ 即通行于公元3～9世纪的中古波斯语。

⑦ 帕西语是公元8世纪为逃避穆斯林迫害而自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所讲的中古波斯方言。

释不了这个“屈折变化”。[1] 结果，他功亏一篑，终未成为第一个成功解读楔形文字铭文的人。这顶桂冠最终落到了格罗特芬的头上。

格罗特芬解读楔形文字时，是德国格廷根的一名中学教师，对东方学从未涉足过。据说，他的一个朋友听说他在解读楔形文字铭文时甚至嘲笑他不自量力。然而，他解读成功了。使他成功的因素，自然有个人的天才、灵性和幸运，但更重要的是前人为他架起的通往成功之路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他的天才和灵性就不能得到发挥，也就谈不上幸运。

为他架设通往成功之路的桥梁的人除上面提到的尼布尔、提赫森和明特尔外，还有两个人至关重要，他们分别是法国学者迪佩隆（A.-H.A.Duperron，1731～1801 年）和德·萨西（B.A.I.S.de Sacy，1758～1838 年）。

迪佩隆于 1754 年到印度的帕西人那里学习和钻研阿维斯陀语，1762 年回到巴黎，1771 年发表《阐德—阿维斯陀：琐罗亚斯德教圣书》。[2] 他的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学术界颇为引人注意，提赫森、明特尔和格罗特芬都读过这一著作。他人读这本书，无动于衷，而格罗特芬读了这本书后便产生了灵感。

更多的和直接导致成功的灵感来自另一位法国学者德·萨西。德·萨西于 1793 年解读了尼布尔在纳克什—卢斯坦临摹的几个钵罗钵语铭文。[3] 其中一个用三种语言（钵罗钵语、帕提亚语和希腊语）书写的铭文道：

这是崇拜马兹达的沙普尔（Shapur Ⅰ，伊朗萨珊王朝国王，240～272 年在位——引者注）神像，雅利安人、非雅利安人和所有上帝属民的王中王，崇拜马兹达的阿尔达希尔（Ardeshir，伊朗萨珊王朝的创立者，224～240 年在位——引者注）神、雅利安人和所有上帝属民的王中王之子，帕帕克之孙。[4]

在他解读的另一个阿尔达希尔铭文中，阿尔达希尔自称“王中王”和帕帕克之子。这种“(国王名字)，……王中王，……之子，……之孙”的行文格式，直接激发了格罗特芬的灵感。

格罗特芬开始解读楔形文字的时间是 1802 年 7 月，是从和朋友打赌开始的。他的这位朋友在格廷根皇家图书馆工作，比较了解当时欧洲学者研究楔形文字的状况。此时，格罗特芬在这方面还从未介入，对其他人的研究情况也一无所知。于是，他的朋友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尼布尔的《阿拉伯及其临近国家游记》，而《游记》中的铭文 B（图 37）和 G（图 38）就成了打开迷宫的钥匙。

---

① F.Müunter, Versuch über die keilförmigen Inschriften, Copenhagen 1802.

② Zend-Awesta, Ouvrage de Zoroastre, Paris 1771.

③ A.I.Silvestre de Sacy, Mémoires sur Diverse Antiquités, Paris 1793.

④ 转引 Bermant 1979，7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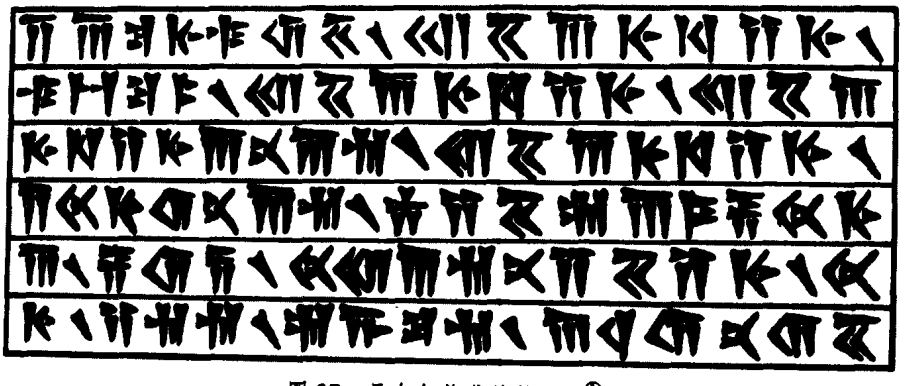


图 37 尼布尔临摹的铭文 B[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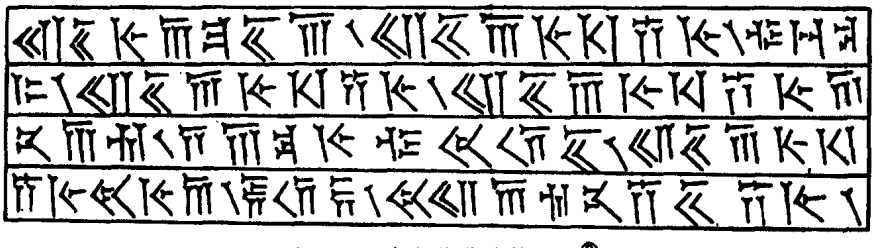


图 38 尼布尔临摹的铭文 G[②]

在格罗特芬之前，人们已就下面几点达成了共识：1. 楔形文字的行文从左至右；2. 经常出现的斜楔有顿字作用，是隔字符号；3. 第一种文字所用的符号最少，可能是一种字母文字；4. 这些铭文出自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5. 它们的内容可能与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国王有关。

像明特尔一样，也许是受明特尔的影响，格罗特芬也首先注意到了被明特尔猜为“国王”的那组反复出现的符号，在短短的三行内就反复出现了四次。在德·萨西解读的钵罗钵语铭文的启发下，他把这组符号断定为“王”字，在第一个“王”字前是一个国王的名字，第二个“王”与第三个“王”构成“王中王”，而第四个“王”就是“万国”

---

① 这个古波斯语铭文原刻在波斯波利斯宫殿的门廊墙壁上，下面是大流士浮雕像。铭文的内容是：

(1) da-a-ra-ya-va-u-ša：xa-ša-a-ya-θa-i-ya： 大流士，

(2) va-za-ra-ka：xa-ša-a-ya-θa-i-ya：xa-ša-a- 伟大的王，王

(3) ya-θa-i-ya-a-na-a-ma：xa-ša-a-ya-θa-i-ya： 中王，万国（4）之王，

(4) da-ha-ya-u-na-a-ma：vi-i-ša-ta-a-sa-pa-ha-ya- （万国，）叙司塔司佩斯

(5) a：pa-u-ça：ha-xa-a-ma-na-i-ša-i-ya：ha- 之子，阿黑门尼德氏，

(6) ya：i-ma-ma：ta-ca-ra-ma：a-ku-u-na-u-ša 该宫殿的建造者。(Walker 1990，60 页)

② 这个古波斯语铭文原刻在波斯波利斯宫殿的门廊墙壁上，下面是薛西斯浮雕像。铭文的内容是：

(1) xa-ša-ya-a-ra-ša-a：xa-ša-a-ya-θa-i-ya：va-za-ra- 薛西斯，伟大的王，

(2) ka：xa-ša-a-ya-θa-i-ya：xa-ša-a-ya-θa-i-ya-a- 王中王，

(3) na-a-ma：da-a-ra-ya-va-ha-u-ša：xa-ša-a-ya-θa- 大流士王

(4) i-ya-ha-ya-a：pa-u-ça：ha-xa-a-ma-na-i-ša-i-ya 之子，阿黑门尼德氏。(Walker 1990，60 页。)

或“万民”之王了。就这样，格罗特芬在尚不知任何字母如何发音的情况下，已经正确地猜出了铭文B的大意，即“某某人（国王的名字），……王，王中之王，万国之王。……”当然，至此，楔形文字还远远没有解读，但已进入正确轨道。

接下来，他把铭文B与铭文G进行了对比。在比较中他发现，铭文B的第一组符号在铭文G的第三行（多一个符号[1]）又出现了。他根据萨珊王朝铭文的行文格式“（国王名字），……王中王，……之子，……之孙”断定，铭文B上的国王是铭文G上的国王的父亲，铭文G上的父王的名字就是铭文B的第一组字。至此已经清楚，铭文B和铭文G是两个国王的铭文，二者一个为父，一个为子，而且名字的长度都一样，都由七个符号组成。这两个国王是谁？首先他想到，这两个自称“王中之王，万国之王”的国王一定是阿黑门尼德王朝鼎盛时期的国王，这就把范围缩小到了薛西斯以前。其次，这两个国王为父子，这就再次把范围缩小到居鲁士（Cyrus）和冈比西斯（Cambyses）、大流士（Darius）和薛西斯（Xerxes）两对父子身上。第三，在选择二者时，他排除了居鲁士和冈比西斯，因为居鲁士和冈比西斯的名字不但长短不一样，且以同一字母开头，而楔形文字铭文中的两个名字以不同字母开头。于是，他选中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父子，再次猜中。铭文B的另一个对解读至关重要的专有名词就是大流士父亲的名字。大流士父亲的名字对熟悉希腊古典作家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已借薛西斯之口交待得清清楚楚。薛西斯说：“假如我不向雅典人进行报复，那我就不是阿凯美涅斯的儿子、铁伊司佩斯的儿子、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的儿子、铁伊司佩斯的儿子、阿里阿拉姆涅斯的儿子、阿尔撒美斯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的儿子了。”[2]格罗特芬断定，大流士的父亲叙司塔司佩斯一定也出现在铭文中。但哪组符号是叙司塔司佩斯呢？他是这样来确定的：第一步，断定铭文G中出现在大流士后面的一组符号为“儿子”，即“大流士之子”；第二步，那么铭文B中出现在“儿子”之前的那组符号就应是“叙司塔司佩斯”，即“叙司塔司佩斯之子”，他又猜中。至此，他猜中的专有名词有：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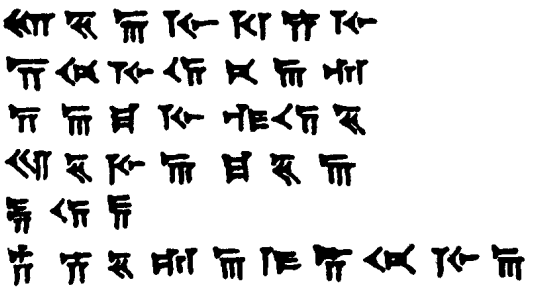
“国”

“大流士”

“薛西斯”

“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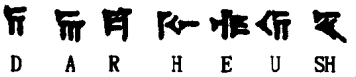
“叙司塔司佩斯”



① 铭文B的形式是 da-a-ra-ya-wa-u-š，而铭文G的形式是 da-a-ra-ya-wa-ha-u-š，这个多出的符号 ha 表示“属格”，见 R.G.Kent,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s, Lexicon, New Haven 1950, 190页。

② 希罗多德《历史》Ⅶ 11。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名词的发音。“大流士”的希腊语形式是 Dareiaues，而希伯来语形式是 Daryaweš。格罗特芬认为希伯来语的 Daryaweš 应最接近古波斯语形式。所以，他便参照希伯来语的 Daryaweš，给代表“大流士”的七个符号配上了发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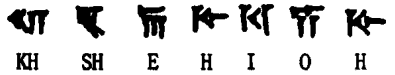


D A R H E U SH
da — a — ra — ya — va — u — ša ①

至于其他几个名词，即“薛西斯”、“叙司塔司佩斯”和“王”的读音，格罗特芬主要参照了迪佩隆的《阿维斯陀》。格罗特芬分配给它们的读音分别是：

Kh SH H E R SH E
xa — ša — ya — a — ra — ša — a “薛西斯”（Xerxes）

G O SH T A S P
vi — i — š — ta — a — s — p “叙司塔司佩斯”（Hystaspes）



KH SH E H I O H
ha — ša — a — ya — θa — i — ya “王”

格罗特芬就是通过这种仔细的观察、认真的思考、天才的猜测、合情的推理部分地成功解读了古波斯语铭文。我们现在知道，古波斯语使用 36 个符号来表示音素和音节，5 个符号表意。格罗特芬仅仅正确解读了其中的 12 个，正好是全部表音（即表示音素和音节）符号的三分之一，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多。但他为人们找到了一个攻破坚不可摧的堡垒的突破口，为人们找到了一把打开迷宫的钥匙，其意义是深远的和划时代的。在 1802～1803 年间，格罗特芬向“格廷根皇家科学院”提交了四篇用拉丁文撰写的论文，标题都是 Praevia de cuneatis, quas vocant, inscriptionibus Persepolitanis legendis et explicandis relatio。②

不过，格罗特芬在迈出正确的一步、从而为他人指明正确方向后，自己却偏离了正确轨道。从 1803 年至 1815 年的十多年间，格罗特芬继续撰写了很多论文和发表了许多铭文译文。英国的驻巴格达总领事、西亚考古先驱里奇在 1810 至 1811 年间亲自或派秘书贝利诺把他新发现的所有楔形文字泥板都送到格罗特芬那里，以便由格罗特芬解读和发表。可见，他当时的信誉是很高的。可是，他这时过于自信，既不接受同时代其他人

① 这里用大写表示格罗特芬配给的音值，小写代表现在公认的发音与书写形式。下同。

② Steiner 1991, p.109.

的研究成果，也不再用钵罗钵语文献作为参考，一味凭猜测，结果他的论文和译文漏洞百出，已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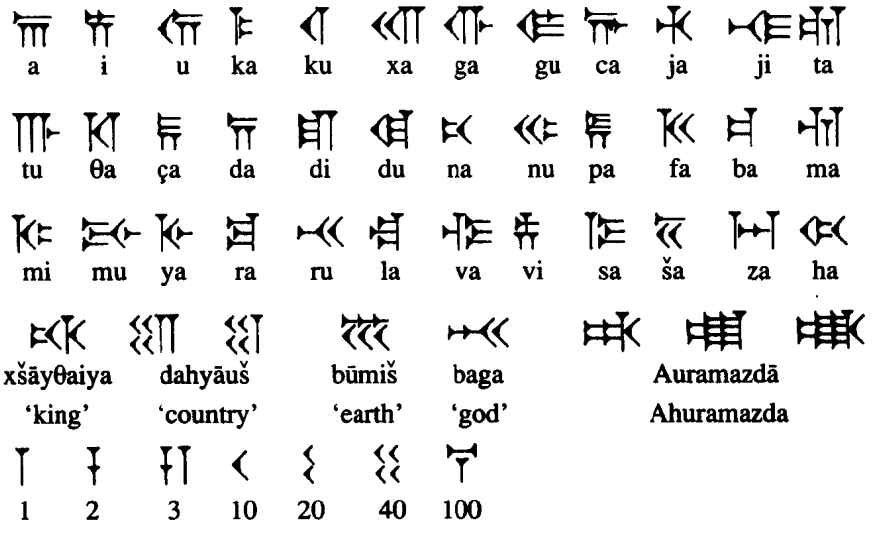


图 39　古波斯字母、音节、表意符号

继格罗特芬之后，对解读古波斯语铭文贡献最大的学者是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R.C.Rask，1787～1832 年)。他精通多种印欧语，对《阿维斯陀》和钵罗钵语铭文也很有研究。他在研究格罗特芬的解读成果时，解决了格罗特芬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语法现象，即古波斯语的复数属格形式，从而发现字母 M 和 N。格罗特芬把“王中之王”中第二个“王”后面的复数属格形式错误地解释为 A-TSCH-A-I-O，拉斯克凭他深厚的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造诣，正确断定古波斯语的复数属格形式应该是 A-N-A-M。

法国东方学家圣·马丁是惟一不承认格罗特芬解读成果的人，他自制了一个古波斯字母表，但其中除抄袭格罗特芬正确解读的字母外，只有 V 和 I 两个字母是他正确解读的，其余皆错。

1834 年，法国东方学家布尔瑙夫发表《阿维斯陀》第三部分评注，[1] 把人们对书写《阿维斯陀》的语言的认识在迪佩隆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布尔瑙夫还对阿勒万德山的古波斯铭文进行了研究，[2] 他列了一个由 33 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声称其中 12 个是由他首次解读的。其实只有 2 个字母，即 K 和 Z，是他首次解读的，其余 10 个字母别人已经在他之前解读。但他通过参照对比《阿维斯陀》和梵语，解读了一些专有名词，以及动词“是”的第一人称形式 adam“我是”。格罗特芬曾把“我是大流士”中的“我

① Commentaire sur le Yaçna, Paris 1834.

② Mémoire sur le deux Inscriptions Cunéiformes…, Paris 1836.

是”（a-da-m）误解为王衔。布尔瑙夫的解读成果代表了古波斯铭文解读中的又一次大的进展。

就在布尔瑙夫发表铭文研究的同一年，挪威学者拉森（Ch.Lassen，1800～1876年）发表了《古波斯楔形文字铭文》，[①] 大大超过了布尔瑙夫。拉森想到希罗多德的记载：当大流士考察博斯普鲁斯时，曾在海岸上竖立两个白色大理石碑，上面刻着组成他的军队的所有民族的名称，一个石碑用希腊语刻写，另一个用亚述文字刻写。[②] 拉森相信，类似的铭文在塔赫提—贾姆希德也一定会有。他认为，如果发现类似的铭文，把专有名词（国家、地区或民族名称）与《阐德—阿维斯陀》里的同一词进行比较，可以借助《阐德—阿维斯陀》里的已知发音推知这些专有名词的发音，从而可以推知古波斯字母的发音。他果然在尼布尔的《游记》中发现了他期望得到的铭文，在上面发现24个专有名词。[③]他列了一个包括23个字母的字母表，其中8个字母是由他首次解读的：D（U）、I、K、T（U）、Z、M（I）、G、G（U），[④] W[⑤] 和 T[⑥] 也接近正确。24个专有名词，他正确解读了其中的19个。

1837年，古波斯楔形文字铭文的解读又被贝尔（E.F.F.Beer，1805～1841年）和雅克（E.V.S.Jacquet，1811～1838年）向前推进一步。贝尔解读了Y和H两个字母，雅克解读了Z、V、THR、TH、Y、R（U）和H共7个字母，其中包括了贝尔解读的Y和H两个字母，但两个人的解读工作都是独立进行的。

至此，人们解读的铭文大都是在波斯波利斯发现的铭文，一般都比较短，且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的比较多，它们显然不能反映古波斯语的全貌。为了进一步研究古波斯语的句法和词法，人们需要一篇较长的古波斯语铭文。不久，人们果然得到了这样的长铭文，而且是三种语言文字对照的长篇铭文，这个铭文不但为深入研究古波斯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也为解读埃兰语和阿卡德语提供了必要前提。这个铭文就是贝希斯敦铭文。

贝希斯敦(Behistun）是罗林森[⑦]从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特（Yaqut，1179～1229

---

① Die altpersischen Keilinschriften，Bonn 1836.

② 希罗多德《历史》Ⅳ:87。

③ C.Niebuhr，Reisebeschreibung nach Arabien und andern umliegenden Ländern，Kopenhagen 1778，Plate XXXⅡ.拉丁化转写和英译，见Kent 1950，136页。铭文上出现的地名和民族名依次为Elam、Media、Babylonia、Arabia、Assyria、Egypt、Armenia、Cappadocia、Sardis、Ionia、Sagartia、Parthia、Drangiana、Aria、Bactria、Sogdiana、Chorasmia、Sattagydia、Arachosia、Sind、Gandara、Scythia和Maka，加上“波斯”共24个国家或民族名称。

④ 其中D、T、M和G不完全正确，因为它们只代表音节DU、TU、MI和GU，不是字母。

⑤ 应为V（A）。

⑥ 应为TR（A），或THR（A）。

⑦ 关于罗林森，详见拱玉书“亚述学之父”，载中西古典文明编写组编《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117页。

年)[1] 那里借用来的，确切的写法应该是 Bahistun，现在多写作 Bisutun。[2] 贝希斯敦位于伊朗的克尔曼沙赫东北约 32 公里，处于哈马丹（古代的埃克巴坦那）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驿道上。刻有大流士铭文的悬崖高出地面附近的一个泉水湖湖面约 60 米，[3] 高不可攀。不过，原始状态的贝希斯敦崖石大概不是如此难以攀登，很可能在刻完铭文和雕塑后，为了防止人为破坏，有意地除掉了可以攀援的部分，使贝希斯敦的刻文和雕塑部分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贝希斯敦铭文和浮雕是于公元前 519 年勒刻的，内容是记载大流士镇压叛王、平定天下的详细过程，目的在于宣扬大流士的武治，以威慑来者。在从公元前 519 年到 1835 年的 2300 多年间，有多少过路人读过贝希斯敦铭文？有多少来往者感受了铭文和浮雕的威慑力？亚历山大有没有见到贝希斯敦铭文和浮雕？如果见到，他又为什么没有像火烧波斯波利斯王宫一样把贝希斯敦夷为平地？如果连亚历山大的千军万马都无法发现贝希斯敦铭文和浮雕，那么，这样“高高挂起”的威慑物还有什么威力可言？[4]

直到 17 世纪末，威尼斯商人本波才首次向欧洲报道了贝希斯敦铭文和浮雕的存在。此后不断有欧洲游客、商人、学者等见到贝希斯敦铭文和浮雕，做过或详或略的描述，但在罗林森以前，没有一人攀上悬崖，看个仔细。只是到了罗林森发现贝希斯敦铭文的 1835 年，情况才发生转变。罗林森不满足于地面观察，于 1835 年，成功攀登到悬崖上。此后，他多次攀上悬崖临摹铭文，亲自临摹了全部古波斯语和埃兰语铭文，并指挥一名库尔德青年拓摹了最难接近的阿卡德语铭文。罗林森是迄今所知的第一个成功攀登上贝希斯敦铭文和浮雕处的人，也是第一个成功解读阿卡德语铭文的人。

罗林森也是首先从古波斯语铭文入手来开始他的解读工作的，而且是完全独立地从零开始。在 1836 年以前，他对德国格罗特芬和其他欧洲学者解读古波斯楔形文字铭文的进展情况一无所知。1836 年，罗林森才从英国常驻巴格达代表泰勒（C.Taylor）给他的书信中得知格罗特芬部分地解读了古波斯楔形文字铭文的消息。但这些远在欧洲的学者们是如何解读的，罗林森对此并不了解。直到 1839 年，他仍错误地认为格罗特芬解读楔形文字铭文所用的材料不是人们在波斯波利斯发现的铭文，而是他曾经临摹过的

---

① 雅古特是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编著《地名辞典》四大册，为当时地理学之集大成者。

② 狄奥多鲁斯（XVI:110；II:13）称之为 Bagistanon，古波斯语称之为 baga-stana，意为“神土”。

③ 关于贝希斯敦铭文所在悬崖的高度，不同说法很多，此处据 Borger 1982，105 页。据罗林森（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47，187 页），勒刻铭文的悬崖高 1700 英尺，大概指海拔；于殿利/郑殿华合著的《巴比伦古文化探研》（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84 页）：贝希斯敦崖石“距地面 300 多英尺高”；Rogers 1915，349 页：“刻字部分高出平原 500 英尺”。还有其他不同数字，此不一一。

④ 从近代欧洲游客报道的情况看，站在地下用肉眼观看贝希斯敦铭文和浮雕时，浮雕的内容依稀可辨，而文字根本看不清。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大流士勒刻铭文和浮雕的目的产生疑问。看来，大流士的着眼点不在当时的当代，而在当时的未来，可能对他来说，流芳千古比威慑臣民更重要。这个问题尚有待研究。

阿勒万德山铭文。[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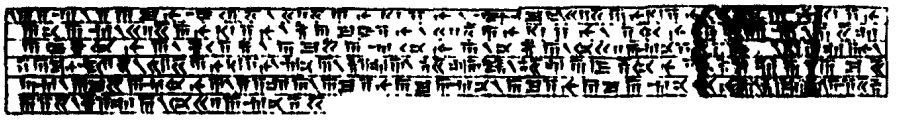


图 40 贝希斯敦的古波斯铭文第一栏 1～6 行[2]

至 1836 年，他至少准确地临摹了两段古波斯语铭文，即第一栏 1～6 行，而且解读了 18 个符号。[3] 到 1838 年，他已准确临摹了 200 行古波斯语铭文，正确地音译和翻译了 1～6 行，并把结果寄给了“皇家亚洲学会”。至 1839 年，他音译和翻译了 200 行古波斯语铭文。由于他从 1839 年开始参加阿富汗战争，研究工作遂中断。战争结束后他到巴格达任职，又重新开始研究楔形文字铭文。到 1844 年为止，他临摹了全部古波斯语铭文。1846 年 2 月，向“皇家亚洲学会”提交了完整的古波斯语铭文的音译和翻译。[4] 1846 年 8 月，他又给“皇家亚洲学会”寄来一份“附记”，论述了新发现的古波斯语的如下特点：有些辅音可以用几个符号来表示，什么时候用哪个符号，完全取决于它后面接什么元音。其实，罗林森发现的是古波斯语符号的既表音素又表音节的特点，如 MA、MI、MU 和 DA、DI、DU 分别由六个不同符号表示，其中 MA 既可表示辅音 m，也可以表示音节 ma，而 MI 和 MU 两个符号只用来表示音节 mi 和 mu，像 M（A）－U 或 M（A）－I 这样的组合在古波斯语里是没有的。这是个很重要的发现，否则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三个 M（实际上是 MA、MI、MU）或三个 D（实际上是 DA、DI、DU）的问题。不过，他的这个发现没有夺冠，因为，爱尔兰的欣克斯（E.Hincks，1792～1866 年）已在两个月前把同样的发现公布于世，捷足先登了。[5]

不知为什么，罗林森对他解读楔形文字的经过总是轻描淡写。在回答人们的追问时，他写道：“我已经讲不出我当时确定每个字母读音的方法。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做已没有任何意义，我也说不出我发现每个字母的日期。”[6] 巴兹的研究结果表明，[7] 罗林森的解读方法基本上与格罗特芬的方法相同，也是从专有名词入手，即首先确定专有名词，再把希腊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读音分解成字母，然后再把具体字母与具体的古波斯楔形符号对号入座。虽然不能排除罗林森在解读前曾听到过格罗特芬已部分地成功

① Pallis, Antiquity of Iraq, 110 页以下。
② Bermant 1979, p.82.
③ JRAS 4 (1847), p.6.
④ 全文发表在 JRAS 4 (1847)。
⑤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1848), p.116.
⑥ JRAS 4 (1847), p.6.
⑦ Budge 1925, 47 页以下。

解读古波斯语铭文的可能性，但人们似乎可以肯定，罗林森从未见到过格罗特芬的字母表，他的解读工作完全是独立进行的。由于贝希斯敦铭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基本都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希腊古典著作，这就使罗林森成功解读古波斯字母成为可能。罗林森完全独立地解读了古波斯语贝希斯敦铭文，完全独立地完成了古波斯语铭文的翻译，为解读埃兰语铭文和阿卡德语铭文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埃兰语铭文的解读

古波斯时期的铭文大都用三种语言文字书写，通常被称为第二种语言和文字的就是埃兰语（Elamite）和埃兰楔形文字。埃兰（Elam）[①] 是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地域大致相当于现在伊朗西南部的胡齐斯坦，中心城市为苏萨（Susa）。埃兰人讲的语言被称为埃兰语。埃兰人使用的楔形文字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音节文字，其中大部分是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变体，部分是完全照搬的借字（图 41）。在尚未解读之前和在解读的过程中，人们给埃兰语言文字起了种种不同名称，有的称之为“钵罗钵语”（如明特尔），有的称之为“米底”语（韦斯特加德），还有称其为“西徐亚语”或“苏萨语”的，等等，共有十多种不同名称。[②]

在上文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早在 1778 年，尼布尔就发现了古波斯语铭文的三种“字母”体系，但他没有分辨出三种不同语言，也错误地把三种文字都称为“字母”。1798 年，提赫森发现这些铭文是用三种不同语言书写的。不过，他错误地认为这三种语言分别是波斯语、米底语和巴克特里亚语。明特尔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铭文是用三种不同语言文字书写的人，他把三种文字划分为字母、音节和表意文字也基本正确，但对语言的判断则是错误的。他发现埃兰文字不使用（古波斯文字使用的）“隔字符”，这可被视为他对正确认识埃兰文字做出的又一贡献，但这还远远算不上解读。可以说，在古波斯语解读之前，埃兰语铭文的解读根本没有进展。如果以格罗特芬部分地成功解读古波斯语铭文（1802 年）为界把古波斯语的解读划为解读之前和解读之后的话，那么，在古波斯语解读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埃兰语的解读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格罗特芬发现埃兰文字中的竖楔在古波斯铭文中没有对应的字，而且总是被用于人名或地名之前，[③] 这是他对埃兰语言文字的解读做出的惟一值得提及的贡献。

---

① 有时被译为“伊兰”、“依兰”和“以拦”等。

② Pallis, Antiquity of Iraq, pp.123－126.

③ G.F.Grotefend, Neue Beiträge zur Erläuterung der persepolitanischen Keilschrift, Hannover 1837, p.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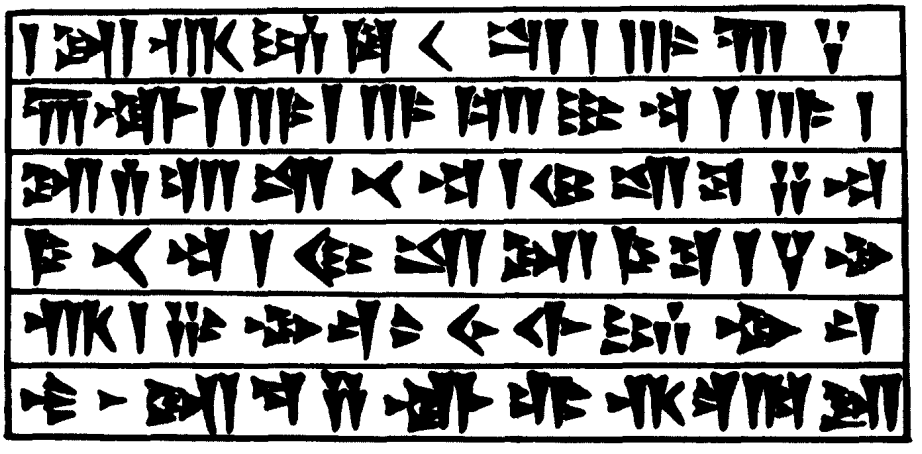


图 41 与图 37 对应的埃兰语铭文①

第一个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人是丹麦学者韦斯特加德（N.L.Westergaard，1815～1878 年）。他本是专于梵文研究的学者，后来，密切关注欧洲各国学者对古波斯楔形文字铭文的解读，对已发表的所有铭文都有研究。1843 年他被丹麦政府派往波斯考察古迹和临摹铭文。他在大流士的墓地纳克什—卢斯坦和塔赫提—贾姆希德临摹了许多用三种语言文字刻写的铭文，成为第一个知道自己在临摹什么内容的铭文的人。他回国后，把铭文都交给拉森，拉森根据新的材料重新修订了他的古波斯字母表，于 1845 年发表，其中包括到那时为止尚未解读的字母。从这个意义上讲，韦斯特加德对古波斯语的解读也有贡献。不过，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为解读埃兰语铭文付出的努力。②

他采取了人们解读古波斯语铭文时采取的方法，即把专有名词（主要是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作为切入点的方法。他首先在古波斯语铭文中找到专有名词，然后按照格罗特芬发现的用于指示人或地域的竖楔的提示，在埃兰语的对照文中找到对应的专有名词，然后再参照古波斯语的读音来确定埃兰楔形符号的读音。他用这种推断的方法给 82 个符号配上了发音，其中有 20 个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③

---

① 内容与古波斯语文本完全一致，音译为：

(1) |da-ri-ya-ma-u-iš | sunki ir-šá-

(2) ir-ra | sunki | sunki-ip-in-na | sunki |

(3) da-a-ú-iš-be-na | mi-iš-ba-za-na-

(4) áš-be-na | mi-iš-da-óš-ba | ša-ak-

(5) ri | ha-ak-ka_4-man-nu-ši-ya ak-ka

(6) hi | da-is-sa-ra-um hu-ut-taš-da (Walker 1990, 61页)

② N.L. Westergaard, "On the Deciphering of the Second Achaemenian or Median Species of Arrowhead Writing",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s Antiquaires du Nord, 1840－1844, pp.271－439.

③ Pallis 1956, p.127.

他在对每个专有名词的发音进行比较之后，发现这第二种铭文绝不是用更复杂的符号书写的古波斯语，而是一种与古波斯语完全不同的语言，他称之为“米底”语。他还仔细比较了古波斯语和埃兰语的对应词，通过比较获得许多埃兰语词汇，同时对埃兰语语法有了一定了解。但他和他的合作者拉森的古波斯语水平毕竟有限，这就大大妨碍了埃兰语的解读进展。譬如，他们曾正确地发现埃兰语的 naari（现在读 nanri）与古波斯语的 thatiy 是对应词，古波斯语的 thatiy 是动词“说”的第三人称单数，但由于他们不了解古波斯语中 thatiy 的词义，所以，在解释埃兰语时望文生义地把 naari 解释为“高贵”。不过，总的说来，韦斯特加德功大于“过”，他为埃兰语的解读开了个好头。

1846 年，爱尔兰的欣克斯又把埃兰语铭文的解读向前推进了一步。他采取的也是比较专有名词的方法，但他在以下两个方面长于他人：一是他对古波斯语铭文有深入研究，二是他的直觉几乎一贯正确。

对解读埃兰语铭文最有价值的材料无疑是贝希斯敦铭文，罗林森是亲自临摹贝希斯敦铭文的人，所以，他也就自然成了对解读埃兰语铭文很有贡献的人。罗林森在笔记中记了很多关于埃兰语的笔记。贝希斯敦铭文的古波斯语铭文的第 35 段（§35）损坏严重，几乎无法识读，于是，罗林森根据埃兰语的对照本弥补了缺文，补文基本正确。[①] 这说明罗林森对埃兰语铭文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发表他对埃兰语的研究成果，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第三种铭文，即阿卡德语铭文的解读上。1851 年，罗林森把他研究埃兰语的论文草稿交给了当时任“皇会”秘书的诺里斯(E.Norris, 1795～1872 年)，但从未见发表。

诺里斯于 1855 年发表了他自己对埃兰语铭文的研究结果，详细说明了他解读每个符号的具体过程。[②] 像韦斯特加德一样，他的解读方法也是专有名词对比法，即通过对比古波斯语铭文和埃兰语铭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从已知的古波斯语发音推断埃兰语音节符号的发音。在贝希斯敦铭文中有 100 多个这样的名称，这为他“重构”埃兰语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现在我们知道，埃兰语使用的音节符号共 123 个。诺里斯推测出 100 多个符号的读音，其中 30 个左右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其余的都正确。他的译文也基本正确。

目前，埃兰语是书写古波斯铭文的三种语言中人们了解得最不够的一种。虽然《创世记》（10:22）把埃兰人的祖先追溯到“闪”（Shem），但可以肯定，埃兰语不属于“闪语”（或译“塞姆语”），似乎与现在已知的任何语言都没有亲缘关系。有关埃兰语的许多基本问题至今仍不很清楚，如埃兰语是否区分清浊辅音等。

---

① JRAS 4 (1847), p.228.

② JRAS (1855), pp.7-46.

仅阿黑门尼德时期就给我们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埃兰语泥板文献，其中大都是与商务有关的档案。其他时代留给我们的材料也不少，包括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Narām-Sîn，前2254～前2218年在位）与埃兰人签订的条约，公元前13世纪的奉献文献、交货记录，以及公元前7世纪的大批书信等。直到阿黑门尼德时期，埃兰语语言文字的使用一直没有间断，阿黑门尼德王朝控制埃兰后，把埃兰语作为一种官方语言，把书记任务交给埃兰书吏掌管。大流士执政后，始令埃兰书吏造古波斯文字，从此，波斯人才摆脱文盲时代，进入文字文明时期。研究表明，在贝希斯敦铭文的三种语言文字铭文中，埃兰语铭文的勒刻时间最早，其次是阿卡德语铭文，最后勒刻的古波斯语铭文。[①] 这个顺序足以表明埃兰语在阿黑门尼德时期的地位，同时也给我们一点启示，那就是，创造古波斯文字的思想可能是在勒刻贝希斯敦铭文的埃兰语文本和阿卡德语文本时萌发并得以实现的。

除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碑文和壁文外，还在埃兰地区发现了一些非楔形的文字材料，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200年间。学者们把这种文献称为“原始埃兰语”（Proto-Elamite）文献。有人认为，这些早期文献也都是埃兰语文献，[②] 并做了解读尝试，但人们对此不褒不贬，淡然处之。直到如今，学者们对这些“原始埃兰语”文献的解释仍众说纷纭。

第三节　阿卡德语铭文的解读

阿卡德语铭文是指用由苏美尔人创造、后被讲阿卡德语的塞姆人继承和发展了的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铭文。[③] 这种铭文在古波斯时期的三种语言文字对照的铭文中通常被称为“第三种”铭文。

许多欧洲学者致力于阿卡德语铭文的解读，说明他们已充分认识到解读“第三种”铭文的重大意义。从本章第二节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从17世纪初开始就不断有人把带有楔形文字的砖和印章等带到欧洲。早在18世纪，许多古物收藏家就认为，这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与波斯波利斯的“第三种”文字是同一种文字。[④] 格罗特芬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虽然有时在形式上与波斯波利斯的

① Borger 1982, pp.105－106.

② W.Hinz, The Lost World of Elam, London 1972, p.31.

③ 很多人习惯于称之为“巴比伦语”铭文。所谓的“巴比伦语”（Babylonian）和“亚述语”（Assyrian）都是阿卡德语（Akkadian），前者指阿卡德语的南部方言，后者指阿卡德语的北部方言，二者区别甚微。通常人们不特意区分二者，统称其为阿卡德语。这是本文称其为阿卡德语铭文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这里讲到的解读的对象，不仅限于巴比伦语铭文，也包括亚述语铭文。

④ Pallis 1956, pp.132－133.

“第三种”文字有一些区别，但它们书写的都是同一种语言。这种观点可能首先在一些人中激发了解读阿卡德语铭文的热情。1811 年后，里奇不断把他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和碑文副本等文字材料送给格罗特芬，由格罗特芬发表。1843 年，法国的博塔发掘豪尔萨巴德，1845 年，英国的莱亚德开始发掘尼姆鲁德，楔形文字泥板、刻字砖、印章、碑铭等文字材料像洪水一样涌入欧洲。楔形文字里蕴藏着什么秘密？欧洲人的心里激荡着强烈的好奇心。因此，解读“第三种”语言文字的任务显得非常迫切。于是，人们从不同角度开始了攻坚。

丹麦学者韦斯特加德首先进行了尝试。他首先把波斯波利斯的古波斯语铭文与“第三种”铭文进行了对比，从中确定对应词。图 42 的楔形文字铭文是与尼布尔《游记》中的铭文 G 相对应的阿卡德语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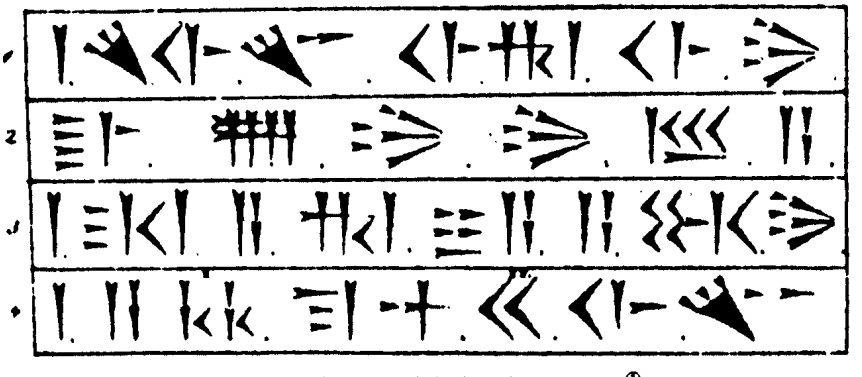


图 42　与图 38 对应的阿卡德语铭文[1]

从古波斯语铭文中我们知道，这个铭文的意思是：“薛西斯，大王，王中之王，大流士王之子，阿黑门尼德氏。”因此，第一句话是“薛西斯”，毫无疑问，但第一句话到什么地方为止仍是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确定出现四次的“王”字，这也并不难。但出乎意料的是，与古波斯语“王”（由 7 个符号组成）相对应的阿卡德语的“王”只是一个孤立的符号。这表明，阿卡德语的“王”字是个表意符号（logogram）。确定“王”字后，其他断字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一组字是“薛西斯”，最后一组字是“阿黑门尼德氏”，这两组字前都有一个竖楔，显然是“限定符”，不发音，指人，并用于人名前；第三行为“大流士王”；第二行“王”前的两个符号为“伟大的”，而“王”后面的那个符号为复数形式，而第二行最后那个符号就是“儿子”，又是个表

① Bermant 1979, p.90. 其拉丁化音译应为：
šá-ši-i'-ši-ri-ši LUGAL　薛西斯，大王，
GAL-ú LUGAL.LUGAL.MEŠ.A (apil)　王中王，
da-a-ri-ia-a-muš LUGAL　大流士王之子，
a-ha-ma-an-niš-ši-i'　阿黑门尼德氏。

意符号。就这样，韦斯特加德阅读了这个铭文，领会了大意，也正确地分析了语法，但却不知任何符号的发音，更谈不上单词的发音了。所以，只能说他领会了这篇铭文的意思，远远还没有解读阿卡德语。而且，他之所以能正确领会和正确分析，完全是由于他凭借了古波斯语的帮助，没有了这样的拐棍，就寸步难行了。事实证明，用一字对一字的比较方法是解读不了“第三种”语言文字的。

由于这条路行不通，人们不得不另找突破点。于是有人试图在《旧约》中找出亚述或巴比伦人名地名，期望从中能得到启发。可是，其结果十分不理想，因为，希伯来语中的亚述或巴比伦的人名地名与原始形式相去甚远。譬如，阿卡德语人名“Marduk-apla-iddina”（意为“马都克赐我一子”）在希伯来语中变成了“Merodach-Baladan”；再如，阿卡德语人名“šarru-kīn”（意为“真王”）在希伯来语里变成了“Sargon”（萨尔贡）。这样的名字不但无助于正确认识阿卡德语，反而引起了误导，致使有人认为这“第三种”语言与古波斯语相似，有人认为与梵语相似，还有人认为与斯拉夫语相似。[①]

1843年，瑞典学者勒文施泰因（I. Löwenstern）提出“第三种”语言属塞姆语（闪米特语）的观点。[②] 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旧约·创世记》（10:22）把亚述（Assur）视为闪的后裔。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不过，他的论据缺乏说服力，因为《创世记》也把埃兰视为闪的后裔，而埃兰语不是闪语（塞姆语）；《创世记》把迦南视为含（Ham）的后裔，而迦南语不是含语，而是闪语。很显然，在《创世记》中，民族不是按语言来划分的，而是依据地理位置划分的，也部分地包括政治因素。可以说，勒文施泰因在论据不足的情况下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带有很大偶然性。这一正确结论对后来的解读者有没有产生启发作用，我们不详。

1857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对阿卡德语铭文的解读结果进行了“验收”，这标志着阿卡德语的解读成功。成功解读阿卡德语的这个功劳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国际合作的结果，对此做出贡献的人很多，下面我们只介绍贡献较大的几人。

爱尔兰的欣克斯。他对解读古波斯语和埃兰语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最大的贡献体现在对阿卡德语解读上。归纳起来，他的方法主要有三个。其一，比较法，即比较三种语言中的专有名词。格罗特芬早就发现，“第三种”铭文中的那个独立的竖楔（𒀭）（图43）是人名的限定符，而三个斜楔（𒁹）是地名的限定符，这对欣克斯确定人名和地名有很大帮助。其二，替换法，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同铭文（或段落、或单词）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异体”（variation）。从“异体”和正体的相互替换中，往往可以有许多新发现。其三，比较形体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因为他认为，就埃兰符号与“巴比伦”

① I. Löwenstern, Essai de Déchiffrement de l'Écriture Assyrienne, Paris 1845, p.12.

② 同上，13页。

符号而言，形体相同者，发音也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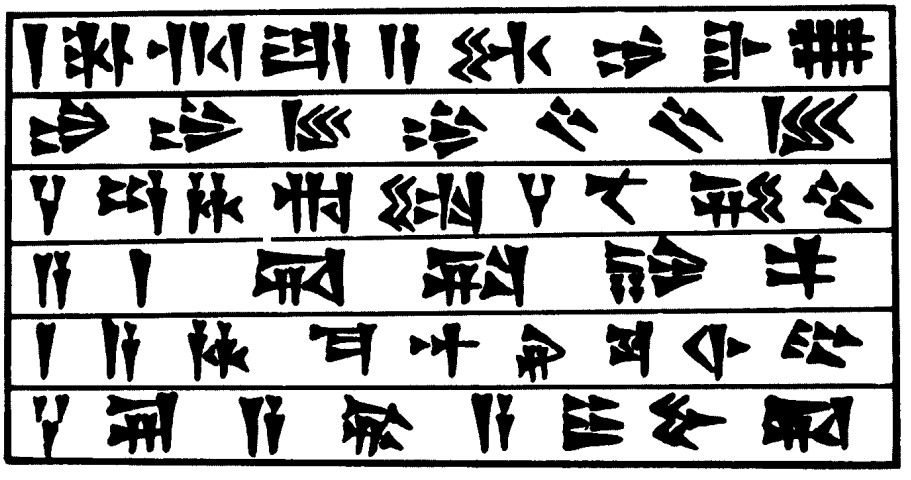


图 43　与图 37 对应的阿卡德语铭文[1]

从 1846 年开始，他就不断向“爱尔兰皇家科学院”提交论文，发表他的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他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1. 他发现，除表意符号（logogram）和指示符（determinative）外，每个符号都代表一个音节，没有纯辅音符号。[2]

2. 给 80 个符号注了音，其中 40 个正确无误，其余皆接近正确。[3]

3. 发现异字同音现象，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符号可能表示同一音节。

4. 1846 年就解读了人称代词“我”（anāku）。由于希伯来语的“我”是 anoki，所以，他通过这个比较确信“巴比伦语”是塞姆语（闪语）的一支。

5. 发现许多表意符号。

6. 发现“音补”（语音补充说明）现象（phonetic complement）。[4]

7. 发现复合字，如，“儿子”和“女人”组合成“女儿”，但“女儿”的发音绝不

---

① 内容与古波斯文本略有出入：

(1) | da-rɪ-ɪa-a-muš LUGAL GAL-u 大流士，大王，

(2) LUGAL LUGAL.MEŠ LUGAL KUR.KUR.MEŠ 王中王，所有讲语言的国家 (3) 之王，

(3) ša nap-ha-rɪ lɪ-šá-nu gab-bɪ（所有讲语言的国家），

(4) A | uš-ta-as-pa 叙司塔司佩斯之子，

(5) | a-ha ma-an-nɪ-ɪš-šɪ-ɪ' 阿黑门尼德氏，

(6) šɑ E_2 a-ga-a ɪ-pu-uš 建筑该宫殿的人。(Walker 1990，61 页)

② 在阿卡德符号中，也有很少部分符号表示双音节，如 rama、$reme_2$ 和 sɪpa 等。

③ Pallɪs 1956，p.151.

④ 如 SA_3-bu 和 $ŠA_3$-bɪ 中的-bu 和-bɪ 就分别是 lɪbbu“心”（主格）和 lɪbbɪ“心”（属格）的“音补”。

等于“儿子”的发音和“女人”的发音之和。[1]

8. 发现一些指示符，其中包括置于地域名称之后的地域指示符 KI。

9. 他还发现，有的符号既可用作表意符号，又可用作表音符号，如：A 既可用于表示“儿子、后裔”，也可用于表示音节 a；AN 既可用于表示音节 an（这时是音节符号），也可用于表示“神”（这时是表意符号），还可以用作指示符，用于神名之前。

10. 把由凯尔·波特在巴比伦发现的一篇铭文[2]与另一篇源于巴比伦的铭文比较之后，他发现，虽然二者字体相去甚远，但内容完全相同，从而发现楔形文字的两种体，一种我们今天称之为“新巴比伦体”，一种我们称之为“古巴比伦体”。他从对比中，发现 76 个古巴比伦体楔形符号的读音，为这种古体字揭开了神密的面纱。

欣克斯的这些发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是个伟大的、天才的解读家。

法国的博塔。他通常被视为开创西亚考古英雄时代的考古学家，他的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解读方面。不过，他做过解读楔形文字文献的努力，对后来的解读产生过一定启发作用。他于 1842 年被法国政府派往摩苏尔做副领事，次年开始发掘豪尔萨巴德，发现大量楔形文字铭文。他从铭文中归纳出几百个楔形文字符号以及一些符号的“异体”。在大量的对比中发现楔形文字的“王”（𒈗）字（即 LUGAL），并发现该字的阿卡德语读音。他认为，亚述人使用的文字不是字母文字，而是音节文字。此外，他还认为，KUR（当时读音不详）这个符号具有限定“国家”的作用。

德·隆佩里埃（A. de Longperier）。他是巴黎皇家博物馆古物部保管员。他发现博塔发现的那个“王”字有一次和其他两个符号一起出现在一个铭文里：𒈗𒌋𒌋 。这三个符号前面是个竖楔，再前面还是这个王字：𒁹𒈗𒌋𒌋 。这表明，竖楔后面的名字是个国王的名字，即“王×××”。在确定这个王的名字时，隆佩里埃想到了希伯来语的“王”（sar），而《旧约·以赛亚书》（20:1）中有亚述王，名曰“萨尔贡”（Sargon）。[3] 因此，他推测，楔形文字中的“王”字应读作 sar，与正确的读音 šar 只差咫尺。他通过这种推理发现法国在豪尔萨巴德发掘的古物属亚述国王萨尔贡统治时期（前 721～前 705 年）。虽然这只是一个孤立的结果，但它的取得没有借助任何双语文献材料，靠的只是一种巧妙的推理。如果没有三语或双语铭文的存在，阿卡德语的解读大概只能靠这样的推理了。

罗林森。他早就致力于“第三种”铭文的解读。1847 年他写道：他通过比较古波斯语铭文和已发表的巴比伦语（阿卡德语）铭文中的专有名词，已发现不少“字母”的

---

① 现在我们知道，DUMU“儿子”+ MUNUS“女人”= mārtum“女儿”。

② R. Ker Porter, Travels in Georgia…, London 1821－1822, pl.78.

③ 汉译《旧约》多译作“撒珥根”，如《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94 年南京，647 页。

发音。可见，这时，罗林森仍把书写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视为“字母”，同时说明，他对欣克斯的研究成果不了解。他对自己的研究结果相当不满意，因为他认为，解读巴比伦语的惟一一把钥匙是贝希斯敦铭文。于是，他于1847年，又来到贝希斯敦，在一个库尔德青年的帮助下完成了阿卡德语铭文的拓制。至此他有了贝希斯敦铭文的各种文本，在占有资料方面已得天独厚。

但是，他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贝希斯敦铭文上，他同时还很注意新发现的材料，如莱亚德于1846年在尼尼微发现的黑色方尖碑。他在贝希斯敦铭文的巴比伦语铭文中和黑色方尖碑上发现许多一样的字词。这样，他把通过贝希斯敦铭文解读的词应用到黑色方尖碑上，最后不但解读了贝希斯敦铭文，也解读了黑色方尖碑，成为亚述学的主要奠基人。

不过，罗林森的解读也绝非一帆风顺。关于这点，我们首先从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把阿卡德楔形符号视为“字母”的事实中就可窥见一斑。罗林森很长时间把ba、bi、bu这样的音节理解为“字母”B，把da、di、du和ta、ti、tu这样的音节理解为“字母”D和T，等等。他同时也发现，有些符号表示音节，如hi、ras和var等。他在音译“高墨达”时，就把楔形文字的gu-ma-a-tu译为g-m-a-t。结果，绝大多数音节符号在他那里都成了只代表一个辅音或一个元音的“字母”。音节众多，字母有限，用字母代替音节，势必造成几个、甚至很多不同符号只用一个字母代表的情况，或者说，一个字母下面势必有几个或更多不同符号。这些符号在罗林森那里就必然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了。不过，事实证明，这个错误并没有影响他解读的进展。这大概与下面的事实有关：其一，罗林森坚信“巴比伦语”是塞姆语的一支。由于他通晓阿拉伯语、古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所以，他只凭辅音（即他的“字母”）就可以领会词义。其二，罗林森不是语言学家出身，所以，他不特别擅长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语言，而注重的是领会大意。这就使他在不理解语法的情况下，敢于大胆解意，不受语言学禁律的束缚。这是“字母”没有影响他的解读进展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阿卡德语有格的变化，如ša-ar-ru（主格）、ša-ar-ri（属格）、ša-ar-ra（宾格）“王”，再如su-bar-tu（主格）、su-bar-ti（属格）、su-bar-ta（宾格）“亚述”等。在这样的例子积累到一定数量时，罗林森才意识到，他的同一“字母”中的各个可替换的异体（如T＝TU、TI、TA，R＝RU、RI、RA）应该是相互有别的音节。一般说来，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以后，才能谈到正确理解语法，只有正确理解了语法，才能正确领会语义和词义。可就罗林森个例而言，他在不理解语法的情况下理解了许多阿卡德语铭文中的词义。但毋庸置疑，发现楔形文字的基本特征，即音节特征，标志着罗林森解读历程中的又一次飞跃。

罗林森在解读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铭文过程中，不知列了多少表格：符号表、读音

表、专有名词表、动词变位表、名词变格表等，并试图从中总结规律。他不断根据新发现，反复地修改这些表格，同时又不断利用它们指导解读。他对贝希斯敦铭文的解读就是在对这些表格反复修改、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完成的。1851 年，他发表了贝希斯敦铭文的全部译文，包括楔形文字原文、音译、翻译和完整的符号表，这标志着阿卡德语的成功解读。

罗林森解读阿卡德语的许多细节，今已无法得知。他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其他欧洲学者的成果，这个问题也无法肯定回答。他确实借鉴了一些人的成果（如欣克斯在解读阿卡德语方面取得的成果和诺里斯在解读埃兰语方面取得的成果），这点没有疑问。然而，他独立地解读了贝希斯敦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在当时的情况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英国人把他尊为英国的“亚述学之父”，他当之无愧。

我们说，以罗林森发表贝希斯敦铭文为标志，阿卡德语于 1851 年就基本被解读了。但解读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没有马上被公众承认和接受。许多学者仍对解读方法和由此取得的成果表示怀疑。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阿卡德楔形文字一字多音（homophones）和一音多字（polyphones）的特点。尽管罗林森一再开设讲座，向公众和学术界说明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的特点，但人们对此还是难以置信。

罗林森的朋友们建议他公开宣布他的解读结果，但他拒绝这样做。他说：“我们对此了解得毕竟很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发现。我要研究所有在尼尼微和巴比伦尼亚发现的泥板，在此之前，我不再多言。”①

1857 年，事情发生戏剧性转折。引起转折的关键人物是塔尔博特。他是英国著名的数学家，由于发明“塔尔博特系统”（1840 年），成为摄影术的先驱。他一直对楔形文字的解读十分关注，认真研读解读家们发表的论著，尤其是欣克斯和罗林森的有关论著。至 1856 年，他对各家的解读结果研究得相当透彻，已成为实际上的东方学家。他坚信，欣克斯和罗林森的解读方法是科学的，取得的结果是正确的。面对社会上尚有相当多的人对解读结果持怀疑态度的事实，他计上心头：他把自己对罗林森寄给他的刚刚在亚述发现的一个棱柱铭文的研究结果封起来，寄给了“皇家亚洲学会”，并附信一封。信中道：“迄今，仍有很多人不相信欣克斯博士和罗林森先生对亚述文字解读结果的正确性，因为许多东西与先人之见背道而驰。例如，一组楔形符号代表一个音节，但这个音节又不固定，有时是这个音节，有时是那个音节。对于这点，人们的回答如下：如果照他们的方法去做，不但会给一切不确知的事情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就连古代亚述人自己也绝不可能读懂这样的文字。所以，他们解读的方法不可能正确，其解释也势必错误

① Budge 1925, p.92.

百出。"[1] 为了拨开疑云，他建议"皇家亚洲学会"不要马上开启他的棱柱铭文译文，要等罗林森翻译完这个铭文后，再来比较他们二人分别独立完成的译文，以检验解读方法和结果正确与否。如果二者不谋而合，就足以证明解读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正确性。

当塔尔博特的信在"皇家亚洲学会"宣读以后，罗林森提出了进一步建议：以"皇家亚洲学会"的名义，邀请其他两位当时恰巧都在伦敦的学者——爱尔兰的欣克斯和法国的奥佩尔（J.Oppert，1825～1905年）[2] 一同参加"会试"。"皇家亚洲学会"采纳了这一建议，把塔尔博特翻译的那个亚述棱柱铭文副本分别寄给欣克斯和奥佩尔，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期限内把译文寄回"皇家亚洲学会"，由"皇家亚洲学会"组织专家和专门会议予以鉴定。于是，罗林森、欣克斯和奥佩尔三人分别独立完成了译文（有的没来得及做完全部），在规定的时间内寄到"皇家亚洲学会"。"皇家亚洲学会"召开了扩大会议，特邀了一些不是会员的知名学者参加鉴定。当场开封，宣读各家解读结果。评委们的结论是：各家解释虽在细节上有一定出入，但总体一致。从此，解读者的辛勤努力和由此结出的丰硕成果开始得到公认。因此，常有人把这一"会试"视为亚述学诞生的标志。如果把它视为亚述学诞生的标志的话，可以说，亚述学的诞生具有戏剧性和传奇性，但它的孕育过程是长期的和艰难的。罗林森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疲惫的十二年里，[3] 我只短暂地回过英国一次。我生活在令人精疲力倦的气候里，断绝了一切社会联系，几乎不能享用文明社会的舒适。事实上，我在为一个伟大的人文目标而受罪。"[4] 其他人也都以不同方式做出过牺牲。这里体现着许多欧洲学者的敬业精神和追求科学目标时的执着，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

① Rogers 1915，p.242.

② 奥佩尔生于德国汉堡，父母都是犹太人。曾在海德堡、波恩和柏林学习。后来到法国，先以教德语为职，后成为法国著名亚述学家和考古学家，任职于法兰西学院。

③ 指在巴格达的12年，即1843～1855年。

④ Athenaeum (1884)，Ⅱ，p.593. 转引 Bermant 1979，82页。

第五章　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

（1842～1855 年）

最早在西亚进行“发掘”的人应该是意大利人彼特罗·德拉·瓦莱。他曾于 1616 年手持一把鹤嘴锄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对巴比伦遗址进行了“发掘”。第二个进行发掘的人是法国的博尚，地点也是巴比伦遗址，时间在 1784 年。他已不是单枪匹马地独自一人发掘，而是雇佣了三个当地人帮他发掘。第三个对美索不达米亚古代遗址进行发掘的人是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里奇，时间在 1811 年。他雇佣了十个当地人随他一起发掘。他们三人的发掘虽然发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随地乱掘（随时可能更换发掘地点），以寻求珍贵文物（以自己的判断为标准）为惟一目的。他们的“发掘”标志着以收集地表文物为主的古物学向以挖掘地下遗存为主的考古学的过渡。

里奇的发掘在欧洲产生的影响最大，他的游记和发掘报告在欧洲有广泛读者，包括法国的莫尔和英国的莱亚德。法国的莫尔是第一个极力主张法国应该积极参与西亚考古的人，而莱亚德是英国西亚考古学之父。可以说，是里奇和他的著作拉开了大规模西亚考古的序幕。没有里奇和他的著作，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开始的时间可能还要推迟一些。

不过，他的头开得并不好。如果把考古学视为“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①] 那么，他与彼特罗·德拉·瓦莱和博尚一样，还远不能算作考古学家，而是个不折不扣的挖宝者。这里所说的挖宝者指这样的掘地取宝者：不择手段，以获取实物为最终和惟一目的。从早期的发掘者的发掘动机和发掘行为中我们看到，西亚考古的原动力主要是物欲，一种占有文物的欲望，而科学追求——如果有的话，也处于次要地位。由这种考古动机决定的考古行为必然是只注重获取实物，并以获取实物为最终和惟一目的。

在里奇时代（19 世纪初），近代科学考古学还没有形成。一种科学的出现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辨证发展地看，里奇以及许多后来者的挖宝式发掘，正代表了西亚考古必然经历的初始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初始阶段，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科学考古学。不过，必须指出，早期的发掘者的挖宝式发掘（包括法国的德·萨尔泽克的发掘）对文物造成了严重破坏，给考古学和历史学带来很多不可弥补的损失。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 2 页。

关于里奇我们在第三章中已做了一些介绍，但作为西亚古物学向考古学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介绍一些他的生平和事迹。他于1787年出生于法国的第戎，在英国度过童年。他很年轻时就到了孟买，服役于东印度公司。他特别喜欢学习语言，也非常具有语言天赋。他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阿拉美亚语、波斯语和汉语。他还利用工作之便到过土耳其和意大利，从而学会土耳其语和意大利语。20岁就任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未满24岁又开始兼任东印度公司驻巴格达代表。上任的头几年，他对帕夏史感兴趣，因此，在巴格达及其附近地区搜集帕夏史材料。1811年，他首次造访巴比伦遗址，从此投身于对巴比伦和亚述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他首先在巴比伦进行了试掘，由于没有发现多少遗物而转向亚述。他曾手拿挖宝的铁锹站在巴比伦尼亚的两个重要遗址——巴比伦遗址和基什遗址上，却不知脚下埋着的就是他觅而不见的宝藏。他的考察报告首先在维也纳发表，但在英国也有广泛读者。

1820年4月，他开始北上，考察库尔德斯坦，10月到达摩苏尔。在那里停留4个月，先后在纳比—优尼斯和库雍基克进行了试掘，并正确地认为这里就是尼尼微遗址。此后，他南下考察尼姆鲁德，每到一村，都可见到楔形文字泥板或石碑。1821年，他考察波斯后，在回巴格达的归途中，不顾个人安危，照顾霍乱病患者，遂染霍乱，死于伊朗的设拉子。他去世后，他的遗孀陆续编辑出版了他的尚未发表的考察报告和游记。[①] 后来，大英博物馆用8000英镑购买了里奇搜集的古物。[②]

里奇逝世后，西亚考古进入“停顿”状态。不过，在停顿的背后，考古的准备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止，欧洲在西亚考古的这条跑道上正在做起跑前的准备。

第一节　法国

里奇的报告引起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莫尔（M.J.Mohl，1806～1876年）的注意。莫尔确信里奇“发掘”的库雍基克就是尼尼微遗址，并相信那里埋藏着奇珍异宝，非常值得发掘。莫尔于1840年专程到伦敦观看东印度公司收集的楔形文字砖。这就更增强了他的上述信念。在他的影响下，法国政府决定往摩苏尔派一名副领事，专门为国家搜集古物。这个被派往摩苏尔的副领事就是博塔。他于1842年5月25日走马上任。有人把这一天视为亚述研究史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③]

法国在摩苏尔设置的这个副领事职位没有造就出政治家，而造就了第一个名垂青史

① 如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Site of Babylon in 1811，London 1839。

② Oates and Oates 1976，p.28. Budge 1925，26页：1825年，英国政府用1000英镑购买了里奇搜集的亚述和巴比伦文物。

③ Rogers 1915，p.160.

的西亚“考古学家”。不过，像早期许多著名的考古学家一样，博塔的成功也主要归功于勇气和运气，尤其是发现地下“宝藏”的运气。运气是使早期“考古学家”（包括莱亚德等人）青史留名的主要原因。后来一些著名考古学家之所以著名，也主要靠一点，即看是否有重大的实物发现：有，则美名远扬；没有，则默默无闻。但是，重大的实物发现往往取决于运气，而不是仅仅靠学识。所以，可以说，著名的考古学家都是幸运儿。

博塔是幸运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学问。他有学问，但不是考古学，也不是与考古相关的历史学。他是个医生，因此喜欢自然科学。他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当过法国领事。在埃及期间他到处搜集昆虫标本，用盒子把它们收藏起来。回国时，开罗的警方怀疑盒子里的东西，要求打开这些盒子，结果，他们看到的是用大头针固定的12000只昆虫的标本。他同时是个外交家，因此善于利用社会关系。难道医生和外交家两点是一个人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前提吗？当然不是。

来摩苏尔上任前，莫尔再三嘱咐他：决不能停留于搜集，要挖掘，地下一定有被埋没的伟大文明。来到摩苏尔后，他本打算先发掘纳比—优尼斯，但遭到帕夏拒绝。于是转而发掘库雍基克（自1842年12月至1843年2月），其结果令他十分失望，因为没有发现任何重要东西。这再次说明了这个时期挖宝式考古的特点：以获得实物为最终和惟一目的。

图 44 普拉斯率领的法国考古队（1852－1853 年）在豪尔萨巴德的人面飞牛前留影（Reade 1992，12 页）

在当地居民的指引下，他来到距库雍基克约10公里的豪尔萨巴德发掘。豪尔萨巴德是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前721～前705年）建立的新都，古代名称为杜尔—沙鲁金（Dūr Sharrukīn“沙鲁金堡”）。据当地居民讲，泥板、楔形文字砖和刻有浮雕的石板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他们祖祖辈辈都把这种东西作为建筑材料。博塔到那里见到的情景果然与其所闻相差无几，开挖之后，更是不断出现奇迹：雕刻的石板、泥板不计其数，更有巨大的人面飞牛石雕等大型艺术品。博塔以为他发现了尼尼微，所以，在1843年4月5日给莫尔的信中他说：“尼尼微找到了”（“Ninive était retrouvée”）。[①] 不久，他放弃库雍基克——真正的尼尼微遗址，把人马全部调到豪尔萨巴德。把尼

① M.J.Mohl, Lettres de M.Botta sur les Découvertes à Khorsabad, Paris 1845；英译本 Letters on the Discoveries at Nineveh 1850 年于伦敦出版。

尼微留给了正在积极准备参加挖掘的英国人。博塔把豪尔萨巴德误认为尼尼微，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留名青史，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重要遗址并挖掘出大量文物。

最初，他的发掘经费是由朋友提供的。他的发现在法国引起轰动后，法国政府开始慷慨解囊，出资3000法郎，遂为发掘工作解决了资金问题。但博塔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其中两个最棘手，一是不适应那里的气候，二是当地居民对发掘工作进行种种阻挠。当地居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认为博塔是在寻找一种“密诀”（talismanic guardians），而按照这个密诀的指引就可以找到宝藏；另一些人则认为博塔是在寻找一个古代地契（old title deeds），以便证明所有土地都曾经是欧洲人的，欧洲人将来有权收复失地。这些说法传到帕夏的耳中后，帕夏先是派了卫兵来监视发掘，夺走所有出土的金属器，声称其目的是为了检验它们是否是金器。后来又命令博塔在发掘地点为他建一座临时住房，专供他来视察时休息之用。再后来（1843年10月），干脆让土耳其政府下了禁止发掘令，发掘工作被迫停止。直到1844年5月，在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努力下，发掘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当时，豪尔萨巴德遗址丘上仍有人居住。为了全面发掘豪尔萨巴德遗址，博塔出钱把居住在遗址上的村民搬迁到周围平地。他雇佣了300名当地居民参加发掘，他本人临摹铭文，弗朗丹负责绘制图表。1845年，发掘工作告一段落。他于1845年满载而归，凯旋巴黎，顿时成为法国和全世界瞩目的人物。在发掘期间，他就不断把“战利品”运回巴黎，有一次还发生了翻船事故，致使在地下掩埋了近3000年的文物，在刚刚重见天日后就又永远沉入底格里斯河。他发掘和收购的文物至今一直是卢浮尔博物馆珍品收藏的组成部分。

法国人在亚述古都的发掘不但为法国获得了珍贵文物、从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发掘结果的发表，[①] 更推动了西亚考古的进一步发展。

在罗林森主持英国的西亚考古期间（1851～1855年），法国人也在加紧考古活动。一方面，驻摩苏尔副领事普拉斯（V.Place，1822～1875年）继博塔之后继续发掘豪尔萨巴德。另一方面，法国东方学家莫尔游说内政部长资助法国的西亚考古工作，后来，由内政部长提议，法国议会批准拨款70000法郎，用于资助西亚考古。1851年，以曾经在约旦做过领事的福莱斯内尔（F.Fresnel）为首，组成了一支西亚考古队，成员包括著名东方学家奥佩尔和建筑师托马斯（F.Thomas）。这支考古队于1851年10月9日从马赛出发，1852年7月7日到达伊拉克的希拉。他们详细考察了许多遗址，并在巴比伦和比尔斯—尼姆鲁德（博尔希帕）进行了发掘，发现许多艺术品和铭文。[②] 很遗憾，

① Monument de Ninive Découvert et Décrit, par M.P.Botta, Mesure et dessine par E.-N.Flandin, Paris 1849. 图文并茂，洋洋五大卷。

② J.Oppert, Expédition Scientifique en Mésopotamie, Paris 1863－1867（2卷）.

这些出土文物，包括普拉斯在豪尔萨巴德发掘出土的部分文物，于1855年5月23日，在运往巴士拉的途中翻船入水，永远沉没。

第二节 英国

法国人的成功发掘（出土大批文物）使英国人垂涎不已。于是，英国人又以更大的热情再次投入西亚考古发掘活动。积极推动并以极大热情和勇气亲自参加和主持发掘的人是莱亚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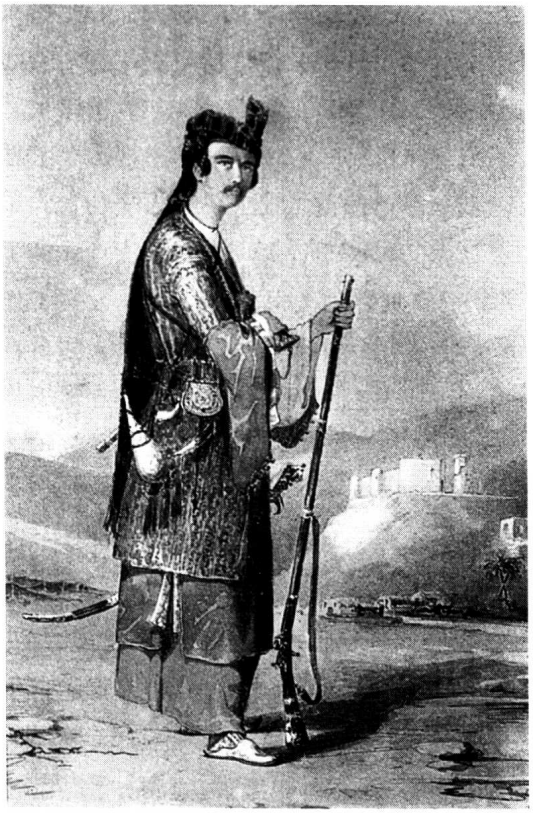


图45 身着波斯服装的莱亚德。1843年于君士坦丁堡（Reade 1992，4页）

莱亚德的全名为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1896年），后人称其为考古学家、近东考古学的创建者、艺术史专家和外交家。

莱亚德于1817年3月5日出生于巴黎。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长大，并在那里学习绘画和意大利历史与艺术。后来学习法律，周游欧洲。他从小爱读《一千零一夜》，对游历东方早就梦寐以求。自从读了英国的里奇“发掘”巴比伦和尼尼微的报告后，对东方更加憧憬。再加上天生的好动和开拓性的性格，1839年他便离开对他来说寂寞得不能容忍的伦敦，准备到锡兰去做律师。他取道陆地，[①]沿路访古。1840年5月到达伊拉克的摩苏尔，然后南下考察巴比伦遗址和泰西封遗址。1840年6月，他来到波斯考察贝希斯敦，然后又考察南部的苏萨等地。这期间，莱亚德已放弃去锡兰做律师的打算，准备投身于西亚考古发掘。他到处争取资金，但收获不大。

他于1842年被巴格达的英国长驻代表派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完成一项外交使命时，在途中结识法国驻摩苏尔副领事博塔，方知博塔正在做他梦寐以求而又尚未

① 由于那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所以，英国人到东亚或南亚时，一般都这样走：横渡地中海，从叙利亚登陆，然后，由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至波斯湾。Pallis 1956，p.54.

做到的事。从此，他开始密切注视博塔的发掘活动。博塔在豪尔萨巴德的成功发掘，使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参与激情。于是，他屡次劝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坎宁(S.Canning)，请求坎宁为他争取发掘许可证。坎宁开始时有些犹豫，后来还是从土耳其政府那里为他弄到发掘许可证，并为莱亚德提供了一笔启动经费：60英镑，[①]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也少得可怜。所以，莱亚德不得不继续在朋友中筹款，以补不足。由于是以坎宁的名义申请的发掘执照，所以，名义上是坎宁在进行发掘，而莱亚德是受雇于坎宁，为他执行考古任务。

莱亚德选择了尼姆鲁德作为发掘地点。这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他熟悉里奇对尼姆鲁德遗址的描述，认为有发掘价值；第二，他于1840年和1842年曾两次亲自考察过尼姆鲁德遗址，亲眼目睹了其发掘潜力；第三，他错误地认为，尼姆鲁德遗址就是古代的尼尼微，[②] 他显然有心想做尼尼微的发现者。

1845年10月，他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骑马南下。当他到达摩苏尔时，发现法国的普拉斯已开始发掘库雍基克（尼尼微遗址）。于是，莱亚德停留在此，并也立即开始在这里进行发掘。由于普拉斯已经得到发掘权，所以，他对莱亚德的行为极为不满，提出强烈抗议。统治摩苏尔地区的帕夏也对莱亚德进行了种种威胁和阻挠，但莱亚德并不示弱，一边抗争，一边继续发掘。从此，英法两国在库雍基克（尼尼微）的发掘权和所有权问题上陷入长期纠纷之中。莱亚德在遗址的一侧发掘，普拉斯在另一侧发掘。不过，不久他们就都放弃了这里的发掘。普拉斯放弃发掘是由于他认为这个遗址没有发掘前途，莱亚德放弃在这里的发掘则是由于他急于发掘尼姆鲁德。

尼姆鲁德地处库雍基克以南约20英里，莱亚德确信那里就是尼尼微。同年11月底，他到达尼姆鲁德，开始在那里发掘。他用非常低廉的价格雇佣了6个当地劳力，没过几天就发掘出大量浮雕石板、巨大的人面飞牛石雕和其他文物。起初，他的发掘受到当地穆夫提和迪卡的阻挠，他不得不再次向坎宁求援，让坎宁为他从土耳其政府那里办理“特殊许可证”，以排除这些阻挠。坎宁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这一事实再次表明，政治势力的参与是西亚早期考古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1846年1月，莱亚德回到摩苏尔。这时，曾阻挠他发掘库雍基克的独眼独耳、以凶残狡诈著称的帕夏已经受到土耳其政府惩罚。他抓住这个良机，又开始对库雍基克进行发掘。与此同时，为了验证他的“许可证”的效力，他还在附近的许多遗址进行了发掘，但因没有发现重要东西而又都放弃。

---

① Rogers 1915, p.178. 后来，莱亚德用公款偿还了这笔钱。

② 里奇当时也认为，尼姆鲁德就是色诺芬（Xenophon, Anabasis Ⅲ, 4, §7）笔下的拉里撒（Larissa，即尼尼微）。现在我们知道，尼姆鲁德就是《旧约·创世记》(10:11) 中提到的迦拉（Kalah），现在多译为卡拉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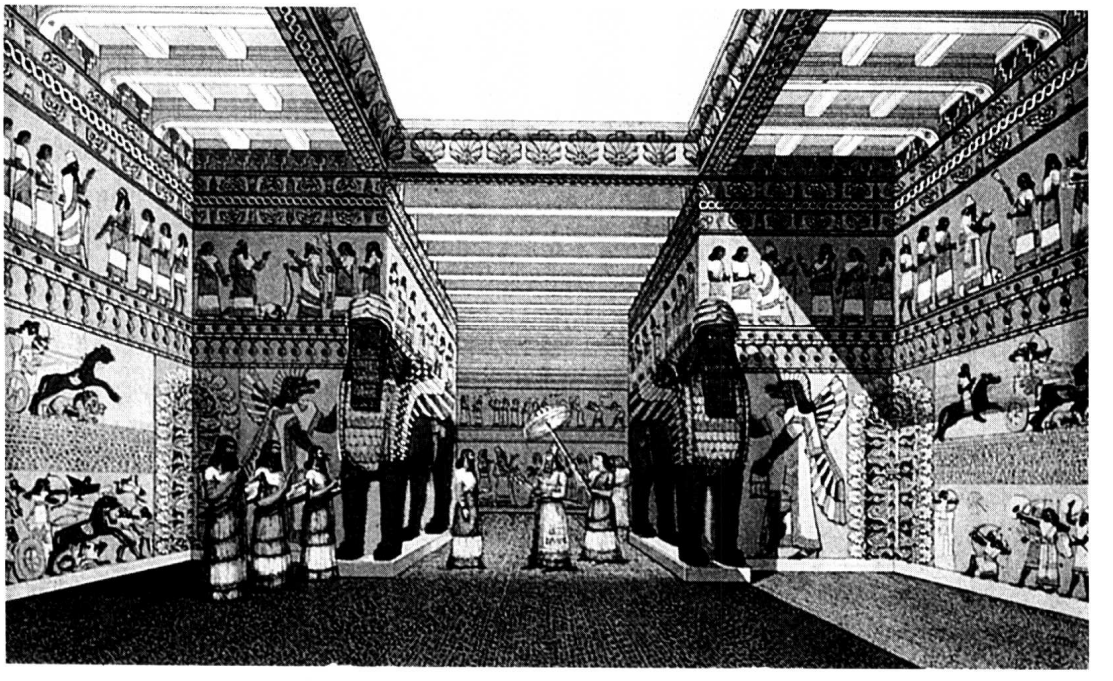


图 46 莱亚德绘制的亚述纳西帕尔二世正殿。大致反映了原貌，细节上有些出入(Reade 1992，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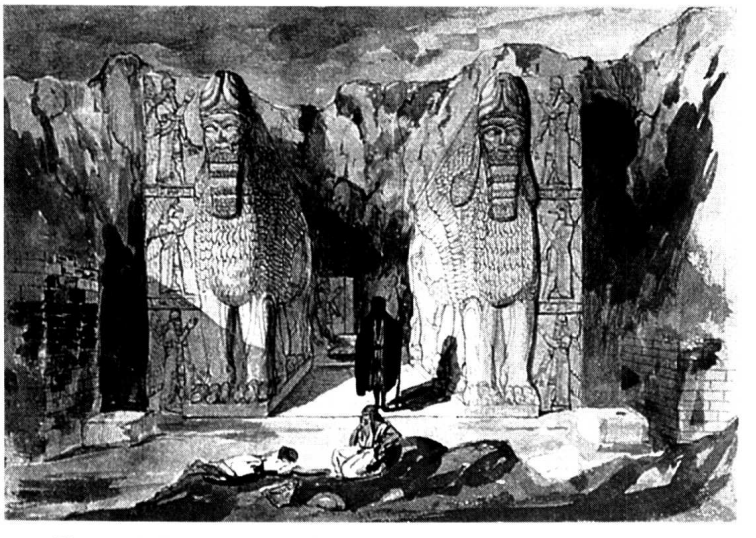


图 47 古伯绘制的莱亚德发掘尼姆鲁德（1850 年）的情景（Reade 1992，8 页）

从 1846 年开始，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发掘库雍基克，把主持尼姆鲁德发掘的任务交给了罗斯。1847 年，莱亚德返回伦敦时，主持尼姆鲁德发掘的任务由拉萨姆（H. Rassam，1826～1910 年）承担，而库雍基克的发掘工作由其兄长拉萨姆（C. Rassam，英国驻摩苏尔副领事）主持。1849 年，莱亚德返回摩苏尔，集中发掘库雍基克，至 1851 年。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莱亚德和拉萨姆在库雍基克清理了 71 个房间、27 座饰以巨大人面飞牛石雕或狮身人面石雕的宫门，出土的浅浮雕石板加起来有 9880 英尺（约 3011.4 米）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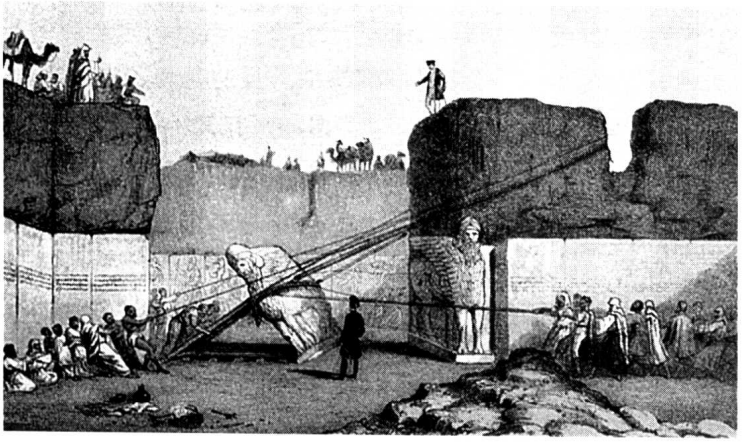


图 48　莱亚德发掘尼姆鲁德（亚述纳西帕尔二世的西北宫）时的情景（Strommenger 1978，45 页）

图 49　莱亚德在尼姆鲁德（亚述纳西帕尔二世宫殿）发现的人面飞牛石雕（Reade 1992，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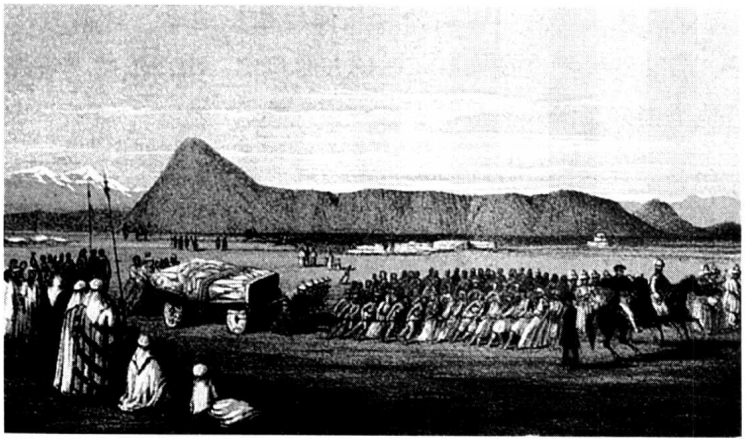


图 50　莱亚德在指挥搬运人面飞牛石雕（Strommenger 1978，4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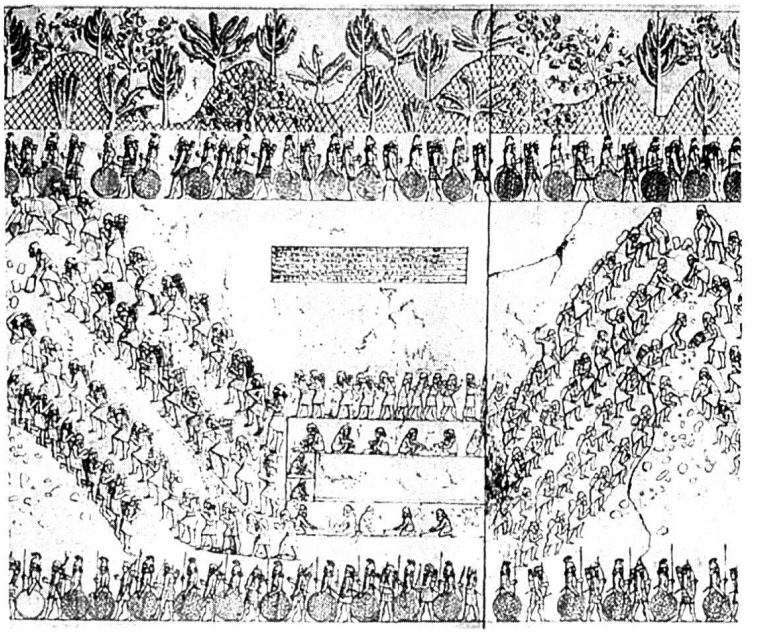


图 51
尼尼微出土的亚述石板浮雕描绘了亚述人为制作人面飞牛石雕而采石和运石的情景（Reade 1992，18 页）

这期间（1849～1851 年），他曾骑马遍访两河流域南部遗址，目的是为了查明哪个遗址还可能出土浮雕石板或类似人面飞牛石雕一样的大型艺术品。1850 年，他来到巴比伦遗址，发掘了遗址北部的一部分，发现一些帕提亚（安息）时期的棺葬和其他遗存，但因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放弃。随后，他又试掘了其他一些遗址，都没有发现他想要发现的东西。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南部的土丘不值得发掘。由于这样的错误结论，他也像里奇一样，站在古代基什的遗址丘上，却不知脚下就是古代名城，埋藏着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也是由于这样的错误结论，他于 1851 年告别考古生涯，永远离开了亚述，返回伦敦，开始从政。

莱亚德是个出色的骑手，他骑着马到处访古，无所不至，可是还是没有见到努法尔，即古代巴比伦尼亚的文化和宗教中心尼普尔遗址，遂把这座古代名城留给了后来的美国人。他于 1841 年考察了苏萨遗址，看到当时的遗址丘像巴比伦遗址一样高大，[①] 但却从来没有打算去发掘苏萨，致使这块肥肉最终落入法国人的口中，滋养法国考古界百余年。每当提起莱亚德的这些失误，英国人都遗憾不已。

图 52　罗林森蜡像（Roaf 1998，152 页）

1851 年，在莱亚德宣布不再参与西亚考古活动后，大英博物馆决定派罗林森主持发掘。于是，这位于 1849 年返回伦敦、忙于宣传和出版楔形文字解读结果的文字解读家和外交官，在他的著作付梓以前，于 1851 年匆匆返回巴格达。

这时，法国的普拉斯受法国政府之命，又开始在库雍基克发掘，同时宣布，库雍基克是法国财产。虽然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坎宁也曾得到土耳其政府的发掘许可，但罗林森无意与法国人相争，认为那里没有发掘前途，准备放弃。然而，正在那里发掘的英国考古学家拉萨姆坚决不同意放弃。他认为，在库雍基克北部还没有发掘的情况下，谈放弃为时过早。此外，他还提出一个不能放弃的重要理由：库雍基克是一个当地阿拉伯人的私有财产，自从他祖先买下那块地起，他们就祖祖辈辈居住在那里。他们在山丘一面种植庄稼，在山丘的另一面放牧羊群。因此，这个遗址才被称为“库雍基克”，意思是“很多羊”。当年博塔在此发掘时，就破坏了大片耕地和牧场，土地所有者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库雍基克的主人提出了抗议，但博塔依仗帕夏的势力，对其抗议根本不予理睬，甚至嘲笑了他。那个阿拉伯人只好到君士坦丁堡向其政府投诉。莱亚德知

① 根据金内尔的《游记》，1813 年时，苏萨遗址高约 100 英尺，周围约 1 英里。见 Kinneir，Memoir，100 页。

道此事后，说服英国大使坎宁，让坎宁出钱买下这块土地，因此，库雍基克应是英国的财产。

罗林森不希望由此而伤害英法两国的友好关系，因此，迟迟不同意立刻发掘，而一直试图寻求外交解决办法。

这期间，法国一直断断续续在遗址南部发掘，到1853年时，有逐步向北部扩展的趋势。眼看垂手可得的宝藏又要落入他人之手，拉萨姆不能再等待了。他于1853年12月20日，带领一些曾经在莱亚德那里参加过发掘工作的阿拉伯人，在遗址的北部秘密地趁夜开始了发掘。第一夜清理瓦砾，第二夜就发现了大型石板浮雕，第三夜就出土了一组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前668～前627年）猎狮浮雕。秘密保守不住了，拉萨姆便大量增加了发掘人员，开始公开发掘，昼夜不停，神速地清理了一个长50英尺、宽15英尺（即15.25×4.58米）的房间。最重要的发现是几堆火烧过的楔形文字泥板。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泥板是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私人图书馆”藏书的组成部分。虽然发现的泥板大都破碎，但这些泥板，加上莱亚德以前在库雍基克发现的泥板（两次一共25000多块），成为亚述学的基础。每当谈起拉萨姆的这段英雄业绩和传奇故事时，英国人总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炫耀之意显而易见。相反，法国人则愤愤不平，且遗憾有余。而我们讲这段历史，目的在于形象地向读者说明西亚考古初始阶段的一个特点：欧洲强国凭借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在西亚展开争夺地下宝藏的较量，尔虞我诈，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对文物造成极大破坏。在我们看来，欧洲人喜欢吹嘘和引以为豪的这段历史，当然有它积极的、应该得到肯定的一面，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这段历史又是一段以势凌人、充分显示帝国主义掠夺成性的本性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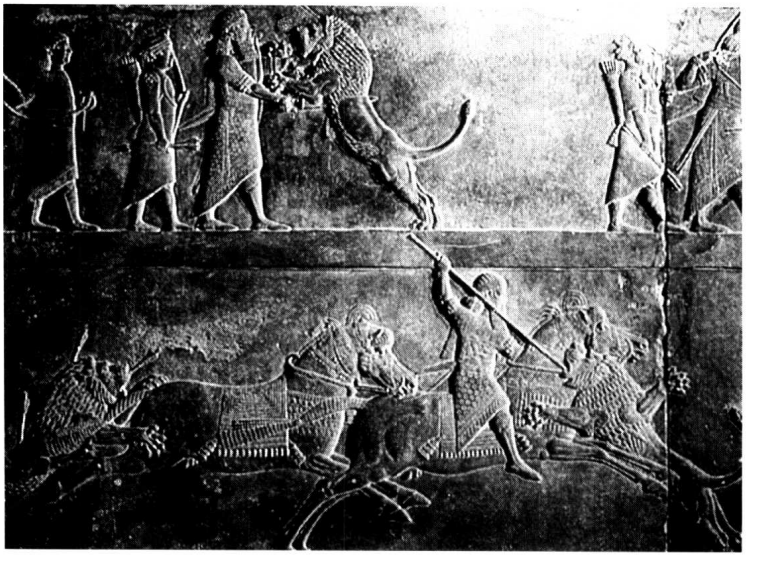


图53　拉萨姆在尼尼微发现的亚述石板浮雕，即亚述巴尼拔猎狮浮雕（Hrouda 1991，353页）

拉萨姆清理一个长50英尺、宽15英尺的房间只用了几天的时间。随后，他被罗林森派往尼姆鲁德，继续发掘莱亚德没有发掘完的遗址，因为罗林森坚信尼姆鲁德也会像

库雍基克一样出土大批泥板。拉萨姆发掘了阿达尔神庙，发现6座纳布神雕像，但没有发现楔形文字泥板。当时，人们对此感到不解。后来发现，尼姆鲁德的大量泥板在莱亚德委托他人主持发掘期间都被当作陶片扔掉了，不可复得。

图 54 亚述塔庙遗址（Hrouda 1991，244 页）

1851～1852 年的整个冬季，法国的普拉斯在卡拉特—舍加特（Qal′at Shergat，古代亚述遗址）进行了发掘。此前，即 1849～1851 年，莱亚德曾在此发掘过。虽然普拉斯和莱亚德的发掘都没有发现重要遗物，罗林森还是对那里的良好发掘前景坚信不疑。于是，他让拉萨姆在发掘尼姆鲁德的同时也开始发掘卡拉特—舍加特。1853 年，泰勒（J.E.Taylor）在南部的穆克吉尔（Tell el-Muqejjir，古代乌尔）的月神庙的四个角落发现 4 个棱柱铭文。罗林森坚信卡拉特—舍加特也必然有类似的铭文。结果，拉萨姆真的发现 2 个八棱柱铭文，即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一世（前 1115～前 1103 年）铭文，另一个由莱亚德于 1851 年发现，一共发现 3 个，分别在神庙遗址的三个角落被发现，第四个至今尚未发现。由于这些铭文的发现，人们始知卡拉特—舍加特就是亚述帝国最古老的都城亚述城（Assur）。拉萨姆的发掘结果与罗林森的期望相差甚远，他对自己的运气也感到失望。不过，他说："尽管我失败了，但我相信，它蕴藏着有价值的遗存，将来的考古学家的铁锹一定会让它们重见天日，……"[①]1903～1914 年，德国的东方学会在此进行了系统和成功的发掘，证实了拉萨姆的先见之明。

1853 年，英国的"亚述发掘基金会"（Assyrian Excavation Fund）建立，基本结束了英国考古学家的资金短缺状况。基金会原来打算派莱亚德再次前往亚述主持发掘，莱亚德由于准备从政没有接受。所以，基金会改派洛夫特斯（W.K.Loftus）前往亚述进行发掘。洛夫特斯曾于 1850 年考察过苏萨，1851 年在那里进行过发掘，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

① H.Rassam, Asshur and the Land of Nimrod, Cincinnati 1897, p.256.

这时，所有英国人在西亚进行的发掘都在驻巴格达总领事罗林森的领导之下。由于北部已有拉萨姆在发掘，所以，罗林森派洛夫特斯南下，去发掘巴比伦尼亚地区的遗址。他从努法尔（古代尼普尔）开始，先后在瓦尔卡（Warka，古代乌鲁克）、桑克雷（Senkere，古代拉尔萨 Larsa）、穆克吉尔（古代乌尔）和阿布—沙赫林（Abu Shahren，古代埃利都）等遗址进行了发掘。[①] 他的发掘实际上都是试掘，发现的文物都被送到大英博物馆。

拉萨姆于 1854 年回伦敦，后去亚丁从政，暂时告别考古生涯。于是，洛夫特斯又被调到北部发掘库雍基克，由大英博物馆和“亚述发掘基金会”联合赞助。洛夫特斯清理了前人已经发掘过的探方，发现许多被当时的发掘者忽视了的泥板、楔形文字砖和其他小型器物。此外，他自己也在不同位置挖了新探方，发现一些浮雕，收获不算太大。

罗林森在主持英国的西亚考古工作期间（1851～1855 年），还派人发掘过“巴比伦堡”卡斯尔（Qasr），几无收获；派托内提（M.J.Tonetti）发掘过比尔斯—尼姆鲁德，[②] 在层塔下面发现尼布甲尼撒二世棱柱铭文。1854 年，英国驻巴士拉副领事泰勒（J.E.Taylor）开始发掘穆克吉尔（乌尔），在南纳神庙遗址发现圆柱铭文，第二年又发掘阿布—沙赫林（埃利都）、拉赫姆（Tell al-Lahm）和西弗尔（Tell Sifr）。

罗林森主持发掘期间，英国财政部给大英博物馆拨发的发掘专款是 3000 英镑。罗林森主持发掘的遗址有库雍基克（尼尼微）、尼姆鲁德（杜尔—沙鲁金）、卡拉特—舍加特（亚述）、努法尔（尼普尔）、瓦尔卡（乌鲁克）、桑克雷（拉尔萨）、穆克吉尔（乌尔）、阿布—沙赫林（埃利都）、卡斯尔（巴比伦的一部分）、比尔斯—尼姆鲁德（博尔希帕）等。可见，罗氏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在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罗林森认为，西亚的重要遗址都已经被发掘，以后不会再有类似库雍基克和尼姆鲁德遗址出土的大型石雕。于是，他于 1855 年 2 月辞掉驻巴格达总领事的职务，返回伦敦，以潜心研究已经出土的文献。他辞职后，英国的考古活动处于暂时停滞状态。

随着罗林森的辞职和法国“福莱斯内尔考察队”考察任务的结束，西亚考古的第一个高潮过去，进入第一个暂停阶段。直到 1873 年英国的史密斯（G.Smith，1840～1876 年）发掘尼尼微以前，除当地人不时进行盗掘外，只有瑞士的韦泊（J.Weber）于 1860 年在尼姆鲁德进行过短暂发掘，发现一些浮雕石板和刻字砖等，他于 1863 年把他发现的文物运往苏黎世，成为“苏黎世收藏”。[③]

---

① W.K.Loftus,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Chaldaea and Susiana, London 1857.

② 古希腊人称之为 Borsippa（博尔希帕）。

③ Budge 1925, p.220.

第三节 结语

这个阶段的考古发掘是西亚考古的初始期，也是英雄时代。它的动机主要是物欲，它的目的主要是获取文物，它的方法极不科学，因此带有极大的破坏性，它的政治依靠是帝国主义列强，它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它的参与国是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对象国是软弱、松散、腐败的奥斯曼帝国。然而，就其发掘的实物收获而言，这个时期的考古是极富有成果的。

具体说来，它具有以下特点。

1. 大批古代遗址被发现发掘，出土文物的数量、内容和艺术品的精美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因此，发掘结果不断在参与发掘的英、法两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轰动。这种轰动效应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西亚考古的发展。

2. 西亚考古最初完全是个人行为，随着大批遗址的发现和文物的大量出土，它逐渐转变为国家行为或由国家积极参与的机构行为。虽然法国在摩苏尔设立副领事的初衷在于为本国收集古物，但当时国家并没有想到进行考古发掘。博塔的发掘最初是他个人筹集的经费，因此属于个人行为。法国政府的积极参与是在他发现重要遗址和大批文物之后。英国的参与也经历了由个人而国家的过程。里奇的发掘完全是个人行为，莱亚德的发掘也是自筹资金进行的。在取得成功后，方得到基金组织、大英博物馆和国家的资助，才由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或机构行为。个人的发掘成功，引起国家和博物馆的积极参与。莱亚德的成功发掘还促成“亚述发掘基金”的设立。国家和博物馆的积极参与和考古基金的设立又进一步促进了西亚考古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3. 西亚考古始终受到发掘国本国政府官员（驻对象国公使或其他政府高级官员）的庇护。博塔的发掘受阻时，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进行了努力，使发掘工作得以继续进行。莱亚德的发掘始终都处于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坎宁的庇护之下，他的“发掘执照”（faraman）也是通过坎宁获得的。

4. 发掘者把自己置于政府官员的庇护之下，说明他们需要这种庇护。他们的发掘工作往往阻力重重，常常由于受到阻挠而被迫停止。阻力往往不是来自土耳其政府，而是来自遗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或群众。摩苏尔的帕夏对博塔的发掘和莱亚德的发掘都进行了种种阻挠，当地群众有时也由于对发掘产生误解而进行阻挠。在西方人的眼里，这些对发掘活动进行阻挠的帕夏都是暴吏，而进行阻挠的群众都成了刁民或愚民。[①] 在这里，我们且不去论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意识和由此决定的看问题的视角，也不去论当时的

① Rogers 1915, p.168; Budge 1925, p.70; Ceram 1972, p.238; Layard 1965, 30 页以下。

当地居民如何“刁”和“愚”，我们只强调一个被西方人忽略或故意忽略的、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事实，那就是，这个时期的西亚考古具有明显的挖宝特点，也具有明显的获利特点和掠夺性。看到了这一点，西方人（Frangi）的考古发掘受到当地居民的阻挠就不难理解了。

5. 由于当时的发掘以获取实物（尤其是大型文物）为主要目的，所以，在实际发掘过程中就出现了如下现象：(1) 许多小文物被忽略，或有意无意地遭到破坏。尼姆鲁德的发掘者甚至把泥板当作无用的陶片扔掉。(2) 以是否已有或将会有大型文物出土来判断某一遗址的发掘价值。结果，许多重要遗址在出土重大文物以前就被放弃。巴比伦、博尔希帕、乌尔、埃利都都是被发掘、又由于没有发现重要文物而被放弃的遗址。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蕴藏着无尽宝藏。莱亚德告别考古生涯而从政，也与他认为西亚遗址已没有大型文物出土的可能性有关。罗林森辞去总领事和考古总监职务也是由于他认为大型文物已挖完掘尽。(3) 不注重地层关系，不记录文物的准确的发现地点或位置。这给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多不便。(4) 急功近利。博塔、莱亚德、罗斯和拉萨姆在库雍基克发掘时都把垃圾堆在附近，方便了自己，却给后来的发掘带来诸多不利。拉萨姆清理一个长达 50 英尺、宽 15 英尺的房间竟然只用了短短的几天时间。

6. 发掘者往往把遗址张冠李戴。博塔错把豪尔萨巴德当成尼尼微，而莱亚德则把尼姆鲁德误认为尼尼微。

7. 发掘者常常脚踏重要遗址和取之不尽的宝藏却不自知，无意识地把宝藏留给别人。

8. 发掘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进行发掘，少则几人，多则几百人。莱亚德发掘尼姆鲁德时，最初雇佣了当地的 6 个廉价劳力。法国的博塔发掘豪尔萨巴德时，雇佣的当地劳力最多时达 300 人。

9. 一人同时或先后连续发掘几个遗址。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坎宁为莱亚德申请的发掘执照适用于整个摩苏尔省，也就是说，莱亚德可以凭借这个“执照”在摩苏尔的任何遗址进行发掘。莱亚德为了验证这一点，在发掘库雍基克的同时，还在摩苏尔附近的许多遗址进行了试掘。洛夫特斯和泰勒也在发掘巴比伦尼亚同时或先后连续发掘了许多遗址。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这个时期的考古性质——挖宝也有密切关系。发掘者往往先选定一块“宝地”，再进行试掘，如无大的收获，便马上放弃，另起炉灶，根本不注意发掘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更谈不上科学性。

10. 拉萨姆的趁夜盗掘，再次反映了这个时期考古发掘所具有的挖宝性、掠夺性和随意性。

11. 发掘出土的文物完全归发掘者所有，这是吸引欧洲人前来考古发掘的重要因素，也是引起当地居民对发掘工作进行阻挠的原因之一。英法两国拿文物作交易，即法

国的普拉斯以豪尔萨巴德出土的文物与英国人交换库雍基克（尼尼微）出土的文物，也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个政策充分反映了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软弱和对该地区古代历史文化的无知，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西亚考古学的发展。

12. 由于缺乏运输经验，法国运载文物的船只多次发生翻船事故，造成重大文物损失。后来，法国政府为确保文物安全，曾派海军军舰到巴士拉运载豪尔萨巴德出土的文物。英国在运输文物时也遇到重重困难，尼姆鲁德出土的文物要几经周转，先运到孟买，然后再等上几周或几个月才能运到英国，这期间文物被盗情况严重。

13. 这时参与西亚考古的国家只有英法两国。法国政府的投入程度远远超过英国政府的投入程度。法国政府为博塔发掘豪尔萨巴德所拨的专款超过了英国财政部给大英博物馆的全部拨款，[①] 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坎宁第一次贷给莱亚德的发掘经费仅仅是60英镑。法国政府为“福莱斯内尔考察队”拨款70000法郎，而大英博物馆为罗林森任考古总监期间从事西亚考古活动的拨款只有3000英镑。法国政府曾派海军军舰到巴士拉接运文物，而英国人发掘出土的文物从未受到过这样的礼遇。博塔出版他的发掘报告时，法国政府慷慨解囊，保证了报告的印刷质量和数量，一次出了五大卷，图文并茂。而莱亚德出版他的发掘报告时，财政部不给钱，大英博物馆没有钱，结果是东印度公司出了一部分，其余的则由朋友赞助。[②]

① Budge 1925, p.71.

② 博塔是摩苏尔副领事，而莱亚德当时是无名小卒，政治地位有很大差异。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代表本国考古成就的考古学家。但是，博塔在法国得到的东西——名声和政府的赞助，莱亚德在英国没有得到。在这一点上，莱亚德非常羡慕博塔。（Layard 1965, p.27）这种反差也可能是促使莱亚德放弃考古、从事政治的原因之一。

第六章　向科学考古学迈进

（1873～1898 年）

1855 年罗林森辞去考古总监职务回到伦敦，法国的“福莱斯内尔考察队”也结束了考察活动，西亚考古进入停滞阶段。担任法国东方学会秘书的莫尔先生对西亚考古活动的停止深表遗憾，对西亚考古的前途十分悲观。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进行努力，力争让法国政府恢复西亚考古工作，因为他坚信，在两河流域的古代遗址中仍然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宝藏，而这些宝藏对揭示人类历史的奥秘意义十分重大。虽然莫尔的建议没有马上被采纳，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莫尔确有先见之明。

有人认为，1855 年英、法两国西亚考古活动停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年）给英、法两国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①] 这种说法可能不够全面，因为：其一，这时的考古发掘虽然得到国家的一定支持，但支持的力度十分有限。从 1846 年到 1849 年的三年间，大英博物馆为发掘尼姆鲁德总共拨款 3000 英镑，这已是最大的一笔拨款。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发掘所需要的有限经费不至于给国家造成负担；其二，1853 年英国成立了“亚述发掘基金会”，这是民间组织，它应该有足够的能力使亚述地区的考古发掘继续下去；其三，没有任何参加考古发掘的人曾经公开说明或暗示过，他们停止发掘的原因是由于资金短缺；其四，法国在西亚考古方面的经济投入要多于英国。[②] 如果说法国人是由于战争造成财力不足而中断了西亚考古发掘的话，那么，一断就是二十多年又似乎有些讲不通。这样看来，1855 年西亚考古停止的主要原因不在经济方面，也不在政治方面。这个停止是已经进行了 12 年之久的考古发掘活动的一种自我调节，这个停止是个积极的停止，它本身就意味着再开始。

自 1843 年（博塔开始发掘豪尔萨巴德）到 1855 年，十多年来，英法考古学家挖掘出的文物数量如此之大，令人目不暇接，使当时的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为之激动不已。但是，困惑有增无减：楔形文字书写着什么奥秘？一旦揭去楔形文字的神秘面纱，人们将看到一部什么样的历史？这一切与《旧约》有多大关系？会不会给人们的宗教观

---

① Pallis 1956, pp.269, 293.

② 法国的财政部长在拒绝一份发掘报告时说：“Non, les fouilles sont finies, on a trop dépensé.” Lloyd 1955, p.175.

念带来冲击？……这一系列困惑和疑问不能不对考古发掘产生影响，人们不可能长期地耗费人力物力去发掘连他们自己也不知为何物的东西。所以，停止发掘，集中精力对已发掘出来的材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已经显得刻不容缓。

至1855年，在一些欧洲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已基本解读，只是解读结果尚未得到公认。所以，这时迫在眉睫的任务有三：一是向公众解释楔形文字的解读结果，二是对已经出土的大量文献和艺术品进行整理和研究，三是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这些艺术品和文字材料，使更多的学者有机会参与对它们的研究。由于到这时为止参与西亚考古的国家只有英法两国，所以，这些工作主要在英法两国进行，做得较好的是英国人。

第一节 英国

首先，英国的罗林森为宣传楔形文字的解读结果进行了不懈努力。1857年，在塔尔博特的提议和罗林森的积极推动下，“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对楔形文字解读结果进行“验收”，这是楔形文字研究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以楔形文字和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楔形文字文献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与文化的亚述学的诞生。[①] 不过，虽然解读结果得到了承认，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对亚述学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能直接参与研究的人并不多，因为从尼尼微、尼姆鲁德、亚述、巴比伦等遗址出土的泥板、方尖碑、界碑、棱柱铭文、圆柱铭文等文字材料，尤其是从尼尼微的两个图书馆中出土的泥板，尚无人整理，仍杂乱地堆积在博物馆的地下室，不能被学者利用。因此，1857年大英博物馆决定出版大型文集《西亚楔形文字铭文集》，由罗林森主编。在诺里斯的协助下，第一卷于1861年问世，到1884年共出了五卷。[②] 这套楔形文字文献集把丰富的文字材料公之于世，使其他国家的学者参与楔形文字文献研究成为可能，极大地促进了亚述学的发展，在亚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西亚考古发掘的再度兴起与《西亚楔形文字铭文集》的出版紧紧联系在一起。1872年，史密斯（G.Smith）在为该书整理和临摹泥板时，发现一块泥板残片的内容讲的是“洪水故事”，与《旧约》中的“洪水故事”十分相似。这意味着《旧约》中的“洪水故事”不是希伯来人的创造，而是从亚述人那里继承和发展来的，这意味着希伯来文化与亚述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史密斯的这一发现立即引起罗林森和其他学者

---

① 参见本书第三节：文字考古——楔形文字的解读。

② 关于《西亚楔形文字铭文集》，详见拱玉书：“亚述学之父”，载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编写组编：《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6～117页。

的重视。1872 年 12 月 3 日，史密斯应“圣经考古学会”之邀做了关于亚述洪水泥板和洪水故事的报告，罗林森主持报告会，许多英国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出席了会议。史密斯的报告使出席会议的听众激动不已。于是，会议当即通过一项敦促英国政府和大英博物馆立即恢复发掘尼尼微遗址的决议。其具体目的之一是寻找“洪水泥板”的残缺部分。这样，停滞了近 20 年的西亚考古在一种新的动力的驱使下又重新开始了。

图 55　出土于尼尼微的洪水故事残片。相当于吉尔伽美什史诗第十一块泥板第 55～106 及 108～269 行（Pritchard 1969）

在谈到史密斯被派往摩苏尔寻找“洪水泥板”的残缺部分之前，我们先来讲一段与“洪水泥板”有关的故事。在史密斯作报告以前，罗林森就以朋友身份把史密斯发现“洪水故事”的消息告诉了法国东方学家、于 1857 年参与“验收”楔形文字解读结果的奥佩尔。他马上从巴黎赶到伦敦，亲自鉴定了“洪水泥板”，然后，又匆匆赶回巴黎，不久又出现在伦敦。第一次，他是来鉴定泥板真伪的；第二次来伦敦却另有目的。他声称，这次来伦敦是受了法国政府的委托，目的是为了索回“洪水泥板”。他要求史密斯和罗林森交出“洪水泥板”，以便由他来发表。他振振有辞地说：土耳其政府已于 1842 年把尼尼微遗址给了法国，因此，尼尼微遗址是法国的财产，那里出土的一切文物都应该归法国所有，而且他已得到法国政府对出版“洪水泥板”的资助。可想而知，史密斯和罗林森没有理睬他。奥佩尔因没有得到泥板而恼羞成怒，对史密斯怀恨在心，一面骂史密斯“无能”，一面又不得不沮丧而归。这个故事再次反映了一个问题：在西亚考古的初始时期（1842～1855 年），无论是英法两国从土耳其政府那里要求获得发掘执照，还是土耳其政府允许发掘，其过程都存在许多问题。英法两国依靠各自的政治势力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而土耳其政府在发放发掘执照时可能根本不顾遗址所在地居民的利益。这可能会引起发掘国之间的纠纷，也可能引起当地居民对政府或发掘者的不满。尼尼微遗址的发掘就导致了这两种后果。

如上所述，史密斯于 1872 年 12 月 3 日做了关于洪水故事的报告。当天，“圣经考古学会”就通过了敦促英国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恢复发掘尼尼微遗址的决议。在 50 天后的 1873 年 1 月 23 日，史密斯就肩负着大英博物馆的考古使命从伦敦出发了。之所以如此之快，是由于资金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但是，不是英国政府慷慨解囊——它从来没有像法国政府那样对考古事业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过——也不是大英博物馆迅速地作出了反

应，而是《每日电讯》的老板——一个既有经济头脑、经济实力又热衷于文化事业的人，捷足先登，一手促成此事。他得知“圣经考古学会”的决议后，立即出资1000畿尼（guineas），作为发掘费用，条件是史密斯必须亲自参加这次发掘，并为《每日电讯》提供游记和发掘报道。当时，史密斯是大英博物馆的雇员。大英博物馆愿意接受《每日电讯》的慷慨资助和合情合理的附加条件，准史密斯半年假。于是，他匆匆上路。

1873年3月2日，史密斯到达摩苏尔。那时，发掘执照还没有下来，所以，摩苏尔的帕夏不允许史密斯对尼尼微进行发掘。他只好南下，来到巴比伦遗址和比尔斯—尼姆鲁德考察，顺路购买了一批契约泥板。4月2日，他回到摩苏尔，由于帕夏仍然不允许他发掘尼尼微，他只好去发掘英国的老根据地尼姆鲁德，发掘持续一个月之久。5月7日，他终于开始发掘尼尼微遗址。一周之后，奇迹就出现了：他果然发现了“洪水泥板”的残缺部分（含第一栏中的17行）。史密斯一眼就能看懂泥板的大概内容，这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史密斯发现“洪水泥板”的奇迹和他聪明绝顶的才智一直被传为美谈。他于6月初结束发掘，7月19日返回伦敦。不过，他回到伦敦时两手空空，因为他携带的泥板在土耳其的亚历山大勒塔（伊斯肯德伦）被扣留，后因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泥板才被放行，最终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又一笔宝贵财产。

史密斯的发掘执照是《每日电讯》申请来的，有效期只有一年。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执照，大英博物馆决定再次派史密斯前往西亚，继续发掘尼尼微遗址。这一次，大英博物馆自己出资，《每日电讯》把执照转让给了大英博物馆，并愿意无条件地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于是，史密斯于1873年11月25日又踏上征程，翌年1月1日到达摩苏尔。他立即投入工作，集中发掘尼尼微遗址，结果又发现几百块泥板（包括残片）。3月，执照到期，史密斯被迫停止发掘。他万万没有想到，摩苏尔的帕夏以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博物馆的名义要求他留下所有泥板的副本。秉性天真、诚实、不懂交涉、不会讨价还价的史密斯乖乖地交出了许多泥板。帕夏的要求本来不算过分，但事实证明，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不是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文物，而是在敲诈勒索，想把一些泥板从史密斯手中拿来，然后再让他出钱买回去。但是史密斯没有买。结果，这些泥板下落不明，奥斯曼帝国博物馆一块也没有得到。这些泥板的流失给亚述学再次带来遗憾。

史密斯两次前往西亚发掘尼尼微遗址，不但从地下挖掘出大量泥板，还从不同人手中购买了大批泥板，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文明研究的原始材料，同时也说明，那里的发掘前景仍十分可观。罗林森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敦促大英博物馆再次向土耳其政府申请发掘执照，准备再次派史密斯前往发掘。不过，这个执照直到1876年才申请下来。因此，发掘工作不得不暂停了一年多。

史密斯在这一年多的待命出征的时间里，白天在大英博物馆为《西亚楔形文字铭文集》第四卷临摹泥板，工作之余著书立说。在他的努力下，《西亚楔形文字铭文集》第

四卷于1875年问世。同年，他还出版了自著的《亚述发现》、[①]《迦勒底人的创世记》、[②]《亚述名年法》[③]和《亚述》。[④]从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史密斯身上的传奇色彩。当时，他年仅35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他的能力和智慧璀璨夺目。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的冲刺，厄运和死神已近在咫尺。

史密斯发掘心切，发掘执照还没有批下，他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征程。1875年10月就到达君士坦丁堡。经过种种努力，发掘执照终于在1876年3月批下来。

在去君士坦丁堡的旅途中，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埃尼白格（Eneberg）的亚述学家。他是芬兰人，此时受瑞典政府派遣，正前往巴比伦和尼尼微遗址进行考察。史密斯与埃尼白格惺惺相惜，同命相怜，志同道合，很快结为莫逆之交。埃尼白格也在君士坦丁堡停留下来，陪伴史密斯等待发掘执照。执照批下之后，他二人便结伴上路，朝阿勒颇进发。当时，那里不但正流行霍乱，而且还正进行部落战争。土耳其政府有令，战争和流行病禁地，非公莫入。但是，他二人无视禁令，决意前行。此时，他们既无法找到可以与之为伍的商队，也无法找到愿意陪他们一同前往的个人，只能相互结伴上路。[⑤]在路途中，他们还考察了一些遗址，包括卡赫美什。他俩都是满怀激情的学者，都极易激动和冲动，又不习惯应付艰难的旅途生活，再加上语言障碍（史密斯的阿拉伯语水平有限，而埃尼白格的阿拉伯语是《古兰经》阿拉伯语，几乎无济于事），两人在路途中历尽了艰辛。不久，埃尼白格就病倒了。两人身边都没有带药，史密斯无能为力，只能看着他的同伴病情一天天恶化，最后眼睁睁地看他死去。脆弱的史密斯能活下来已经又是一个奇迹。

史密斯于1876年7月到达摩苏尔。他本想继续发掘尼尼微遗址，可是，由于那里正在发生地区间的居民冲突，再加之天气炎热，所以，根本雇不到民工。这样，他的发掘计划就彻底搁浅了。十分失望的他不得不空手而归。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忍着饥饿，艰难跋涉。快到阿勒颇时，他得了痢疾，病倒。后被送到英国驻阿勒颇领事馆，但为时已晚，抢救无效，遂以身殉职。

史密斯的英年早逝虽然给亚述学和近东考古学带来很多遗憾，但英国的西亚考古发掘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英国人再次从史密斯购买和发掘的大批泥板中看到了两河流域的考古潜力，因而，他们决定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同时扩大发掘范围。从史密斯的经验和

---

① Assyrian Discoveries, London 1875.

②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 London 1875.

③ The Assyrian Eponym Canon, London 1875.

④ Assyria, London 1875.

⑤ 不与商队结伴而行是非常危险的，当年塔韦尼埃曾与一支由600只骆驼组成的商队结伴同行，而埃尔德雷德曾与一支由4000只骆驼组成的商队一起从阿勒颇来到巴格达，仅这段路一般就需要走25～30天。Lloyd 1955, p.35.

教训中，英国人认识到以下三点：1. 必须为考古发掘工作设置专职；2. 必须派遣既有经验又懂阿拉伯语或土耳其语的人去主持发掘；3. 政府必须参与，尽量使土耳其政府下发的发掘执照不带附加条件。

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拉萨姆。他曾在尼尼微遗址发掘，有丰富的发掘经验；在阿拉伯国家从政多年，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本身是阿拉伯血统，不但语言没有障碍，心理更与阿拉伯人息息相通。大英博物馆选择了拉萨姆。1877 年年初他就来到君士坦丁堡等待发掘执照，等了三个半月，没有结果，于是又返回伦敦。

1877 年 4 月，亨利·莱亚德接替埃利欧特（Sir Henry Elliot）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这个大使对英国的考古学有特殊意义，因为他本人是英国西亚考古活动的倡导者，也是最成功的发掘者。他因考古的成功而一举成名，成名后放弃考古，步入政界。他的政治生涯比他的考古生涯更成功。此时，他成为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后来又晋升为英国外交大臣。他大概是历史上官做得最大的一位考古学家。由于他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在上任后不到两个月就从土耳其政府那里得到发掘执照。

拉萨姆于 1877 年 6 月又来到君士坦丁堡。由于执照还没有批下来，他便继续南行考察。当他回到摩苏尔时，他的发掘执照已经生效。于是，他于 1878 年 1 月开始再次发掘尼尼微遗址。对他来说，这是二十多年后的“卷土重来”。他一边指挥雇工发掘尼尼微，一边骑马在摩苏尔周围地区的居民中进行调查。他的雇工很快就清理了辛纳赫里布和亚述巴尼拔宫殿遗址中的许多房间，发现大批泥板和让亚述学家叹为观止的亚述巴尼拔棱柱铭文（Rm.1）。与此同时，他在民间访古时，得知有人在距摩苏尔约 20 英里的巴拉瓦特（Balawat，即古代的伊姆古尔—恩利尔 Imgur-Enlil）发现过刻有战争场面的青铜板。通过艰难交涉，他终于在当地居民的指引下找到了发现地点，然后，派人去发掘，结果发现亚述国王萨尔曼纳萨尔三世青铜门。这座青铜门现存大英博物馆，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门面”之一。

亨利·莱亚德作为英国大使给英国的西亚考古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他的努力下，英国又得到新的发掘执照，凭这个执照英国人可以同时发掘许多遗址。这样，于 1878 年 7 月回到伦敦的拉萨姆于 10 月又踏上考古征程，取道摩苏尔。他一到达目的地就同时开辟了三个战场：库雍基克（尼尼微遗址）、尼姆鲁德（卡尔胡遗址）和卡拉特—舍加特（亚述遗址）。[①]

与此同时，他又南下寻找他认为有发掘价值的遗址。拉萨姆与史密斯不同，他像莱亚德一样是早期挖宝时代出身的考古学家，他不懂楔形文字，也不太注重楔形文字泥

① 有人把这三个遗址称为“亚述三角”（Assyrian triangle）。Parrot 1955，p.44.

图 56
拉萨姆巴拉瓦特青铜门的一部分。考古界一直对巴拉瓦特青铜门的出土地点持怀疑态度，直到 1951 年考古学家又在巴拉瓦特发现青铜门残片时，人们才开使相信拉萨姆（Roaf 1998，168/16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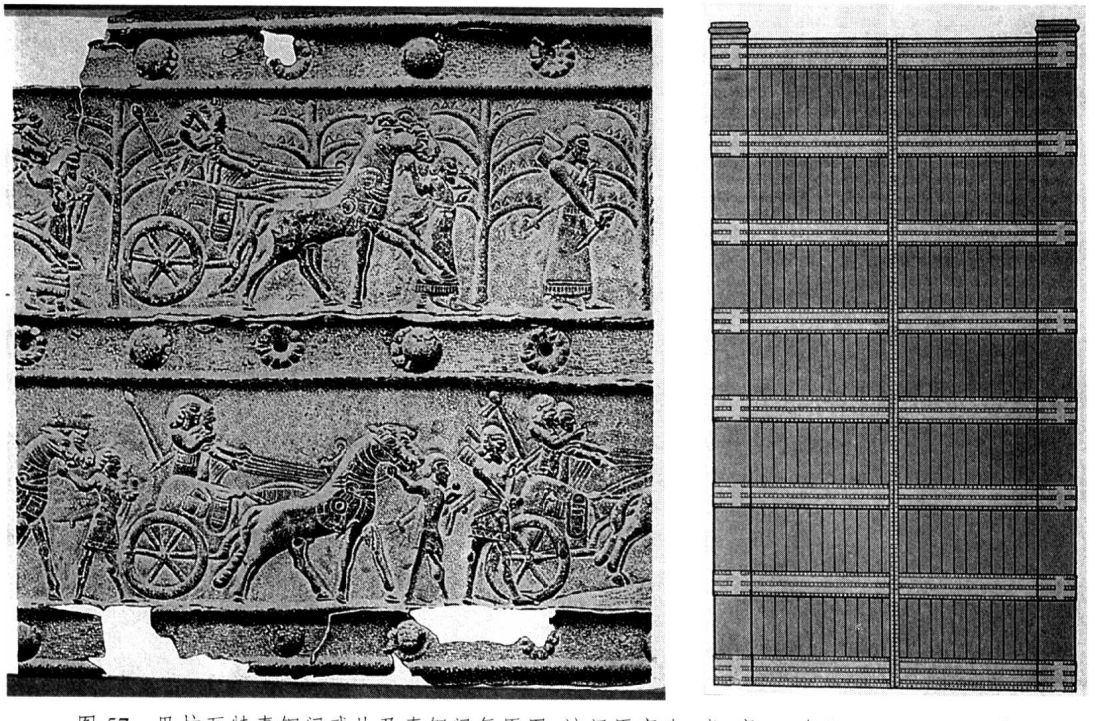


图 57　巴拉瓦特青铜门残片及青铜门复原图。该门原高为6米、宽2.3米(Roaf 1998,166页)

板的发掘，他特别注重的是大型艺术品等大型文物的获得。[①]所以，他在南部考察时，认为阿卡尔（Tell Aqr，即戴尔 Der）不可能有大型雕塑，因而没有发掘，而选择了阿

① 法国考古学家帕罗对拉萨姆发掘的评价是："……从中获得最易获得的东西和对遗址的掠夺。"Parrot 1955, p.45.

布—哈巴（Abu Habba，即希帕尔 Sippar）。其实，两地都是古代的重要城市，都非常有发掘潜力，古代遗存都十分丰富。拉萨姆在阿布—哈巴发现近 300 个房间遗迹，到执照期满时，他的雇工们清理了 170 个房间遗迹，发现 40000～50000 块泥板。没有发掘的部分，后来被当地阿拉伯人盗掘。据阿拉伯人自己讲，他们曾在一个房间里发现许多陶罐，里面装满了泥板，最大的有 4 英寸（10.16 厘米）长。他们还在另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排排石架，上面摆着泥板，有的泥板和印章还被人用一种线绳系在一起。这些泥板后来被贩卖到世界各地，给后来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其中多少泥板被毁，不详。

1879 年，拉萨姆在巴比伦发现居鲁士圆柱铭文，铭文记载了居鲁士于公元前 539 年征服巴比伦的情况。[①]在比尔斯—尼姆鲁德也发现很多泥板，但在伊卜拉欣姆（Tell Ibrahim，即古代的库塔 Kutha）几无收获。当他看到铁罗（Tello，即古代的吉尔苏 Girsu）时，先是不敢发掘，因为铁罗不在巴格达省范围内。但是，在他知道法国驻巴士拉副领事德·萨尔泽克（E.de Sarzec）曾经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在那里发掘时，他也决意进行不法发掘。他集中了一些人，几小时后就发现了一座神庙遗址和两个刻有铭文的大门基座以及一些泥板。他在那里盗掘三日，由于他的雇工与当地居民发生械斗，不得不停止发掘。大概由于这段历史，有的法国考古学家称他为“无耻的拉萨姆”。[②]

拉萨姆穿梭于凡城（Van）和巴比伦之间，同时发掘和监督发掘几个遗址。在巴比伦，发掘工作自 1879 年起一直在进行，到 1880 年已发现一些泥板和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的青铜器。此外还发现博尚于 1782 年发掘过的“竖井”。后来，德国的科尔德威（R.Koldewey）发掘巴比伦时，认为这个“竖井”是用来为“空中花园”提供水源的。[③]库雍基克（尼尼微）的发掘由其侄子尼姆鲁德·拉萨姆（Nimrud Rassam）监督进行，凡城的发掘由英国驻凡城常驻代表克莱顿（C.Clayton）监督进行，在阿布—哈巴，也有人替他监督发掘。他这次受大英博物馆之雇在西亚主持发掘的使命一直持续到 1882 年 7 月底，那时，发掘执照到期，他只好停止发掘。这次遍地开花式的发掘收获很大，仅在阿布—哈巴（希帕尔）一地就发现泥板 60000～70000 块。[④]1882 年年底，拉萨姆回到伦敦。此前，他在各地都雇了人，希望他们能为英国看守遗址，防止盗掘，希望英国能

---

① 有人把这个铭文的第 18～21 行刻到两块马骨化石上，不知何时，流入中国，现存故宫博物院。马骨铭文由吴宇虹解读。见 Wu Yuhong, “A Horse-Bone Inscription Copied from the Cyrus Cylinder (Line 18－21) in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JAC 1 (1986 年), 13～20 页。又吴宇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居鲁士泥圆柱（第 18～21 行）马骨化石铭文抄本（初稿）”，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 年第 2 期，34～36 页。亦见施安昌：“故宫新收骨化石铭刻（楔形文字）的情况”，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 年第 2 期，30～36 页。

② Parrot 1955, p.44.

③ 关于“空中花园”，现有新说：可能不是尼布甲尼撒二世所建，而是早于他约一个世纪的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所建，地址不在巴比伦，而在尼尼微。见吴宇虹：《“空中花园”新说》，载《人民日报》1996 年 2 月 4 日。

④ H.Rassam, Asshur and the Land of Nimrod, Cincinnati 1897, p.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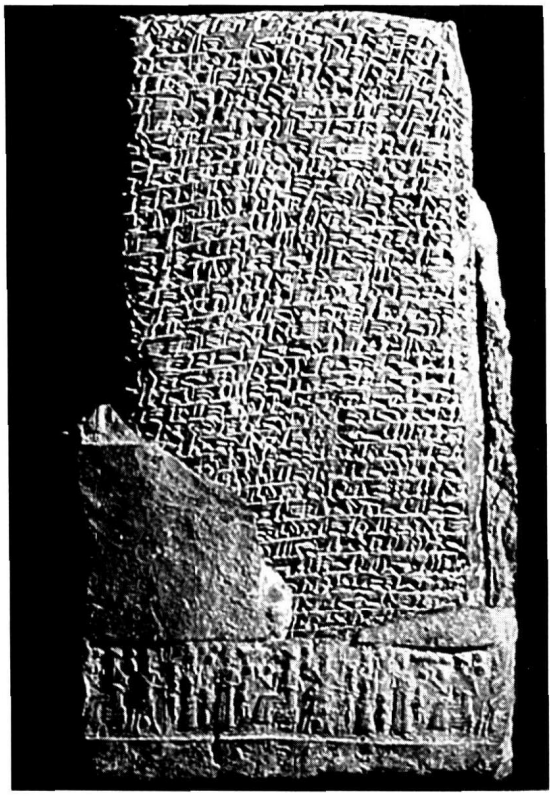
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发掘这些遗址。

然而，拉萨姆回伦敦后，当地阿拉伯人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英国没有发掘完的遗址上进行盗掘，英国花钱雇佣的看守根本无法阻止，或许他们也参与了盗掘。结果，大量泥板被转卖到巴格达的文物交易市场，后又被转卖到世界各地。这时，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都到巴格达等地去购买文物，它们之间相互竞争，把文物的价格越抬越高。价格的提高反过来又刺激和鼓励了盗掘文物的不法行为。面对这种恶性循环，英国人无能为力，只能望洋兴叹。后来，不得不“助纣为虐”，不惜金钱，开始与法国和美国争购文物。

1887年，大英博物馆派巴兹调查英国发掘遗址的文物流失情况。临行前，罗林森对他做了交代：相对而言，钱不重要，“千金散尽还复来”，而泥板是不会再生的，失而不可复得。所以，保护泥板不流失最为重要。巴兹考察了拉萨姆发掘的所有遗址，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文物的情景，他无力阻止，只好出钱购买泥板，甚至不得不出钱从英国人雇佣的看守手里购买泥板。在他购买的泥板中，一些“盒式泥板”——即装在“信封”里的泥板——使他产生极大兴趣。在千方百计从卖主那里打听到这些泥板的出处——戴尔后，他考察了戴尔，发现那里果然非常有发掘潜力。因此，他建议大英博物馆立即申请发掘戴尔。

1888年，大英博物馆派巴兹到君士坦丁堡申请发掘执照。他到达后，每日到政府部门交涉，毫无结果。最后，还是一名英国政府高级官员直接在苏丹王那里为他获得特别执照。但这个执照只限于发掘库雍基克。于是，巴兹马上开始发掘库雍基克。他面临三种选择：一是把前人发掘时就近堆起的废土堆移开，在前人挖掘的探沟附近发掘；二是完全另辟战场；三是在前人（莱亚德、拉萨姆、洛夫特斯和史密斯）挖的探沟处继续发掘。前二者费时费力，而后者最为便捷，所以，他采取了最后一种方式。他雇佣了几百名当地民工参加发掘，土耳其政府也派人监督，大英博物馆不但要为这个监督付旅费，还要为他付工资。发掘出来的文物必须要先运到君士坦丁堡，然后由土耳其政府决定哪些可以让英国人带走。在拉萨姆的斡旋下，英国人最后讨到300多块泥板。连发掘带购买，巴兹为大英博物馆获得一大批泥板和其他文物，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功臣之一。巴兹于1889年返回伦敦，库雍基克的发掘工作遂由拉萨姆主持。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英博物馆获得发掘戴尔的执照。1890年，巴兹又踏上征程，取路摩苏尔，顺路购买了许多文物，其中有240块从库雍基克出土（通过盗掘）的泥板。戴尔地处巴格达以南约20英里处，因此，巴兹从摩苏尔轻舟南下，直抵巴格达。可是他来迟一步，数月之前，巴格达帕夏已指使人在此进行了盗掘。盗掘者在两个房间中发现大量泥板，它们被装在陶罐里，大都是“盒式泥板”（装在“信封”里的泥板）。这些泥板都被转卖到了巴格达文物交易所，后来又被转卖到世界各地。此外，在戴尔还有一处房屋遗址，里面埋藏有大量泥板。据说，为巴格达帕夏负责盗掘的人对这个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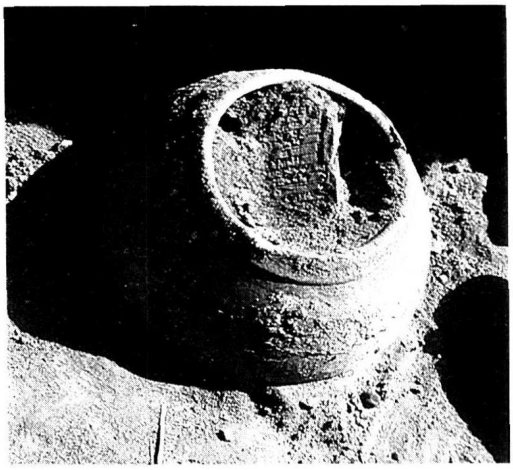


图 59 装在陶罐里的泥板（Hrouda 1991，280 页左）

图 58
在亚述殖民地卡尼什出土的“盒式泥板”，即用封泥（相当现在的信封）包起来的泥板。这个封泥的下面有滚印印纹（Hrouda 1991，87 页）

秘而不宣，为的是有朝一日把这个秘密“卖”给外国人。现在，巴兹来了，这个人就把“秘密”卖给了他。巴兹仅在这一个房间就发现泥板近 3000 块。据巴兹估计，戴尔出土的泥板总数不下于 15000 块。[①] 巴兹的发掘于 1891 年结束，他回伦敦时带回 2500 块泥板，其余 15000 块购买的泥板也在此后的几年里陆续被运到伦敦。

第二节 法国

自 1855 年放弃亚述地区的发掘后至 1877 年，法国人再没有在亚述地区进行过考古发掘。法国的西亚考古工作一停就是二十多年，直到 1877 年才有人开始在巴比伦尼亚进行发掘。[②] 与英国相比，法国并没有多少文字材料，至少它占有的文字材料不至于让他们忙于整理二十余年而无暇顾及考古。因此，可以说，法国的西亚考古从一开始的自

① Budge 1925，p.142.

② 1860 年 10 月 21 日至 1861 年 9 月 24 日，法国塞姆学家雷南（E.Renan）在地中海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发掘，其中包括比布鲁斯、西顿和推罗等遗址。他于 1864 年出版的 Mission de Phénicie 是第一部描述腓尼基考古的著作。Parrot 1955，p.45.

我调节式的停滞逐步演变成了消极的停滞。1877年再次开始的发掘也完全是由偶然的个人因素促成的。英国人之所以在停止了十多年后再次走上西亚考古之路，是由于他们在整理和消化文字材料的过程中再次看到了考古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他们的行为是主动的，有明确的具体目标——寻求泥板。相比之下，法国人在22年后重新在巴比伦尼亚开辟考古新战场的行为是偶然的，完全为物质利益所趋，甚至是亦步亦趋地步英国人的后尘。在这第二次考古浪潮中，第一个进行考古发掘的英国人是出色的楔形文字文献学家史密斯——一个不惜金钱、爱泥板如命的学者，而第一个进行考古发掘的法国人德·萨尔泽克首先是个政治家，是职务之便使他走上考古之路。[①]

1877年，德·萨尔泽克被任命为巴士拉领事。他上任不久，就利用职务之便开始调查巴比伦尼亚的古代遗址，努力寻求值得发掘者。在当地人的指引下，他来到铁罗，那里不但有许多遗址丘，而且还有许多石雕半埋半露，视而可见。这里显然是个古代重镇，考古宝地。他决定在此发掘，并立即动手，把土耳其政府的“许可”与“不可”完全置于脑后。[②]他的第一季发掘工作持续了3个月（3～6月），出土大量文物。1878年，他又在更大的遗址丘发掘了5个月（2～6月），然后满载而归，把出土文物转卖给卢浮尔博物馆，获利13万法郎。[③]这时，他求助于政府，通过法国外交部从土耳其政府获得发掘执照，法国政府也为他拨了专款。于是，他又回到铁罗，并从1880年1月起，开始大张旗鼓地对这一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在当年和第二年的两季发掘中出土一批拉格什统治者古地亚雕像和其他文物。从1881年到1891年的10年间，他对铁罗的17个遗址丘进行了发掘。出土的文物几乎囊括了迄今所知的所有出土于拉格什的重要文物，如麦西里姆权标头、安纳吐姆鹫碑、古地亚坐像和大量泥板文献。由于他的目的仍是挖宝，这就注定了他的发掘方法不可能是科学的，他既没有注意地层关系，也没有记录文物的出土位置。他的惟一目的就是寻求实物，因此，他的发掘有始而无终，十七处遗址丘，没有一个发掘彻底，有时是见好就收，但有时还没有见好也收，给当地文物商贩和盗掘者留下可乘之机，也给考古学留下莫大遗憾。

在德·萨尔泽克发掘期间（1881～1891年），当地阿拉伯人趁机进行盗掘，使文物大量流失。盗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其一，帮助德·萨尔泽克进行盗掘（这样说是因为他并没有获得土耳其政府的批准）的阿拉伯人期望能得到一些好处，尤其是当他们听说德·萨尔泽克把出土文物转卖给了卢浮尔博物馆、自得13万法郎（传闻中又添枝加叶，

---

① “他的职务使他逍遥自在，无所事事。他选择考古完全是为了寻找一些事情做，以有意义地打发时间。Lloyd 1955，p.192.

② 英国考古学家劳埃德说：“他没有申请许可主要是怕惊动拉萨姆，另外，当时的南部巴比伦尼亚正处于独立状态。”Lloyd 1955，p.192.

③ Ch.Fossey，Manuel I，Paris 1904，p.50；Budge 1925，p.198.

图 60
麦西里姆权标头。高 19 厘米，刻有铭文与浮雕，浮雕是六头雄狮和一只“安祖鸟”（在权标头的上面），铭文道：“麦西里姆，基什之王，宁吉尔苏神庙的建造者，为宁吉尔苏献上此物，（此时）卢加尔—沙恩古尔是拉格什的国君。”（Hrouda 1991，330 页）

图 61 古地亚石雕像。闪长岩。由于大腿上放了一个建筑图，再加上铭文的内容涉及神庙建筑，所以，该雕像被称为“建筑师古地亚”（Hrouda 1991，25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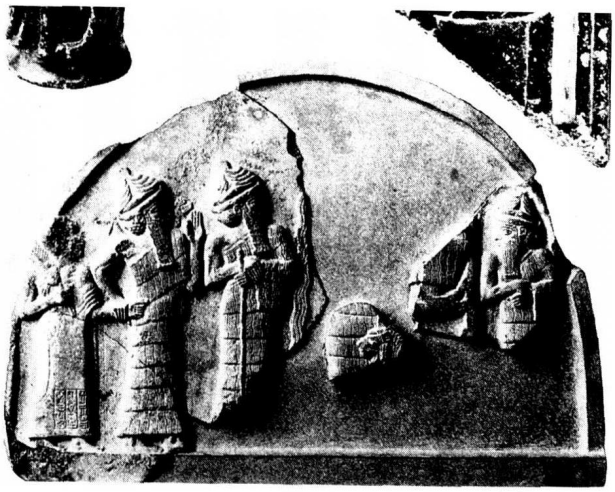


图 62 古地亚石碑残片（Pritchard 1969，图 513）

说他得了 130 万法郎）的消息时，他们更是期盼能分得一点好处，结果分文没有得到。于是，他们便开始在德·萨尔泽克不在时进行盗掘。其二，德·萨尔泽克的发掘并不是不间断地连续进行的，而是分段进行，有时两段时间相距很长，这就在时间上给阿拉伯人的盗掘提供了可趁之机。其三，当地阿拉伯人把泥板等文物视为自己的财产，而把德·

萨尔泽克视为掠夺者。所以，他们的“发掘”应该是理所当然，而法国人的发掘才是非法。但归根结底，有利可图是最重要的原因。德·萨尔泽克出卖文物，获得厚利，这使阿拉伯人再次看到，已经变成商品的文物可以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阿拉伯人买通官员，以挖砖为名，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盗掘。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找到储存泥板的房间，挖出焙干的泥板无数。出土时泥板的保存状态是：数百块泥板罗列在架上，较大的摞在一起，较小的放在陶罐里。他们向德·萨尔泽克封锁消息，不想让他知道他们在“挖砖”时挖出了泥板，也不想让他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泥板，更不想让他知道泥板藏在什么地方。阿拉伯人与德·萨尔泽克展开了智斗，输家是德·萨尔泽克。结果，将近40000块泥板被转卖到文物商手里。文物商本想以此发一笔大财，但是，他们的美梦也没有成真。在经过专家的抽样鉴定、确认这些泥板都不是历史铭文而是与农业、畜牧业和神庙有关的经济文献之后，文物商十分失望。于是，他们把泥板一下子都抛到巴格达和巴士拉的文物市场，廉价出售。结果，来往于巴格达和巴士拉的各国商人、使节、游客、海员和传教士等很快就把这些泥板瓜分一空。目前，这些泥板仍流散在世界各地，但大部分已被转（卖）到不同博物馆。铁罗出土的泥板不能集中一处，这对从事研究的人来说是极大的遗憾。德·萨尔泽克于1901年去世，此后，由杜·克罗（du Cros）[①] 主持铁罗的发掘工作，断断续续持续到1909年。

不论是德·萨尔泽克的发掘还是杜·克罗的发掘，都有一个与挖宝式发掘共有的特点：不注重地层关系，以获得实物为最终目的。但由于出土文物的非同小可，不但德·萨尔泽克因此成为西亚考古史上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法国的东方学家也因此再次在国际学术界扮演重要角色。有人把铁罗的发掘誉为不但“开创了法国考古研究的新时代”，[②]而且“揭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③]这是首次大批出土苏美尔语文献和苏美尔人创造的艺术品，使苏美尔人建立的、早已从历史舞台上和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的王朝——拉格什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520～前2355年）和拉格什第二王朝（即古地亚王朝）又活生生地再现在人们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萨尔泽克的发掘是划时代的。有了铁罗出土的材料才有了苏美尔学，从这个意义上看，德·萨尔泽克的功劳的确值得书上一笔。

1884年，法国考古学家迪厄拉富瓦（A.M.Dieulafoy，1844～1920年）开始发掘伊朗境内的苏什（Shush，古代的苏萨 Susa）。这标志着法国在伊朗境内发掘的开始，从此，法国考古学家与伊朗，尤其是与苏萨，结下不解之缘。苏萨对于法国人就像尼尼微对于英国人一样，意义非同一般。一提到尼尼微，人们就会联想到英国人，联想到英国

① Budge 1925，p.202. 根据 Hrouda 1991，448页，此人应是 G.Cros。

② Rogers 1915, p.296.

③ Rogers 1915, p.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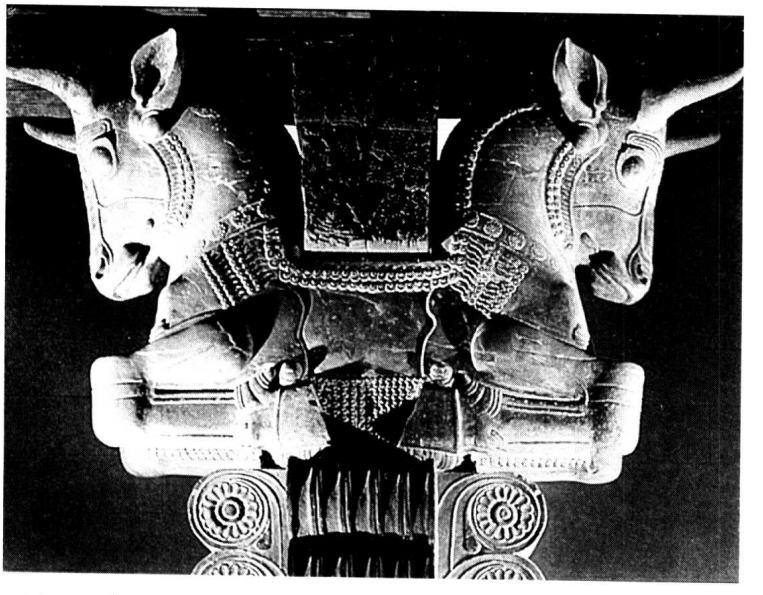


图 63 在苏萨发现的双牛柱顶。其中的一些图饰明显受到埃及和希腊的影响（Roaf 1998，207 页）

考古学家的运气，联想到从那里出土的取之不尽的文物，联想到大英博物馆的亚述陈列室。同样，一提到苏萨，人们就会联想到法国人，联想到法国考古学家的运气，联想到从那里出土的取之不尽的文物，联想到巴黎卢浮尔博物馆的苏萨文物陈列室。就像尼尼微是英国考古学家的有代表性的发掘基地一样，苏萨是法国考古学家的有代表性的发掘基地。就像尼尼微是英国考古学家的骄傲一样，苏萨是法国考古学家的骄傲。

迪厄拉富瓦的发掘于 1884 年首战告捷，持续到 1886 年。他发掘了阿塔薛西斯二世（前 404～前 359 年）宫殿，出土很多古波斯时代的艺术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系列双牛柱顶。他的战利品总共几百箱，在运往卢浮尔博物馆时，曾被土耳其海关扣押 50 多箱，后在法国政府的帮助下，不但被扣押的文物被运到巴黎，其他文物也陆续运抵巴黎，再次显示了强权的优势。①

1893 年，尚特雷（E.Chantre）发掘博阿兹柯伊附近的古代遗址（赫梯帝国首都哈图沙，当时尚不知），出土的文物有印迹（Siegelabdrücke/impressions）和泥板。②

第三节 德国

最早在西亚进行考古发掘的德国人可能与 1874 年德国派往波斯观察金星运行情况的天文学考察团有关。它的领队安德烈亚斯（F.C.Andreas）和成员之一施托尔泽（M.Stolze）在考察天文现象的使命结束后（1877 年），开始考察波斯境内的古代遗址。1888 年，大英博物馆的巴兹在考察波斯西南部的古代遗址时，听说一个德国人曾在一

① 关于他的发掘和发现，见 M.Dieulafoy，L'Art antique de la Perse，Paris 1884/1885；M.Dieulafoy，La Perse，La Chaldée et la Susiane，Paris 1887；M.Dieulafoy，L'Acropole de Suse d'apres les Fouilles en 1884－1886，Paris 1893。

② E.Chatre，Mission en Cappadoce 1893－1894，Paris 1898.

个名叫萨姆斯阿巴德（Samsabad）的地方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发掘，发现许多小型遗物和大型建筑残迹，其墙基刻有楔形文字铭文。[①] 这个德国人可能就是安德烈亚斯和施托尔泽中的一个。施托尔泽著《波斯波利斯》，[②] 没有提到发掘之事。所以，那个进行发掘的人更可能是安德烈亚斯。不过，谁是谁非，已不可考。

从 1879 到 1880 年，萨豪（E.Sachau）等人对叙利亚、亚述和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古代遗址进行了考察。[③] 虽然他们没有进行发掘（只购买了许多文物），但他们显然是在为跃跃欲试、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参与西亚考古发掘的德国人做必要的战前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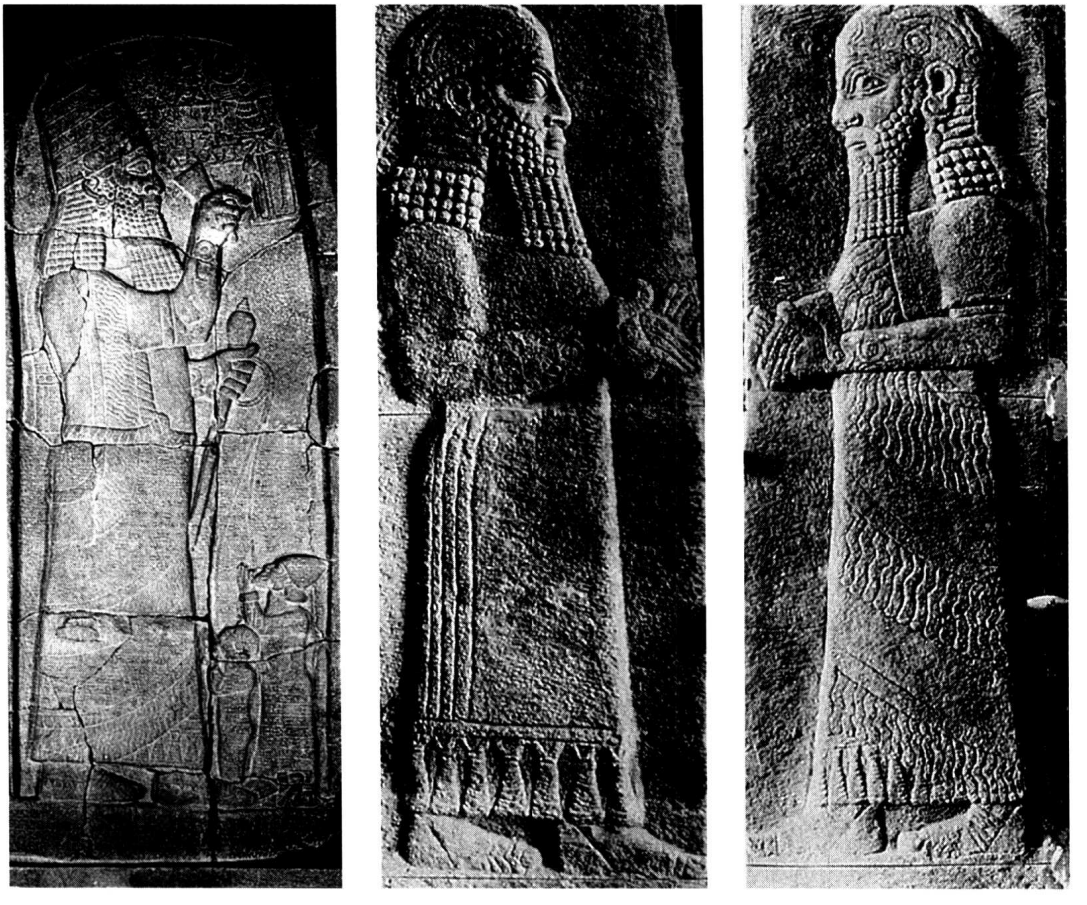


图 64　亚述国王埃萨尔哈敦胜利纪念碑。出土于土耳其境内的钦奇尔里，粒玄岩，高 3.18 米。埃萨尔哈敦手里牵着被征服的埃及国王和腓尼基国王（左），石碑的两个侧面分别是他的两个儿子巴比伦王沙马什—舒马—温肯（中）和后来继承父亲王位的亚述巴尼拔（右）（Hrouda 1991，356/357 页）

① Budge 1925，p.237.

② F.Stolze，Persepolis，Berlin 1882.

③ E.Sachau，Reise in Syrien und Mesopotamien，Leipzig 1883.

1882年，胡曼（K.Humann）和科尔德威等人开始在土耳其境内的钦奇尔里（Zincirli，即古代的萨马尔 Sam'al）进行发掘，持续到1894年。发掘者对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并发掘了卫城的许多宫殿遗址。由于出土许多较长的阿拉美亚语铭文，所以，此城的大部分建筑都被定在公元前9～前8世纪。考古学家还发现亚述国王埃萨尔哈敦（Esarhaddon，前680～前669年在位）石碑。[①] 这是德国考古学家在西亚地区进行的第一次有计划的发掘，标志着德国正式加入到西亚考古发掘的行列。这也是一次"相对讲究方法"的发掘。[②]

1887年，科尔德威为柏林的普鲁士皇家博物馆主持了对阿尔—希巴（al-Hiba，即古代的拉格什 Lagash）的发掘。发掘工作持续了6个多星期（3月29日至5月11日），集中发掘了遗址西部"高地"，证明此处为伊辛—拉尔萨时期（前2017～前1763年）堆积。[③] 他还在其他两处被称为"北丘"和"民宅"的地方进行了发掘。[④] 此后80多年，无人问津。自1968年起，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馆和纽约大学的美术研究所联合对阿尔—希巴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

第四节 美国

1857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对楔形文字解读结果进行的"验收"标志着亚述学的诞生。至此，法英两国的第一次西亚考古发掘高潮（1842～1855年）已过，大量文物涌入欧洲。欧洲的人文科学界，尤其是神学界，受到极大震撼。一个新的领域展现在眼前，这个新领域将给人文科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谁也无法预测。但是，绝大多数欧洲人都以积极的态度迎接着这个新的学科，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期盼着它的研究成果。

与欧洲相比，美国显得有些保守。美国人不但没有在欧洲人掀起的、此起彼伏的东方考察浪潮中推波助澜，就是对楔形文字的解读结果也大都持怀疑态度。不过，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亚述学的科学性越来越不容置疑、埋没了2000多年的亚述历史又重现于世时，尤其是在史密斯发表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洪水泥板"之后，美国的大学教授们，特别是神学教授们才产生一种强烈的参与感，他们开始不再沉默、观望和怀疑，而开始积极地参与。

19世纪70年代，英法这两个进行亚述考古的国家，虽然不乏亚述学专家和大师，但亚述学还没有作为一门学科被引入大学。在这方面，德国人捷足先登，走到了英法两国的前面。于是，一位名叫莱昂（D.G.Lyon）的美国人来到德国的莱比锡学习亚述学。

---

① F.von Luschan, Monolith des Asarhaddon, Berlin 1893.

② Matthiae 1980, p.18.

③ RlA 6, p.423 fig.1.

④ R.Koldewey, "Die altbabylonischen Gräber in Surghul und El Hibba", ZA 2 (1887), pp.403－404.

1882年，莱昂学成回国，被聘为哈佛大学的神学教授，第一个把亚述学介绍和发展到美国，成为美国的“亚述学之父”。1883年，美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聘德国亚述学家豪普特（P.Haupt）为塞姆语教授。虽然莱昂和豪普特的职位不是亚述学教授，但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亚述学家，他们实际从事的事业也是地地道道的亚述学。188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聘请德国亚述学家希普莱西特（H.V.Hilprecht）为教授。至此，美国的三所大学引进了亚述学。

1884年，纽约的沃尔夫小姐（Miss Wolfe）慷慨解囊，出资5000美元，资助西亚考古。于是，由沃德（W.H.Ward）、斯蒂雷特（J.R.S.Sterrett）和海涅斯（J.H.Haynes）组成了一个考察团，对两河流域的古代遗址进行了详细考察。由于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地区已由英法两国进行了长期发掘，于是，他们便把考察的重点放到了两河流域的南部。根据这次考察结果，宾夕法尼亚大学决定发掘努法尔，即古代的尼普尔。[①] 尼普尔地处巴比伦以南约100英里（约160公里），曾长期是两河流域南部的宗教、文化和学术中心。美国人把尼普尔选作参与西亚考古的起点，说明沃尔夫考察团的努力没有枉费。从选择了尼普尔的那天起，美国人就抱了一块金砖。

又经过几年的准备，宾夕法尼亚大学终于在1888年组成了考古队，开始对尼普尔进行发掘。这支考古队于1888年6月23日从纽约出发，驶向目的地，这标志着美国参与西亚考古的开始。从此，西亚考古发掘的行列中又多了一强。这支考古队由彼得斯（J.P.Peters）任队长，宾夕法尼亚大学亚述学家希普莱西特教授任碑铭学家，成员有海涅斯等。发掘经费由银行家克拉克（E.W.Clark）赞助。

考古队雇佣近200名阿拉伯人参加发掘。由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发生部落纠纷，考古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考古队的帐篷也遭到焚烧。因而，发掘工作还没有进行多长时间就被迫停止（1889年2月6日～4月15日）。不过，时间虽短，成果却非常显著，可以说是首战告捷：不但出土2000多块泥板，还发现大批遗物——各种各样的陶器、陶塑、陶范、陶制玩具、浮雕、石制武器、石制用具、金银首饰、青铜器、铁器、平印（stamp seals）、滚印（cylinder seals）、宝石等等。

1890年，发掘工作得以继续，这一次，考古队雇佣400名阿拉伯人参加发掘。泥板源源不断，仅一季（1890年1月14日～5月3日）就发现8000多块。所有出土文物都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博物馆。随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又派希普莱西特到帝国博物馆为泥板做索引。为了报答希普莱西特的服务，土耳其苏丹后来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私人赠礼送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当时希普莱西特任馆长。

---

① 当时人们以为努法尔是古代的Calneh，尚不知是尼普尔。见Rogers 1915，302页。

图 65 尼普尔曾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中心，曾是人们景仰的文化圣地，如今却变成了沙漠，只有乌尔纳木（约前 2100 年）建立的塔庙，仍以其伤残不堪的身躯，屹立在沙海之中，昭示着古代文明的魅力和生命力（Hrouda 1991，11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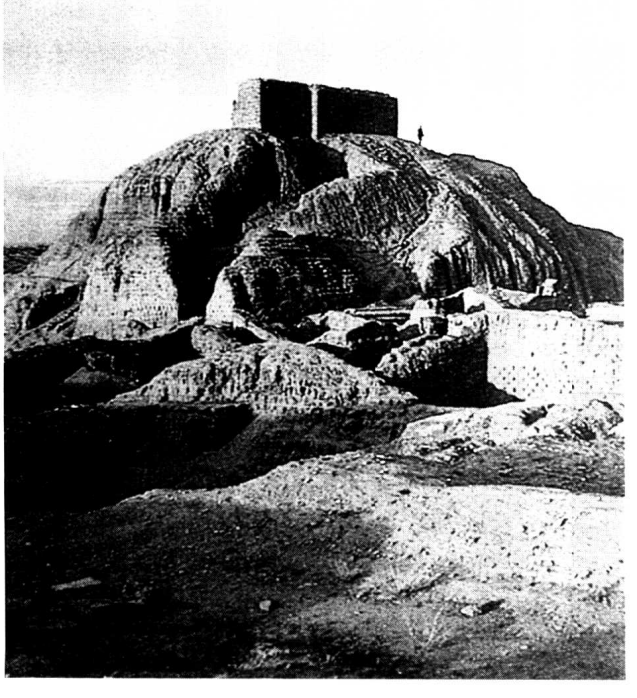


图 66

1900 年，美国考古队把考古队住所盖到了恩利尔塔庙上，为的是得到神的看顾，免遭当地阿拉伯人的袭击（Roaf 1998，8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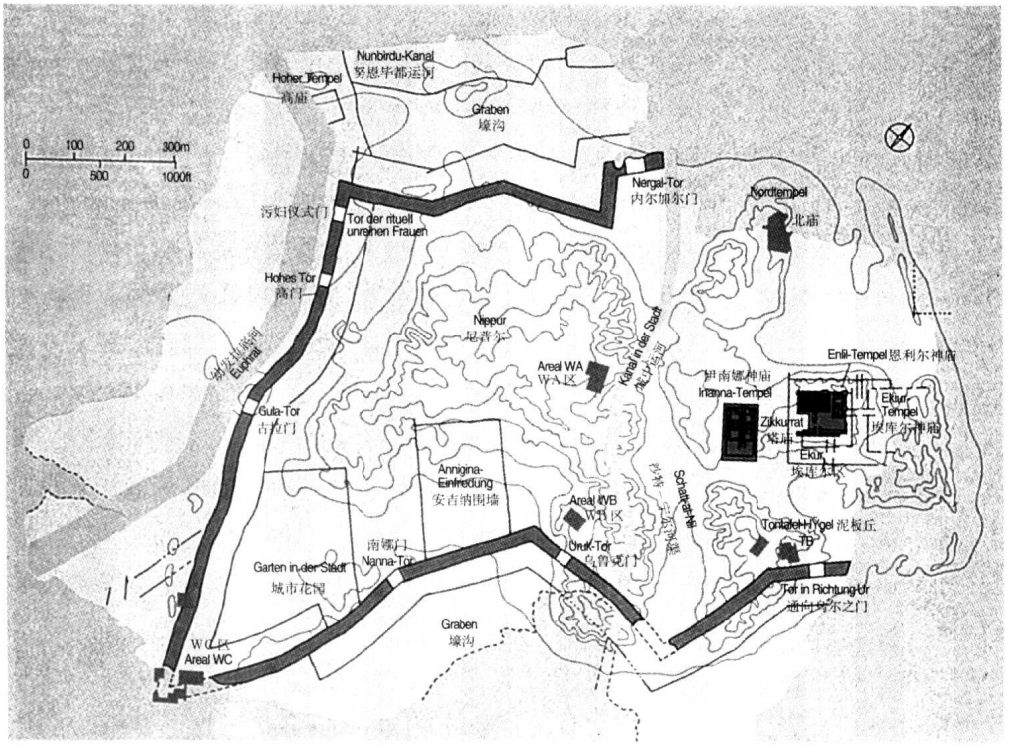


图 67　尼普尔遗址平面图（Roaf 1998，8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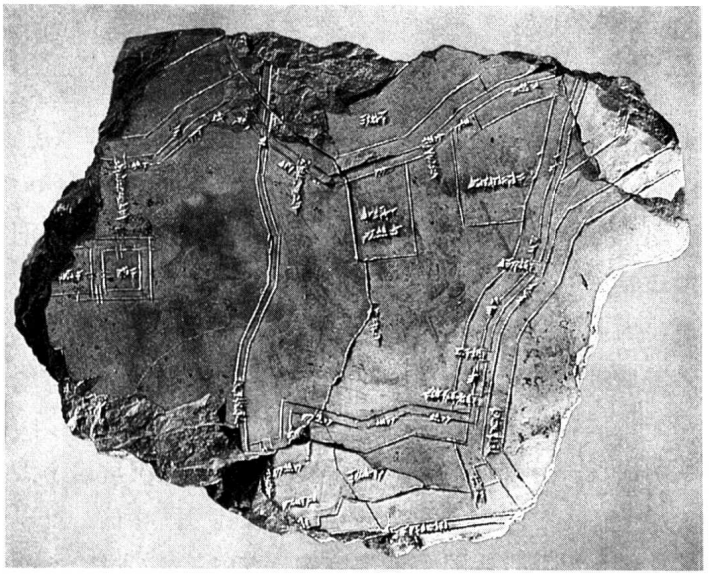


图 68　古代书吏于公元前 16 世纪绘制的尼普尔地图，与现代考古发掘的结果基本吻合（Hrouda 1991，257 页）

图 69　在尼普尔伊南娜神庙地基中发现的微型铜像。高 30 厘米。这个头顶土筐的人可能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始人乌尔纳木，也可能是他的儿子舒尔吉（Roaf 1998，81 页）

在随后的两年中没有进行发掘工作。1893年，作为摄影师参加前两次发掘的海涅斯又来到尼普尔进行发掘。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还有一位欧洲人陪伴他，后来，他单枪匹马，独自一人在这里继续发掘。他在此连续发掘了34个月（1893年4月至1896年2月），创下欧洲人在当时的种种不利条件下——夏日酷热，蚊虫猖獗，沙暴起处云遮日蔽，霍乱随时可能发生，强盗随时可能破门而入——连续在野外发掘时间最长的纪录。他在这将近3年的时间里，共发现21000多块泥板，发现和搜集了大量其他文物，发现一些到当时为止从未有人涉足过的遗址。海涅斯本人不是亚述学家，也不是职业考古学家。他的惟一目的是为美国争取古物，他的成就在客观上对美国亚述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899年，在希普莱西特教授主持下，宾夕法尼亚大学再次对尼普尔进行发掘，海涅斯再次加入发掘队伍。这次发掘工作的重大发现是恩利尔神庙的文献档案室，有的学者称之为“图书馆”，出土23000块泥板，年代都在公元前2700年到前2000年之间。至此，宾夕法尼亚大学仅从尼普尔一个遗址就获得50000多块泥板，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古代文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00年，在发掘尼普尔的同时，希普莱西特还对阿布—哈塔布（Abu Hatab，即古代的基苏拉 Kisurra）和法拉（Fara，即古代的舒鲁帕克 Shuruppak）进行了发掘。在舒鲁帕克收获较大，除发现一些小型文物外，还发现一些刻字贝壳。

第五节　土耳其

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考古浪潮并没有使这个日薄西山、内外交困的大帝国对本土的古物古迹产生兴趣。如果从法国的博塔发掘尼尼微（1842年）算起，奥斯曼帝国的这种麻木不仁将近持续了半个世纪。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法、英、德、美的挖宝者和考古学家对这里的古物古迹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恨不能一下子把全部珍贵文物攫为己有。因此，它们逐鹿于两河之间，互不相让。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也趁近水楼台之便，对许多遗址进行疯狂盗掘，同时从事贩卖文物的交易，但这些文物又被西方人廉价采购一空，仍然与奥斯曼帝国无缘。

奥斯曼帝国似乎在等待一个人的成长，等待他羽翼丰满后来改变这种状况。这个人就是汉姆迪·贝伊（Hamdy Bey，1842～1910年）。他出生于1842年12月30日，可以说与西亚考古同龄。他留学西方后，成为奥斯曼帝国博物馆馆长（1881～1910年）。他是个有智慧、耐心、学问和热情的人。他上任后，对奥斯曼帝国博物馆进行了改革，所

以，有人说他实际上是奥斯曼帝国博物馆的创建者。[①]1884 年，在他的主持下奥斯曼帝国出台第一部文物管理法。自 1887 年起，开始组织自己的考古队伍对本土的一些遗址进行发掘。1889 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参与两河流域南部的考古发掘，他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同时，与美国事先达成协议，使所有出土文物都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博物馆。后来，由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派希普莱西特教授到帝国博物馆为泥板做索引，为了报答希普莱西特的服务，土耳其苏丹后来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私人赠礼送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1894 年，汉姆迪·贝伊说服土耳其苏丹，使苏丹个人出了一定数目的钱资助他进行考古发掘。他选择了阿布—哈巴，即古代的希帕尔，进行了 3 个月发掘（1～4 月）。不过，他没有亲自主持这次发掘，而是另请了高明：他聘请法国著名亚述学家、多明我会神父舍尔（J.V.Scheil，Father Scheil）主持发掘。发掘费用仅用了 3000 法郎，成果却十分可观，出土 1000 多块泥板——大都是古巴比伦时期的书信和契约，以及许多陶器。

第六节　结语

从 1873 年英国的史密斯寻找“洪水泥板”的残缺部分而第一次踏上考古征途算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 40 多年的时间里，西亚地区经历了第二次考古发掘高潮。参与的国家从英、法两国扩大到英、法、德、美、土五个国家。从方法和目的的角度着眼，这 40 年的考古历程可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前 20 年为“向科学考古学迈进”时期，后 20 年为“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时期。本章叙述的是这 40 年中的前 20 年。

划分考古时期，无非是想借此强调考古学史上的某些与时代有关系的突出特点。但就多国参与的西亚考古而言，时间与特点不是一刀切成的。如果在时间上确定一个点，那么，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国考古学的发展不一定都呈现同一特点。同样，如果在各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找到共同特点，那么也很难把这些特点放到一个时间框架中去。因此，我们所说的“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向科学考古学迈进”和“科学考古学的诞生”，都只能体现一个大致时间范围和在这个大致时间范围内西亚考古学呈现出的最明显的特点。

从发掘方法上看，“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与“向科学考古学迈进”没有本质区别，但从“向科学考古学迈进”到“科学考古学的诞生”却是一次飞跃。从发掘的目的着眼，三个时期则明显不同：“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时期专门寻找大型艺术品，“向科学

① RIA 4 (1972), p.71.

考古学迈进”时期对泥板情有独钟，而“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时期则对建筑有所侧重。

与“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时期相比，“向科学考古学迈进”时期首先表现为其考古发掘的目的与前者有别。“英雄时代”的考古学家以寻求大型艺术品为主要目的，对泥板的价值认识不足，因此，常常忽视搜集泥板，甚至有时把发现的泥板当成碎陶片扔掉（如莱亚德发掘尼姆鲁德），而“向科学考古学迈进”时期的考古学家则对泥板情有独钟，特别注重发现和收购泥板，因此，这时泥板大量流入欧洲和美国。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发掘和发现泥板为主的考古时期。

泥板是史料，与艺术品不同，几乎没有观赏价值。如果不是用于治史，泥板就没有价值。正是因为西方学者此时以楔形文字泥板为原始史料，开始揭示被湮没了几千年的西亚古代历史，因而，泥板成为考古学家的第一追求目标。文献学家重视史料，使得考古学家重视泥板；考古学家重视发现和收购泥板，又为文献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极大地促进了亚述学的发展。这是一个考古学和文献学结合得十分紧密的时期。英国的史密斯是亚述学家，他前往西亚进行考古发掘的惟一目的是寻找泥板，他挖的宝就是泥板，得到泥板就如获至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时而潜心研究楔形文字泥板文献，通过文献重建历史，时而餐风宿露，不远万里，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泥板而进行发掘，最后以身殉职。考古学和文献学的紧密结合在他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当然，任何时期的考古学家都不会不尽全力搜集各种艺术品。这个时期出土的艺术品也相当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这个时期定为以发掘泥板等文字材料为主的时期，因为泥板等文字材料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目标，而其他东西则是额外收获。而且，艺术品往往也是珍贵史料，如法国人发现的大批古地亚石雕像，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每座石雕像都带有或短或长的伴文。

英国的拉萨姆是个例外。他是参加过莱亚德指挥的考古发掘工作的遗老，虽然也不排斥泥板，但他的主要目标还是大型艺术品。从这个例子中——即“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时期的遗老继续参加“向科学考古学迈进”时期的发掘，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与“向科学考古学迈进”二者之间的区别，而是二者之间的连贯性，尤其是发掘方法上的连贯性。的确，英国和法国的考古学家在发掘方法上几乎都是墨守成规，没有什么创新，原因可能是传统的惯性太大。而新参与西亚考古的德国和美国考古学家没有传统的包袱，因此，他们迈出的步子就大一些。

德国的科尔德威本身就是研究建筑和艺术史的，所以，在发掘过程中侧重对建筑进行研究已成为他的突出特点。他后来为德国东方学会主持巴比伦的发掘工作时，创造了一套揭露遗址的方法，为西亚科学考古学奠定了基础。美国的班克斯（E.J.Banks）也十分善于发掘建筑，善于辨别各建筑部分的功能。不但如此，他还绘制了遗址图，标出

了阿达布（Adab）遗址的十二个土丘的相对位置，同时把土丘编了号，这就大大提高了记录的准确性。“向科学考古学迈进”时期的主要特点在科尔德威和班克斯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如上所述，“向科学考古学迈进”时期对泥板情有独钟。正因为如此，这时当地人的盗掘行为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非法文物交易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小小的泥板为盗掘和非法交易提供了最大方便。英、法、德、美等国的博物馆为了得到泥板，争相抢购，不仅抬高了泥板的价格，更助长了盗掘和非法文物交易行为。1876 年，英国的史密斯仅在巴格达就购买了从希帕尔盗掘出土的泥板 2000 块，1890～1891 年，大英博物馆的巴兹购买了从戴尔盗掘出土的泥板 9500 多块。[①]仅从上述两例中我们对盗掘的规模便可略见一斑。据说，法国领事佩雷提（M.Péretié）曾经花 30 皮阿斯特（piastres）购买了一块中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一世（Adad-Nirari Ⅰ）铭文石板。后来，他把石板转卖给英国的史密斯时，收史密斯 70 英镑。[②]1878 年，德·萨尔泽克把出土文物转卖给卢浮尔博物馆，获利 13 万法郎。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对通过文物交易而牟取暴利的情况可知一二。一些欧洲人通过贩卖文物而发了东方文物财，这就使得更多的当地居民企图通过贩卖文物而发洋财。

此外，还有一些特点值得注意，譬如，英国政府把考古学家莱亚德晋升为驻土耳其大使和大英博物馆重新启用考古元老拉萨姆。任命西亚考古学家莱亚德为大使体现了英国政府对西亚考古的认同和支持。这种支持方式非常独特，而且卓有成效。作为大使的考古学家和作为考古学家的大使，莱亚德为英国的西亚考古带来了新的机遇。他对英国西亚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莱亚德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此时的西亚考古学像以前（和以后）一样，离不开政治的参与。政治势力和西亚的考古发掘仿佛是一对连体的孪生兄弟，它们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重新启用拉萨姆，也是英国人的一个英明决策。史密斯以身殉职的沉痛教训使英国人清楚认识到，一个能从事考古的人易得，而一个既专于考古又了解阿拉伯人心理的考古学家难求。拉萨姆就是把二者结合得最好的人选。他参与过莱亚德时代的考古发掘，本身又是阿拉伯血统的英国人。他为增进阿拉伯人和英国考古学家之间的理解做出了突出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述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史密斯发现洪水泥板之后，亚述学和西亚考古学受到社会各界更多关注，其表现之一就是对亚述学和西亚考古学的解囊相助。以英国为例，曾经有人资助诺里斯出版《亚述语词典》（Dictionary of Assyrian Language），后来，又有《每日电讯》的老板资助史密斯的发掘。这说明亚述学和西亚

① Pallis 1956, p.284.

② Budge 1925, p.115.

考古学越来越多地得到社会的承认。再后来，我们从德国和美国的亚述学和西亚考古学的发展轨迹中清楚看到，这种由个人或民间学术团体资助亚述学和西亚考古学的做法，在欧美已蔚然成风。这种良好风气已经成为欧美国家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在发扬光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七章　科学考古学的诞生

(1898～1914 年)

第一节　法国

德·摩尔根（J.de Morgan，1857～1924 年）于 1897 年开始发掘苏萨，标志着法国西亚科学考古学的诞生。

德·摩尔根本是一个工程师和一个具有实际经验的地质学家。为了做地质考察，他踏破铁鞋，走遍天下。为了入乡随俗、更好地与当地居民沟通，他学习和掌握了很多种欧洲语言和东方语言。他曾在埃及任古物局局长，工作十分出色。埃及在进入成文史以前也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观点，就是首先由他提出来的。在发掘苏萨以前，他已闻名于世，苏萨的发掘再次证明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自然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法国政府派他主持苏萨的发掘工作可谓是最佳选择。

他的方法与众不同。在他之前，西亚考古方法主要是在遗址的某一处挖一个或同时在不同位置挖几个探坑或探沟。德·摩尔根没有采取这种传统方法。他采取的方法是：1.选定发掘目标和范围——他选择了“城堡丘”；2.铲除耕土——把无数吨耕土移往他处；3.全面揭露，直至生土为止。这样，各文化层从上到下，一目了然。他采取了新的方法，注意到各文化层的关系，确立了各层建筑和遗物的年代关系，这在西亚考古史上是划时代的。

当然，他的运气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他采取了上述科学方法而没有发现重要古代遗存和遗物的话，他的方法可能早已连同他的名字一起被人遗忘了。然而，他是幸运的。在他的重大发现中，除数百块刻有古波斯语、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铭文的砖以外，还有马尼什图舒（Manishtusu）方尖碑、纳拉姆辛石柱、汉穆拉比法典石碑以及许多界碑和大量前苏美尔时期的陶片。就是没有他的科学方法，这些重大发现也足以使他成为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考古学家。

他之所以能够采取与众不同的新的方法进行发掘，是与法国政府的支持和参与分不开的。法国政府直接从波斯国王那里用 10000 法郎买下了一个“发掘权”，凭这个“发掘权”，法国可以在波斯境内发掘任何遗址，出土文物也全部归法国所有。这样，德·摩尔根在时间上得到充分保证，不必像英国人那样，有时为了充分利用执照的有限

图 70
汉穆拉比（前 1792～前 1750 年）法典石碑。玄武岩，高 2.25 米。汉穆拉比法典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用塞姆语书写的法典，比用苏美尔语书写的乌尔纳木法典晚 300 余年。当年，这个法典石碑可能被立在希帕尔，公元前 12 世纪被远征巴比伦的埃兰国王掠夺到埃兰首都苏萨（Hrouda 1991，83 页）

时间，不得不火速发掘，根本顾及不到方法。法国政府还为德·摩尔根拨了专款，使他在物质上也得到了保证。波斯王室还派一支军队作他的保镖，使他在安全上得到保证。这样，他的科学方法的实施也就得到了保证。[①]

除苏萨的发掘外，法国对吉尔苏的发掘仍断断续续地在进行，直到 1909 年。此外，1902～1903 年，法国考古学家还对伊朗境内的穆斯延（Tepe Musjan）进行了发掘，1911～1912 年开始对伊拉克境内的基什（Kish）进行发掘。这些发掘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科学考古的新方法。

第二节　德国

1897 年，德国政府决定参与对亚述和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古代遗址的发掘，于是，首先派柏林大学教授萨豪进行实地考察，[②] 随行人员中有科尔德威。对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古代遗址进行了详细考察之后，萨豪建议刚刚成立的德国东方学会对两河流域南部的

① Budge 1925，p.205.

② E.Sachau：Am Euphrat und Tigris，Reisenotizen aus dem Winter 1897－1898，Leipzig 1900.

巴比伦遗址和北部的亚述遗址进行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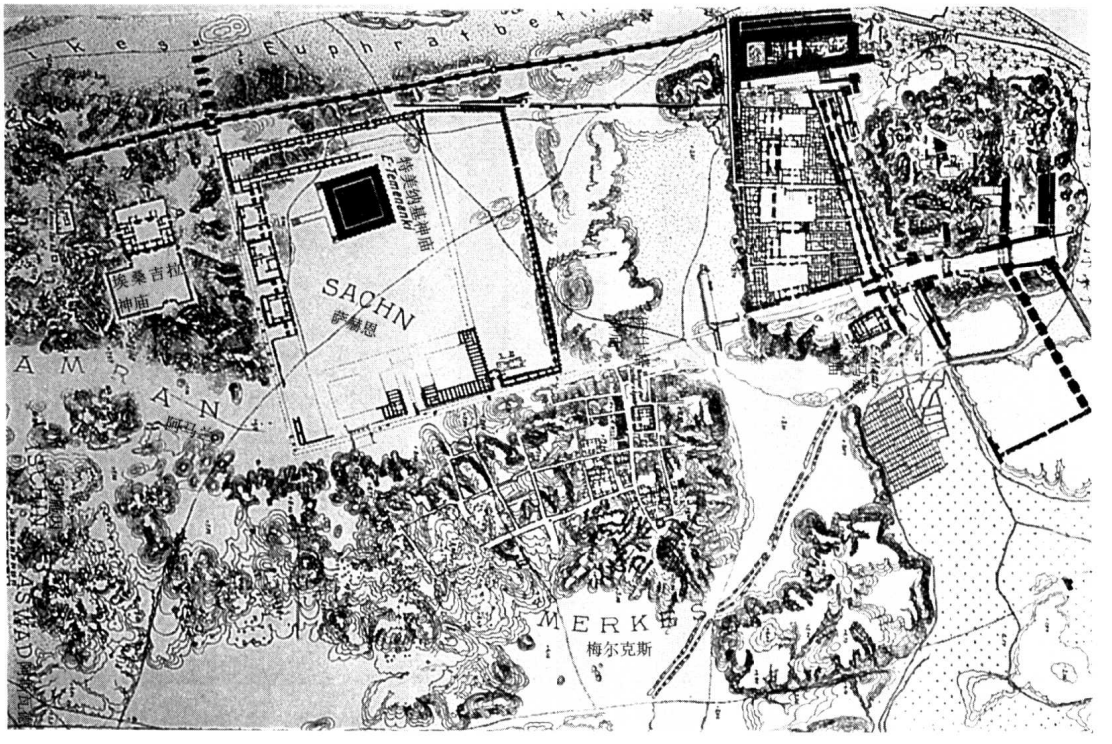


图 71　发掘后的巴比伦遗址图（Wilhelm 1998，2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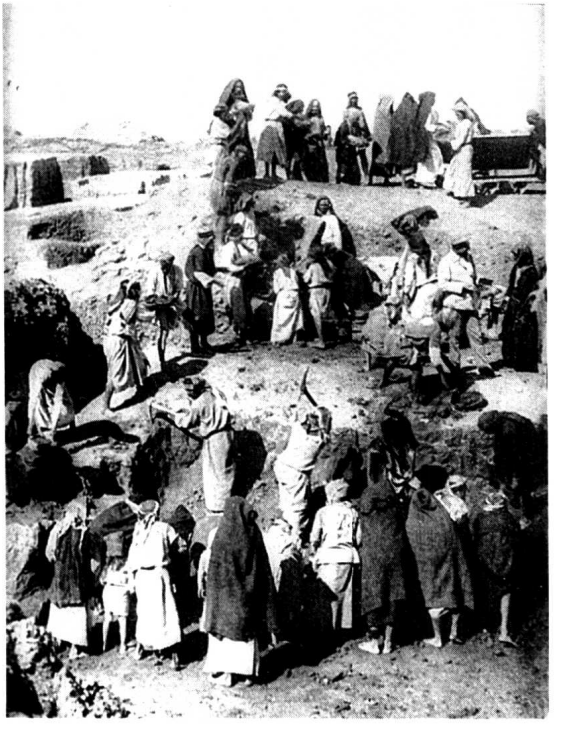


图 72
巴比伦遗址的发掘现场。人们用有轨翻车把废土运往远处，避免了以前在其他遗址的发掘中经常出现的重复性搬运废土的问题。科尔德威把当地民工分成小组，各司其职，有条不紊（Rogers 1915，315 页）

图 73 伊施塔城门的发掘现场。1902 年摄（Wilhelm 1998，2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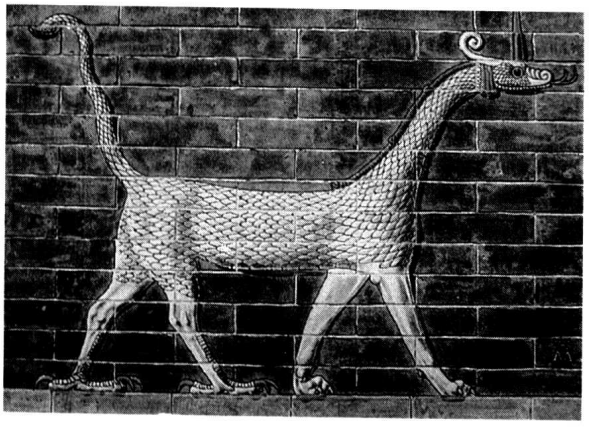


图 74 伊施塔城门上的用彩釉浮雕砖镶嵌的“龙蛇”，是马都克神的神兽（Wilhelm 1998，21 页）

图 75 伊施塔城门和游行街水彩复原图（Roaf 1998，193 页）

德国东方学会成立于1898年。学会刚刚成立就决定组建一支美索不达米亚考古队，准备对巴比伦遗址进行发掘。科尔德威任考古队队长，亚述学专家是迈斯纳（B.Meissner，此后任柏林大学亚述学教授），建筑师安德烈（W.Andrae）作为助手随行，在阿拉伯世界以“毛毯商”著称的迈埃尔（H.F.L.Meyer）随行管理财政。这支由“24匹骑兽和驮兽组成的队伍”于1898年12月底出发，次年3月5日到达巴比伦，到达后立即开始了发掘。这是德国东方学会组织的首次发掘，这支队伍是到那时为止西亚考古历史上一支水平最高的考古队伍：领队科尔德威本身是建筑师、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曾经参加过包括西亚地区遗址在内的许多遗址的考古发掘，有多年的考古经验；迈斯纳是当时最优秀的亚述学家之一；安德烈是著名建筑师。在考古设备和工具方面也做了充分准备，史无前例地使用了有轨翻车搬运废土。最重要的是其考古目的非常明确，除为柏林的皇家博物馆争取文物外，还有三个具体目标：一是进一步了解古巴比伦人为墙表上釉的技术，二是加深对巴比伦尼亚政治和文化史的了解，三是用科学方法揭示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宫殿的建筑特点。[①] 把研究古代建筑特点作为考古发掘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本身就是划时代的。

发掘经费也得到了充分保证。当时，东方学会为巴比伦的发掘募捐了一笔钱，捐款人主要是参与组建东方学会的成员，学会的主要筹建者西蒙（J.Simon）捐赠3000马克。据说，募捐到的钱已足够发掘之用。这时，对西亚考古十分感兴趣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年，1888～1918年在位）又锦上添花，从“皇家自行支配使用基金”中拨款20000马克。第二年，又拨给“普鲁士政府资助金”67000马克。

发掘过程也井然有序。科尔德威把雇佣的阿拉伯人分成不同的组，每组20人，1人铲土，3人装筐，16人搬运。铲土者每天工资25分（cents），装筐者20分，搬运者15分。废土被搬运到遗址区以外的地方，避免了以前的考古发掘者常常不得不再次搬运废土的问题。科尔德威一般雇佣200到250人。整个发掘共用劳力约120万人次。如果按当前（1998年）伊拉克劳动力市场的价格计算，整个发掘要花费700万到1200万马克。这还不包括德国人的工资、旅费和运费，如果把全部费用计算在内，按当今的价格标准计算，至少需要1500万马克。[②] 一年之内发掘工作始终不停，即使是酷热的盛夏，发掘也继续进行。尽管如此，发掘的部分也仅仅是巴比伦城的一小部分。

巴比伦遗址由许多大小不同的遗址丘组成，公元前550年前后占地约1000公顷。他们第一个发掘的遗址丘卡斯尔后来证明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宫殿遗址。他们首先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大面积暴露，然后由安德烈根据暴露的情况绘制了完整的宫殿复原图，出

① Wilhelm 1998, pp.22－23.

② Wilhelm 1998, p.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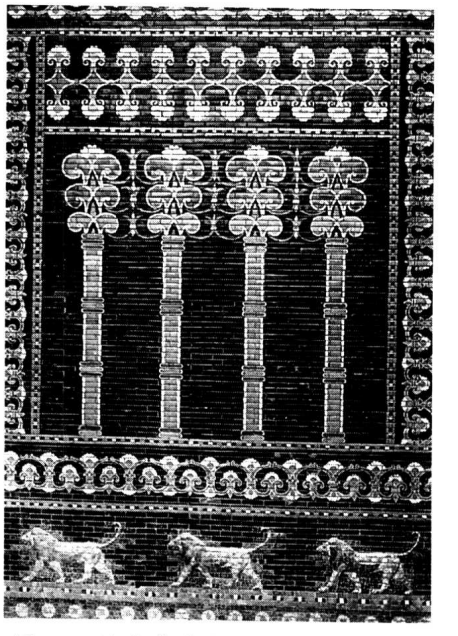


图 77 巴比伦南宫正殿正面墙。图案中有用螺旋花饰来表现的圣树和伊施塔的神兽雄狮（Roaf 1998，200 页）

图 76
发掘后的巴比伦遗址。图中可见游行街、伊施塔城门、巴比伦的复式城墙和南宫（Hrouda 1991，31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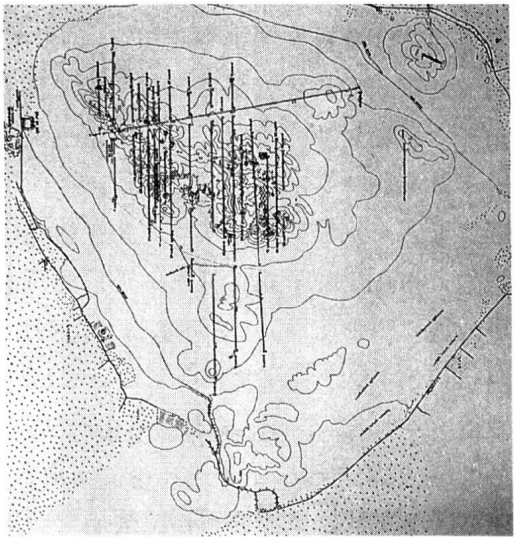
土了一些赫梯语铭文和大量新巴比伦时期的泥板。与宫殿毗连的建筑是埃马赫（Emah）神庙，出土亚述巴尼拔棱柱铭文和尼布甲尼撒铭文砖，当年的亚历山大生命垂危时就是在这座神庙奉献牺牲、祈求神灵的。[①] 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发现使德国考古学家们喜出望外，他们冒着酷暑继续发掘，一口气从 1899 年 3 月发掘到 1900 年 11 月。这期间又发现巴比伦最大的神庙——巴比伦主神马都克神庙埃桑吉拉，出土精美的天青石印章和大量文字材料，其中一个天青石印章上刻有铭文，它是亚述国王埃萨尔哈敦奉献给神庙的。[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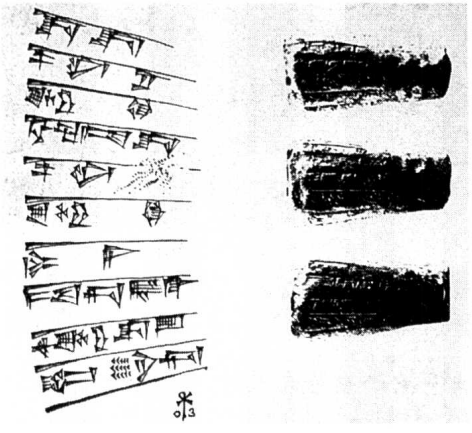
巴比伦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 1915 年。[③] 发现的重要建筑有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

① Arrian, Anabasis, Ⅶ:24, 25。

② 关于巴比伦发掘的详细情况，见 R.Koldewey, Das Wiedererstehende Babylon, Leipzig 1913.1990 年由 B.Hrouda 修订再版。

③ 此后，科尔德威派人看守遗址，直到 1917 年 3 月 7 日。当时，英军占领巴格达，所以，德国不得不撤回所有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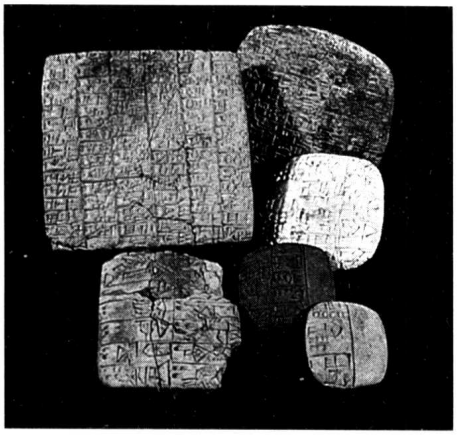


图 78　在巴比伦发现的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石碑。高 36.8 厘米。他头顶土筐，在为重建马都克神庙奠基（Roaf 1998，192 页）

图 79　在科尔德威的第一季发掘中就出土了这个石碑。它是公元前 10～前 9 世纪的作品，家乡是叙利亚的阿勒颇，不知何时和由于什么原因被搬到了巴比伦，很可能是战利品。碑上的人物是雷雨神，他左手持斧，右手持光束（Wilhelm 1998，17 页）

图 80　法拉出土的泥钉铭文。上面出现地名“苏鲁帕克”（Wilhelm 1998，30 页）

图 81　在法拉遗址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Wilhelm 1998，31 页）

图 82　安德烈绘制的法拉遗址发掘情况示意图（Wilhelm 1998，29 页）

78	79	82
80		
81		

建造的宫殿、神庙、游行街、伊施塔门，遗物有泥板、棱柱铭文、滚印和各种家用器具。当然还要提到“空中花园”。科尔德威认为，他在“南城堡”（Südburg）东北部发现的“拱顶建筑”就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他的米底王后建造的“空中花园”。这在当时是一项引起轰动的发现，多少年来也没有人提出过异议。自 1978 年起，开始有人怀疑科尔德威的“空中花园”。德国学者纳格尔（W.Nagel）指出，这个“空中花园”在地理位置上有几处弊端：其一，花园的视线被宫墙挡住；其二，距主要街道太近，易于受到噪音和灰尘的干扰；其三，王后到花园要经过整个宫殿。因此，这个“拱顶建筑”不可能是“空中花园”。纳格尔认为，沿河建造的巨大外堡很可能就是昔日的“空中花园”。[①]1994 年，英国女学者戴丽（S.Dalley）更是全盘否定了科尔德威的“空中花园”。她指出，“空中花园”根本就不在南部的巴比伦，而在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空中花园”不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所建，而是比他早一个世纪左右的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的杰作。戴丽对纳格尔的观点未做任何评论。两个批评者的观点目前只能算是新说，不是定论。目前已发掘的部分皆属新巴比伦时期的遗址和遗物，古巴比伦时期的遗存深埋地下水位之下，至今不能发掘。

德国东方学会对巴比伦遗址的发掘是西亚考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发掘不但因规模之大，发现的建筑遗址和文物数量之多，而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巴比伦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方法上也多有创新，为后来的考古学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最重要的创新有两项，一是创立了“土砖解剖法”（Lehmziegelpräparation），二是注重“观察建筑层”（Baugeschichtlich-stratigraphische Beobachtung）。后来，它们成为所有西亚考古学家共同遵循的原则。[②]

1901 年，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普莱西特来到巴比伦遗址考察时就向正在那里主持发掘的科尔德威指出了法拉遗址的重要性。同年，当希普莱西特访问柏林时，他又向德国东方学会提出了发掘法拉的建议。德国东方学会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派正在发掘巴比伦的科尔德威同时发掘法拉。科尔德威派安德烈到发掘现场指挥发掘，发掘工作连续进行了 8 个半月（1902 年 6 月～1903 年 3 月），发掘结果证明了希普莱西特的先见之明。发现近 300 块泥板，泥板形状与以往发现的不同，文字也明显更古老，证明这里曾是高度发达的古代城市。第二年，德国亚述学家德利奇解读了出土于法拉的一个泥钉铭文中的地名 SU.KUR.RU^{ki}，即 SU.KUR.RU^{ki}应读作 Shuruppak“苏鲁帕克”，[③] 于是，法拉遗址的历史地位更加明确：这里是巴比伦洪水故事中的主人公乌特纳皮施提的故乡。

① W.Nagel, “Wo lagen die hängenden Gärten?”, MDOG, Nr. 110 (1978), pp.19－28.

② Lloyd 1955, pp.212－213.

③ F.Delitzsch, Nachtrag, MDOG, Nr.16 (1903).

法拉遗址较大，但高出地面不多，大部分高出周围平原1米左右，有些部分高出周围地面2米或更多一点，整个遗址丘共占地220公顷。[①] 安德烈除从发掘巴比伦的民工中选了30人外，还雇佣了160名民工，三个月后又增雇40名。[②]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揭示遗址的历史面貌，他采取了挖探沟的方法：东西方向挖了至少20条探沟，最长者长达800米，遇到重要建筑遗存时便扩大发掘范围。这样，法拉遗址的历史面貌就基本清楚了。发现的建筑遗存有民宅、官邸、宫殿、神庙、档案室、庭院和坟墓。出土的文物有泥板、陶器、滚印和金属器。出土的文献中除经济文献外，还有大量神表，对研究古代宗教的意义非常重大。法拉文献的文字属于“古朴文字”，代表了楔形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字材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至今也属于凤毛麟角，对研究楔形文字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发掘的法拉遗存大都属早王朝Ⅲ时期（约前2500～前2250年），个别建筑属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约前2900年）。直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前2100～前2000年）苏鲁帕克仍是个重要城市，后来被遗弃，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河流改道。[③]

图83　19世纪中叶英国考古学家莱亚德在亚述发现的亚述国王萨尔曼纳萨尔三世坐像（Wilhelm 1998，48页）

德国东方学会选择发掘的第三个重要遗址是亚述遗址。亚述遗址的现代阿拉伯名称是卡拉特—舍加特，意为“地宫”，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距小扎布河口约25公里。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莱亚德和拉萨姆就在此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除发现萨尔曼纳萨尔三世大型石雕坐像和一些泥板外，收获并不算大。英国考古学家遂放弃亚述遗址，转向他处。后来，英国的史密斯也在此进行过发掘，收获也不大。

为什么别人放弃发掘，而德国东方学会却偏偏选择被别人放弃的遗址进行发掘呢？

---

① Martin 1988，p.12.

② Martin 1988，p.16.

③ Wilhelm 1998，p.31；Martin 1988，p.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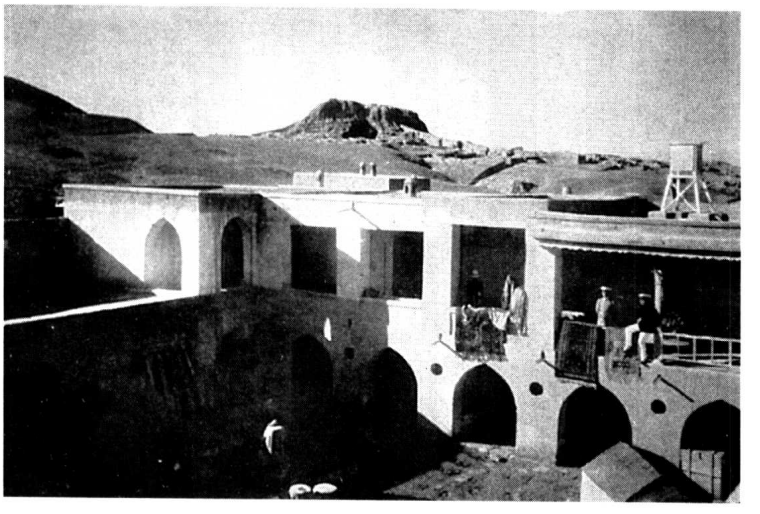


图 84 德国亚述考古队住所彩色照片。1909 年由主持亚述发掘的安德烈拍照，是考古史上最早的彩照。远处背景上的“山丘”就是亚述塔庙（Wilhelm 1998，4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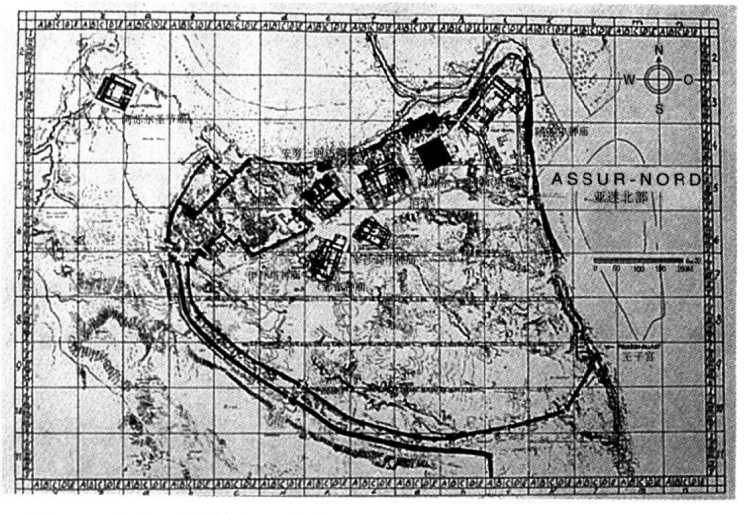


图 85 安德烈绘制的亚述遗址发掘情况示意图（Wilhelm 1998，51 页）

考查一下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我们就会发现，德国人的这个选择是由这个时期考古发掘的特点决定的。以往的发掘以为本国的博物馆猎取文物为主，从科尔德威发掘巴比伦开始，发掘的目的开始转向以研究古代建筑、进而透过建筑特点和城市规模等揭示人类历史文化为主。正是出于后一目的，德国人才选择了亚述遗址。那高出地面 30 多米的塔庙遗存、那些偶尔露峥嵘的大型建筑残垣、已经出土的各种遗物以及亚述本身的历史地位都表明，这里有广阔的发掘前景，从研究古代建筑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亚述城区遗址的范围并不算大，占地大约 1.3 平方公里，这使得对此进行全面发掘成为可能。

1903 年，对西亚考古一向很感兴趣并给予大力支持的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向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42～1918 年，1876～1909 年在位）争取发掘执照。卡拉特—舍加特（即亚述遗址）是苏丹的私人领地，哈米德二世立即满足了德皇的要求，把发掘权作为礼物送给德皇威廉二世。于是，在德皇的亲自支持下，在国家的资助下，德国东方学会于 1903 年秋开始对亚述遗址进行发掘。德国东方学会委托科尔德威主持，于是，正在主持巴比伦发掘的科尔德威便派其助手安德烈北上负责发掘工作。当时安德

烈 28 岁，风华正茂。自 1898 年以来就跟随科尔德威发掘巴比伦，这时对西亚地区的发掘已是轻车熟路，很有经验。他本人是建筑学家和出色的画家，因此成为负责发掘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以极大的热情、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投入发掘工作，指挥 180 人的考古队伍（包括雇佣的当地民工），一干就是 11 年，1914 年 4 月 20 日安德烈宣布发掘工作结束。11 年来，发掘工作几乎是不停不息——只有 1908 年夏因安德烈回国度假而暂时停挖。

他对卫城的神庙、宫殿和防御工事进行了系统发掘，对城区的其余部分用每隔 100 米挖一条 10 米宽的探沟的方式进行了发掘，这样，包括居民区在内的整个城市的布局就比较清楚了。亚述人把死者安葬在自家住房底下修建的“家墓”，安德烈发掘这样的“家墓”多达千座。

安德烈非常重视地层关系，逐层揭露，详细记录。他的发掘方法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几乎为后来所有的考古学家所效仿。他在发掘过程中表现出的“耐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无法用语言来赞美的”，充分体现了“德国式的彻底性和科学上的精确性”，[①]“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考古学家能够在一座神庙遗址中看到那么多世纪的历史”。[②]“如此这般彻底地对一个遗址进行发掘迄今为止史无前例”。[③]

持续了将近 11 年的发掘，回报也是丰厚的，出土文物可谓不可胜数：泥板文献（共出土 16000 多块）、棱柱铭文、圆柱铭文、名年官碑、印章、雕塑、陶器、首饰、家用器具等，应有尽有。时间跨度也非常大，几乎包括各个时代。挖出的建筑遗址更是洋洋可观：萨曼纳萨尔一世（前 1273～前 1244 年）宫殿、阿苏尔神庙及与之毗连的两座层塔、亚述纳希帕尔二世（前 883～前 859 年）宫殿、安努神庙、阿达德神庙以及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Tukulti-Ninurta Ⅰ，前 1243～前 1207 年）宫殿。[④]所有出土文物都首先被运往巴格达，然后，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博物馆平分秋色。所以，亚述文物现在主要分藏在两个博物馆：德国柏林的前亚博物馆（Das Vorderasiatische Museum）和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博物馆，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1938 年，也就是在亚述发掘结束后 24 年，安德烈出版了他的《复活的亚述》[⑤]。在书中，安德烈对亚述的历史演变及贸易在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生动描述，让人感到作者仿佛不是亚述的发掘者，而是古代亚述生活的参与者。

---

① Rogers 1915, p.321.

② 同上，326 页。

③ 同上，328 页；法国考古学家对安德烈的发掘也评价极高，见 Parrot 1955, 46 页。

④ W.Andrae, Die Stelenreihen in Assur, Leipzig 1913; L.Messerschmidt, Keilschrifttexte aus Assur historischen Inhalts, Leipzig 1911.

⑤ W.Andrae, Das Wiedererstandene Assur, Leipzig 1938; 1977 年由 B.Hrouda 修订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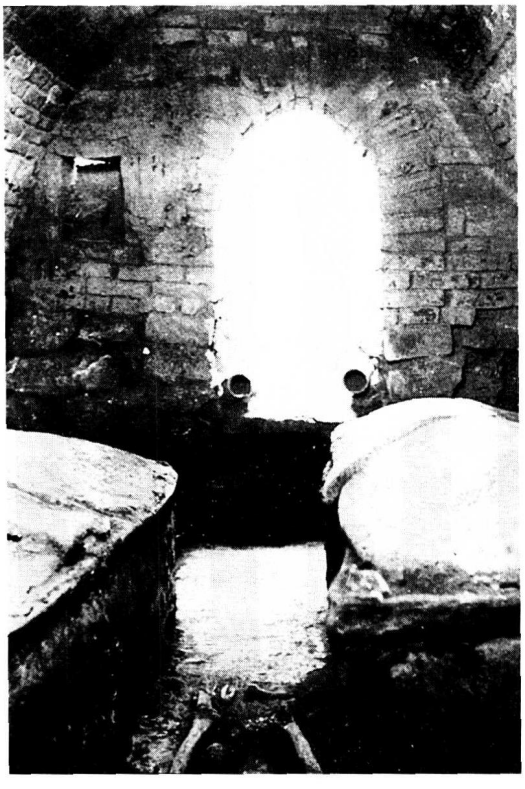


图 86 亚述出土的地下墓室（Wilhelm 1998，63 页）

图 87 亚述出土名年官碑的发掘现场。石碑仍在原来位置（Wilhelm 1998，5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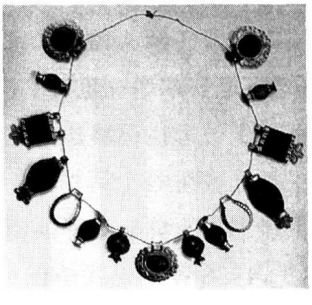


图 88 一个亚述墓室出土的首饰（项链）。珠子分别用光玉髓、天青石、仿制水晶和孔雀石制造，镶嵌在金框里，再由金链贯穿一起，成为项链。直径约20厘米（Wilhelm 1998，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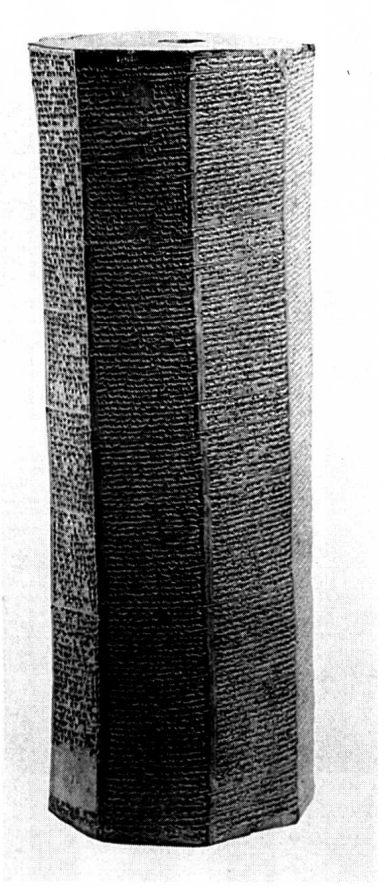


图 89　亚述出土的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一世（前 1114～前 1076 年）八棱柱铭文（Wilhelm 1998，5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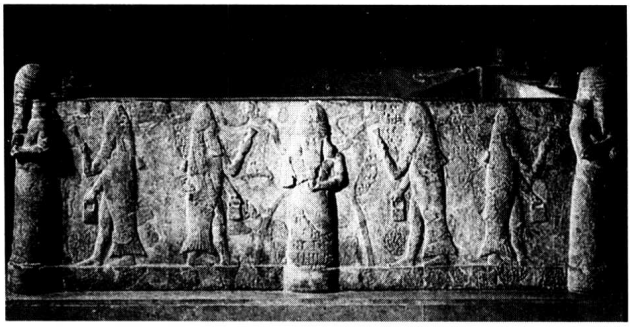


图 90　亚述神庙出土的水盆。周围饰以浅浮雕、高浮雕和圆雕。根据铭文，这个祭器产生于辛纳赫里布统治时期（Wilhelm 1998，62 页）

图 91

亚述出土的石膏石浮雕。高 1.36 米，宽 0.9 米。主要人物可能是亚述神，他两手分别持有植物，两只山羊在吃植物，他的两边有两个女神，手持水瓶，水溢流出来，浇灌在大地上（Wilhelm 1998，58 页）

安德烈在亚述的发掘对后来的史前史考古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亚述并非史前遗址，最早的文化层也不超过公元前3000年初期，但是，他的方法，即以地层区别文化的方

原

书

缺

页

在巴比伦和亚述的发掘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德国东方学会又在小亚细亚开辟了新的考古战场：博阿兹柯伊（Boghazköy）。

1906年，德国的温克勒（H.Winckler）和土耳其的马克里迪（Th.Makridi）开始对土耳其境内的博阿兹柯伊村附近的古代遗址进行发掘。马可里迪是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次发掘名义上的组织者是奥斯曼帝国博物馆。这样，马可里迪既是温克勒的助手，又是他的领导，经费由温克勒自筹。除两个私人捐助者外，还有两个学术组织在经费上给予了帮助，一个是“前亚学会”（Vorderasiatische Gesellschaft），一个是东方学会（Das Orient-Comité）。次年，即1907年，德国东方学会开始资助他们的发掘，资助力度达30000马克，由德国东方学会的创建人西蒙筹集，使温克勒短缺的资金得到补充，得以继续发掘。温克勒是亚述学家，他最感兴趣的是如何获得泥板，认为对遗址进行考古研究与他无关。[①] 因此，德国考古所（Das Archäologische Institut）同时派出一支考古队，由普赫施坦（O.Puchstein）率领，侧重于对建筑进行研究。资金也由东方学会资助，资助力度同样是30000马克。

博阿兹柯伊地处安卡拉以东160公里，这里的古代遗址首先由法国的建筑学家和探险家泰克西埃于1834年发现。[②] 稍后，英国的地质学家哈密顿和德国地质学家里特尔（K.Ritter）都对博阿兹柯伊遗址进行过描述。[③] 但他们都没有认清博阿兹柯伊遗址的真实历史面貌，这一问题的解决留给了半个世纪后的德国亚述学家温克勒。

在1906年7月17日开始的第一季发掘中就出土了2500块楔形文字泥板（包括残片），[④] 其中有赫梯国王哈图希里三世（Hattušili Ⅲ，公元前1265～前1236年）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公元前1304～前1237年）之间用阿卡德语签定的条约[⑤] 和用阿卡德语及赫梯语（当时未知）书写的书信。[⑥] 根据这些材料，温克勒正确地把博阿兹柯伊遗址确定为赫梯帝国都城哈图沙。[⑦]

---

① Wilhelm 1998, p.92. 据说，在发现泥板后，温克勒只把较大的泥板保留下来，小的泥板都被他扔掉。在1931年以后的再次发掘中，比特尔对温克勒堆起的废土丘进行了再次发掘，又找到许多小型泥板。在这一点上，温克勒还不如半个世纪之前的莱亚德：莱亚德在发掘尼姆鲁德时曾对泥板视而不见，因为他把泥板误认作了陶片，温克勒是故意扔掉泥板，二者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

② 见本书第二节：近代欧洲学者的实地考察。

③ W.J.Hamilton, Researches in Asia Minor, Pontus and Armenia, London 1842。里特尔描述摘录，见 Wilhelm 1998, 95－96页。

④ H.Winckler, “Vorläufige Nachrichten über die Ausgrabungen in Boghaz-köi im Sommer 1907”, MDOG, Nr.35 (1907), pp.1－59; J.Garstang, The Land of the Hittites, London 1910.

⑤ E.Edel, Der Vertrag zwischen Ramses Ⅱ. von Ägypten und Hattuschili Ⅲ. von Hatti, WVDOG 95, 1997.

⑥ E.Edel, Die ägyptisch-hethitische Korrespondenz aus Boghazköi in babylonischer und hethitischer Sprache, Abhandlung 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77, 1994.

⑦ MDOG 35（1907年），5页以下。

图 95 哈图沙出土的平印的印迹。“盖”在赠地文书、国王公告、条约等文献上，周围刻有楔形文字，中间一般刻有象形文字（Hrouda 1991，10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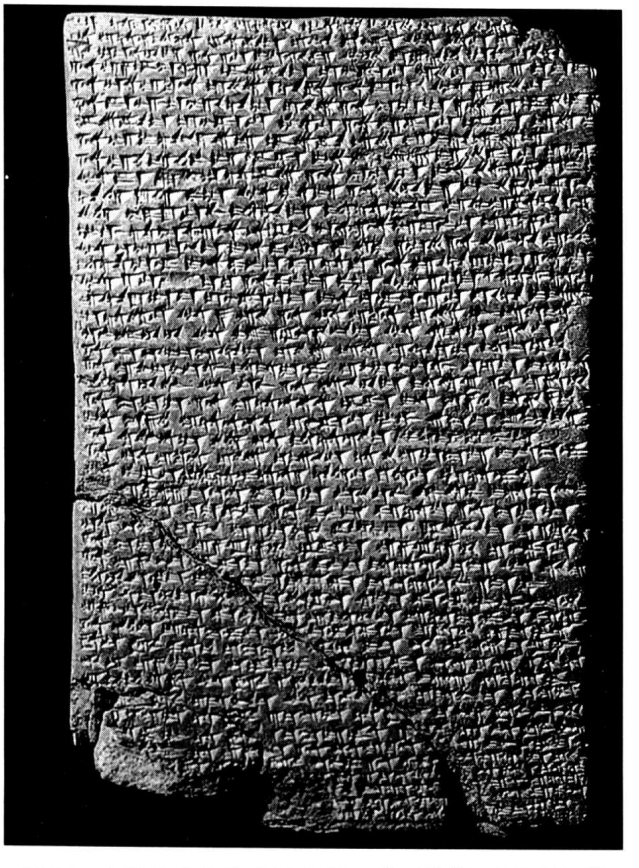


图 96 哈图沙出土的哈图希里一世（约前 1560 年）铭文。这个泥板是公元前 13 世纪的阿卡德语抄本（Hrouda 1991，105 页）

图 97 哈图沙出土的石浮雕，曾用以装饰城门石柱。最初，考古学家认为石雕中的人物是国王，因此，他们便把它装饰的城门称为“王门”。现在，人们一致认为，浮雕上的人物不是国王，而是神（Hrouda 1991，96 页）

图 98　在哈图沙附近的亚泽勒卡亚发现的山崖神庙中的石壁浮雕：舒鲁马（Surruma）神用一支胳臂搂住赫梯国王吐德哈里亚四世（约前 1225 年），以示保护（Wilhelm 1998，97 页）

图 99　在哈图沙附近的亚泽勒卡亚发现的山崖神庙中的石壁浮雕：十二阴间神（部分）（Wilhelm 1998，97 页）

博阿兹柯伊的发掘工作断断续续持续到 1912 年 9 月 1 日，由于当地流行霍乱，实际发掘工作已于 1911 年 8 月 14 日结束。1931 年，德国东方学会再次发掘博阿兹柯伊。因为这次发掘带有纪念西蒙的性质，所以，它被称为“詹姆斯—西蒙战役”，由 24 岁的史前史学家比特尔（K.Bittel）主持。[①] 后又不断进行发掘，至 1975 年始告一段落。自 1996 年起，德国东方学会又开始在此进行发掘，由奇雄（R.Czichon）主持。[②]1906～1912 年的博阿兹柯伊发掘工作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如浮雕和神庙建筑，但最大的收获还是泥板。在六年的发掘中（1906～1912 年）共出土 10000 多块泥板（包括残片）。1915 年，捷克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赫罗兹尼（B.Hrozný，1879～1952 年）成功解读用

① K.Bittel, Die James Simon Grabung in Boghazköy September 1931, MDOG 70 (1932), pp.1－24.

② R.Czichon, Studien zur Regionalgeschichte von Hattusha/Boghazköy 1996, MDOG 129 (1997), pp.89－102.

楔形文字书写的赫梯语文献，证明赫梯语是一种印欧语系中的语言，[①] 从而奠定了赫梯学的基础。博阿兹柯伊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自 1916 年起被整理出版，主要都集中在 KBo 和 KUB 两个系列里。[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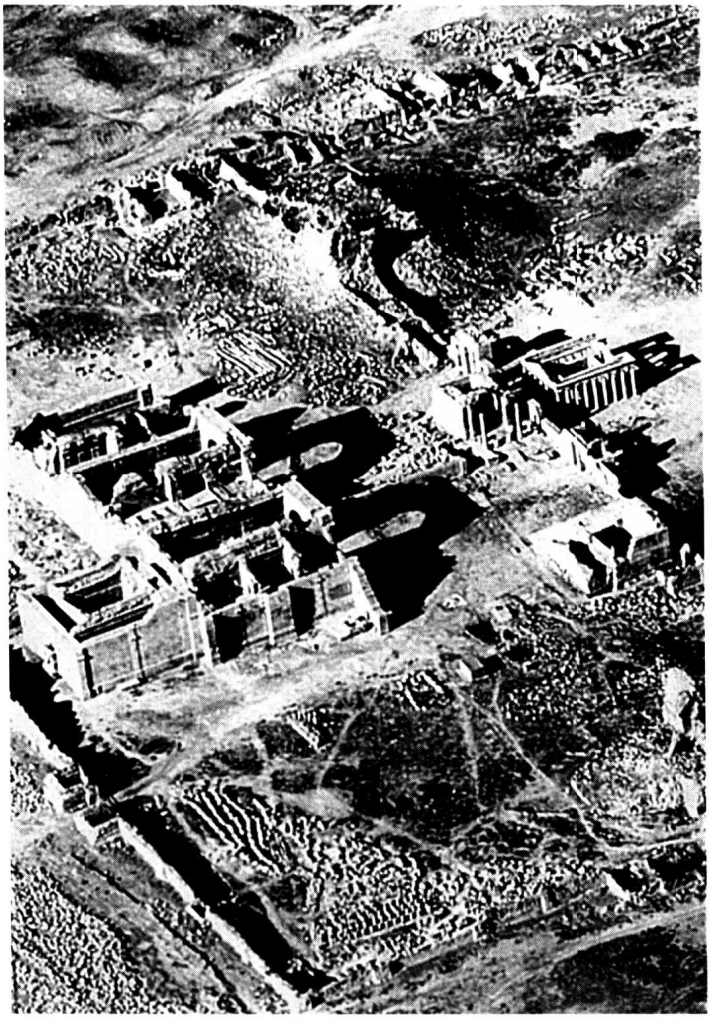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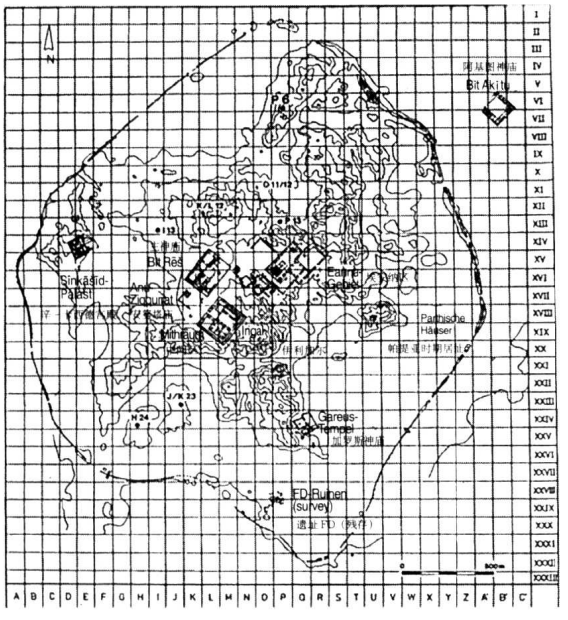
图 100 哈尔—哈德尔（古代哈特拉）遗址鸟瞰图（Wilhelm 1998, 69 页）

1907 年，德国东方学会又开始发掘阿尔—哈德尔（al-Hadr，即古代的哈特拉 Hatra）。阿尔—哈德尔地处亚述城以西约 50 公里，摩苏尔西南约 90 公里。发掘工作由正在主持亚述遗址发掘的安德烈负责。在 1907 年到 1911 年间，发掘亚述遗址的人员到阿尔—哈德尔进行过 7 次发掘，每次逗留的时间都不长，最短 3 天，最长 8 天。阿尔—哈德尔是地上遗址，遗留的断壁残垣都是帕提亚时期的建筑。他们主要对这座城市遗址中的残留建筑进行了测量和功能测定，最后绘制了城市复原图。

1912 年 11 月，德国东方学会开始对两河流域南部的瓦尔卡（Warka，即古代乌鲁克 Uruk）进行发掘。该遗址地处今日的塞马沃以北 15 公里，占地 550 公顷，与巴比伦遗址（占地 1000 公顷）和尼尼微遗址（占地 750 公顷）相比要小得多。该遗址由三个土丘组成。其中一个高出地面约 40 英尺(约12米)

① F.Hrozný, "The Lösung des Hethitischen Problems", MDOG, Nr.56 (1915), pp.17－50.

② KBo（＝Keilschrifttexte aus Boghazköi）于 1916 问世，KUB（＝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öi）于 1921 年问世。KUB 共出了 60 卷，已经不再继续出版，而 KBo 迄今仍在继续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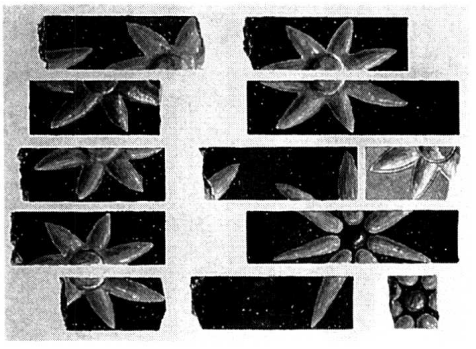


图 101

乌鲁克遗址发掘情况示意图。包括 1989 年以前发掘的所有地点（Wilhelm 1998，32 页）

图 102

看似土丘链的起伏地势就是当年的乌鲁克城墙。《吉尔伽美什史诗》道：吉尔伽美什“为乌鲁克建造了城墙，给神圣宝库埃安纳神庙护以屏障。看哪，那城墙如铜明亮；看哪，那城垛举世无双。跨入那亘古即有的城门，走近埃安纳神庙——伊什塔的住地，它使后来者可望而不可及。登上乌鲁克的城墙，绕它走一圈，看一看奠基记录，查一查筑墙方砖，看是否是烧砖，看地基是否是七个智者所奠。……”真是：昔日辉煌今何在，残垣断壁荒丘中（Wilhelm 1998，33 页）

图 103

由于时间关系，德国考古学家在发掘乌鲁克的 Bīt Rēš 时，采取了沿着墙角挖探沟的方法（Wilhelm 1998，36 页）

图 104

彩釉浮雕砖的水彩画，由考古学家于 1912/1913 年在发掘现场绘制（Wilhelm 1998，35 页）

101	104
102	
103	

图 105 1912～1913 年在乌鲁克的 Bit Reš 出土的塞流古时期的泥板（Wilhelm 1998，3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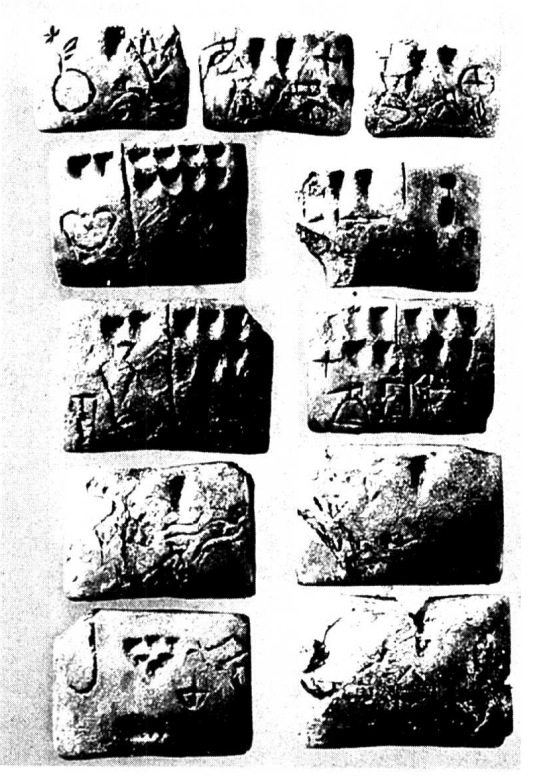


图 106 乌鲁克出土的古朴泥板（Wilhelm 1998，3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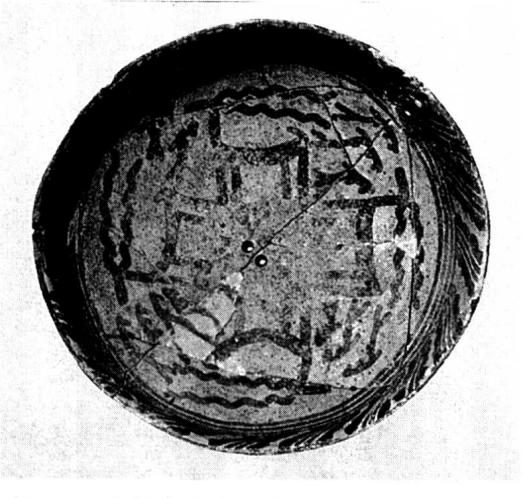


图 107 哈拉夫彩陶。约公元前 4500 年，直径为 33 厘米（Roaf 1998，3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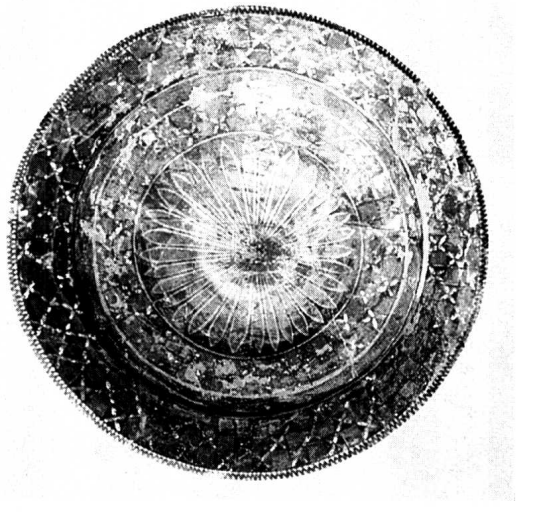


图 108 萨马拉彩陶。约公元前 5000 年，直径为 25 厘米（Roaf 1998，39 页）

是层塔遗址所在。昔日的乌鲁克受益于幼发拉底河，曾长期繁荣兴盛，而如今我们见到的乌鲁克遗址远离幼发拉底河 20 公里，已是一片沙漠荒丘。1904 年，德国亚述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希普莱西特在考察了瓦尔卡之后，对那里的恶劣环境进行了描述，并警告将来的考古学家说，如果没有 200 万马克作为发掘 50 年的资金保证，那么，就请你不要去做发掘瓦尔卡的美梦。[①]

然而，时隔不到 10 年，德国东方学会真的做起了发掘瓦尔卡的美梦，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从 1912 年算起的近一个世纪，德国考古学家在瓦尔卡已经发掘了近 40 次。看来，这个美梦将来还要继续做下去。

第一轮发掘由约尔丹（J.Jordan）和普鲁塞尔（C.Preusser）主持。当时，他们二人都在参加亚述的发掘。他们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绘制了遗址图，二是在不同城区挖了探沟，三是较大面积地发掘了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主神庙”（Bīt Rēš）。发掘“主神庙”是三者中的重点。之所以选择“主神庙”作为重点发掘对象，是由于安德烈于 1902 年曾在这里发现过彩釉浮雕砖，正是这种特殊建筑材料导致了巴比伦的发掘（至少是原因之一），巴比伦的成功发掘反过来又证明彩釉浮雕砖这种特殊建筑材料可以为考古学提供重要线索。再一个理由是，当时人们认为，在文物交易市场上出现的“古朴泥板”很可能是盗掘者从“主神庙”遗址挖掘出来的。由于这个建筑遗址占地大约 36000 平方米，残垣的高度有时高达 10 多米，所以，全部暴露是考古队的人力和物力所不能及的。于是，他们采取了挖探沟的方法，主要目地在于暴露墙角，遇到感兴趣的建筑遗存便扩大发掘范围。这样，整个建筑的轮廓和规模就基本清楚了。根据发现的泥板和印迹得知，这个建筑的年代较晚，是塞流古时期（前 312～前 64 年）的建筑，建筑师中也有希腊人，但建筑风格却完全是巴比伦式的，可以说是仿古建筑。

发掘工作持续到第二年（1913 年）5 月，在夏季到来之际便草草收场。现在看来，这次发掘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它没有达到当时德国东方学会期望达到的目的：揭示巴比伦尼亚的早期历史。[②] 因此，一时人们都很失望。失望加疲惫的考古学家们，艰难跋涉 10 天才到达巴格达。这次发掘不是靠政府的资助，完全是靠私人赞助，经费是由德国东方学会的创始人西蒙帮助筹集的，共筹得 65000 马克。[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瓦尔卡发掘工作没能继续下去。战后，德国的考古活动几乎全部停止。直到1928年，瓦尔卡的发掘才又得以恢复。到二战爆发考古工作再次停止时，瓦尔卡的发掘已经进行了11次。1956年，考古工作再次恢复，考古工作者又开始不断在瓦尔

---

① Wilhelm 1998, p.33.

② 关于德国东方学会决定发掘瓦尔卡的原因和目的，详见 Delitzsch, Warka, MDOG, Nr.47 (1911), 46～54 页。

③ MDOG 128 (1996), p.197 note 74.

卡发起考古战役，迄今又进行了28个回合。今天，当我们回首过去，来再看看当年希普莱西特对瓦尔卡考古前景所做的预言时，不禁联想到中国人的一句箴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虽然瓦尔卡的发掘工作迄今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发掘工作还远未结束。已经发掘的重要建筑有：城市中心地区的神庙建筑（其中最早者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前后建筑的城墙、坐落在城市西部的古巴比伦时期的宫殿、位于城市东部的塞流古和帕提亚时期的建筑等。出土的文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泥板，年代横跨3000年，几乎包括各个时期，其中的大量“古朴泥板”是迄今已知的最早的文字材料。此外，重要器物有乌鲁克石膏瓶、滚印和石头塑像等。

1911～1913年，冯·奥本海姆（M.F.von Oppenheim）开始对哈拉夫（Tell Halaf）遗址进行发掘。哈拉夫本是史前居址，代表性遗存是哈拉夫彩陶，年代约属公元前5千纪早期。“哈拉夫彩陶”色彩明亮，图案错综复杂，色彩有红、褐、黑、白等，涂于泥釉之上，是迄今为止古代西亚地区出土的最精美的陶器。[①] 哈拉夫于公元前10至前8世纪成为阿拉美亚人的都城之一。迄今发现的重要建筑遗存都属于这两个时期。

冯·奥本海姆本是外交家，曾广游阿拉伯国家。1899年，受德国政府委托，来到西亚地区勘察德国将要着手建设的从君士坦丁堡到巴格达的铁路沿线地区。在叙利亚地区考察时，他听到有关哈拉夫遗址出土过雕塑的消息，经考察，认为值得发掘，但因公务在身，无暇顾及。在12年后的1911年，他才得以重返旧地进行发掘，发掘持续到1913年。

1912年，在冯·奥本海姆发掘哈拉夫的同时，德国学者海尔茨菲尔德（E.E.Herzfeld）开始发掘伊拉克境内的萨马拉。萨马拉地处巴格达以北约75英里（约120公里），9世纪时，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曾一度在此建都。就是在这座穆斯林城市废墟的下面，海尔茨菲尔德发现了史前墓葬和后来被称为“萨马拉彩陶”的陶片。“萨马拉彩陶”为手制陶器，绘有精美的几何图案和程式化的动物或植物形象。当时还不能确定“萨马拉彩陶”的年代，直到60年代初，“萨马拉彩陶”及其代表的文化，即“萨马拉文化”的年代才得以确立：萨马拉是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地区最早的一个靠人工灌溉进行农业生产的村舍，时间在公元前6千纪上半叶。

虽然冯·奥本海姆和海尔茨菲尔德都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他们发现的史前遗存，但是，他们的发现却引起了人们对史前史的关注和兴趣，推动了史前考古学的发展。

1913年，德国东方学会又在阿尔—阿卡尔（Tellul al-'Aqar）开辟考古新战场。阿尔—阿卡尔的古代名称是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Kār Tukulti-Ninurta），意为“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堡”，在亚述遗址的北面，相距只有3公里，坐落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占地约62公顷。当年，奥斯曼帝国同意德国发掘亚述时，也同时同意德国发掘邻近的

① Oates and Oates 1976, p.37; Roaf 1998, p.39.

阿尔—阿卡尔遗址。

图 109　发掘后的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遗址。1914 年拍摄（Wilhelm 1998，66/67 页）

1913 年 10 月～1914 年 3 月，在建筑师巴赫曼（W.Bachmann）的主持下，德国东方学会对阿尔—阿卡尔进行了发掘。巴赫曼指挥 270 人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现的建筑有城门、城墙、神庙、层塔、宫殿、民宅、河渠等。在发现的文字材料中有一雪花石膏铭文，于是，人们始知此城就是中亚述国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前 1233～前 1197 年间所建造的新都。这里很少有人居住过，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被暗杀后，该城即被遗弃。在发掘之前，从亚述城出土的图库尔提·尼努尔塔铭文中人们已经知道他建有新都，这时，文字材料得到了考古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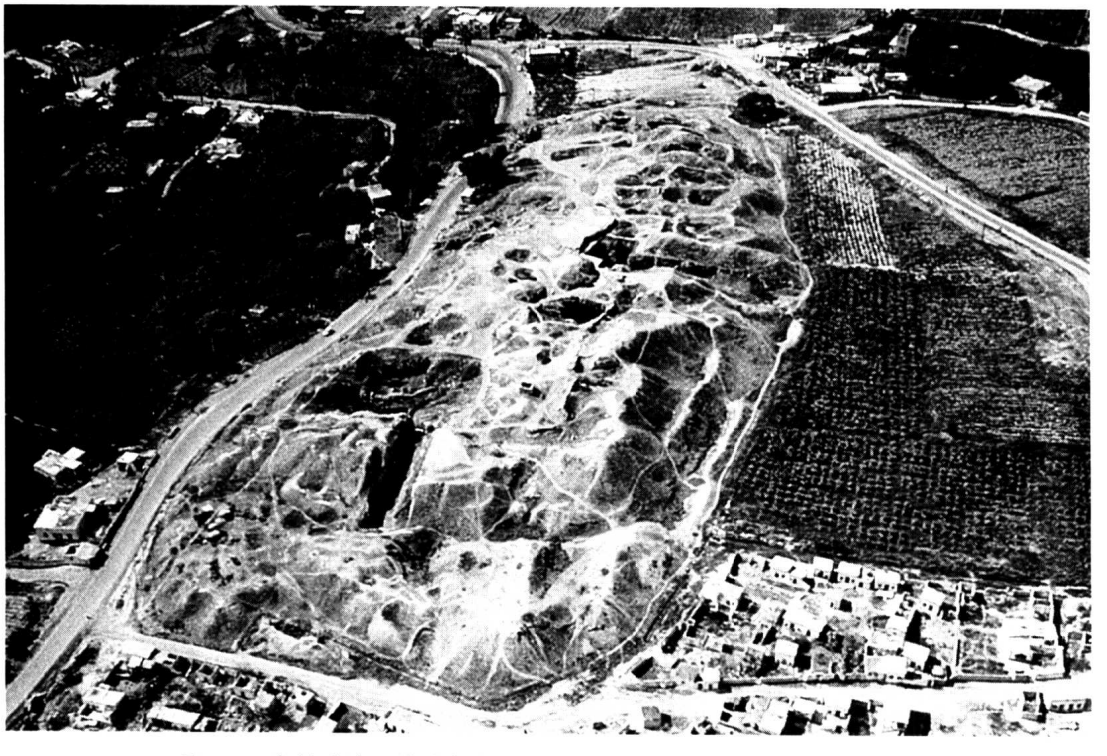


图 110　发掘后的耶利哥遗址，1909 年拍摄（Wilhelm 1998，102 页）

图 111 早在公元前7500年,耶利哥就有了城墙和圆塔这样的防御设施(Hrouda 1991,41页)

一战之前，德国东方学会还对另一个史前遗址进行了发掘，这就是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Jericho）。这次由德国东方学会资助、由维也纳大学神学教授塞林（E.Sellin）主持的发掘通常被称为德奥联合发掘。1907 年，塞林准备对耶利哥遗址进行发掘，在进行了试掘之后，维也纳大学无力再独立给予资助。在德国东方学会的德利奇建议下，塞林请求德国东方学会给予资助。西蒙毫不犹豫，承担了绝大部分发掘经费，于是，两国合作开始。

发掘工作共进行两季。第一季于 1908 年1 月 2 日开始，至 4 月 8 日结束，第二季始于 1909 年 1 月 15 日，止于 4 月 2 日。第一季，德国东方学会派考古学家瓦钦格（C.Watzinger）和建筑师朗根内热（F.Langenegger）相助，第二季，由牛尔德克（A.Noeldeke）取代朗根内热。

采取的方法是当时发掘遗址丘普遍采用的方法：挖掘纵向探沟，以暴露遗址的纵截面。不仅如此，塞林还在遗址中间挖了探坑。这样，他不但发现遗址周围的围墙，还发现遗址中心地区的一部分居住建筑，并据此绘制了平面图。但是由于此时地层学还没有建立，所以，地层关系还不能分辨得很清楚。此外，由于陶器类型学也尚未建立，所以，不同居住层的时间关系往往被错误解释。[①] 后来，瓦钦格对定年进行了更正，[②] 但其论证还是由于缺少陶器类型学的支持而显得不够有力。正确确定耶利哥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其他任务留给了 20 年后的英国人。[③]

第三节 美国

1899 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W.R.Harper）决定组织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对美

① E.Sellin und C.Watzinger, Jericho, Die Ergebnisse der Ausgrabungen, WVDOG 22（1913）.

② C.Watzinger, Zur Chronologie der Schichten von Jericho, ZDMG 80（1926）, pp.131－136.

③ 1929～1936 年，英国考古学家加斯坦在此进行发掘，确定了耶利哥遗址各文化层的年代关系。1952～1958 年，英国的凯尼容（K.M.Kenyon）再次在此发掘。

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穆克吉尔（即古代的乌尔）进行发掘。刚刚卸任的美国驻巴格达领事（1897～1898年）班克斯[①] 被任命为考古队队长。1900年1月他来到君士坦丁堡，通过美国外交机构向土耳其政府申请发掘执照。由于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正发生叛乱，考古申请遭到拒绝。接着，班克斯又提出发掘比尔斯—尼姆鲁德的申请，同样遭到拒绝，因为比尔斯—尼姆鲁德已经许给了德国东方学会。于是，班克斯又提出发掘易卜拉欣的请求，亦遭到拒绝。最后，班克斯提出发掘两河流域南部遗址比斯马亚（Tell Bismaya，即古代阿达布）的申请，也没有马上得到批准。可见，芝加哥大学出师不利。但不久就出现了转机。

正当班克斯率领的“乌尔考古队”困滞君士坦丁堡之时，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新的机构应运而生了：美国的企业家、金融家和慈善家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捐赠10万美元，建立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基金”（The Oriental Exploration Fund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②] 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任基金会主席。基金会成立后立即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发掘桑克雷，即古代的拉尔萨的申请。几经周折，申请还是被束之高阁。于是，基金会又转而申请发掘比斯马亚。1903年10月3日，发掘比斯马亚的申请终于被批准。这样，“屯兵”君士坦丁堡的班克斯一班人马开始南下，12月到达目的地，于圣诞之日就开始了发掘工作。这标志着芝加哥大学参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开始。他们选择了最大的遗址丘作为首次发掘的对象。当然，此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发掘的是古代重镇阿达布。后来发现石雕和大量泥板（约2500块，大约500块保存完好），文字材料出土后，该遗址的古代名称也就迎刃而解了。

班克斯的发掘持续到第二年（1904年）5月，夏日的酷热和风沙使他们不得不停止发掘，跑到巴格达避暑。9月，又开始发掘，但不久就又被迫停止。班克斯回国，把发掘工作交给其他人，希望继续发掘下去。由于新的负责人身体欠佳，发掘工作没有再继续。至此，芝加哥大学的第一轮考古发掘告一段落。

班克斯虽然善于发掘建筑，善于辨别各建筑部分的功能，但是，他却忽视了地层关系。这就导致了文物记录上的一大缺陷：他只记载了文物出土地点距地面的深度。[③] 这样的记录不能表明文物的地层关系，对年代学毫无意义。但是，班克斯绘制了遗址图，标出了阿达布遗址的12个土丘的相对位置，同时把土丘编了号。这样，在对出土文物做记录时，就可以明确标示出其出土地点（出土于几号土丘）和距地面深度。他的方法

---

① 班克斯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塞姆语，后到德国留学，师从德国著名亚述学家德利奇（F. Delitzsch），参加过多次考古发掘工作，1897～1898年任美国驻巴格达领事。由于政务缠身，无法从事考古工作，他便很快辞去领事职务回国。

② 也有人说他捐了5万美元，见 Breasted 1933，28页。

③ Yang Zhi：“The Excavation of Adab”，JAC 3（1988），p.5.

虽然有很多弊端，但是，与莱亚德时代相比已有很大进步：前者是挖宝，目的只在于获得实物，而后者则已十分接近后来公认的科学的考古方法，已开始注意到记录的重要性以及出土文物的位置对研究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班克斯一生撰写了好几部专著和几百篇关于考古发掘的文章，为宏扬芝加哥大学的亚述学做出了贡献。

第四节 英国

自 1873 史密斯被派到两河流域进行以寻找泥板（尤其是“洪水泥板”）为主要目的的发掘以来，到巴兹结束对戴尔的发掘为止，各种各样的泥板以及刻有铭文的圆泥柱或棱柱源源不断地涌入大英博物馆，使人应接不暇。这样，整理、出版和消化理解这些汗牛充栋的新材料的任务又显得紧迫起来。于是，考古发掘又自我调节式地暂停下来。这一停就是 12 年，直到 1903 年，在整理、出版和消化这些新材料的过程中，人们又感到了发掘的重要，又产生强烈的发掘欲望。

图 112 卡赫美什雷雨神神庙遗址（Woolley 1955，64 页）

1903 年，大英博物馆派金（L.W.King）继续发掘尼尼微遗址，次年又派汤普森（C. Thompson）相助。1904 年，金回伦敦，发掘工作由汤普森主持，至 1905 年结束。至此，发掘工作又告一段落。在金和汤普森主持的发掘中，共发现 800 多块泥板。[①]

1911 年，贺加斯(D. G. Hogarth）主持发掘土耳其/叙利亚境内的卡赫美什（Carchemish），[②] 后不久，大英博物馆决定让年轻的考古学家吴雷（L.Woolley）主持那里的发掘。帮助贺加斯发掘的劳伦斯（Th.E.Lawrence，1888～1935 年）这时成了吴雷的助手。卡赫美什发掘计划是

① Budge 1925，pp.164，175.

② 即现在的卡尔卡米司（Carchamis）/杰拉布鲁斯（Jerablus）。

大英博物馆到那时为止筹划的规模最大的发掘项目，但是，考古队成员却只有吴雷和劳伦斯两个欧洲人，吴雷是总指挥，并负责绘图，劳伦斯负责拍照，其余都是当地阿拉伯人，还有少数埃及人，因为此前吴雷曾在埃及主持过发掘。

卡赫美什在罗马时代仍然是个大城市，发掘时，遗址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建造大型建筑用的方石和圆柱支离破碎，随处可见。在发掘过程中他们常常会遇到罗马时代的混凝土地基，用炸药炸开地基后才能对下面的赫梯建筑遗址继续进行发掘。吴雷在解释他之所以炸掉罗马建筑遗存的原因时说：卡赫美什曾是赫梯人的都城，而在罗马时代它只是个省城，赫梯人的建筑非常辉煌，相比之下，罗马人的建筑无足轻重，所以只能让它们去见鬼。[①]

吴雷发掘的建筑多数都是神庙和宫殿遗址，许多装饰墙基的石板浮雕仍保存完好，浮雕的主题从神话到历史，多种多样，有的浮雕伴以赫梯象形文字铭文。罗马时代的建筑地基破坏了相当一部分赫梯浮雕，尽管如此，吴雷还是常常可以发现连贯不断的浮雕系列。浮雕石板一般有黑色玄武岩和白色石灰岩两种，两种材料交错使用，一黑一白，对比十分鲜明。白色石灰岩最初涂有颜料，出土时颜料早已脱落，所以，最初的颜色对比可能不是现在我们见到的一黑一白，黑白相间这种样子。

所有浮雕中最使发掘者吴雷赞叹不已的是所谓的“王宫扶壁”（the Royal Buttress），这是由四块石板组成的一组浮雕，表现的是卡赫美什国王阿拉拉斯（Araras）及其家庭成员，浮雕上的每个人都配有文字说明，此外还有一段很长的铭文。所有铭文都用象形文字书写，当时还不能被解读。这组浮雕出土时场面十分壮观，激动的阿拉伯发掘者鸣枪欢呼，来自美国的一群游客也以各种方式助兴，热烈的场面久久不能平静。人们在莱亚德的书中常常会发现类似的激动人心的场面，进入20世纪后，即“科学考古学诞生”后，这种场面就非常罕见了。

除了发掘宫殿遗址和神庙遗址外，吴雷还发掘了几个民房（private houses）遗址，收获甚大。其中一座较大的房屋显然是在经过了一番激战后毁于战火的，地面上散落一些武器，每个门口都有大量箭头，令人联想到房屋的守卫者曾经与入侵者浴血奋战、保卫家园的壮烈场面。在一个房间里还发现楔形文字泥板，上面书写着亚述国王的纳税令，这样，卡赫美什臣属于亚述的政治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了。同时还发现几件来自埃及的东西：一个刻有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Psammetichus）名字的手镯，一封印有法老尼科（Necho Ⅱ，公元前610～前594年）印章的纸草书信——这说明卡赫美什的居民背着亚述暗与埃及私通，还有一个青铜盾牌，上面刻着一排动物和一个希腊蛇发女怪的头，这个盾牌可能是希罗多德《历史》中讲到的帮助埃及攻打赫梯人的希腊雇佣军留下

① Woolley 1955, p.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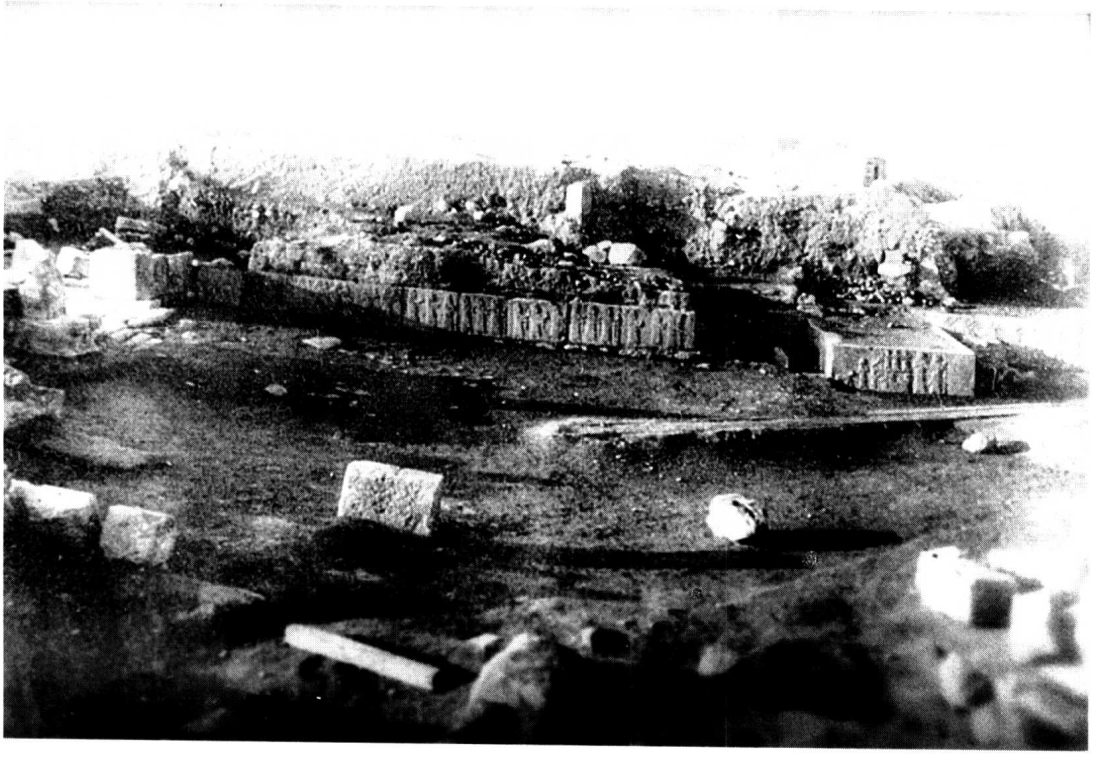


图 113 在原位置的卡赫美什“王门”两侧的石板浮雕（Woolley 1955，72 页）

图 114
土耳其安卡拉考古博物馆收藏的卡赫美什“王门”两侧的石板浮雕（部分）（Hrouda 1991，400 页）

的遗物，而这场战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604 年。

由于亚述文献中提到过卡赫美什，人们对它的晚期历史多少有一点了解，但所知甚少。吴雷的每个发现都是新材料，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或修正了相关时期的历史。起

图 115
在原位置的“王宫扶壁”石板浮雕（部分）（Woolley 1955，72 页）

图 116　土耳其安卡拉考古博物馆收藏的“王宫扶壁”石板浮雕（部分）（Hrouda 1991，402～403 页）

初，人们把重建历史的希望寄托于文字材料的发现上，但文字材料发现后却令他们在惊喜之余感到遗憾，因为出土的文字材料都是用象形文字书写的，这种尚未解读的文字对于重建历史无济于事。[①] 最令吴雷激动不已、而后又最令他感到惋惜的是一个石狮：这是守卫赫梯王宫正门两侧的一个石狮，狮身上刻有一个双语铭文，分别用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书写。吴雷满以为终于找到了解读象形文字的钥匙，可事实证明他的愿望只是一场黄粱美梦，因为楔形文字铭文已严重残损，不可识读。令他痛心不已的是这个残损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正是早于他 60 年的英国考古学家们。早在 1854 年这个庞然大物就被

① 赫梯象形文字的解读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1877～1900 年为摸索阶段，1900～1930 年为过渡阶段，1930 年以后为突破阶段。像楔形文字的解读一样，赫梯象形文字的解读也是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它是几代欧洲和美国学者智慧的共同结晶，在此不能详述。

发现，在往大英博物馆“拖运”过程中，硬是把楔形文字铭文拖掉了一些，在放弃“拖运”计划后，这个石狮就成了当地石匠制作磨盘的材料。

图 117 卡赫美什出土的象形文字铭文拓片（Woolley 1955，6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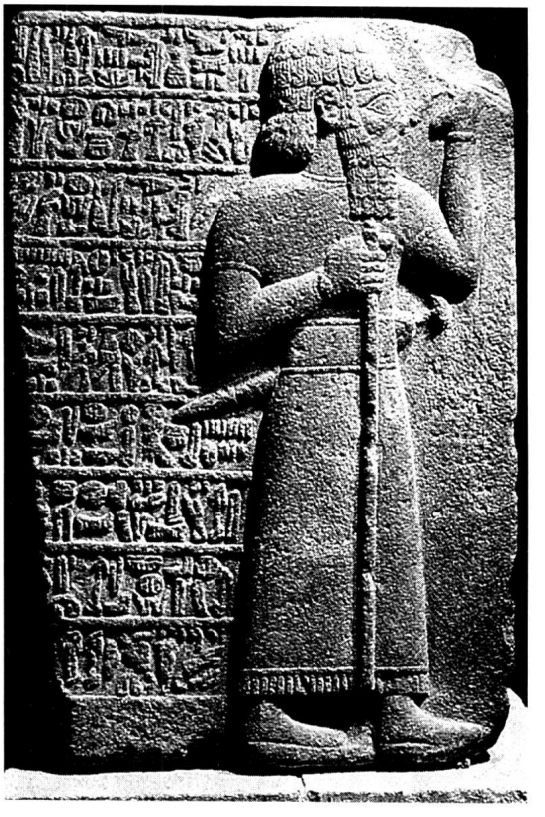


图 118 卡赫美什出土的刻有象形文字铭文和国王浮雕像的石板（Hrouda 1991，401 页）

根据土耳其的法律，考古队发现的所有文物都归土耳其所有。吴雷的发掘执照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本人也在上面签了字。为了防止考古队假报实情，土耳其政府还派了专人来监视考古队。吴雷信守了诺言，出土的文物都上缴给了土耳其，但他同时为大英博物馆购买了一些小文物，走私到英国。这些他都做得得心应手。惟一大费周折的一次走私是在 1914 年。这年，距卡赫美什约 10 英里（约 16 公里）的阿马尔纳的村民盗掘了附近的一座古墓，村民们把盗得的东西都卖给了吴雷。吴雷留下其中的一半文物，另一半上缴给了土耳其政府。不久，附近一个村庄的村民又盗掘了另一座古墓，他们也都把盗得的文物送到了吴雷手中。吴雷这次准备“独吞”这些文物。他打发土耳其的监视人员睡下后，便开始与村民们进行秘密交易。这样的秘密交易持续了几周，吴雷获得文物 64 箱（61×45.7 厘米）。几经周折之后，最终在英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英国海军才趁土耳其政府面对紧张的国际局势而无暇他顾之机，成功地把全部文物都运到英国。

当时的叙利亚是土耳其苏丹统治下的一个省，由“外理”（Wali，省长）统治。在

腐败的土耳其政府统治下，外理的日子并不好过，如果有人在苏丹的耳边吹一吹风，外理就可能丢掉乌纱帽。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外理也变本加厉，抓紧时间搜刮民财，外理的下属官吏也上行下效，同样利用职权搜刮民财，对西方的考古学家也毫不例外。如果他们不进贡贿赂，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当时的金融市场也非常混乱，就是在杰拉布鲁斯这样的小村子金磅与皮阿斯特的兑换率就有三种：在当地的小卖店买东西时是一种，给官方交税时又是一种，在德国援建的火车站交费时又是另一种。在政治腐败和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吴雷遇到了很多棘手问题，他一方面要对付当地贪官污吏的搜刮，另一方面又要对国内的审计员有个清楚的交代。事实证明，吴雷不但是个出色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个善于当家理财的人。他指挥建造的考古队住房一共才花掉考古经费140英镑，而这套房间除有卧室外，还有洗澡间、厨房、仆人住处、可以随时扩展的储藏室、冲洗胶卷的暗室、绘图室和会客室。

之所以要如此这般建造考古队住房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作了长期在此安营扎寨的准备：计划在这里发掘10年。正因为如此，吴雷的发掘是从长计议的。每当发掘建筑遗址时，他总是先除去浮土，使建筑的整体结构先暴露出来，然后再逐个清理内室。他还对城市的外墙进行了跟踪发掘，清理了内城的一些防御工事，发掘了位于卫城上的几座早期墓葬，大多数都准备留待以后发掘。谁也没有想到，当他们积极筹划长期发掘时，世界大战正在悄悄逼近。战争爆发后，一切美好计划都付诸东流了。1919年，吴雷重返故地，在法国军队与阿拉伯和土耳其人对峙的紧张气氛中又进行了一季发掘。最后，法国军队战败，卡赫美什大部分划归土耳其。此后，考古学家与这个战略要地的缘分就永远结束了。

图119　吴雷建造的卡赫美什考古队住所（Woolley 1955，64页）

第五节　结语

科尔德威为德国东方学会主持巴比伦发掘标志着西亚科学考古学的诞生。这里所谓的科学考古学不是就考古内容而是就其方法而言的，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解剖土坯、详察地层和重建历史。这种始用于巴比伦发掘（1898～1917年）的方法，很快被主持亚

述发掘（1903～1914年）的安德烈发扬光大。此后，不仅大多数德国考古学家采用这种方法，其他国家的西亚考古学家也都先后学习和借鉴了这种方法。[①] 后人对巴比伦的发掘给予高度评价，英国考古学家劳埃德说，科尔德威和安德烈为不断发展的发掘技术奠定了基础。[②] 最早学习和借鉴这种方法的人是集考古学家和亚述学家于一身的英国人金。金于1901年11月参观了德国科尔德威主持的巴比伦发掘，随后，在发掘尼尼微遗址时，他就采用了科尔德威的发掘方法，收到了良好效果。[③]

西亚科学考古学诞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它是考古发掘技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西亚考古发掘的历史（如果从博塔算起）到此已有半个多世纪。人们在长期的发掘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探索最有效的方法。从莱亚德等人的挖宝，到班克斯的详细登记出土文物，再到科尔德威的详察建筑层，每发展一步都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必然结果。

其次，它是亚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博塔和莱亚德的时代，除几位语言大师外，还没有人能读懂楔形文字泥板，而且语言大师们也正在解读楔形文字，就是已经取得的成果也还没有得到公认。那时，对大多数人来说，泥板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正因为如此，发掘者对泥板有时是视而不见，有时是见而不识，而对大型艺术品则虎视眈眈，一掘为快。大型艺术品至少可供观赏，价值往往溢于表面，一见皆知，最容易引起轰动。而只有引起轰动，才能引起国家有关部门或博物馆的重视，才能得到继续发掘的经济保障。所以，挖宝——值钱的遗物——是时代的产物，它随着一个时代而产生，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到了史密斯时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时，楔形文字已被解读，泥板的史料价值得到肯定，获得泥板也就成了考古学家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这时想要发现其他值钱的东西（如大型艺术品）已不那么容易。到了科尔德威时代，泥板提供的史料已不能满足重建历史的需要，其他考古证据（如建筑）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对古代建筑的发掘与研究成为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考古目的的变化引起发掘的具体目标的变化，发掘的具体目标的变化又带来考古方法上的变化：单纯为获得艺术品或泥板之类的实物的发掘，不需要注意发掘方法，只需要达到目的，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发掘建筑遗存就不能不注意手段，因为不择手段就达不到目的。

第三，它是学术机构参与考古的结果。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 Orient-Gesellschaft）于1898年成立。虽然成立学会的主要动机是赶超英法、为国家获取文物，

① Lloyd 1955, pp.212－213; Lloyd 1984, p.10.

② Lloyd 1984, p.10. 汉译本《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杨建华译，文物出版社，1990年）13页。

③ Rogers 1915, pp.342－343.

但该学会毕竟是个学术团体，会员中的大多数都是知名学者。可想而知，由这样的学术团体筹划的考古发掘不可能都是功利性的，学术性必然要得到体现。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巴比伦发掘而言，从确定考古目的到配备参加考古人员，无不体现了学术性。

第四，它是资金得到保证的结果。德国东方学会成立后，学会的创建人西蒙为巴比伦的发掘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在此基础上，德皇威廉二世又给予特别资助，使发掘工作有了资金保障。有了资金保障，方可从长计议，方可组织一支拥有24匹骑兽和驮兽的考古大军，满载考古“辎重”（包括有轨翻车），浩浩荡荡，奔赴战场。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科学方法的实施就不能得到保障。过去的许多考古学家都常常被经费的短缺所困扰，有的因经费不足而不得不采取最便捷的发掘方法：顺着前人挖的探沟继续发掘，如巴兹发掘尼尼微的情况就是如此。

第五，它是发掘时间得到保证的结果。巴比伦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915年，一战爆发后才被迫停止。就是在一战期间，德国也一直派人看守遗址，随时准备继续发掘。这说明，德国东方学会有长期发掘或彻底发掘巴比伦的打算。从筹集的发掘资金到事先准备好了的考古设备等方面看，这种长期或彻底发掘的打算自始有之，而且，他们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在整个发掘过程中，从未遇到申请执照的问题，似乎两国有长期发掘协议。这种长期的发掘打算和没有时间限制的发掘执照为科学方法的实施在时间上提供了保证。以前的许多发掘都因执照短暂而不能筹划长期发掘计划，或因为执照到期，正在进行的发掘不得不草草收场。当年，《每日电讯》申请到的发掘尼尼微的执照只有一年有效期。为了充分利用执照上限定的、对发掘一个大型遗址来说少得可怜的一年时间，史密斯不得不来去匆匆，最后连命都搭上了。由于时间紧迫，史密斯单独一人上路，仓促雇人发掘，不久就不得不草草收兵，哪里还顾得上方法，更不能奢望科学方法。

第六，它是受考古学大环境影响的结果。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Schliemann，1822～1890年）开始发掘地处小亚细亚西北的希沙立克（Hissarlik Hill），即特洛伊城址，那是一个没有一点地面古迹遗存的土丘遗址。谢里曼采用的发掘方法主要有：1.剖开土丘的剖面，分出人类活动层位；2.保存发现的每一件器物；3.详细记录每件器物的发现地层。[①] 虽然这位后来被奉为“科学考古学”（scientific archaeology）的开山祖师[②]的谢里曼在当时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但他的发掘方法对科尔德威产生了影响，这点似乎不容置疑，因为科尔德威的发掘方法与谢里曼的方法几乎如出一辙。

第七，它是科尔德威个人的考古发掘经验不断积累的结果。科尔德威从1882年起

① 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47页。

② G.Daniel (ed.), The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London 1978, p.186.

就开始参与和主持西亚地区的考古发掘，到 1899 年正式开始发掘巴比伦时，他已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本身又是研究建筑和艺术史的，把他的所长（建筑史和艺术史）应用到考古学上自然就会形成注重发掘古代建筑遗存的特点。随着个人经验的积累，再加上一些有利的外部因素，如足够的时间、充足的经费和前人（如谢里曼）的经验，就自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如果说时代可以造就英雄，那么，时代之所以能够在此时造就出开创西亚考古史新纪元的英雄，是因为此时有个科尔德威。

其实，法国的德·摩尔根于 1897 年对苏萨的发掘已经在许多方面打破了传统。如上所述，他采取了大面积铲除耕土、全面揭露、同时注意观察不同地层、以地层关系确定年代关系的方法。他的发掘方法与科尔德威的方法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完全可被视为西亚科学考古学的典范。然而，人们都把科尔德威的方法视为西亚科学考古学的典范，闭口不谈德·摩尔根的贡献，这颇有些令人费解。

德·摩尔根之所以能创造性地采用新的发掘方法，其原因也大致与科尔德威的相同，最相似的是时间上和资金上的保证。法国政府用 10000 法郎从波斯国王那里买下了一个“发掘权”，凭这个“发掘权”，法国可以在波斯境内发掘任何遗址，而且，出土文物也全部归法国所有，这就为德·摩尔根在时间上提供了充分保证。此外，法国政府还为德·摩尔根拨了专款，使他在资金上得到了保证。波斯王室还派一支军队保护他，使他在安全上得到保证。这样，他的科学方法的实施也就得到了保证。

虽然这个时期在总体上可被视为“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时期，但其中还有很多不科学的因素或者现象，德国的温克勒就是典型的一例。他是亚述学家，只对泥板感兴趣，而且只对较大的泥板感兴趣，小泥板则一概扔掉。据说，当时发现的泥板大都在原位置(in situ)，但他对当时的情况既没有记录也没有拍照，致使博阿兹柯伊出土的泥板大都没有具体出处。这种只强调目的而丝毫不顾及手段的发掘，第一不应该发生在博阿兹柯伊，因为博阿兹柯伊的发掘是在 1906 年以后，那时，科学考古学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正在被成功地应用到巴比伦和亚述的发掘中；第二不应该发生在温克勒身上，因为温克勒是德国人，实际上在为德国东方学会进行发掘，科尔德威在巴比伦的发掘和安德烈在亚述的发掘他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的发掘方法和在当时的考古界产生的影响他也应十分清楚。所以，温克勒的倒行逆施很令人费解。

1905 年由汤普森主持的尼尼微发掘工作结束后，英国的西亚考古发掘活动又进入了一个低潮。[①] 美国的班克斯于 1904 年回国后，美国的西亚发掘也进入停滞状态。所以，英美两国在以德国的巴比伦发掘为标志的“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时期，对西亚考古

① 小规模考古发掘仍在个别地区进行，如 1907 年加斯坦主持的对土耳其境内的萨克贾龟祖（Sakcegözu）的发掘和 1911～1914 年先由贺加斯、后由吴雷等主持的对卡赫美什的发掘。

学的发展没有做出什么值得书上一笔的贡献。

对德国来说，从1898年德国东方学会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十五六年的时间是德国考古学大展雄风的黄金时代。这时不但有一批巨商大贾、社会名流解囊相助，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鼎力支持，[①] 更有一批人才甘为科学——亚述学和西亚考古学——献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这个黄金时代的结束，战争使德国的西亚考古元气大伤，因此，类似这样的黄金时代再未出现。一战期间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国的西亚考古一蹶不振，[②] 直到1927年才恢复对叙利亚境内的古扎纳的发掘，次年，恢复对乌鲁克的发掘，1931年恢复对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的发掘，算是又迎来了德国西亚考古史上的第二个春天。

“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时期的发掘对象，就其重点而言，已经从泥板过渡到了建筑。德国的考古学家大都是建筑师，从发掘巴比伦的科尔德威，到发掘亚述的安德烈，再到发掘阿尔—阿卡尔的巴赫曼，无一例外。所以说，“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时期与以前的“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和“向科学考古学迈进”时期相比，其特点之一就是发掘的主要对象发生了变化：“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发掘的主要对象是大型艺术品，“向科学考古学迈进”时期发掘的主要对象是泥板，而“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时期发掘的主要对象则是建筑。

---

① 德皇威廉二世不但在经济上给予德国东方学会以极大支持，而且，还曾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为德国考古学家争取发掘权。亚述的发掘权就是他亲自从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那里争取来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把亚述的发掘权作为礼物送给德皇威廉二世。这种国家元首把某遗址的发掘权赠送给其他国家元首的礼尚往来，大概在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例。

② 据说，在一战期间，德国人非法对许多遗址进行了发掘，被雇佣的当地民工为他们发掘时有时根本没有任何欧洲人监视。Budge 1925，p.240.

第八章　西亚考古的黄金时代

(1919～1939 年)

第一节　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国的考古发掘都被迫停止，许多国家的考古学家都直接在阿拉伯地区参与了战争，[①]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从此改弦易辙，脱离了考古界，如英国的劳伦斯，[②] 但更多的人仍翘望战争结束，早日继续发掘，英国的汤普森就属于后者。他在战前曾经发掘过尼尼微，战争期间服务于英国情报局，战后，在尚未签订停战协议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指挥一支印度军队开始了发掘。他首先选择的是两河流域南部遗址乌尔，后又转移到附近的埃利都。他的发掘虽然收获不大，但却开了战后恢复西亚考古发掘的先河。

1919 年，霍尔（H.R.Hall）接替汤普森来到乌尔进行发掘，为他发掘的是 70 名土耳其战俘。[③] 他在乌尔的发掘并不成功，成功的是在附近的欧贝德（Tell el-Ubaid）的发掘。欧贝德遗址位于乌尔以南 6 公里，遗址丘长 350 米，最高处高出周围地区 67 米。霍尔在那里发现建筑神庙的平台（后来的塔庙的雏形），同时还发现一些装饰品。当时，伊拉克还没有制定考古法，在这种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大英博物馆与伊拉克政府平分了出土文物。

为了弥补经费不足和充分发挥合作的优势，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决定联合对乌尔进行发掘。1922 年，在吴雷的主持下，联合发掘正式开始，计划发掘两年，结果却断断续续一直发掘到 1934 年，共发掘了 12 季，历时 12 年。

发掘主持人吴雷从 1907 年起就开始参与考古发掘工作，[④] 到他主持乌尔发掘时已是富有实际经验的“一流发掘者”（a first-class digger）。[⑤] 他的发掘非常成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巴格达、伦敦和美国费城的博物馆，还使在本世纪初由德国人首先创建的科学

---

① 英国考古学家吴雷在战争期间服役于英国情报局，任少校，被俘，在土耳其度过两年战俘生活。

② G.R.H.Wright, “T.E.Lawrence and Middle Eastern Archaeology”, MDOG 117 (1985), pp.5－20.

③ Lloyd 1955, p.222.

④ Woolley 1955, pp.15, 23.

⑤ 这是贝尔女士（Getrude Bell）对他的评价，转引 Oates and Oates 1976, 51 页。

图 120　乌尔王陵出土的金盔，高 23 厘米（Hrouda 1991，6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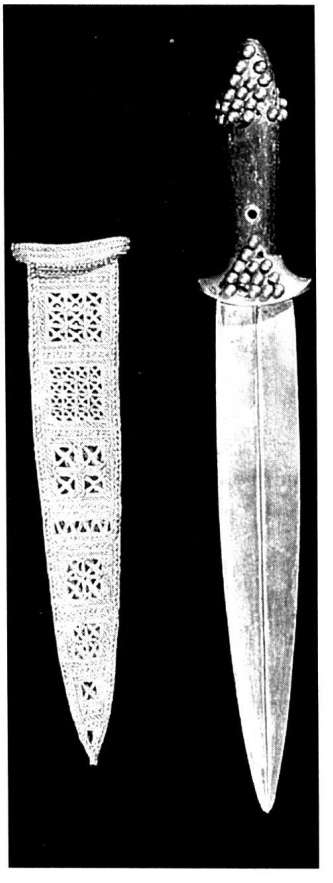


图 121　乌尔王陵出土的金剑和用金丝编织的剑鞘，剑长 37 厘米（Hrouda 1991，361 页）

考古发掘方法得到继承和发扬。尤其值得书上一笔的是他在发掘中表现出的远见和耐心，这与一般考古学家常有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1922 年，在对乌尔的一些墓葬进行发掘并出土了一些金银珠宝之后，在断定正在发掘的古代墓葬群具有十分乐观的发掘前景、极有可能出土大批重要文物之后，他没有急于继续发掘，而是重新封闭了陵墓，把发掘人员调往其他不重要的地方进行发掘。

吴雷在谈到他推迟发掘王陵的原因时说："那时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正处在幼年期，没有任何办法对陵墓中出土的小物件进行断代。我们的目的是再现历史，而不是为博物馆搜集各种古董。在我们和我们的雇工受到充分训练之前，历史不会得到再现。"[①] 我们应该指出，吴雷把 1922 年的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说成是"正处在幼年期"，这显然过低地估计了西亚考古的总体水平。诚然，那时西亚考古学还没有做为一门学科进入大学，那时也还没有西亚考古的教科书可以参考，各地考古学家主要凭经验和实践来改进

① 转引 Lloyd 1963，50 页。

发掘技术。[1] 但是，自从德国东方学会发掘巴比伦和亚述之后，西亚考古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提高，西亚考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如果1922年处在幼年时期，1926年也不可能发展到成熟期，吴雷的发掘技术能在四年内成熟起来，恰好说明了当时的西亚考古学已达到较高水平这一事实，当时的考古总体环境可被比作是一座大学，吴雷和他的雇工是这所大学在四年内培养出来的大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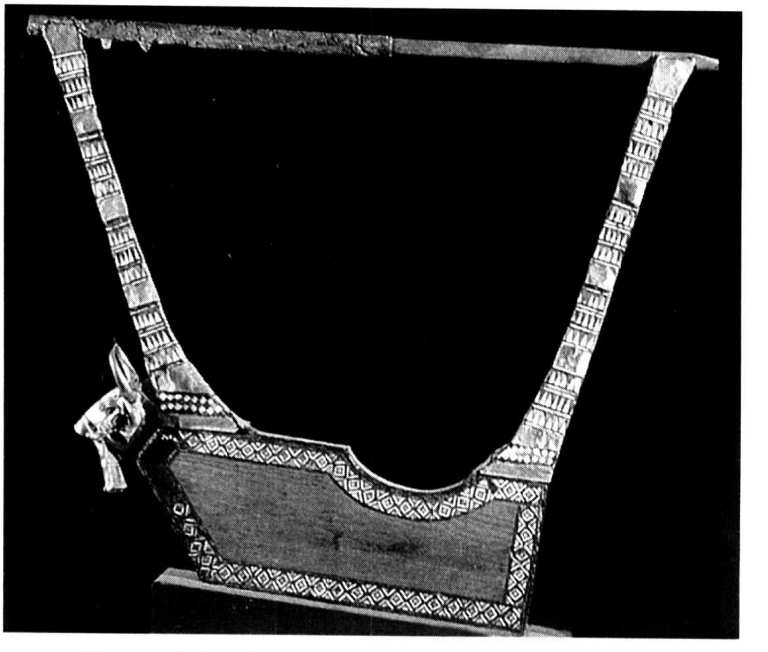


图 123 乌尔王陵出土的竖琴（Hrouda 1991，294 页）

图 122 乌尔王陵出土的竖琴音箱（Hrouda 1991，295 页）

这就是说，他推迟发掘王陵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认为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正处在幼年期，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对陵墓中出土的小物件进行断代；二是他认为包括欧洲人在内的所有参加发掘的人都因缺乏训练而不够资格发掘如此重要的陵墓。直到1926年他认为参加发掘的人都已符合要求时，他才开始对重点发掘对象——乌尔王陵——进行发掘。他把这项发掘工作整整推迟了4年。这期间，由于没有惊人的发现，他失去了得到社会各界更多赞助的机会，迫使他在某一年的发掘中，不得不利用一次机会，脱下帽子向当时居住在伊拉克的英国公民乞求捐助。

① Lloyd 1963，p.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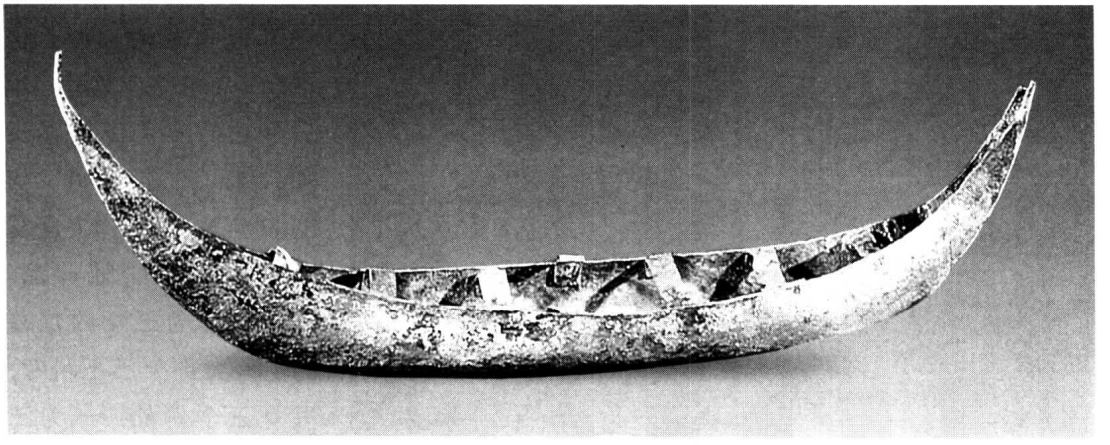


图 124　乌尔王陵出土的银质模型船。长 65 厘米，宽 8 厘米（Hrouda 1991，19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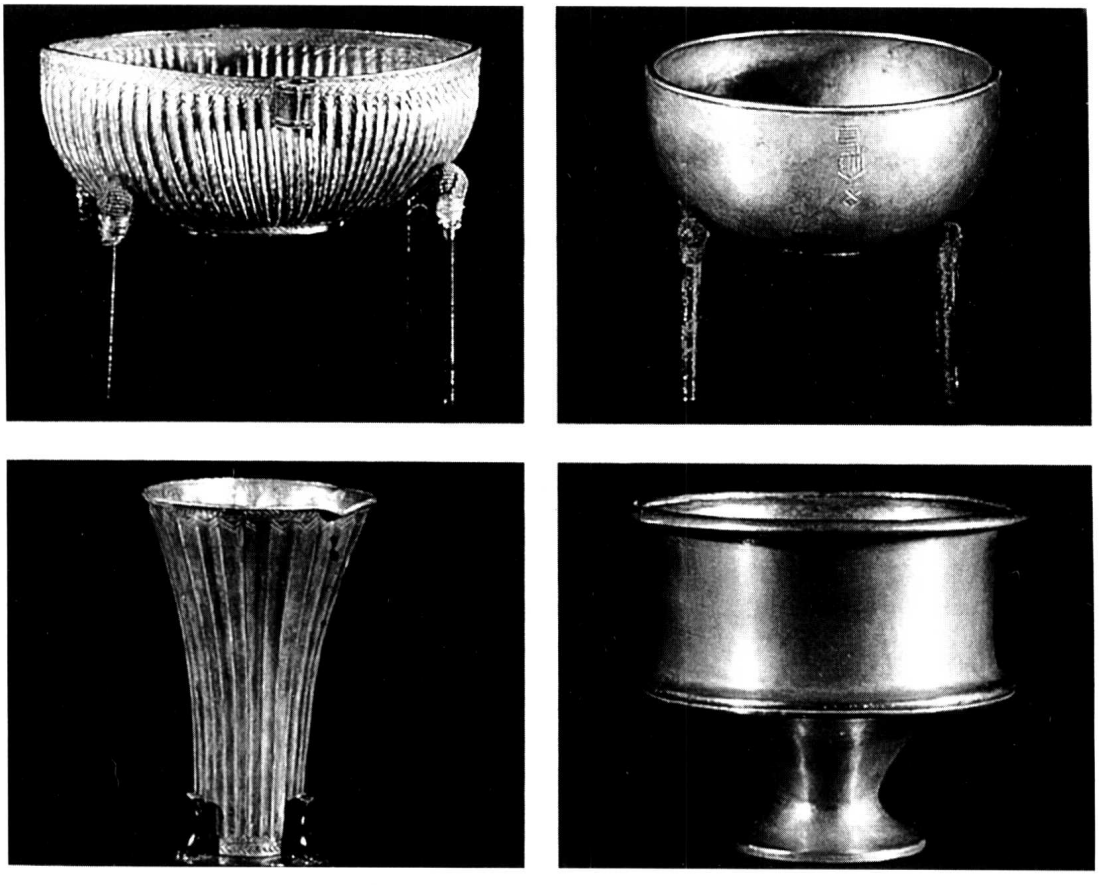


图 125　乌尔王陵出土的金器（Hrouda 1991，6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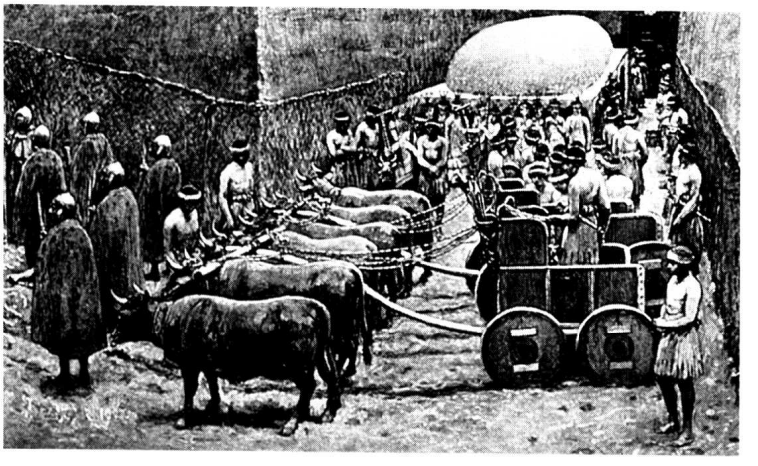


图 126 乌尔王陵之一、王后普阿比墓中的人殉复原图。共 74 人，其中 68 人是女性（Beek 1961，36 页）

图 127 乌尔王陵中的人殉出土时情景（Hrouda 1991，64 页）

他的耐心和等待给予了他丰厚的回报。他清理了 100 多座墓葬，绝大多数的年代都属早王朝后期（约前 2600～前 2500 年），其中 17 座墓葬中有丰富的随葬品。这些被称为王陵的坟墓的主人大部分已不可考，只有三个例外：一为王后普阿比（Puabi）之陵，二是阿卡拉姆都克（Akalamdug）之陵，三为美斯卡拉姆都克（Meskalamdug）之陵。除知名的王陵以外，其余的“王陵”都被编了号，以便称呼，一个不知名的王陵被称为“巨陵”。就是在这个被称为“巨陵”的王陵中，出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人殉墓葬。据考证，这些人被骗到墓穴中，在完成某种仪式后被毒死。就目前所知，这样的人殉方式和规模在西亚历史上尚属绝无仅有。随葬品中金器、银器、宝石应有尽有。它们显示出的高超的金属工艺水平和镶嵌技术，特别引人瞩目，令人叹为观止。

“洪水沉积层”是他的另一个重大发现，这是考古学家第一次在苏美尔遗址中发现洪水层，后来在其他遗址也有类似的沉积层被发现，它们并不属于一个时期，所以，如何解释，仍有争论。这些所谓的“洪水沉积层”大概记录了地区性洪水泛滥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可能在文学作品中这种地区性灾难被渲染为世界性的灾难。吴雷的这一发现引

起轰动，因为当时人们认为他的发现为史密斯发现的“洪水故事”提供了考古证据。除了社会轰动效应外，“洪水沉积层”的发现在西亚史前考古学上也有重大意义：“洪水沉积层”的下面还有居住层，房屋的建筑材料或为土坯或为芦苇，当时的居民使用一种别具风格的彩陶（后来这种彩陶被称为“欧贝德彩陶”），这样，苏美尔地区的史前文化首次通过地层关系再现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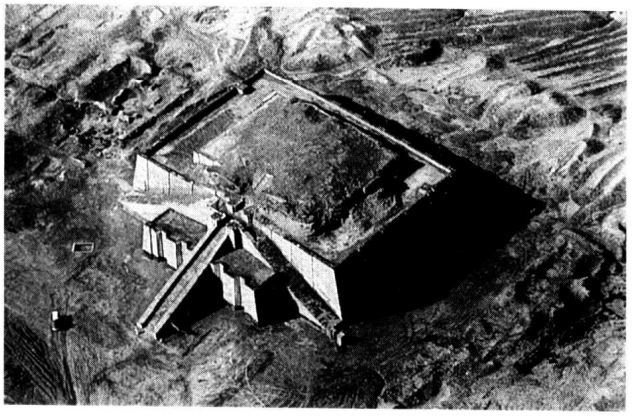


图 128　修复后的乌尔塔庙。最初有三层，如今最底层犹在，第二层已所剩无几（Hrouda 1991，23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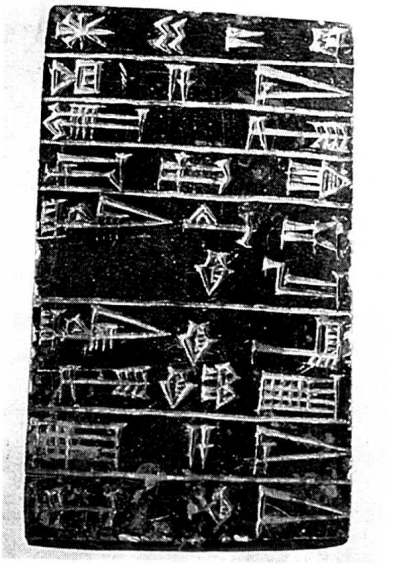


图 129　乌尔出土的刻有楔形文字的石板文书（Hrouda 1991，281 页）

乌尔塔庙（Ziggurat）的发掘是个巨大工程，连续不断地进行了许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清除浮土，阿拉伯人一筐一筐地把浮土装到窄轨翻车上，再运往距塔庙较远的地方。乌尔塔庙是两河流域各时代各地区不可胜数的塔庙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残存部分高出周围地面 16.76 米，皆用烧砖砌筑。发掘之前，伊拉克政府明确规定，发掘者不许移动塔庙的任何一块砖。乌尔塔庙由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建者乌尔纳木建造，后来许多统治者对它进行过修复和改建。哪些属于原建筑？哪些属于后来统治者修复和改建的部分？解答这些问题在当时并非易事，因为发掘者吴雷那时还不能根据建筑材料本身（主要是烧砖本身）的一些特点来断代，当时的断代还完全依赖于文献。经过几年的比较研究他才逐渐掌握不同时期建筑材料（即烧砖）的不同特点，并能够脱离文献而比较正确地鉴别各时期的建筑。

除上述重大发现外，还应特别提到泥板。在发现的泥板中，几乎各时期的作品都有，为再现乌尔乃至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乌尔古朴文献的发现，弥补了楔形文字发展演变史中的一个缺环。

吴雷在乌尔连续发掘了 12 年，始终有妻子的陪伴。每当发现珍贵文物，其最后的

出土清理工作都必由他本人和妻子一同完成。陪同丈夫在一个一眼望去黄灰一片、无山无水、无草无木、无人无烟的异国他乡考古达12年之久，其艰辛和单调是不言而喻的。战胜这些困难需要对事业的热爱、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对舒适生活的自愿放弃。但成功的事业不能长期与舒适的生活背道而驰，即使二者不能永远并驾齐驱。大概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吴雷的妻子在丈夫选择下一次发掘地点时便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首先，它当然要有考古价值；其次，它必须是个绿地，靠山，离海也不远。"[①] 在度过12年的荒漠考古生活后，吴雷的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乌尔发掘结束后，吴雷选择了当时土耳其境内的阿贾纳（Tell Acana，有时亦作 Tell Atchana，现属叙利亚），既满足了妻子的要求，又使得他在考古事业上再度取得成功。

吴雷在发掘乌尔期间和发掘之后，不断以各种方式发表了发掘结果，[②] 除大量发掘报告外，自己编写和与其他人一同编写的著作有《乌尔发掘》第二、四、五和九卷，[③] 自己撰写的专著的数量也相当可观。[④] 可以说，吴雷是个十分成功的田野考古学家、出色的作家、杰出的管理者[⑤] 和优秀的学者。

1927年，在汤普森的主持下，英国恢复对尼尼微的发掘，发掘对象主要是新亚述时期的建筑。在一战期间，尼尼微成了土耳其军队的战略要地，因此有这样一个趣闻：汤普森把发现的一些文物标本送到大英博物馆进行鉴定，其中有一个东西上面贴着一个标签，标签上写着"一种奇怪的矿石"。鉴定报告写道："不是一种奇怪的矿石，而是硝化甘油，仍有爆炸的可能。"[⑥]

1928年英国的加罗（D.A.E.Garrod）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扎尔基（Zarzi），这是首次在伊拉克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她在这里发现了相当于欧洲格拉韦特（Gravettian）文化的原生堆积，因而扎尔基成为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同年，她又对距苏莱曼尼亚(Sulaimaniya)更近的哈扎尔—默尔德(Hazar Merd)洞穴进行了发掘，发现更早的属于莫斯特(Mousterian)类型的燧石工具，其中有典型的单面加工的尖状器和刮削器。此外，她还发现了同时代的兽骨遗存。[⑦] 当她离开伊拉克去巴勒斯坦以后，伊拉克的旧石器时代

---

① Woolley 1955, p.107.

② 如"Excavations at Ur of the Chaldees", The Antiquaries Journal 3（1923年），311页以下；"Excavations at Ur, 1929-1930", The Antiquaries Journal 10（1930年），315页以下。

③ Ur Excavations Ⅱ, London/Philadelphia 1934; Ur Excavations Ⅳ, London/Philadelphia 1955; Ur Excavations Ⅴ, London/Philadelphia 1939; Ur Excavations Ⅸ, London 1962.

④ 如L.Woolley, Spadework, London 1955; History Unearthed, A Survey of Eighteen Archaeological Sites Throught the World, London 1958; A Forgotten Kingdom, London 1953, 1959再版。

⑤ 他雇佣的助手从来没有超过5人，而他通常要指挥200到250人进行发掘。

⑥ Lloyd 1963, p.66.

⑦ Lloyd 1984, p.23; D.A.W.Garrod: "The Caves of Zarzi and Hazar Merd",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Prehistoric Research, no.6 (1930); 第8页：兽骨遗存表。

研究也随之停顿下来，直到1949年美国人才又继续在这里从事旧石器文化研究。

1929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加斯坦开始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这是继一战之前进行的德国—奥地利联合发掘之后的继续发掘。加斯坦把探沟挖到遗址丘的最底层，首次发现前陶新石器居址。

1931年，在乌尔协助吴雷发掘的马洛旺（Max E.L.Mallowan）接替汤普森主持尼尼微发掘。他在新亚述时期遗存的下面挖了一个27米深的探坑，上面的坑围为20×14米，下面的面积逐渐缩小到2平方米，直达生土层。这27米深的探坑中的22米都为史前遗存，即都属于开始使用文字的公元前3千纪后半期之前。马洛旺把史前遗存分为5层，记录时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即把最下面的一层称为第1层（I），因此，1层（I）是最早的文化层，这与通常的记录方式不同。第5层出土的文物（主要是陶片）反映了当时曾繁荣一时的文化，年代相当于两河南部的早王朝时期。其陶器风格（有的只涂饰彩色图纹，有的是雕刻后再涂色）与两河南部发现的彩陶大相径庭。这种后来被考古学家称为“尼尼微Ⅴ”（Ninevite Ⅴ）的彩陶后来在两河北部的其他遗址也有发现，它显然代表了一种文化类型，不过，对于这种传播范围并不算小的文化以及它的准确年代，人们还无法深究。第4层的厚度为5米，说明居住的时间不短，这里出土了乌鲁克彩陶。第3层的厚度为8米，出土的陶片和其他器物也大都属于乌鲁克时期。最下面的两层出土哈拉夫彩陶和萨马拉彩陶，陶片有的是彩陶，有的是刻纹陶，有的是二者的结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考古学家发掘哈苏纳以后，人们才把这最后一种陶器类型确定为哈苏纳陶器。尼尼微出土的哈苏纳陶器在年代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首次确立了哈苏纳陶器的相对年代。

为了纪念为西亚考古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贝尔（G.Bell）女士，1932年1月14日在伦敦成立了“伊拉克英国考古所”，贝尔女士的部分遗产被捐给该考古所。“伊拉克英国考古所”成立后资助了一系列考古发掘，马洛旺主持的阿尔帕吉耶（Tell Arpacije/Arpachiyah，古代名称不详）就是其中之一。阿尔帕吉耶地处尼尼微东北约5公里，在遗址丘的地面上哈拉夫彩陶垂手可得。1931年，马洛旺结束尼尼微的发掘后，就转向了阿尔帕吉耶，目的是要搜集和研究哈拉夫彩陶。哈拉夫彩陶虽然被发现得很早，[①] 但直到30年代人们还只知哈拉夫彩陶是一种陶器风格，至于制造这种陶器的人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等问题，人们一概不知。

阿尔帕吉耶遗址丘不高，占地面积也只有大约2.5公顷。伊拉克英国考古所投入600英镑，预计在3个月内结束全部发掘工作。当时伊拉克劳动力还相当便宜，每人一天1先令就算是高工资了。马洛旺平均每天雇佣150个当地劳动力，结果整个发掘工作

① 在1911～1913年的哈拉夫发掘中冯·奥本海姆就发现了哈拉夫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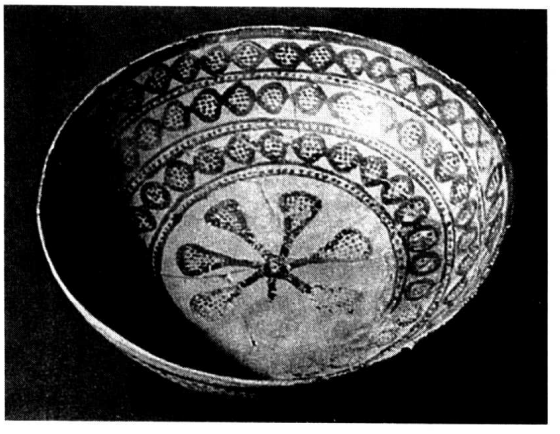


图 130 阿尔帕吉耶 TT7 层出土的哈拉夫彩陶（Oates and Oates 1976，10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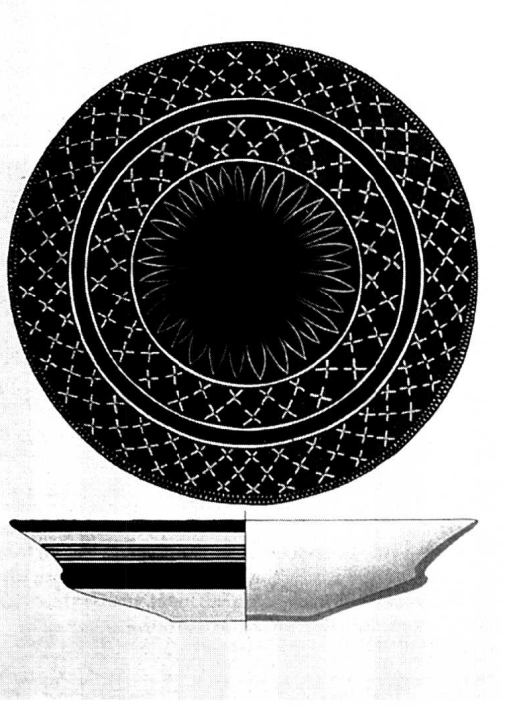


图 131 阿尔帕吉耶 TT6 层出土的哈拉夫彩陶。属于公元前 5 千纪初期，直径 32 厘米（Oates and Oates 1976，5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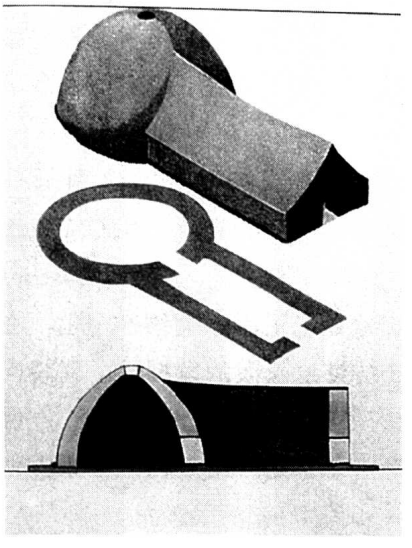


图 132 阿尔帕吉耶 TT7-8 层出土的哈拉夫“蜂窠式”建筑示意图（Oates and Oates 1976，10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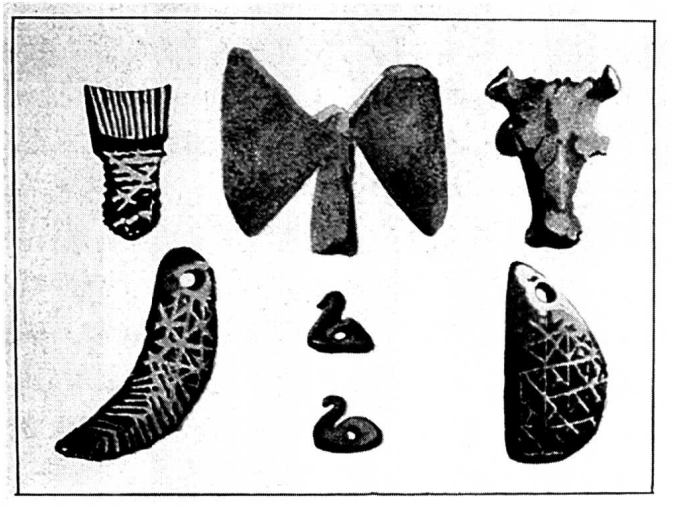


图 133 阿尔帕吉耶出土的护身符 Oates and Oates 1976，108 页

的花销（包括出版费用）也没超过2000英镑。[1]

马洛旺虽然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在这里只发掘了一季（1932～1933年），但却获得大量考古材料，为研究哈拉夫文化的性质提供了大量证据。发掘结果表明，阿尔帕吉耶不是可以代表哈拉夫文化的典型村落，它只是一个“特区”，一个为较大的居住中心（如尼尼微）提供陶器的“特区”，居民大都是陶工。在TT6层的一个制陶工场发现许多史前精美陶器，其中有些色彩多变，图纹复杂，做工精细。这里还出土了一堆红赭石和一些调配颜料的石板。除陶器外，这里的建筑也非常有特点。在最早的TT7～10层发现一系列所谓的“涛夫式”（Tauf）圆形建筑，[2] 最初，地基部分的直径一般不超过4米，后来越变越大，到第7层时直径达到10米，而且开始在圆形居室的基础上延伸出一个长方形的走廊，成为“蜂窠式”（tholoi）建筑。[3] 考古学家发现这种建筑的地基与钥匙眼儿相似，因此，这种建筑又常被称为“钥匙眼儿式建筑”。由于这些建筑的地基——一般用河卵石、砾岩或沙岩等铺成——从来没有遭到破坏，所以，马洛旺认为，这些蜂窠式建筑很可能是神庙，地基没有遭到破坏是由于某种宗教原因。[4] 阿尔帕吉耶的这些蜂窠式建筑也是迄今为止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圆顶式建筑。[5] 马洛旺的发掘是“伊拉克英国考古所”成立后进行的首次发掘，被誉为西亚考古史上“首次为揭示其居民生活方式而对史前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6]

1934年，由于伊拉克颁布了新的文物法，马洛旺便放弃伊拉克境内的阿尔帕吉耶的发掘，把考古战场转移到叙利亚。他们的目的是要发掘一个史前遗址，以便了解这个地区的史前史及其与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关系。在普查了62个遗址之后，马洛旺决定发掘查加尔—巴扎尔（Chagar Bazar），即古代的阿施纳库姆（Ašnakkum）。[7] 该遗址地处北叙利亚的哈布尔河流域，高出周围耕地21米，占地面积达25公顷，虽然不是这一地区的最大遗址，但其高度表明它曾有过悠久的历史。站在遗址的最高处放眼远眺，将近200座古代遗址可以尽收眼底，说明该地区在古代是人口密集的地方。[8]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15个居住层，第1层的年代在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400年

---

① Mallowan 1956, p.1.

② Tauf是阿拉伯语，指用麦秆搅拌的泥砌成的结实的泥墙。

③ “蜂窠式”建筑本来是指公元前16～前12世纪古希腊迈锡尼时代的地下圆顶式石墓。这里借用“蜂窠式”一词并非有借此表示文化渊流关系之意。

④ Mallowan 1956, p.4.

⑤ 同上。

⑥ Oates and Oates 1976, p.106.

⑦ 当时人们曾一度错误地认为，查加尔—巴扎尔是沙姆希—阿达德一世建立的首都舒巴特—恩利尔（Shubat-Enlil）。马洛旺认为其古代名称是Til-ša-annim，意为“其（回答）为‘是’的丘”，见Mallowan 1956，18页及注释1。

⑧ Mallowan 1956, p.12.

图 134 查加尔—巴扎尔遗址（Curtis 1982，79 页）

图 135 查加尔—巴扎尔出土的彩绘母神陶像（Oates and Oates 1976，10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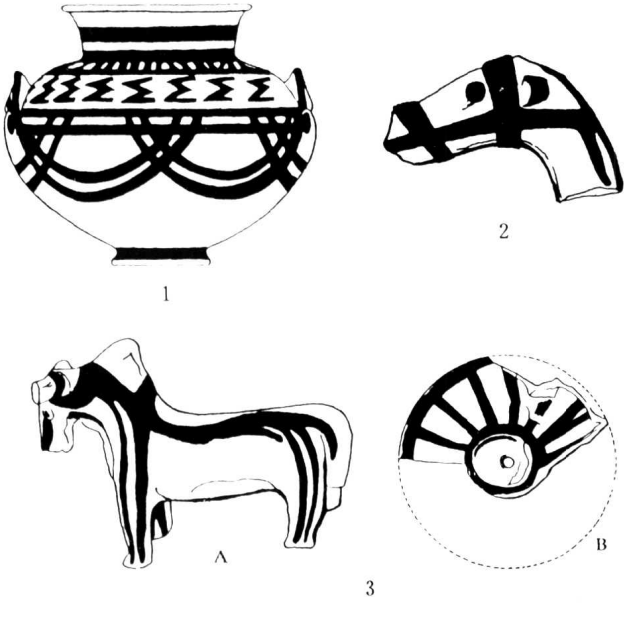


图 136 查加尔—巴扎尔出土的陶制品（Mallowan 1956）
1. 彩陶壶，属“尼尼微V”式，年代为约公元前 3000 年（15 页图 8） 2. “眼镜马”（19 页图 10） 3. 陶制辐轮牛车复原图（19 页图 9）

间，而最早的第 15 层的年代在公元前 5000 年前后，这里出土了哈拉夫和萨马拉彩陶。最早的居住层没有建筑痕迹，说明这时人们可能仍然居住在帐篷里，厚厚的垃圾堆积层又说明这个帐篷居住期至少长达几个世纪。[①] 第 14～11 层的建筑用泥团建造，从第 10 层开始有土坯建筑，第 9 层的建筑呈蜂窠式。第 7 层（约前 3000 年）以后出现一个时间跨度为几百年的缺环。在出土的小件文物中有母神泥塑，其中有些母神塑像塑造的是坐在圆椅上的母神，有人认为它们是被用来帮助妇女分娩的，类似的风

① Mallowan 1956, p.14.

俗《旧约》中也有记载。[1]

这里的第5层（前3000～前2700年）相当于尼尼微Ⅴ，明显地受到亚述文化和埃兰文化的影响。接下来是个繁荣期（约前2700～前2300年），该时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一块非陨石铁，这是最早的冶铁证据之一。[2]在第1层中也出土很多小件文物，其中备受瞩目的是泥板（共70多块）、陶马和陶制辐轮。

1936年，吴雷开始转向现在叙利亚西北部一个靠近地中海的遗址阿贾纳进行发掘。由于吴雷具有多年的考古经验，所以，他从遗址的外形就可以认定阿贾纳曾是这一地区的古代重镇。他相信，伊文斯（A.Evans）发掘的、以克诺索斯（Knossos）王宫遗址为代表的米诺斯文明，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小岛和孤岛文明，它一定受到过西亚大陆文明的影响。他选择阿贾纳遗址进行发掘，目的就是要为他的大陆文明影响论寻找考古证据。同时，他还选择了地处奥龙特斯河口附近的一个小遗址米纳（al-Mina）作为发掘对象。

图137　阿贾纳出土的公元前14世纪的彩陶（Woolley 1955，111页）

发掘工作可分为二战前（1936～1939年）和二战后（1946～1949年）两个阶段。他全面发掘了这个遗址，

① Mallowan 1956，p.14.

② Mallowan 1956，p.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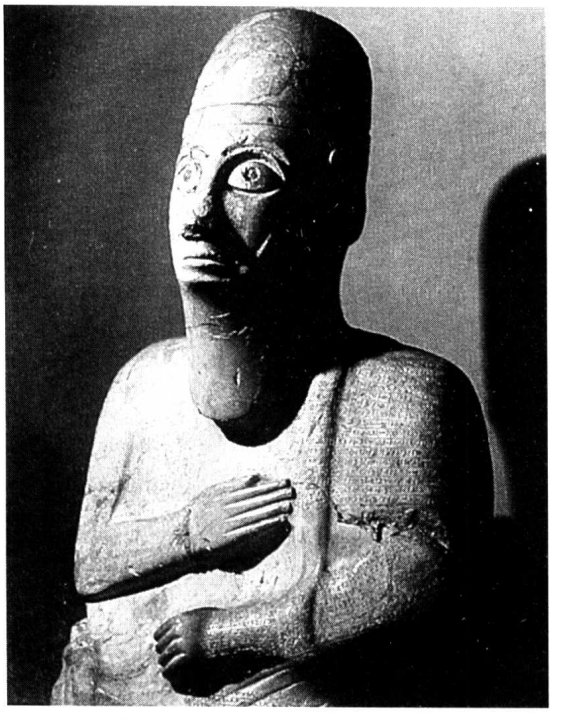


图 138 阿贾纳出土的伊德里米国王雕像。高 1.04 米（Roaf 1998，132 页）

基本弄清了它的历史。发掘结果表明，阿贾纳就是古代的阿拉拉赫（Alalah），曾是穆基什（Mukish）王国的首都。大约从公元前 4000 年的新石器末期开始，这里就有了彩陶，而且明显受到两河流域南部的欧贝德彩陶的影响。阿贾纳是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城邦获取建筑木材的要道，这大概是两地建立联系的主要原因。阿贾纳的建筑风格也完全是从两河流域照搬过来的。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阿贾纳一度臣属于埃及。到了公元前 18 世纪，阿贾纳又成为巴比伦的盟友，这时，在阿贾纳也出现了具有两河流域艺术风格的统治者雕像。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他期望获得的、可以证明克里特文明受到西亚大陆文明影响 的证据：阿贾纳的王宫壁画与后来的克诺索斯王宫壁画如出一辙。公元前 15 世纪的史料更为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阿贾纳国王伊德里米（Idrimi）雕像，雕像的正面刻有自传体楔形文字铭文。阿贾纳大概毁于公元前 1190 年，在此前的一个多世纪里，与爱琴海的迈锡尼文明有密切交往。

图 139 “工头”哈穆迪（Woolley 1955，96 页）

米纳的发掘结果表明，它与希腊的贸易史更是渊远流长，并一直持续到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希波战争期间，雅典仍然向波斯出口工艺产品。[①]

像历次发掘一样，雇佣当地居民从事发掘中的体力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在被雇佣的人中除“工头”外都是新手。哈穆迪（Hamoudi）是吴雷发掘卡赫美什时雇佣的“工头”，由于工作出色，吴雷主持乌尔发掘时仍然把他带在身边，令其指挥民工发掘。现在，吴雷又把他带到地中海沿岸的阿贾纳指挥发掘，而且，还雇佣了他的两个儿子帮助父亲。到开始发掘阿贾纳的 1936 年时，哈穆迪已跟随吴雷 25

① Woolley 1955，p.112.

年之久。“雇个好工头，发掘不犯愁”[①]是吴雷的经验之谈。显然出于这一经验，他一直把这位好工头带在身边。吴雷的成功中显然有他的一份，吴雷夫人后来为哈穆迪制作了青铜塑像，也许就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1937～1938 年，马洛旺又对叙利亚东北部的另一个遗址布拉克（Tell Brak）进行了发掘，发掘工作分 3 次进行，分别在 1937 年春和 1938 年春季和秋季。布拉克是个大遗址，古代名称不详，整个遗址占地 120 公顷，遗址丘高出周围平原 40 米，它曾是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交通要道。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约前 2900～前 2800 年）的布拉克十分兴盛，阿卡德时期以后开始衰落，这大概是其古代名称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马洛旺在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一系列神庙遗址以及数千个用雪花石膏塑造的“眼睛偶像”（Eye-Idols），正是由于这些“眼睛偶像”的出土，这些神庙也常常被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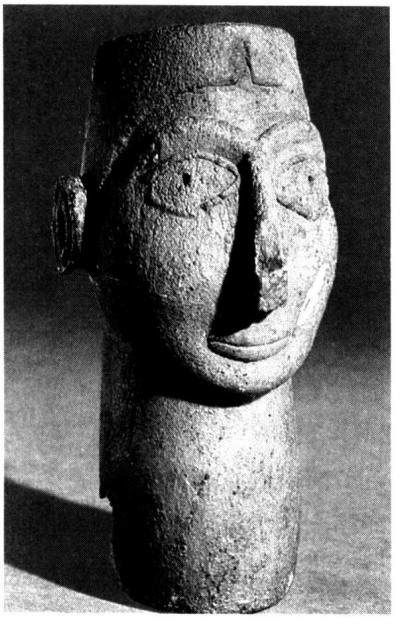


图 140　布拉克“眼庙”下面出土的石雕像。年代约属公元前3100年，高17厘米（Roaf 1998，68页）

图 141　布拉克出土的“大眼偶像”。其中 300 多个保存完好，它们的高度在 2～11 厘米之间，有的是石像，有的为陶像（Roaf 1998，6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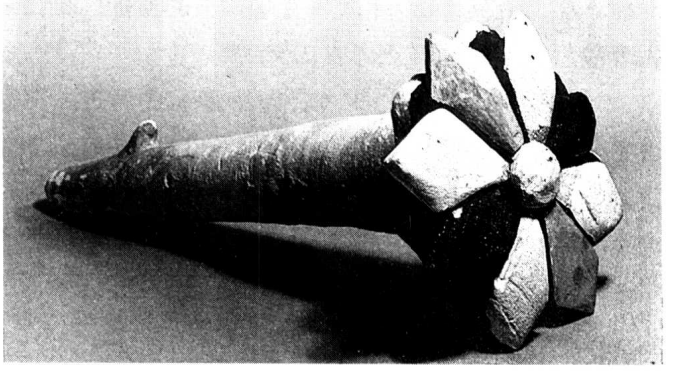


图 142　用于装饰布拉克“眼庙”的镶嵌销钉。反映了乌鲁克文化的北传（Oates and Oates 1976，116 页）

① “Foremen make or mar a dig”，Woolley 1955，p.113.

古学家称为“眼庙”（Eye-Temples）。目前，关于这些“眼睛偶像”的功能学界还没有定论。出土的文物还有项链、念珠和印章等。在更早的乌鲁克文化层中出土“磨光的红陶”，再次证明了早在公元前4千纪时苏美尔文化就已传播到了两河北部的大部地区。[①]在阿卡德文化层，考古学家发现了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宫殿遗存，证明阿卡德时期布拉克曾是阿卡德王朝的一个行省。无论哪个时期的建筑，其风格都与两河南部苏美尔人的建筑风格如出一辙。

1938年11月，在结束了布拉克的发掘后，马洛旺又继续西移，在六周时间内对叙利亚北部其他一些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中包括阿斯瓦德（Tell Aswad）和吉德尔（Tell Jidle）等。[②]

在马洛旺发掘查加尔—巴扎尔和布拉克的同时，加斯坦开始发掘土耳其境内的余米克（Tepe Yümük）。他一共发掘了四季，其中两季是在二战期间进行的。这里的史前文化遗存的序列也比较清楚，新石器文化层至少有10米厚，接下来是铜石并用文化层。[③]

第二节 德国

一战之前是德国西亚考古史上的黄金时代。1914年战争的硝烟骤起，灾难降临于世，考古学也在劫难逃，德国西亚考古的黄金时代遂随着战争的硝烟而永远结束。战争过后，当战胜国英法各国的考古学家迫不及待地重操旧业时，德国的考古学家还只能袖手旁观。直到1927年，德国的考古学家才又开始走出国门，重新参与西亚考古。1927年他们首先恢复了对叙利亚境内的哈拉夫（古扎纳）的发掘，次年，恢复对乌鲁克的发掘，1931年恢复对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的发掘，算是迎来了德国西亚考古史上的第二个春天，但今非昔比，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由冯·奥本海姆主持的哈拉夫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11年。一战结束后，德国考古界一蹶不振。直到1927年才恢复哈拉夫的发掘，仍由冯·奥本海姆主持，这标志着德国考古界战后重新参与西亚考古。

被认为是“当年大事”[④]（1928年）的考古发掘是德国东方学会在乌鲁克进行的考古发掘。该学会在那里的首次发掘是在1912年，由约尔丹等人主持。战后的重新发掘由安德烈一手策划，但他从未亲自到前线指挥，在前线主持发掘的先后是约尔丹、牛尔德克和海因里希（E.Heinrich）。这些人继承和发扬了安德烈和科尔德威创造的科学考

① Oates and Oates 1976, p.54.

② Mallowan 1956, pp.39－44.

③ 关于英美联合发掘基什和捷姆迭特—那色的情况，在以下的美国一节里有较详细的叙述。

④ Oates and Oates 1976, p.52.

古方法，非常注重发掘建筑，并注意研究地层关系。这里的考古文化层从欧贝德时期开始，一直到帕提亚时期，中间无缺环，使人们第一次从地层中看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史发展的全部过程。自1928年到1939年二战爆发，他们共发掘了11季。有人认为，他们的方法无可挑剔，如果一定要指出不足的话，那就是他们没有及时发表发掘结果。[①]

乌鲁克的发掘再现了苏美尔的早期历史，不仅如此，通过乌鲁克发掘确立了陶器发展的序列。按年代的早晚顺序排列是：欧贝德彩陶（1930～1931 年发现）——轮制的乌鲁克彩陶——捷姆迭特—那色彩陶（Eanna Ⅲ）。在 1931 年的莱顿国际亚述学会议上，根据陶器风格和年代引申出来的“欧贝德文化”、“乌鲁克文化”、“捷姆迭特—那色文化”这些名称被普遍接受，且沿用至今。

第三节　法国

法国的“史前考古”可以追溯到德·摩尔根的发掘活动。他于 1891 年考察了地处伊朗西南部库泽斯坦省、曾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苏萨遗址，在遗址丘的地表搜集到彩陶碎片和燧石工具，于是，他认为该遗址的居住年代要远远早于阿黑门尼德时期。他的发现至少带来三个结果：一是法国组建了到那时和迄今为止欧洲最大的一支考察队——“法国波斯考察队”（Délégation Française en Perse），二是引起法国学界对史前史的兴趣，三是法国政府出钱资助波斯地区的考古。[②]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波斯考察队”在苏萨发现的陶器一直被认为是最早的陶器，其他地区的陶器几乎都被解释为受“伊朗影响”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于是，法国考古学家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古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20 年，在康特诺（G.Contenau）的主持下，法国考古学家开始对西顿（Sidon）进行发掘；1921 年，在拉薛（D.Le Lasseur）的主持下开始对推罗（Tyre）进行发掘；1922 年，在蒙特（P.Montet）的主持下对毕布勒（Byblos）进行发掘。这些考古发掘的目的都是为了深入了解公元前 1000 年前后的腓尼基世界的历史，或解决雷南没有解决的问题。[③]这里的古代文化对《圣经》世界和西方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在推罗，考古学家仅仅发现了罗马时期的墓葬，发掘的结果令人十分失望。在西顿，除发现一些波斯后期和希腊化时代的墓葬外，仅发现腓尼基后期的一座神庙。只有

---

① Oates and Oates 1976, p.52.

② Oates and Oates 1976, pp.36－37.

③ 1860 年，法国组织了以著名历史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雷南为首的“腓尼基考察队”，本想像当年的拿破仑一世的埃及考古队一样流芳千古，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在毕布勒，发掘结果才比较令人满意，重大的发现有属于公元前10世纪的腓尼基石棺和表明与埃及古王国有密切联系的大量证据。就发掘的方法而言，法国考古学家的发掘远远称不上科学发掘，他们既没有做地面调查，也没有绘制显示不同地区生态特点的考古地图，选择发掘地点时也主要是依据偶然的发现或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假说。[①]

图143 蒂尔—巴尔希普出土的壁画：猎狮。从主题到造型都深受亚述石板浮雕艺术的影响（Roaf 1998，154页）

除对地中海沿岸的一些遗址进行发掘外，法国考古学家还对叙利亚内地的一些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中包括1921年开始的、由佩扎尔（M.Pézard）主持的对内比—门德（Tell Nebi Mend）的发掘，结果证明该遗址就是古代的卡叠什（Qadesh）；还包括1926年开始的、由梅斯尼尔·杜·比松（R.du Mesnil du Buisson）主持的米施利夫（Mishrife）发掘，结果证明该遗址就是古代的卡特纳（Qatna）。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可是发掘者没有对它们进行彻底发掘。

1928年由惕罗·当让（F.Thureau-Dangin）主持的阿尔斯兰—塔什（Arslan Tash）的发掘是一战后法国考古史上的一次硕果累累的发掘。阿尔斯兰—塔什遗址地处土耳其东南部，古代称为哈达图（Hadatu）。发掘工作在一年内进行了两季，出土大量雕塑和象牙装饰品，皆属新亚述时期，即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统治时期。这种大概在腓尼基生产制作的象牙装饰品可能在发掘过程中被盗，许多年后，它们被转卖到文物市场，被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博物馆收购。

紧接着，惕罗·当让又对叙利亚境内的阿赫马尔（Tell Ahmar）遗址进行了发掘，这里是古代的蒂尔—巴尔希普（Til Barsip），曾是阿拉美亚人建立的王国比特—阿迪尼（Bit Adini）的首都，后来被亚述帝国吞并。惕罗·当让发现早于亚述统治时期的新赫梯时期的雕塑及新亚述时期壁画。阿尔斯兰—塔什和阿赫马尔的发掘以大量证据表明，亚述艺术在深受赫梯文化影响的叙利亚西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地区也得到广泛传播。

① Matthiae 1980，p.22.

1923～1924年间，法国考古学家的老根据地吉尔苏多次被盗掘，据说，盗掘者盗走很多文物，证明这里仍有很大的发掘潜力。1928年，法国考古学家在忙完地中海沿岸一些遗址的发掘后，又重返老根据地。发掘工作先由德·热努亚克（H.de Genouillac）主持。1931年，帕罗（A.Parrot）接替德·热努亚克，主持这里的发掘。考古学家们重点发掘了大型建筑遗址。在发掘了20次之后，法国考古学家于1933年最后彻底放弃这个遗址。

图144　吉尔苏发掘现场（Parrot 1955，图版13）

图145　吉尔苏发掘现场（Parrot 1955，图版17）

在惕罗·当让的建议下，帕罗把全部人马转移到拉尔萨。拉尔萨是个低平的遗址丘，位于乌鲁克东南。从1931年开始就有法国考古学家在此发掘，阿拉伯人亦在此进行疯狂盗掘，法国考古队无力驱逐，请英国皇家空军出动后，才赶走了盗掘者。1933年，帕罗带着发掘吉尔苏的考古人员来到这里，草草挖了几个探坑后，就由于伊拉克的考古政策有变而结束了发掘，把人马转移到叙利亚，开始了幸运的马里发掘。

1929年，在谢费尔（F.A.Schaeffer）的主持下，法国考古学家开始对乌伽里特（Ugarit）进行发掘。乌伽里特遗址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被称为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的遗址丘，一部分是被称为米内特—贝达（Minet al-Beidha）的海港。乌伽里特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居住，公元前1200年前后，在“海上民族入侵”中被毁灭。公元前2千纪中期，这里是赫梯王国和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的必争之地。乌伽里特在两强的

图 146 乌伽里特出土的、饰有浮雕人面像的釉陶瓶，属于公元前 14～前 13 世纪，高 16 厘米（Roaf 1998，147 页）

图 147 乌伽里特出土的青铜像，面部和头部镀金，高 17.9 厘米（Roaf 1998，147 页）

争夺中总是倾向于较强的一方，从中获得了经济实惠（控制塞普路斯的贸易）。从至今仍保存良好的用坚石建筑的许多宫殿和神庙中，我们对当年繁荣兴盛可略见一斑。谢费尔在第一季发掘中就发掘出一个王宫档案室，其中珍藏的最早的楔形字母文字泥板属公元前 14 到公元前 13 世纪，这种楔形字母文字在当时尚无人能解读。后来人们知道，它书写的是迦南语，内容是迦南神话和史诗。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迦南神话学和迦南诗歌学。在后来的发掘中相继发现大量泥板文献，其中有用乌伽里特语书写的管理文献、文学作品和词汇表，有用中巴比伦语书写的管理文献和政治文献，还有用赫梯语和胡里特语书写的各种文献。1939 年二战的爆发中断了乌伽里特的考古发掘，但战后又马上恢复了发掘，仍由谢费尔主持。直到1975年才由马戈龙(J.C.Margueron)接替谢费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考古界在马里交上好运。马里（Mari）即今之哈里里(Tell Hariri)，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交界处，靠近幼发拉底河，属叙利亚。1933 年，几个当地阿拉伯人在此挖掘墓穴，结果挖掘出一座雕像。法国考古机构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决定对这个遗址进行发掘。这时，伊拉克政府已颁布新的考古法，规定出土的“孤品”文物一律归伊拉克所有，其他文物伊拉克与考古队平分。这样，在伊拉克进行考古发掘已经没有特别诱人的物质利益，至少物质收获对考古队来说已经微乎其微。于是，法国停止了伊拉克境内的拉尔萨的发掘，把主持拉尔萨发掘的帕罗调到了叙利亚，开始了本世纪最幸运和最重大的发掘。第一季发掘尚未结束就由出土的文献材料证明了该遗址的重要：这里是古巴伦时期的文献中、特别是《汉穆拉比法典》的前言中提到的、地处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古代强国马里。被汉穆拉比打败了的马里虽然与两河流域文明中心地区相距稍远了一些，但从文献上推断，它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组成部分，现在这一点又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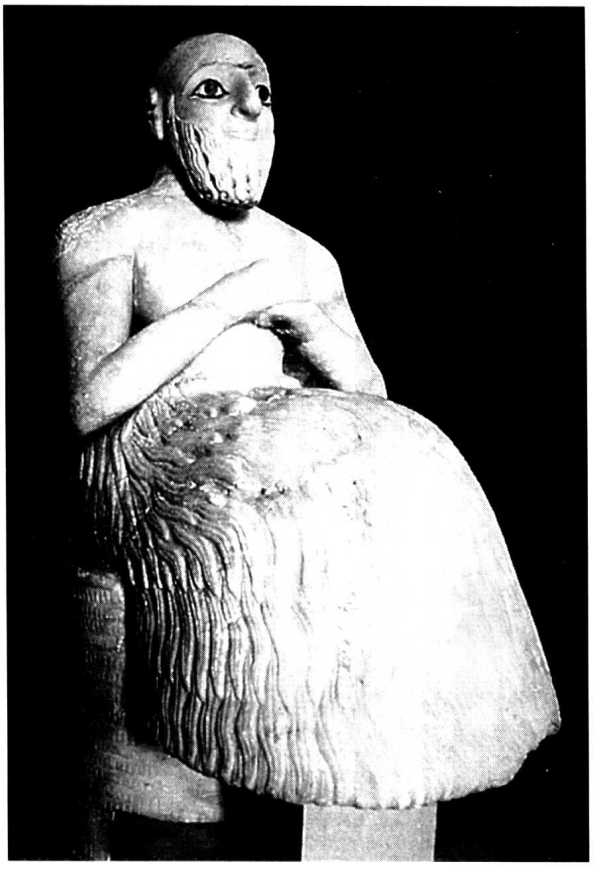


图 148　马里出土的石雕像：神庙管理员埃比赫—伊尔。年代约在公元前 2400 年，高 52.5 厘米（Roaf 1998，90 页）

图 149　马里出土的女神石雕像。高 1.4 米（Roaf 1998，119 页）

图 150　马里出土的石膏头像：戴马球帽的妇女。高 15 厘米（Roaf 1998，91 页）

148 | 149
150

图 151 马里出土的壁画。古巴比伦时期，宽 1.35 米（Roaf 1998，1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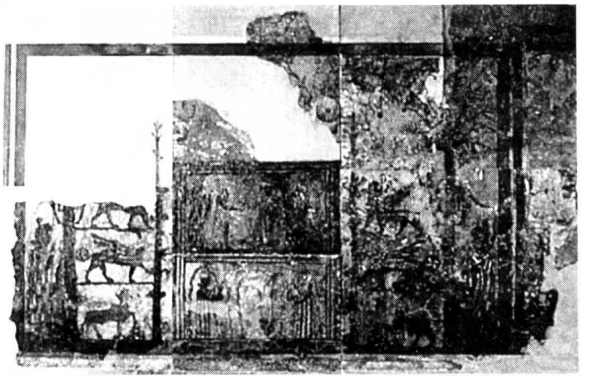


图 152 马里出土的壁画。古巴比伦时期，高 1.75、宽 2.5 米（Hrouda 1991，341 页）

图 153 马里伊什塔神庙出土的石雕像。古巴比伦时期（Parrot 1955，图版 12）

马里曾是控制幼发拉底河上游陆路与河上贸易的重地，坐落在幼发拉底河西岸，始建于公元前 3000 年初期。早王朝时期它就成为参与争夺地区霸权的城邦之一，因此也被收入《苏美尔王表》，统治者是阿摩利特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它也是强者必争之地。公元前 19 世纪，亚述国王沙姆希·阿达德（Šhamši-Adad）驱逐了马里的阿摩利特统治者，把幼子雅斯马赫·阿杜（Jasmah-Addu）立为马里王。沙姆希·阿达德死后（前 1780 年），马里最后一个阿摩利特统治者的儿子奇姆里利姆（Zimri-Lim）又从亚述人手中夺回统治权。马里出土的“马里王室档案室”就是奇姆里利姆统治时期在旧宫殿的基础上建造的。奇姆里利姆统治了 20 年左右，最后被当年的盟友汉穆拉比打败。公元前 1757 年，汉穆拉比彻底摧毁了马里，从此，马里被放弃，再无人居住，只在中亚述时期曾一度成为墓地。

我们之所以能清楚地了解汉穆拉比建立帝国前这段动荡的历史，这要感谢“马里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的出土。这个王室档案贮藏了数以万计的楔形文字泥板。其中大部分是行政管理文献和书信，也有文学作品，还有几块胡里特语泥板。这些王室档案自 1946 年开始在《马里王室档案》丛书系列里与读者见面。除泥板外，宫殿遗址中还出土

了大量其他文物，其中著名的有伊施图普—伊鲁姆（Ištup—ilum）黑石雕、手捧水瓶的女神和壁画等。

第四节　美国

1921年，牛津大学教授兰格顿（S.Langdon）从伦敦来到芝加哥，向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馆长劳夫尔（B.Laufer）提出了联合发掘瓦尔卡（乌鲁克）的建议。1921～1922年，英国的威尔德—布隆德尔（Weld-Blundel）在考察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些古代遗址后，建议发掘基什，这个建议被采纳。于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和美国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于1923年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基什进行发掘，英国方面的资金主要由威尔德—布隆德尔筹集。考古工作由兰格顿总负责，曾在皮特里门下受过训练的英国考古学家麦凯（E.Mackay）被委任为发掘主持人。1922年10月获得发掘执照，1923年3月麦凯就开始了发掘。1926年，麦凯前往印度河流域主持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发掘工作。于是，兰格顿雇佣了曾在苏萨主持过发掘的法国考古学家沃特林（Ch.Watelin）主持基什的发掘，直到1933年整个发掘工作结束为止。

基什的发掘一共进行了11季，[①] 兰格顿只有两季（第二和第四季）亲自到现场参加发掘，他在《泰晤士报》、《每日电讯》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发掘报告大部分都是根据与在前线主持发掘的麦凯和沃特林的通信写成的，因此错误很多。由于兰格顿作为发掘工作的总负责人长期远离发掘现场，而又过早地忙于整理文献，所以，基什的发掘工作暴露出很多问题。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劳埃德是这样评价基什发掘的："……英加拉[②] 的发掘很糟糕，记录也很糟糕，出版同样糟糕。"[③]

1925～1926年，在发掘基什的同时，兰格顿还对地处基什东北约15英里（约24公里）的捷姆迭特—那色（Jemdet Nasr）遗址进行了发掘，兰格顿亲自主持。发现的文物有陶器、泥板（150块古朴泥板）、烧过的谷物、泥斧、泥镰、印章和印迹等，[④] 发掘报告由麦凯发表。[⑤] 大概是由于麦凯没有亲自参加发掘的缘故，他无法在报告中记录

---

① 第一季：1923年3月13日～5月28日；第二季：1923年10月1日～1924年3月20日；第三季：1924年10月8日～1925年3月20日；第四季：1925年12月21日～1926年3月？日；第五季：1926年12月19日～1927年3月20日；第六季：1927年12月1日～1928年3月22日；第七季：1928年11月28日～1929年3月12日；第八季：1929年11月23日～1930年3月18日；第九季：1930年11月15日～1931年3月17日；第十季：1931年11月25日～1932年3月18日；第十一季：1933年1月～3月；见Moorey 1978，14～15页。

② Ingharra是基什的一个城区，古代的Hursagkalamma，见Moorey 1978，15页图。

③ 转引Moorey 1978，14页。

④ Potts 1986，p.17，note 1；p.27.

⑤ E.J.H.Mackay："Report on Excavations at Jemdet Nasr，Iraq"，Anthropology Memoirs I，3，1931 Chicago.

图 154 捷姆迭特—那色出土的陶器（Oates and Oates 1976，46 页）

出土文物的准确出土位置。因此，他的报告一发表就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①] 毫无疑问，捷姆迭特—那色的整个发掘工作，特别是文物登记工作，有很多缺陷，但它的发掘结果对考古分期产生重大影响。[②] 发掘工作结束不久，就有人开始使用“捷姆迭特—那色时期”或“捷姆迭特—那色文化”这样的术语。在 1930 年由史密斯（S.Smith）召集的“巴格达考古发掘主持人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接受了欧贝德——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的考古分期法。[③] 从此，“捷姆迭特—那色”不仅被用来指陶器类型和泥板类型，也被用来指考古地层，甚至考古文化。

1925 年，谢拉（E.Chiera）作为“美国东方研究会伊拉克分会”的会长被派到伊拉克。当年春季他就与伊拉克博物馆一起，联合对基尔库克（Kirkuk）西南约 10 英里(约16公里)的一个小遗址丘进行了发掘。除发现一些器物外，还发现1000多块泥板。研究结果表明，这里曾是一个庄园，泥板是家庭档案，记录了六代人的情况，内容各种各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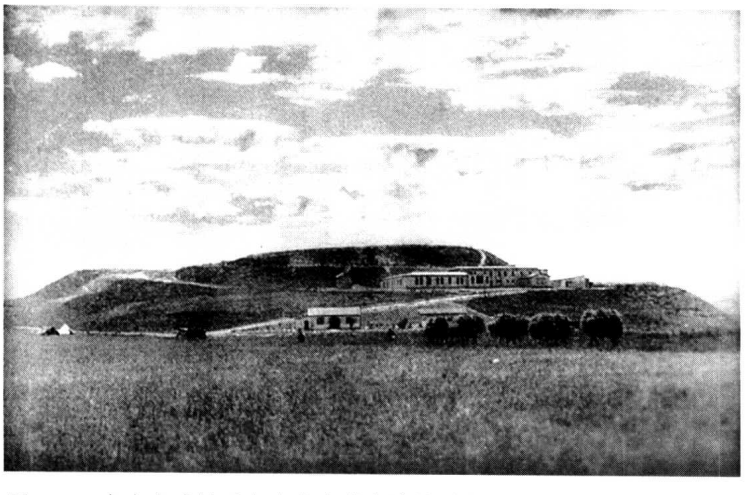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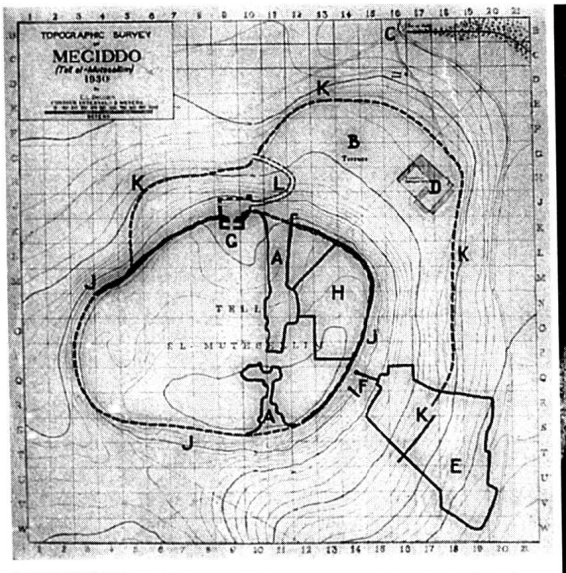
图 155 麦吉多遗址丘与麦吉多考古队临时住所(Breasted 1933，239页)

同年，即 1925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地中海沿岸的麦吉多（Megiddo）开辟考古新战场。麦吉多是古代名称，现在的遗址被称为穆塔萨里姆（Tell al-Mutasallim），地处以色列境内。早在 1902 年，德国东方学会就委托住在海法的德国

① Potts 1986，p.24，notes 35，36.

② 法国考古学家帕罗这样评价说：“the scientifi results were important.” Parrot 1955，p.50.

③ Potts 1986，p.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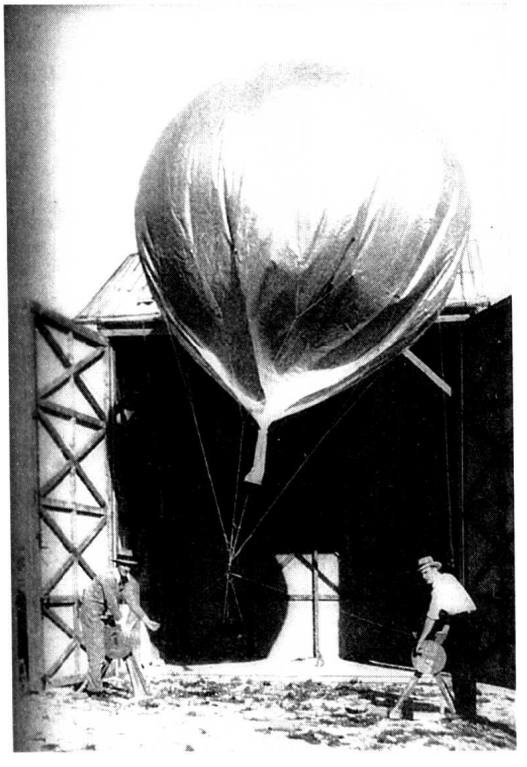


图 156　盖伊于 1930 年绘制的麦吉多遗址示意图（Breasted 1933，242 页）

图 157　通过气球携带的照相机拍摄的麦吉多遗址鸟瞰图（由不同部位的单张照片拼凑而成）（Breasted 1933，254 页）

图 158　携带着照相机的气球（Breasted 1933，252 页）

156 | 157
158

建筑师舒马赫（G. Schumacher）对麦吉多进行了调查。从 1903 至 1905 年，舒马赫受德国东方学会的委托对麦吉多进行了发掘。他挖了一条宽 20～25 米的探沟，从北到南，纵贯整个遗址，最深的地方达 15 米。此外，他还在遗址的其他地方挖了一些探沟。从发掘方法看，他一开始就没有全面和彻底发掘麦吉多的打算。而 20 年后美国人的发掘则不同，他们一开始就计划全面发掘这个特大遗址，发掘经费由（小）洛克菲勒赞助。

头两季发掘由菲舍尔（C.S.Fisher）主持，在考古队的住所没有建筑完毕之前，考古学家们都住在帐篷里。由于虫叮蚊咬，他们几乎都发起疟疾高烧，尤其是曾经长期在巴比伦尼亚进行考察的主持人菲舍尔的病情更加严重。这样，菲舍尔在主持了两季发掘后就不得不放弃职位，接替他的是当时正在巴勒斯坦文物局任局长的盖伊（P.L.O.Guy）。

麦吉多遗址丘占地约6公顷，最高处高出周围地面60米，遗存非常丰富。发现的建筑遗存包括公共设施、城堡、神庙、宫殿、民房和坟墓。器物遗存中主要有象牙制品（共发现382件）和各种陶器。最早的建筑层属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000年）。最值得称道的是盖伊的发掘方法，他把遗址图画在标有罗马数字和拉丁字母的方格图纸上，这样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记录遗址的不同位置。他特别注重地层关系，为每件器物都做了卡片或标签，详细记录其发现位置，包括埋藏的深度和所属地层。他的拍照方式也独具一格：用气球携带照相机的方式对遗址的各个部位进行了空中拍照，然后把各部分连接在一起，拼成一个完整的遗址俯瞰图。他在对遗址丘进行发掘之前，先对将要堆放废土的地方进行发掘，在确认地下无古代建筑和其他古代遗存后，再对遗址丘进行发掘，并用有轨翻车搬运废土。虽然他的方法在大的方面没有超越当时考古学家都采用的一些方法，如绘制地图、详细记录和拍照等，但在许多细节上都进行了创新和改进，为科学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26年，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开始启动“安纳托利亚—赫梯考察”项目，在冯·德·奥斯坦（H.H.von der Osten）的主持下，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工作者对哈里斯河流域的克泽尔—伊尔马克（Kizil Irmak）盆地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几百个古代遗址。1927年，他们选择了其中的较大的遗址阿利撒尔（Alisar Hüyük）进行发掘。阿利撒尔遗址丘因位于现在的阿利撒尔村附近而得名，地处安卡拉东南，距安卡拉约135英里（约217公里），距赫梯帝国的都城哈图沙53英里（约85公里）。阿利撒尔遗址丘很大，长520米，宽350米，堆积的废土大约有75万立方米。[①]

发掘工作一共进行了6季，都是在夏季进行的。由于人力和财力的限制，他们没有像发掘麦吉多那样，采取全面暴露遗址的方法，也没有像以前的许多考古学家那样，采取随意挖探沟或探坑的方法，而是选择遗址丘形状特殊的地方进行发掘。结果表明，这样的地方往往都有建筑遗存。从1928年开始，他们规定了这种探坑的规模，每个都10米见方。为了更全面地揭露建筑，个别地方的发掘范围被一再扩大。

考古学家们非常注重地层关系。在深100英尺（约30米）的一个探坑中，考古学家辨认出各个时代的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到弗里吉亚（Phrygia）时期（约前9世纪），上下5000多年，这是首次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确立考古文化序列。

---

① Breasted 1933, pp.279－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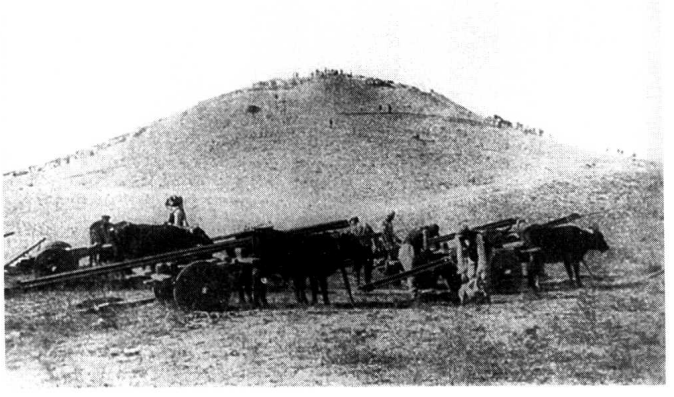


图 159　正被发掘的阿利撒尔遗址。铁轨刚刚运到（Breasted 1933，28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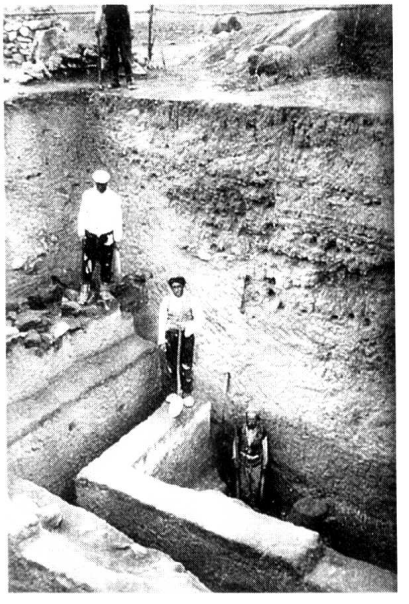


图 160　阿利撒尔 10 米见方的探方(Breasted 1933，286 页)

图 161
全面揭露式发掘阿利撒尔遗址（Breasted 1933，287 页）

发现的实物多达 15000 件，[①] 大都是各种各样的陶器，还有 60 多块泥板。阿利撒尔是继博阿兹柯伊（哈图沙）和屈尔台佩（卡尼什）之后第三个出土楔形文字泥板的安纳托利亚遗址，并且在这个地区是首次在明确的文化层中出土泥板，因此，它们为确定考古文化层又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按内容分类可把阿利撒尔出土的泥板分为两类，一类是书信，一类是商务文献，其中包括许多新的商务名词和原始哈提语人名，具有特殊的

① Breasted 1933，p.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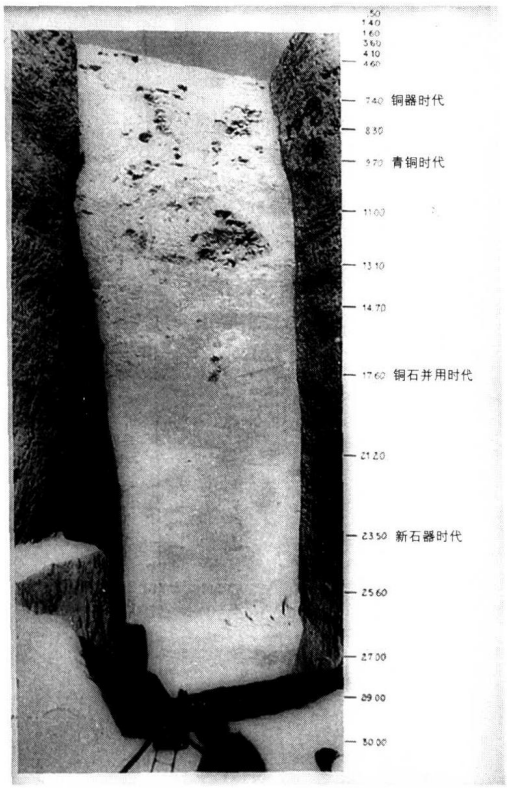


图 163 阿利撒尔发掘现场：重见天日的泥板（Breasted 1933，293 页）

图 162 约 30 米深的探坑，反映了上下 5000 年的文化发展（Breasted 1933，289 页）

图 164 阿利撒尔出土的陶器（Breasted 1933，292 页）

民族学价值。在出土的文字材料中还有刻有象形文字的印章。在阿利撒尔的卫城，考古学家发掘了一系列堡垒建筑遗存，最早的建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最晚的建于公元前600年左右，上下约1900年。在不同文化层中都出土了一些人的尸骨，这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种学材料，其中的一些头盖骨被运到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进行研究。

1927年，美国的一支考古队在施派瑟尔（E.A.Speiser）的主持下开始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Tepe Gaura）遗址，高拉地处尼尼微东北约16公里，已经在扎格罗斯山脉的丘陵地带。1849年，莱亚德曾在这里进行过试掘，只发现一些陶片。我们知道，莱亚德是个专门挖掘大型艺术品的挖宝式考古学家，他对陶片丝毫不感兴趣。再者，那时的陶片也不过是孤立的陶片而已，它们的史料意义还没有被认识。所以，莱亚德很快就放弃了高拉遗址。到了20年代末的1927年，西亚的史前考古学已经初步建立，陶器成为重要的发掘和研究对象。正是那些莱亚德不屑一顾的陶片把美国的考古学家吸引到了这里。美国人雄心勃勃，准备全面发掘遗址丘，逐层揭露，直至生土。结果，这个底部直径为130米的、面积不算很大的圆形遗址丘，并不像美国人想象的那样容易战胜。由于人力物力的不足，实际发掘面积要比原来计划的小得多。尽管如此，这个一直进行到1938年的发掘还是获得很多材料和数据，在西亚史前考古史上竖立了重要里程碑。

高拉遗址丘共有22个文化层，其中20个层次是在遗址丘的中心部分发掘的。所有文化层中，最早的约属公元前5500年，最晚的约属公元前1500年。最早的文化类型属哈拉夫文化，接下来是欧贝德文化，之后是乌鲁克文化，发现的一系列神庙建筑皆属乌鲁克时期，与乌鲁克的建筑风格也十分相似，足以说明两河北部与南部的文化联系。除神庙外还发现一个较大的房屋建筑，周围筑有坚固的围墙，说明这是重要人物——村社首领——的居址，高筑围墙说明危及生命或财产的因素很多，这个房屋之前的建筑就是毁于大火。

1928年，已被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聘为教授的谢拉联合哈佛大学在伊拉克的基尔库克地区进行了发掘，发掘对象是一个被称为约尔干（Jorgan Tepe）的较大的遗址丘。在出土的文物中除大量楔形文字泥板外，还有一幅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泥板上绘制的地图，使这个公元前1500年前后一度由胡里特人居住的城市又活现在人们面前，也使这座古城的名称再现于世：它就是古代的努济（Nuzi）。

在谢拉发掘努济的同时，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又派他到北部的古代遗址豪尔萨巴德发掘。这是古代的杜尔—沙鲁金，是沙鲁金（即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前722～前705年）统治时期建立的新都。早在19世纪40和50年代，法国的博塔和普拉斯就在这里进行过发掘。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布雷斯特德（J.H.Breasted，1865～1935年）视察过这个遗址，认为遗址虽遭到严重破坏，却仍然很有发掘价值，同时听说那里还有浮雕。所以，芝加哥大学这时又迫不及待地派谢拉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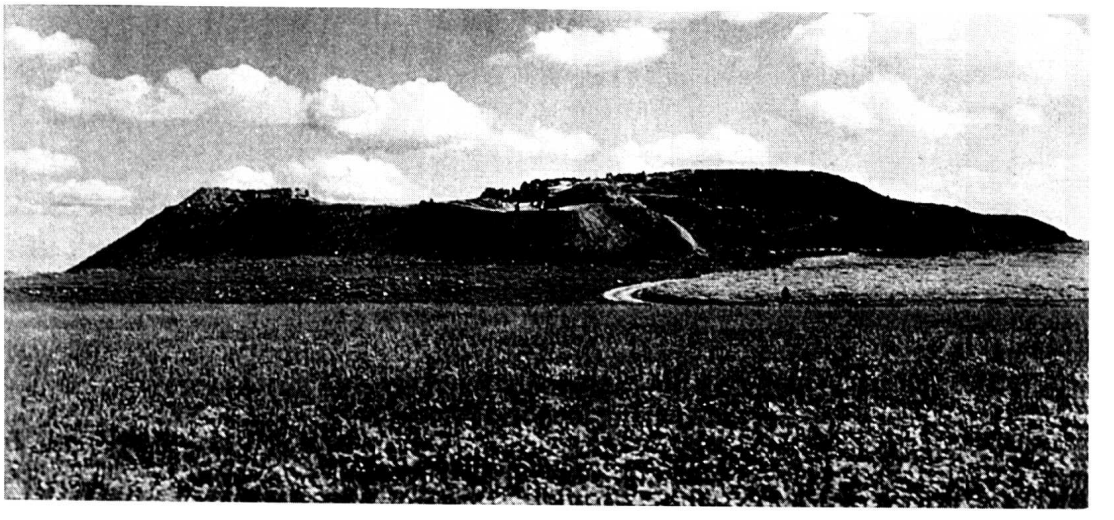


图 165
高拉遗址发掘现场(Oates and Oates 1976,53页)

图 166
高拉的"蜂窠式"建筑,第XVII层,公元前5千纪中期(Oates and Oates 1976,1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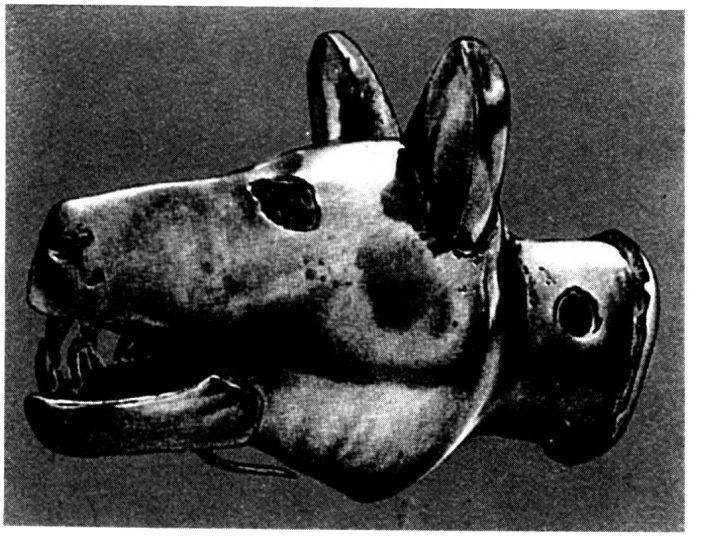


图 167
高拉出土的狼头。天然金银合金,长3厘米,属公元前4000年(Oates and Oates 1976,129页)

去发掘。那时，在主要遗址丘的上面有一个小村子，村民们把遗址变成了采石场：他们把发现的浮雕板打碎，然后烧成石灰，用作建筑材料。谢拉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果然发现了布雷斯特德听说过的那组浮雕。但由于日晒雨淋，再加上人为破坏，浮雕所剩无几。其中一小部分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得到修复。除浮雕外，他还发现一个巨大的人面飞牛雕塑。3000 年前，这个庞然大物守卫在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的宫门旁，现在则成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守护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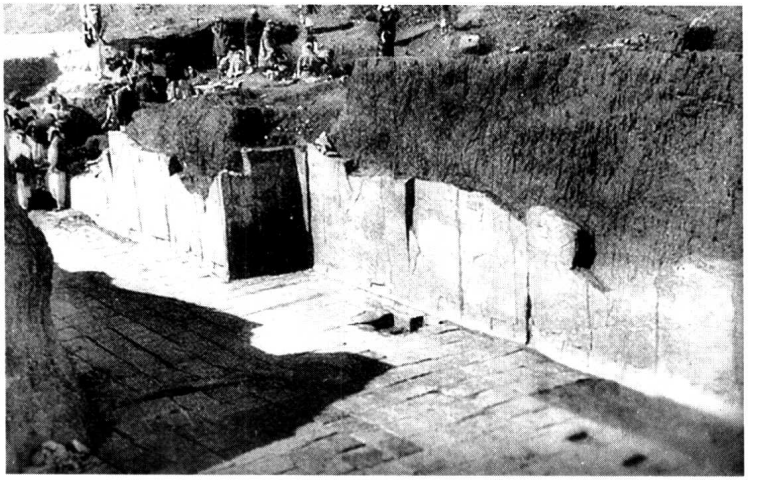


图 168　豪尔萨巴德石板浮雕发掘现场。经受几千年考验的石板浮雕遭到当地人的严重破坏（Breasted 1933，36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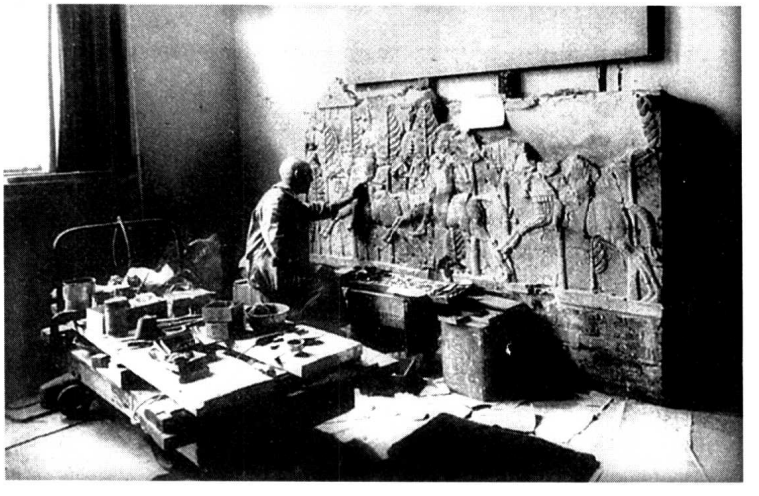


图 169　一部分豪尔萨巴德出土的石板浮雕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得到修复（Breasted 1933，375 页）

1929 年，由于谢拉必须回国主持亚述字典的编撰工作，豪尔萨巴德的发掘工作暂时停止。

同年，在实施“安纳托利亚—赫梯考察”项目的同时，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又启动了伊拉克考古计划。这支考古队由法兰克福率领，从 1929 到 1936 年，对迪亚拉（Diyala）下游地区的一些遗址进行了考察和发掘，收获甚大，成为美国西亚考古史上的一座丰碑。

法兰克福（Henri Frankfort，1897～1954 年）于 1897 年生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曾就读于阿姆斯特丹大学、莱顿大学、伦敦大学并在设在雅典的“大英雅典考古学会”学习。1925 至 1929 年受伦敦“埃及考察协会”的委托率领一支英国考古队到埃及考古。1929 至 1937 年受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之托到伊拉克负责考古发掘。193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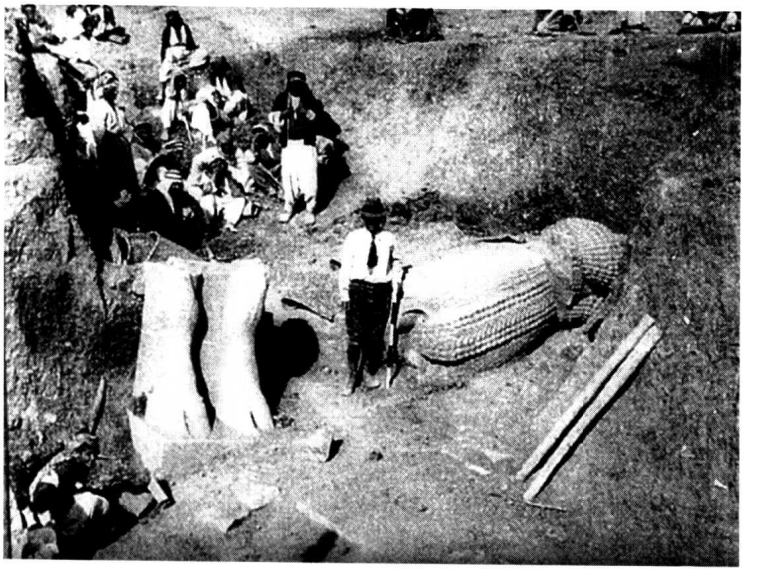


图 170 豪尔萨巴德人面飞牛的发掘现场（Breasted 1933，82 页）

图 171 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的埃及展厅。从后面的人面飞牛开始是亚述展厅（Breasted 1933，116 页）

成为芝加哥大学东方考古学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1949 年起，担任沃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所长和伦敦大学前古典史教授，直至 1954 年去世。

1929 年的一天，洛克菲勒由著名的埃及学家布雷斯特德陪同，来到法兰克福在埃及的阿马尔纳（Tell al-Amarna）考古时居住的帐篷。就是在这个帐篷里，布雷斯特德代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向法兰克福委以伊拉克考古队领队的重任，把法兰克福的考古生涯从埃及转向了两河流域。

为什么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偏偏在这时找到法兰克福并委以重任？这大概与下面几个因素有关。其一，当时欧美的一些考古队蜂拥至伊拉克。据不完全统计，1929 年有 18 个欧美考古队同时在伊拉克的不同遗址发掘。可想而知，有能力者谁不想来“赶时髦”？其二，始于 1922 年的乌尔发掘（英美联合）和始于 1928 年的第二次乌鲁克发掘（德国）把两河流域的历史再次提前。这些新的发掘结果表明，“历史始于苏美尔”。然而，于 1923 年开始的基什发掘使“苏美尔问题”复杂化。这个未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可能对芝加哥大学有一定吸引力。其三，遗址本身对考古工作的“回报”，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虽然博塔和莱亚德那样的“遍地都是宝，只需弯弯腰；要是刨一刨，多得拿不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一战后继续进行的发掘表明，这里仍是考古学家的黄金宝地，回报仍然丰厚。其四，当

时法兰克福虽然刚刚 30 出头，却已是一个既有田野考古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学者。他的两卷本博士论文研究了近东陶器。此时，他正在撰写《考古学与苏美尔问题》，[①] 当时就有人把《考古学与苏美尔问题》戏称为“苏美尔学与法兰克福问题”。[②] 他对苏美尔问题十分感兴趣并对此已颇有研究，所以，选他为芝加哥大学两河流域考古队队长不是没有理由的。

1929 年 12 月 23 日，法兰克福从埃及来到巴格达。这之前，不论是他本人还是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都没有具体的发掘计划。到巴格达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发掘遗址。1930 年，在当时在巴格达担任大英委管政府文物局长的史密斯（S.Smith）的提示下，法兰克福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迪亚拉地区。今日的不毛之地恰是昔日的文明沃土，这从距巴格达较近的海法吉（Khafajeh）遗址来看已确切无疑。当时，海法吉已被疯狂盗掘，后来，英方通过军事行动才制止了盗掘。巴格达文物贩子的摊点充斥着苏美尔雕塑和泥板文书。这样，收购那些被盗的文物就成了法兰克福的当务之急。

参加这支考古队的成员先后有建筑学家劳埃德（S. Lloyd）和卢德（G.Loud）、碑铭学家（即亚述学家）雅各布森、以及参加过谢拉主持的努济发掘的德鲁加斯（P.Delougaz）等 15 人。[③]

1930 年，已经到达伊拉克的考察队成员劳埃德、卢德和雅各布森被派往北部发掘豪尔萨巴德。他们发掘了几天，一无所获。这时，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物馆馆长德鲁加斯加入这支考古队伍，在德鲁加斯的领导下，考古队采取了德国人发明的逐块清理并仔细观察墙砖的发掘方法，这样，他们很快就清理出了一座宫门。[④] 不久，在此练兵的人员除卢德外都被调往南部发掘其他遗址，发掘主持工作交给了卢德。他留在这里继续发掘，直到 1934 年。卢德本来就是从事建筑学研究的，所以，他对包括宫殿、城墙和民房在内的建筑进行了系统发掘，为人们了解新亚述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新材料。

由法兰克福领导的芝加哥大学伊拉克考古队获得 4 个遗址的发掘执照，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阿斯马尔（Tell Asmar），即古代埃什努纳（Eshnunna）。它曾是古代文明的一个中心，今日却成了不毛之地，连饮用的水都没有，地下水也因含盐过多而不能饮用。[⑤] 当地的阿拉伯人称这里是“chol”，即“曾经灌溉过”。[⑥] 法兰克福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饮用水要从外地运来。

---

① H.Frankfort, Archaeology and the Sumerian Problem, Studies in Ancient Oriental Civilization, No.4, Chicago 1932.

② Lloyd 1995, p.2731.

③ Breasted 1933, p.343.

④ Lloyd 1963, p.35.

⑤ Breasted 1933, p.340.

⑥ Lloyd 1995, p.2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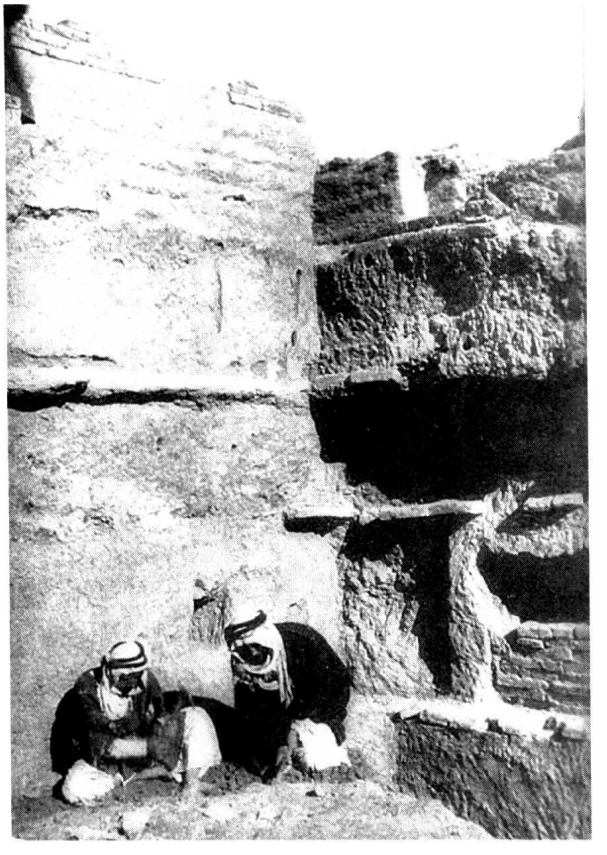


图 172
阿斯马尔遗址的四个文化层（Breasted 1933，347 页）

图 173 阿斯马尔出土的、刻有楔形文字铭文的门柱底座（Breasted 1933，34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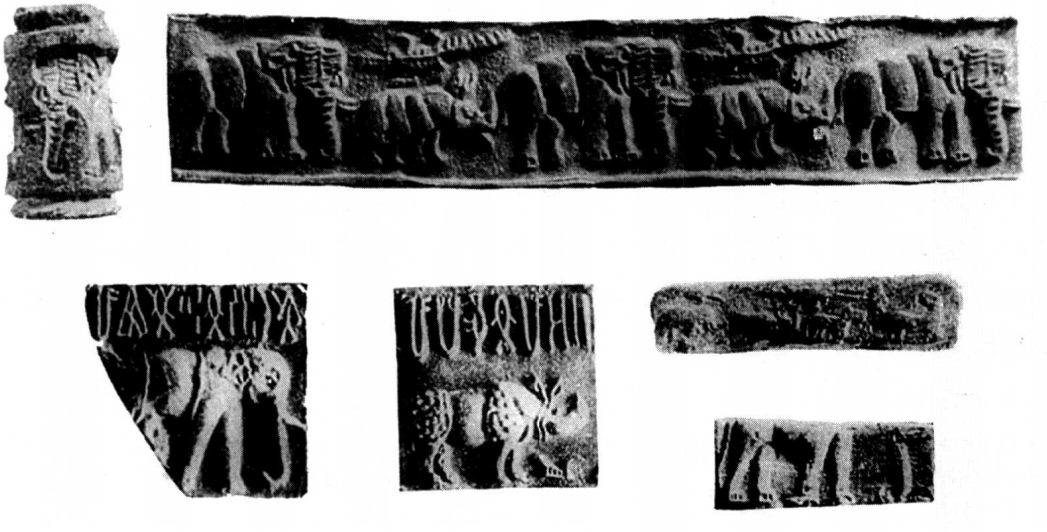


图 174 阿斯马尔出土的滚印及其印迹与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平印（Breasted 1933，353 页）

埃什努纳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北35公里处。由于风蚀的缘故，它没有形成“丘”（Tell），几乎与周围的平原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古代建筑遗址埋在地下，发现的有神庙、宫殿和民居，其建筑层次非常清楚，每个新的建筑层都代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法兰克福根据迪亚拉地区古建筑遗存的相互叠压关系，再佐之以发现的文字材料，把衔接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历史阶段叫做“早王朝时期”（Early Dynastic Period），又根据建筑风格的不同再把“早王朝时期”细分为“早王朝Ⅰ”、“早王朝Ⅱ”和“早王朝Ⅲ”。在1931年的莱顿国际亚述学会议上与会学者肯定了法兰克福的这个考古分期。从此，这一分期开始被大多数学者沿用，直到今日。莱顿会议还确定了早期苏美尔文化的序列：欧贝德（文化/时期）——乌鲁克（文化/时期）——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接下来是“早王朝时期”。

在阿斯马尔遗址北部的一个阿卡德末期（约公元前2200年）的建筑遗址中出土的一个滚印（圆柱印章）颇引人瞩目，发掘者认为，这个滚印是从印度“进口”的，上面的大象图案反映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与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文化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印章还是首次发现。[①]

在阿斯马尔（埃什努纳）的第一季发掘中就出土了1400多块泥板，担任碑铭学家和记录员的雅各布森详细记录了所有泥板的发现地层，这样仔细和系统的记录在西亚发掘史中尚属首次。正是由于注意了地层关系，他才得以正确地重建从乌尔第三王朝到汉穆拉比时代（约前2100～前1750年）的埃什努纳统治者的相对年代。他在做记录的同时，临摹了出土的泥板，准备发表，但上级决定暂不发表任何泥板，等待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后再由谢拉和珀贝尔（A.Poebel）整理发表。这对这位刚刚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的年轻亚述学家是一个沉重打击，他认为谢拉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当时谢拉是接替卢肯贝尔（Daniel D.Luckenbill）[②] 而刚刚上任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亚述学教授。

由于不能发表泥板，法兰克福便派他去主持发掘工作。这时，卢德、德鲁加斯和劳埃德都分别在主持不同遗址的发掘。于是，他也另辟新战场，开始对附近的一个遗址伊施查里（Tell Ischtchali）进行发掘。伊施查里的古代名称是内里布图（Neribtum）。在这里，他发掘了伊辛—拉尔萨（Isin-Larsa）时期的一座献给女神伊南娜—吉蒂图（Inanna Kititum）的神庙。由于神庙的部分建筑与以前出土的神庙建筑有所不同，所以他的发掘引起考古界的普遍关注。到那时为止，德国考古学家们对建筑最有研究，他们把神庙建筑分成南北两种形式，南部神庙的主要内殿为“长房式”，而北部神庙的主要

① Breasted 1933, p.353.

② 1927年由于心脏病突发死于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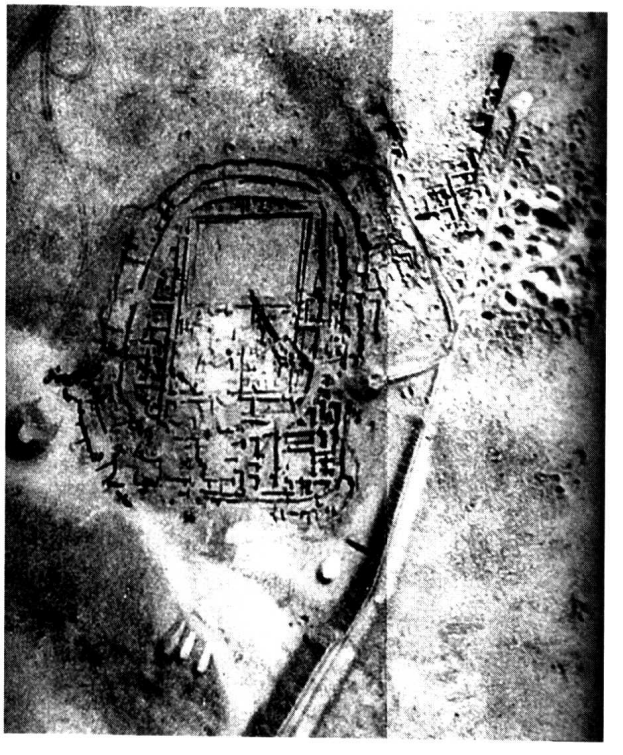


图 175 海法吉遗址：考古学家发掘的“椭圆神庙”和盗掘者乱掘的痕迹（Breasted 1933，354 页）

图 176 海法吉“椭圆神庙”发掘现场（Lloyd 1963，图版 12）

内殿为“宽房式”。此外，不论是南是北，神的居室都在神庙的最高部位。由于建筑越高越容易受到风沙腐蚀的缘故，神的居室无一保存至今。雅各布森发掘的神庙与已知的神庙建筑的特点颇有不同。伊施查里神庙的主要内殿就是神的“接待室”，即公共祈祷室，而神职人员的居室就在主要内殿的后面。伊施查里神庙的发现为人们了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建筑形式的发展提供了特例。

法兰克福考古队发掘的另一个遗址是海法吉，即古代图图布（Tutub）。像阿斯马尔遗址一样，海法吉遗址也是个平地遗址。在美国考古学家发掘之前，海法吉曾被当地阿拉伯人盗掘，很多珍贵文物流失。第一季发掘由（德国的）普鲁塞尔主持，此后由德鲁加斯主持。他们只掘地 1 米就发现了古代建筑。他们采取了“德国方式”（German system），[①] 一块砖一块砖地进行暴露，同时注意每块砖之间的接合关系。不久，一个围有双层围墙的椭圆建筑就再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椭圆神庙”（oval-shaped temenos/Temple Oval）。发掘结果表明，这座神庙始建于早王朝时期，动工之前，人们先在神庙建筑区掘地 4 米，然后在上面填上干净的沙，这在古代西亚的建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据德鲁加斯估计，为了这个目的大约共搬运沙子 64000 立方米，在

① Lloyd 1995，p.2736.

搬运沙子的同时也可能还伴以某种宗教仪式。[①]

海法吉没有出土泥板，却出土大量其他文物，远远超过阿斯马尔，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些青铜塑像，其中一个有半人高，现存伊拉克博物馆。由普罗塞尔发现的三个铜铸人像格外引人注意。三个铸像中两小一大，皆裸体，都站在祭坛（?）上，做祈祷式。三人皆留长须，但发式不尽相同，其中一个（较大者）留长发，两绺卷发从耳前垂下，两个（较小者）头发齐肩。较大的铸像被巴格达博物馆收藏，两个较小的由伊拉克政府奖励给了芝加哥大学。

图 178　分离后的三个铜像（Breasted 1933，358 页）

图 177
海法吉出土的铜像。出土时三个铜像交织在一起（Breasted 1933，357 页）

1935 年，德鲁加斯发现一个用砖石砌成的穹顶墓群，但由于芝加哥大学的迪亚拉地区发掘计划已接近尾声而没有进行发掘。

参加法兰克福领导的迪亚拉考古队的成员之一劳埃德当时就表现出色，后来成了英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西亚考古学家。

劳埃德于 1929 年参加法兰克福领导的埃及阿马尔纳考古发掘，从此开始了他的长

① Lloyd 1995，p.2736；Lloyd 1963，p.39.

达半个世纪的田野考古生涯。1930 年 1 月，他又追随法兰克福来到巴格达。据他自己透露，当时（1929 年 7 月）布雷斯特德陪同洛克菲勒在埃及的阿马尔纳委法兰克福以重任时，法兰克福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让劳埃德同往两河。[①]

图 179 埃及的阿马尔纳发掘现场（Lloyd 1963，图版 8）

那时，劳埃德对伊拉克十分陌生。离开伦敦前他急忙阅读了一些有关伊拉克的资料，算是临阵磨了枪。

到达巴格达后不久，其他两名队员卢德和雅各布森也先后到达。他们正赶上英方在格特鲁德·贝尔博物馆为“格特鲁德·贝尔纪念匾”举行隆重的揭幕式。劳埃德十分激动，在给家人的信里写道：“……最高专员讲话后，国王作了答辞。费萨尔[②] 非常出色，身材高大，举止文雅，汉斯[③] 说‘他像一匹良种马’。他的话温文尔雅而又非常诚恳，翻译成英语就是：‘这座博物馆的建立并不是贝尔小姐惟一的伟大善行。我认为，她主要——我应该说她完全是在为伊拉克民族尽义务’……”。[④]

这时，法兰克福已决定发掘迪亚拉地区的阿斯马尔。发掘之前，法兰克福安排三人到几个正被发掘的遗址参观，其中包括吴雷发掘的“迦勒底的乌尔”、德国人发掘的乌鲁克和法国人发掘的基什。

他们先来到瓦尔卡，即古代的乌鲁克。当时，一支德国考古队正在这里发掘。这是劳埃德第一次在伊拉克旅行，领教了当年长途跋涉的艰难。距瓦尔卡最近的火车站在希德尔（Khidr），距瓦尔卡 19.3 公里。他们到达希德尔时夜幕早已降临。三天来一直在下雨，通往瓦尔卡的小路上泥泞不堪。幸好接站的人给他们也带去马匹，使他们得以免于徒步泥泞之中。经法兰克福建议，他们临行前都在巴格达买了羊皮袄，可是没人告诉他们如何穿。结果他们把毛面穿在外面，经雨一淋就永远成了废料。看到他们这副狼狈

① Lloyd 1995，p.2730.

② 指费萨尔一世（Feisal I），希贾兹的侯塞因的次子，1921 年成为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第一代国王。伊拉克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政治才能。

③ 指法兰克福。

④ Lloyd 1995，p.2732.

相，向来缺乏幽默感的德国人这时也笑了起来。劳埃德一行在这里逗留两天，并没有受到多少礼遇，这大概与这时德国经济不景气、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有关。不过，当他们离开这里时，德国考古队的全体成员早晨四点就都起来为他们送行。

乌尔考古队的接待更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吃午饭时，劳埃德一行站在椅子背后，等吴雷夫人坐下后才就座。饭桌上谈的都是巴格达政界的名人佚事，对这几位客人来说仿佛是天方夜谭。吃完饭，吴雷就离开客人，吩咐一名考古队成员带他们到发掘现场参观。当时，王陵的发掘已经结束。劳埃德看后感慨不已：相比之下，阿马尔纳的发掘简直是儿戏。[①]

接着他们又北上，来到法国人发掘的基什。法国人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洗尘午餐。队长沃特林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劳埃德在此结识莱特林格（Gerald Reitlinger），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以致劳埃德连自己的使命都抛在了脑后。

在法兰克福发掘迪亚拉地区遗址的计划得以实施之前，也就是在迪亚拉考古队住所盖起来以前，劳埃德等人被派往两河流域的北部去发掘豪尔萨巴德，这是劳埃德首次在西亚进行发掘。冬季来临后，常常由于降雨而不能进行发掘。于是，他们便利用时机向雅各布森学习苏美尔语。[②]

迪亚拉考古队住所盖起来以后，考古队成员回到迪亚拉地区。法兰克福给劳埃德分派的第一项发掘任务是让他发掘一组古巴比伦时期的建筑。当时，劳埃德还不是成熟的考古学家，所以，他把自己视为“学徒”，“师傅”都是曾经参加过安德烈主持的亚述发掘的“亚述发掘专家”。不过，发掘方法主要还是根据经验而不是理论。劳埃德的“学徒”期以发现举世闻名的21个苏美尔人塑像而圆满告终，这是到那时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苏美尔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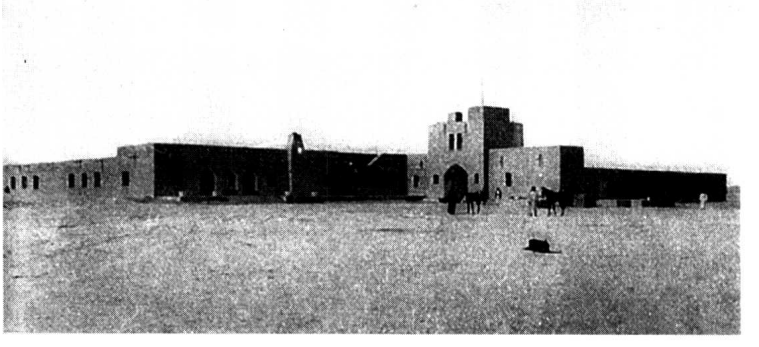


图180　建在阿斯马尔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伊拉克考古队”临时住所（Breasted 1933，343页）

1933年，劳埃德和雅各布森暂时放下对迪亚拉地区苏美尔遗址的发掘，来到摩苏

① Lloyd 1995，p.2732.

② Lloyd 1995，p.2734. 雅各布森于1904年出生在丹麦，192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亚述学博士学位，此时正是他获得学位的第二年。后来他曾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任教授和所长，1962年至1974年退休为止任哈佛大学近东语言文学系教授，1993年去世，是公认的苏美尔学大师之一。

尔北部的杰尔宛（Jerwan）进行发掘。几年前，他们发掘豪尔萨巴德时就发现此处多有砖石建筑，并发现当地“村长”的门前立了一块巨石，上面刻有亚述铭文。雅各布森当场就解读了铭文的大意，其中有“我架了一座桥，……我让它在上面通过”等。当时，他们已据此把这里的砖石建筑确定为新亚述时期的建筑遗址。他们雇佣了 80 名当地库尔德人，发掘了一个月，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猜测：这里的砖石建筑正是在古代就闻名于世的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建造的高架渠。这座高架渠横跨在一条被称为高莫尔苏（Gomel Su）的河流上，长 280 米，宽 22 米，足见新亚述时期的建筑水平之高。发掘者认为，建造高架渠、拦水坝和输水渠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尼尼微的用水需求。

1935 年，阿斯马尔（埃什努纳）的发掘接近尾声，劳埃德急于寻找新的发掘地点。几年来，他常常站在阿斯马尔的考古队住所（excavation house）[1] 的上面，眺望远处的一座遗址丘，它若隐若现，有时还会变成海市蜃楼。那就是位于阿斯马尔东南约 20 公里的古代遗址阿吉拉布（Tell Agrab）。劳埃德对它早有好奇之心，当面临选择新的考古遗址之际，他便利用一个周日，骑马来到久仰的遗址前。果然不出所料，仅从遗址表面的遗物——残垣、陶片、骨头……就可以看出，这里曾是一座发达的古代城市。几天后，他带领一位最得力的助手到此试掘，发现大型建筑残迹和石板浮雕，上面的人物形象和阿斯马尔出土的苏美尔人塑像相似，这里显然曾是一座苏美尔城市。法兰克福立即与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几周之后，申请到发掘执照。于是，劳埃德于 1936 年 1 月正式开始发掘阿吉拉布。

他雇佣了 100 名劳工。[2] 由于最初没有在这里进行长期发掘的打算，只是计划发掘两个月，所以，只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小的考古住所，把“沙尔喀提专家”（曾参加过亚述发掘的当地阿拉伯人）安顿在这里，劳埃德本人则每天驱车往返于阿斯马尔与阿吉拉布之间，其余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劳工都从最近的村子雇佣。

他们的发掘主要在沙拉神庙（Shara Temple）进行。发掘结果表明，沙拉神庙的建筑面积为 54 平方米。在面积为 20 平方米的主要祈祷室的两边，排列着两排放置祭献品的基座，基座的下面堆放着祭献品，数量多得不可胜数。其中多为念珠、各种动物形状的护身符和石头制成的权标头，还出土了大量的刻有各种生活图案的石碗碎片和较小的人物塑像。该神庙建于早王朝早期（约前 2800 年），奉献物也大都属于这个时期。在所有奉献物中，最重要的是一个采用失蜡浇铸技术制作的四马双轮战车模型，出土时被泥土包裹着，只有一个橘子大小。这一发现为我们了解古代两河流域车式的发展揭开了新

① 德国人把它戏称为“考古队的宫殿”。Lloyd 1995，p.2735.

② 此处根据 Lloyd 1995，2737 页，但 Lloyd 1963，46 页：“我用了 50 名阿拉伯民工，其中 20 名是不可多得的沙尔喀提专家”（即参加过德国人主持的亚述发掘的阿拉伯人），两处似乎有矛盾。

的一页。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阿吉拉布出土文物的总量（用包装箱衡量）就超过了阿斯马尔六年来出土文物的总量。

发掘结果表明，这里还有很大发掘潜力。经过法兰克福的努力，芝加哥大学决定继续在此发掘，遂于1936年在这里用土坯盖了一个考古队住所。劳埃德从现代欧洲回到古城废墟后，继续进行发掘。几个月后，发掘宣告完毕，古城废墟再次被放弃。

至此，法兰克福考古生涯中的辉煌时代结束了，但对劳埃德来说，这仅仅是他漫长而成功的考古生涯的序幕。出色完成芝加哥大学的考古使命后，他又来到土耳其参与发掘。1939年，他作为伊拉克文物局技术顾问又回到伊拉克，帮助伊拉克考古学家进行考古发掘，为伊拉克的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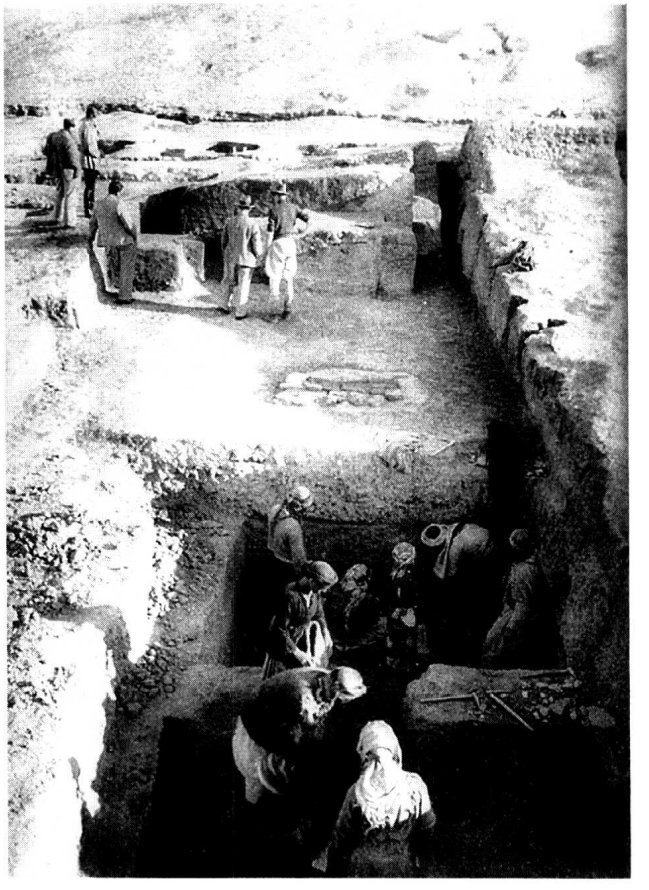


图181　阿吉拉布沙拉神庙发掘现场（Lloyd 1963，图版6）

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参与西亚考古是考古史上的大事，这是最有实力的一支考古大军。[①] 他们选择了四个重要遗址：埃及的卢克索（Luxor）、巴勒斯坦的麦吉多、亚述的豪尔萨巴德和伊朗的波斯波利斯。相比之下，英国的劳埃德深感欧洲考古队的寒酸，同时也非常羡慕美国考古队的富有。[②] 卢克索的“芝加哥之家”（Chicago House）、麦吉多的气球空中摄影以及阿斯马尔的“考古队住所”，这一切都令人对美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③]

二战之前美国芝加哥大学发掘的另一个重要遗址是伊朗境内的波斯波利斯，古波斯语称之为帕尔萨（Parsa），现在的伊朗人称之为塔赫提—贾姆希德。发掘工作从1931

① Parrot 1955，p.56.

② Lloyd 1955，p.231.

③ Lloyd 1955，p.232.

图 182 波斯波利斯附近的一个新石器村落遗址。时代约为公元前 4000 年（Breasted 1933，31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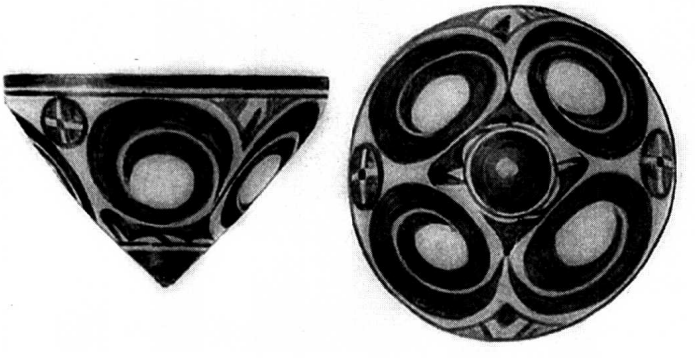


图 183 波斯波利斯附近一新石器村落遗址出土的彩陶（Breasted 1933，313 页）

年持续到 1939 年，先由海尔茨菲尔德主持。1935 年 1 月，史密特（E.F.Schmidt）接替海尔茨菲尔德，负责整个计划的实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

伊朗西南部地区曾是早期欧洲探险家和学者考察的一个焦点。早在 1626 年，意大利的古董商和学者彼特罗·德拉·瓦莱就曾到这里进行过考察。此后，到这里考察的欧洲人纷至沓来，接连不断。但真正的考古发掘开始于 19 世纪末。当时，法国政府买下波斯境内所有古代遗址的发掘权，实行垄断发掘，一直到 1929 年这种垄断才宣告结束。此后，在法国考古学家继续发掘伊朗境内的一些遗址的同时，“德国科学研究会”[①] 和美国费城博物馆开始把发掘范围扩大到伊朗。

波斯波利斯的发掘是芝加哥大学于 1931 年开始实施的“波斯考古”计划的组成部分。随着这个计划的实施，美国考古学家把西亚考古的又一个焦点集中到波斯波利斯及其附近地区。他们的发掘目标是以波斯波利斯为中心的方圆 10 公里内的所有遗址，从史前遗址到伊斯兰时期的遗址都包括在内。发掘工作开始之前，他们在波斯波利斯附近发掘了一个小遗址丘，出土了属于公元前 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建筑遗存。部分房屋的土墙遗存有 2 米多高，墙上的红颜色装饰图案仍然依稀可见，一些家用器具仍然放在原

①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来位置，有的餐具里还有食物（兽骨）遗存和燧石刀。出土的彩陶尤令人瞩目。发掘者海尔茨菲尔德认为，这里出土的陶器形式多样，装饰图案丰富多彩，最能反映这个文化的发展水平。它们在年代方面比苏萨Ⅰ彩陶还古老，在艺术方面比后者还要精美。[①]

不论是法国考古学家发现的苏萨遗址，还是美国考古学家发掘的这个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它们与古波斯帝国时期的波斯波利斯之间都有个相当大的缺环。为了弥补这个缺环，美国考古学家在发掘波斯波利斯的同时，继续对周围的一些小遗址丘进行发掘。获得考古材料最多的遗址是距波斯波利斯只有几公里之遥的伊斯塔尔（Istahkr）。伊斯塔尔的发掘开始于1932年，主持考古发掘的海尔茨菲尔德分别从三个不同方向挖了"探沟"（test plots），结果证明，这里的古代遗存上自公元前2000年，下至公元1000年，上下3000年。有人认为，伊斯塔尔很可能就是古波斯时期的首都，而波斯波利斯只不过是一个郊外宫殿。[②]

由于波斯波利斯是地面遗址，即古代建筑大部分都暴露在地面上，所以发掘工作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清理全露或半露在地面的残垣断壁，二是保护遗存，三是有选择地恢复建筑的原来面貌。在所有遗存中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墙壁浮雕。这些浮雕保存完好，个别地方连颜色都基本保持了原貌，这与古波斯时期的建筑材料有密切关系。波斯波利斯宫殿的建筑材料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晒干的土坯，一种是石头。大厅中的支柱、门柱、门楣、窗框、阶梯、扶壁等类似的支撑部分都用石头建造，装饰性浮雕一般都刻在这些石头建筑部分。它们构成了一个建筑物的框架，连接各个框架部分的墙是用晒干的土坯建造的。从古波斯帝国灭亡到美国考古学家发掘波斯波利斯，其间岁月流逝已有2500多年。昔日富丽堂皇的宫殿，如今只剩下一些石头框架，如瘦骨嶙峋的怪兽，形影相吊于荒漠之中，土坯建筑已荡然无存。这些曝露在风沙中的残石断柱，曾唤起多少欧洲探险家和学者的想象，有多少欧洲学者曾据此对古波斯时期的建筑特点做出了错误判断，认为该时期只有石头建筑！直到美国考古学家发掘波斯波利斯，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土坯建筑被风蚀后化为土，掩埋了低矮的石头建筑（如扶壁）；它自己"粉身碎骨"，却保护了石头建筑，使石头建筑上的浮雕乃至浮雕的颜色得以保存下来。

芝加哥大学"波斯考古"计划的实施虽然不算顺利，[③] 但还是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1）修复古代建筑，（2）发现大量泥板，[④]（3）详细发表

---

① 转引 Breasted 1933，3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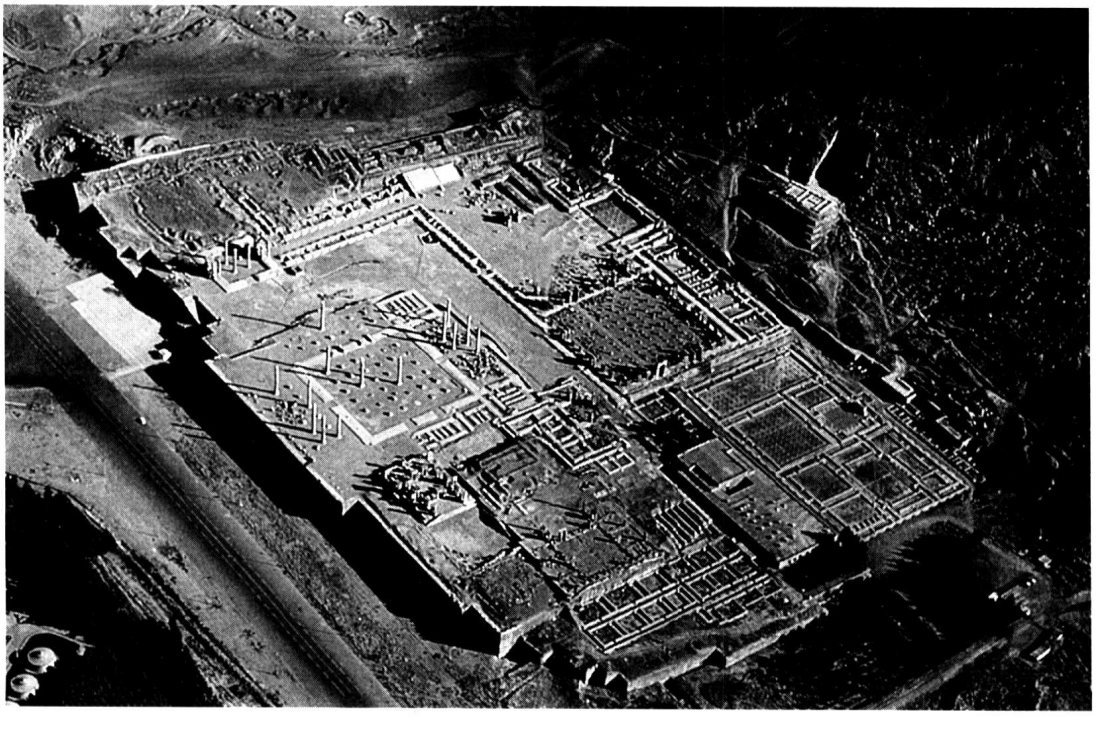
② Breasted 1933，p.321.

③ 如1934年伊朗政府指责发掘主持人海尔茨菲尔德走私文物，芝加哥大学被迫免去他的职务，因此，1931～1934年的发掘至今没有完整发表；二战爆发前，伊朗的反美情绪高涨，给考古工作者带来很多障碍，1939年二战爆发后被迫停止。

④ 共发现30000多块泥板，大部分用埃兰语书写。截止到1991年，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之一。

图 184
薛西斯王宫的议政厅出土时情形。1932年摄（Breasted 1933，330 页）

图 185　清理后的薛西斯王宫议政厅（Hrouda 1991，434～435 页）



表了1935年以后的发掘结果报告，[①]（4）建立了伊朗西南部地区的陶器和文化序列。[②]

193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决定发掘法拉。法拉地处伊拉克南部，正好位于巴格达和波斯湾的中间。1902～1903年，德国的东方学会曾在此进行过为期8个月的发掘。因此，宾大在发掘前曾与德国东方学会主席贵特鲍克（Bruno Güterbock）进行了协商。原计划在6周内结束发掘工作，因为这次发掘的目的主要是试掘，但由于受风沙的阻碍，发掘工作进行了3个月（2月15日～5月15日）。美国人之所以选择法拉进行发掘，因为它是古代的舒鲁帕克，是洪水故事中的主人公乌特纳皮施提的故乡。[③]

曾参加过芝加哥大学对土耳其境内的阿利撒尔遗址进行发掘的史密特主持了这次发掘。考古队由5名成员组成，雇佣的当地民工最多时虽达140人，但与当时一般考古队雇佣民工的人数相比并不算多。发掘伊始就出土了泥板，泥板出土后，后来成为苏美尔学大师的克莱默（S.N.Kramer）马上作为碑铭学家加入了考古队伍。史密特首先选定了一个1000平方米的地区，然后把它划分为10个10米见方的部分，他一共发掘了其中的四个部分。此外还在划定区域以外挖了两个探坑。发现的文物虽然不如当年德国东方学会发现的多，但史密特详细记录了文物的出土地层。由于每个地层的年代都可以确定，所以出土文物的年代也就基本可以确定。[④]

法拉发掘结束后，史密特已没有勇气面对那里的种种不利因素——气候不好，缺少饮水，再加上德国东方学会已经把那里挖得乱七八糟，特别是废土都没有移走。于是，他把兴趣转向伊朗。此后，再无人在此进行过考古发掘。

第五节　其他国家

捷克

1924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赫罗兹尼主持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利法特（Tell Rifat），即古代的阿尔帕德（Arpad），这是新亚述时期遗址，曾为阿拉美亚人建立的国家比特—阿古希（Bit-Agusi）的都城。

1925年，赫罗兹尼又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卡尼什（Kanish），即现在的屈尔台佩（Kültepe）。早在1893年，法国的探险家尚特雷就在这里进行过调查，1906年，德国的

---

① E.F.Schmidt: Persepolis Ⅰ. Structures, Reliefs, Inscriptions, Chicago 1953（=OIP 68）; E.F.Schmidt: Persepolis Ⅱ. Contents of the Treasury and Other Discoveries, Chicago 1957（=OIP 69）; E.F.Schmidt: Persepolis Ⅲ. The Royal Tombs and Other Monuments, Chicago 1970（=OIP 70）.

② Balcer 1991, p.147.

③ Martin 1988, p.17.

④ 同③，18页。

温克勒在此发掘。卡尼什城分土著的那沙（Nesha）和亚述商人居住区卡鲁姆（Karum，阿卡德语，意为“贸易据点”）两个部分。土著赫梯人居住区建在卫城上，最早的宫殿始建于公元前3千纪末期。卡鲁姆始建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是古亚述的贸易据点，是当时最繁荣的商业网点之一。这里除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雕塑品和一些稀有金属制品外，还出土大量古亚述语楔形文字泥板。

丹麦

1931年，在英霍尔特（H.Ingholt）的主持下，丹麦考古学家对叙利亚境内的哈马特（Hamath，即今之哈马/Hama）进行了发掘，发掘经费由卡尔斯伯格基金会（Carlsberg Foundation）资助。在发掘中，考古学家特别注重地层关系，结果发现12个文化层，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伊斯兰时代。此外，还发现20多块楔形文字泥板和一些赫梯象形文字铭文残片。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从地层学角度来看，这次发掘在叙利亚地区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伊拉克

1936年，伊拉克政府首次对本土的古代遗址进行发掘，但这次发掘的遗址都是伊斯兰时期的遗址。由于缺少考古学专家，发掘工作有始无终地不了了之。1939年，两个伊拉克人巴基尔（T.Bakir）和萨法尔（F.Safar）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毕业回国，与此同时，伊拉克文物局派遣到不同遗址监察外国考古队的监察员也在监察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羽翼渐丰。这样，伊拉克的一支现代考古队就应运而生了。[①] 不过，他们的重要发掘都是在1940年以后，因此不包括在本书的范围之内。只有格莱—雷什（Grai Resh）的发掘是在1939年进行的，由英国人劳埃德主持。格莱—雷什地处尼尼微以西约140公里，居住层从欧贝德时期至早王朝早期。

土耳其

1934年，在阿里克（R.O.Arik）的主持下土耳其发掘本土的格吕达奇（Göllüdag），这是新亚述时期遗址，发现城堡遗址和五脚石狮等。

1935年，也是在阿里克的主持下土耳其发掘本土的阿拉贾（Alaca Hüyük），至1949年，发现所谓的“阿拉贾王陵”，属早期青铜时代。在王陵中发现大量随葬品，其中的青铜兽旗堪称早期青铜艺术杰作。阿拉贾在赫梯帝国时代经历了第二个繁荣期。

第六节　结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昔日隶属于土耳其的阿拉伯

① Lloyd 1955, p.236.

国家，现在都纷纷摆脱它的统治，或独立，或被西方列强托管。黎巴嫩和叙利亚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伊拉克成为英国的托管国，直到1932年托管制才被废除。这种格局自然对西亚考古产生了直接影响，最明显者有二：一是英法两国立即开始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行考古发掘，二是英法学者或政治家开始直接领导或参与制定托管国的文物法，或直接参与建立文物管理机构。伊拉克文物局和伊拉克博物馆就是战后由英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东方事务秘书贝尔女士一手创建的。20年代初，她领导制定了伊拉克的“考古法”（Law of Excavation），并兼任伊拉克政府的临时考古总监（Director of Archaeology）。

美国亚述学和考古学家雅各布森把从30年代开始到二战之前这段时间称为西亚考古史上的“大发掘时代”（era of great excavations）或“基础发现时代”（era of basic discovery）。[①] 他的根据主要是：在此期间，法兰克福提出了陶器定年法，并以此确定了早王朝时期；稍后，他又整理和研究了印章，提出了印章的定年理论；阿斯马尔出土的泥板被逐块按照出土地点和地层详细记录，这在西亚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乌尔和乌鲁克都发现欧贝德文化和乌鲁克文化的遗存；劳埃德确立了哈苏纳文化在史前文化序列中的地位。这一切都使30年代成为西亚考古史上的特殊年代，成为创造历史的时代。

雅各布森主要着眼于美国的发掘活动，对法国的马里发掘只字未提。如果考虑到法国的马里发掘，30年代就会显得更加辉煌。但我们应该看到，30年代的考古成就是建立在20年代的考古成就之上，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更何况许多重大发掘本来就始于20年代，如乌鲁克的发掘始于1928年，而乌尔的发掘开始得更早——一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就已开始。就其发现文物的数量、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对西亚考古学发展产生的重大意义等方面而言，乌尔发掘绝不亚于30年代的马里发掘和迪亚拉地区的发掘。乌尔的发掘宣告了西亚考古史上黄金时代的开始，所以，法国考古学家帕罗把1919～1939年的20年称为“东方考古的黄金时代”，[②] 我们在此把这辉煌的20年称为西亚考古的黄金时代。

归纳起来，这个时代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地层学的不断完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20年里，西亚考古的方法不断完善。德国东方学会根据地层关系把乌鲁克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乌鲁克和捷姆迭特—那色，确立了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化序列。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法兰克福的领导下对伊拉克境内的一些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对迪亚拉地区的古代遗址阿斯马尔、海法吉和阿吉拉布的文化序列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

① Jacobsen 1995, p.2747.

② Parrot 1955, p.49.

上，确立了早王朝时期的考古年代。

2. 考古学本身不断升华。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越来越重视看似不重要的东西，二是史前遗址的发掘，三是成立考古学会。进入 20 年代后，对考古学家来说已“没有不重要的东西”（nothing is unimportant），[①] 这种对遗址的任何遗存都一视同仁的态度使考古学开始远离功利性，而走向纯科学研究。考古学家主动选择史前遗址进行发掘这一事实，使考古学更加远离商业性和功利性，进一步变为学术研究。考古学家们十分清楚，史前的村落遗址不可能像有些历史遗址那样出土大量金银器、大型艺术品或大型建筑，而可能仅出土石器或陶器等没有什么市场价值的东西。然而，在科学上这些小件却个个都是无价之宝。考古学恰恰是在日益重视“不重要的东西”并把发掘和研究它们作为目标的过程中自身得到了升华。英国考古学会伊拉克分会（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Iraq）于 1932 年成立，它是英国西亚考古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随着它的诞生，一个后来非常有影响的考古杂志《伊拉克》也应运而生，这也使考古学越来越成为一门科学。

3. 考古队伍的组建不断科学化和正规化。可以说，200 年前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就开创了科学组建考古队伍的先河，但那毕竟是个例外。德国东方学会发掘巴比伦时，也组建了一支在当时来说庞大的考古队伍，但那仅仅是个开始。20 年代以后，考古队伍的组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毕竟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所以，许多发掘队伍都不健全，就连乌尔的重大发掘也几乎是由吴雷一人单枪匹马来完成的。进入 30 年代后，考古队伍的科学组建不但成了考古学本身的要求，也成了考古对象国的要求，伊拉克制定的考古法中就对外国考古队的组建提出了明确的规定。至此，什么工作都由（一个）考古学家完成的时代宣告结束，考古队由多人组成、分工不同、各司其职的时代随之到来。这时，一支考古队伍一般由下列人员组成：队长（director）、测量员（surveyor）、制图员（draughtsman）、摄影师（photographer）、碑铭学家（epigraphist）、监察员（inspector）、工头（foreman）、雇工（workers）、工程建筑管理员（clerk of the works）、秘书（secretary），有时还要有助理（archaeological assistants）、古物修复员（repairers of antique objects）和技术员（technicians）。[②] 30 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伊拉克考古队”除设田野助理（field assistant）外，还设有建筑学助理（architectural assistant），他们的记录员（recorder）大概就相当于上面提到的制图员。[③]

4. 制定考古法。1933 年，伊拉克政府制定了新的考古法，其中规定了一些细则，

① Parrot 1955, p.21.

② 同上，20～21 页。

③ Breasted 1933, p.343.

涉及考古队人员的组成、发掘范围、发掘方法和分配文物等方面：一个外国考古队必须由考古学家、碑铭学家、建筑学家和摄影师组成，一个考古队一次只能发掘一个遗址，而且事先要划定发掘范围，对所有被发现的文物都要做详细记录，原则上一切出土文物都归伊拉克政府所有，但在发掘结束时伊拉克可以赠送给考古队一些文物作为酬谢。此外，整个发掘过程必由伊拉克文物局派监察员进行监察。[①] 这个政策出台后，大英博物馆便停止了对乌尔和阿尔帕吉耶的发掘，法国的卢浮尔博物馆停止了对拉格什的发掘。吴雷转向土耳其，马洛旺转向叙利亚，法国的帕罗也转向叙利亚。这说明，直到那时为止，欧洲考古队的西亚考古发掘仍然带有为本国的博物馆收集文物的色彩，尤其是英法两国的考古发掘更是如此，这与他们受本国的博物馆委托进行发掘有关。博物馆以收藏为主，自然注重文物的获得，由博物馆资助的发掘都不能不带有上述特点，或更确切地说，上述弱点。伊拉克考古法的出台，净化了伊拉克境内的考古，使考古学在那里得到进一步升华，它宣告了以获得文物为主要目的的考古时代（在伊拉克）的结束和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的西亚考古时代的到来。

早在1884年奥斯曼帝国就制定过文物法。[②] 据英国考古学家和亚述学家巴兹讲，汉姆迪·贝伊在伊斯坦布尔制定考古法是一回事，真正执行又是另一回事。[③] 如今的伊拉克已不同于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政治地位的提高保证了新制定的考古法的有效实施。

5. 举行国际会议。30年代举行过一系列与考古有关的国际会议。一次是由任伊拉克文物局局长的英国人史密斯（S.Smith）于1930年1月16日召集的“巴格达考古发掘主持人会议”，[④]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涉及到考古图表的规范化、各种物名的统一化和陶器类型归纳的最佳方法等。会议还接受了欧贝德——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的考古文化分期法。[⑤] 另一个会议是1931年9月7～12日在莱顿举行的第18次国际东方学家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欧贝德——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早王朝（Ⅰ～Ⅲ）的考古文化序列。1935年9月23～29日在罗马举行了第19次国际东方学家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吴雷发掘的乌尔王墓的定年问题及其与法兰克福提出的早王朝时期的关系。[⑥] 通过举行国际会议，各国考古学家进一步相互沟通，使考古学和亚述学进一步国际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6. 利用先进技术。法国考古学家发掘马里时动用了法国地中海空军对遗址进行了

---

① Lloyd 1955, p.220.

② RIA 4 (1972), p.71.

③ 转引 Oates and Oates 1976, 34页。

④ 参加会议的有铁罗发掘主持人德·热努亚克（法国）、豪尔萨巴德发掘主持人法兰克福（美国）、瓦尔卡发掘主持人约尔丹（德国）、基什发掘主持人沃特林（英美联合考古队）、乌尔发掘主持人吴雷（英国）等。

⑤ Potts 1986, p.20, notes 13, 14.

⑥ 同上，23页及注33。

空中拍照，使马里王宫和整个城市布局跃然纸上。[1] 芝加哥大学在发掘麦吉多时首次利用气球成功地对遗址进行了空中拍照，从而制定了遗址鸟瞰图。这些都是考古学家利用先进科技为考古服务的早期证据。

当然，这个黄金时代不可能一点问题也没有。缺乏合格的专业人员，就是个大问题。[2] 考古学家们或老或小，有些青黄不接。但恰恰是这一点，加快了考古学走进大学的步伐。由于缺乏专业人员，所以，在发掘的一些具体细节上就难免存在许多问题。美国考古学家德鲁加斯在评论海法吉被盗掘的情况时说："笔者（指德鲁加斯本人——引者注）认为，由这样的破坏（指盗掘造成的破坏——引者注）造成的考古证据的损失一般都不是不可弥补的，这恰恰与那些由所谓的'科学发掘'造成的破坏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方法不当，或雇佣的民工不够有经验，那么，所谓的'科学发掘'反而可能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发掘得越彻底，破坏性就越大，也就越不可弥补。"[3] 这说明当时一些所谓的科学发掘不过尔尔。

在结束本章之前还应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时期的史前考古。

史前考古在一战之前就已经开始。但是，必须强调指出，那时的史前考古是历史考古的副产品，是历史考古的必然结果。那时的史前考古学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脱离历史遗存而仅仅依靠地层或器物类型对史前遗存进行研究的"史前考古学家"，他们只是在历史遗存的下面发现了早于它的遗存的历史考古学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史前遗存的价值那时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陶器在史前考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人们可从陶器的制作和使用情况中对制造和使用陶器的古代民族的生活情况和技术发展水平窥见一斑，更重要的是，陶器（发现时大都是陶片）常常会给考古学家提供定年的线索和依据。由于陶器风格的变化比较快，考古学家常常把陶器作为区分考古阶段或民族迁徙的证据。

早在公元前 8000 年，叙利亚的穆勒贝特就已出现了陶器，但做工相当粗糙。虽然用火烧过，但由于火的温度还很低，所以不够结实，不能盛装液体。伊朗的甘吉—达勒赫也出土了类似的陶器，年代属公元前 8 千纪后期。从 7 千纪后期开始，伊朗的扎格罗斯山地区的居民已普遍使用陶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土的最早的陶器是哈苏纳陶器，其最早的标本出土于乌姆—达巴西亚（Umm Dabaghiyah）。到了公元前 6 千纪，陶器制作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尽管到这时为止，制陶方法还一直停留于手工制作。手动陶轮的出现是在公元前 5 千纪后期，其后 1000 年，即在乌鲁克早期，人们才发明了快速

① Parrot 1955, p.22.

② 同上，48 页。

③ 转引 Lloyd 1963，40 页。

陶轮，才有了成批生产的陶器。

莱亚德1849年在高拉遗址发掘时，因只发现一些陶片而放弃了发掘。1927年，正是莱亚德当年不屑一顾的陶片把美国的考古学家吸引到了这里。这说明到了20年代末，西亚的史前考古学已经初步建立，陶器成为重要的发掘和研究对象。英国的加斯坦从1929年开始的对耶利哥的发掘又把史前考古向前推进了一步。

从20年代末开始，英国史前史学家柴尔德（G. Childe）开始对西亚考古材料进行综合研究，1928年，他发表了《最远古的东方》。由于西亚史前史考古资料日新月异，所以，他不得不于1934年重新修订和再版《最远古的东方》一书。柴尔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庞杂的考古资料，使当时的一些仅把燧石、陶器或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西亚史前考古学家们耳目一新。虽然最终认同他的观点的西方史前史学家并不多，但受其方法和理论的影响而开始对考古材料和理论重新进行思考的却大有人在。

1933至193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对土耳其境内的一系列史前遗址进行了发掘，确立了一系列史前文化序列。

一战以后，许多国家的考古学家对前苏美尔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起源进行了研究。从20年代初开始，英国的吴雷在欧贝德和乌尔发现了前苏美尔文化遗存，把两河南部的文明史大大提前。1928年，英国的加罗在伊拉克北部山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第一次指出西亚考古学所揭示的这一地区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缺环，也就是说，在洞穴居住者和以从事农业为主并已经使用铜器的哈拉夫文化和萨马拉文化之间显然还缺少许多中间环节。1931年，马洛旺在尼尼微的一个探沟中发现比萨马拉文化还早的文化堆积，使缺少的环节得到了一定补充。40年代初，伊拉克考古学家在亚述高原西部遗址哈苏纳进行了发掘，在最底层发现了新石器晚期游牧居民的营地遗址，再次把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史提前了好几个世纪。尽管如此，它与旧石器末期的扎尔基和帕勒高拉（Palegaura）遗址仍然存在着约5000年的缺环。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缺环，美国的布雷伍德才于50年代组织了大规模史前考古发掘。

附录 1：

西亚考古学大事年表

注：

*）已经开始的考古活动。

1)、2)、3)……在这一年开始的考古活动。

1811　1)英国的里奇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1817 年，他再次发掘。到访过巴比伦遗址并对此作过描述的有犹太人本杰明，德国的席尔特贝格尔、劳沃尔夫、尼布尔，英国的埃尔德雷德、白金汉、凯尔·波特和米格南，意大利的彼特罗·德拉·瓦莱、罗马天主教士皮埃尔·埃马努埃尔、意大利学者文森佐·玛丽亚，法国的博尚、奥利维埃、塞斯提尼、琼斯。1850 年，英国的莱亚德发掘。1851～1854 年，由奥佩尔、福莱斯内尔和托马斯组成的法国考古队发掘。1897～1898 年，德国人萨豪考察，发现很有发掘潜力。1898～1915 年，德国发掘，由科尔德威主持。巴比伦虽然早在公元前 3 千纪中期就已建城，但由于公元前 2000 年以前的建筑层在地下水位之下，所以，现在只有关于其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没有实物。发掘的大型建筑有神庙、宫殿、城墙、游行街、伊什塔城门和“巴比伦塔”等。德国人把其中的伊什塔城门和一段游行街搬运到柏林，堂而皇之地立于柏林的帕加蒙博物馆。这些遗物都属于新巴比伦时期。

1817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 1811 1)。

1821　1)英国的里奇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今之卡拉特—舍加特。1836 年，德国的罗斯调查。1840 年，英国的爱恩斯沃斯由密特福(Mitford)、莱亚德和拉萨姆(Ch. Rassam)陪同发掘。1847～1853 年，英国的莱亚德和拉萨姆(H. Rassam)发掘，发现萨尔曼纳萨尔三世雕像，这是第一个被发现的亚述雕像。1849 年，发现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一世泥柱铭文，该铭文于 1857 年被用来验证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文献的解读成果，成为解读楔形文字(阿卡德语)的“试金石”。1873 年，史密斯(G. Smith)发现阿达德·尼拉里一世铭文。1903～1914 年，德国发掘，由安德烈主持。1945 年，伊拉克政府进行发掘和修复。1989 年，德国再次发掘，由赫鲁达(B. Hrouda)主持。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和发掘神庙建筑群和王宫，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建筑。在伊什塔神庙附近考古学家深挖到最早的建筑层，属早王朝时期。公元前 614 年毁于米底人。

1836　*）德国调查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 1821 1)。

1)切斯内考察队调查叙利亚境内的哈达图，即现在的阿尔斯兰—塔什。此后，英国的莱亚德、美国的沃尔夫考察队(Wolfe-Expedition)、海涅斯(J. H. Haynes)和汉姆迪·贝伊都在此做过调查。1886 和 1899 年，切米尔·帕夏(Dschemil Pascha)发掘，发现雕塑。1917 年，德国的牛尔德克发掘。1925 年，施隆姆博格(D. Schlumberger)发掘，发现楔形文字泥板。1928 年，法

国的惕罗·当让主持发掘。详见1928 1)。

1840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1842 1)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至1843年，由博塔主持，几乎没有收获。1845～1855年英国发掘，先后由莱亚德、拉萨姆(H. Rassam)、洛夫特斯主持；1873～1875年，史密斯(G. Smith)发掘；1878～1880年，拉萨姆主持发掘。1888～1891年，巴兹发掘；1903～1905年，金和汤普森发掘。1927～1932年，英国再次发掘，先后由汤普森、哈琴松(Hutchinson)、哈密顿和马洛旺主持。1960～1970年，由伊拉克文物局负责修复。城址分两个部分，现代阿拉伯名称分别为库雍基克和内比—雍努斯(Nebi Junus)。建筑遗址可追溯到哈苏纳时期，不过，大型建筑皆属新亚述时期，其中主要的有辛纳赫里布王宫和亚述巴尼拔王宫。这里的遗存十分丰富，最重要的有装饰宫壁的石板浮雕和"亚述巴尼拔图书馆"，都是研究亚述史的重要史料。

1843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1)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即豪尔萨巴德，至1855年，先后由博塔和博塔的继任者普拉斯主持。1845年，英国的莱亚德发掘。1852年，法国的奥佩尔考察此地。1929～1935年美国发掘，先后由法兰克福、劳埃德(S. Lloyd)、德鲁加斯和卢德主持。杜尔—沙鲁金是萨尔贡(即沙鲁金)二世建立的都城，所以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大型建筑有宫殿、神庙和层塔，大型艺术品有守卫兽和石墙浮雕。一部分遗物(由普拉斯发掘)在运输过程中由于发生翻船事故而沉入底格里斯河，不可复得。

1844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1845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1)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即《旧约》中的卡拉赫，现在的尼姆鲁德，至1851年，先后由莱亚德和罗林森(H. C. Rawlinson)主持；1853～1854年，由拉萨姆主持；1854～1855年，由洛夫特斯主持；1873年，由史密斯(G. Smith)主持；1877～1879年，由拉萨姆主持；1949～1957年，由马洛旺主持(在1953年的发掘中出土刻字木板)。自1956年始，伊拉克参与发掘。1958～1963年，由欧茨(D. Oates)主持；1969年至今，伊拉克文物局发掘。自1974年起，波兰的莫茨琴斯基(J. Meuszynski)亦不时在此发掘。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一些考古队也不断到此发掘。1989年，伊拉克政府组织发掘和修复时，发现人们长期踏破铁鞋觅不到的亚述王室墓葬。此城由萨尔曼纳萨尔一世(Salmanassar Ⅰ，前1274～前1245年)始建，公元前9世纪，在亚述纳西帕尔(Assurnasirpal)统治下臻于极盛。此后，几乎每个亚述王都在这里建有宫殿。所以，考古学家在这里的卫城发现许多宫殿遗址和神庙遗址。此外，还发现层塔、富商居住区和书吏居住区。在下城发掘出所谓的"萨尔曼纳萨尔城堡"。出土的艺术品中有许多象牙雕塑(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姆鲁德的蒙娜丽莎")、大型雕像、石墙浮雕和著名的"萨尔曼纳萨尔黑色方尖碑"。

2)英国的莱亚德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1846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1845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1)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比拉(Tell Billa/

Tell Billah,莱亚德书中的 Baasheida),属 2 千纪中期的胡里特遗址。由莱亚德和坎宁发掘,发现一些浮雕板残片和带文字的砖。1930～1935 年,美国东方研究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联合发掘,发现比拉陶器。

1847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 1845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 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 1821 1)。

1848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 1845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 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 1821 1)。

1849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 1845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 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 1821 1)。

1850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 1845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 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 1811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 1821 1)。
1)英国的洛夫特斯调查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即今日的瓦尔卡。1912～1913 年,德国发掘,由约尔丹主持。1928～1939 年,德国再次发掘,先后由约尔丹、牛尔德克和海因里希主持。二战后(自 1953 年始),德国继续发掘迄今:1953～1967 年,由楞岑(H. J. Lenzen)主持,1967～1977 年,由史密特(H. J. Schmidt)主持,1980～1990 年,由伯莫尔(R. M. Boehmer)主持。地处纳西里耶西北 60 公里。现在流行的许多概念,如城邦、苏美尔文化、吉尔伽美什和文字的发明等,都与乌鲁克有关。乌鲁克由两个城区组成,一个是战神与爱神伊南娜的崇拜区埃安纳(Eanna),一个是天神安努(Anu)的崇拜区库拉巴(Kullaba)。两个区的最早的居住层皆属欧贝德时期,此后就是以这个遗址命名的乌鲁克时期。在埃安纳区,自乌鲁克晚期始(约前 3300 年),出现大型建筑群,部分墙壁用石钉或泥钉镶嵌成图案。不过,在接下来的捷姆迭特—那色和早王朝时期,这些雄伟建筑被夷为地基,上面又建起其他建筑,其原因至今无法解释。长 9 公里的城墙亦建于这个时期。出土于库拉巴区的大型建筑有安努塔庙和素庙等。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统治者都在乌鲁克留下建筑足迹。乌鲁克的最后繁荣期是帕提亚时期。这里出土的"乌鲁克古朴泥板"是为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这里出土的"乌鲁克石膏瓶"、"祭司王"、"猎狮碑"和滚印等都是公元前 3 千纪初期的艺术杰作。
2)英国的洛夫特斯调查伊拉克境内的阿达布,即比斯马亚。1885 年,美国的沃尔夫考察队调查,由沃尔德主持。1890 年和 1891 年,沃尔德和彼得斯分别调查(当时,彼得斯正在发掘尼普尔,到此调查的时间只持续几个小时)。1897 年,德国的萨豪调查。正式发掘是在 1903～1904 年,由美国的班克斯主持,由"芝加哥大学东方开发基金巴比伦亚述分部"资助。重要发现有带麦西里姆(Mesilim)铭文的陶片和大量楔形文字泥板,大都属阿卡德时期和古巴比伦时期。
3)英国的洛夫特斯调查伊拉克境内的埃利都。见 1918 1)。
4)法国试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详见 1911 2)。

1851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1845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1852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1)法国的普拉斯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马尔泰(Maltai)，没有收获。马尔泰地处摩苏尔以北约70公里，古代名称不详。这里有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的岩石浮雕。

1853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1845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1)英国地理学家洛夫特斯考察伊拉克境内的拉尔萨。

1854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1845 1)。

1855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1845 1)。
1)英国的泰勒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拉赫姆(古代的杜鲁Duru，或杜尔—比特—亚金Dūr Bīt-Jakin，地处纳西里耶东南约35公里)，发现双层罐葬、刻字砖和一块泥板。此后，汤普森和霍尔(H. R. Hall)先后在此发掘。1949年，伊拉克发掘，由萨法尔主持。此城多见于文献。阿卡德时期就已存在，乌尔第三王朝以后臻于极盛。考古发现早王朝时期(约前25世纪)至新巴比伦时期(前7世纪)遗存，出土的实物有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刻字砖、陶管和陶碗以及新亚述时期的紫晶(amethyst)滚印和那波尼达(Nabonidus)泥锥铭文等。发现墓葬(新亚述和阿黑门尼德时期)共17座。
2)英国的泰勒调查伊拉克境内的埃利都。详见1918 1)。

1873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1874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1875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1877 1)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吉尔苏，即铁罗，断断续续持续到1909年，1928～1933年，继续发掘，先后由德·萨尔泽克、克罗、德·热努亚克和帕罗主持。重大发现有“安纳吐姆鹫碑”、古地亚雕像以及大量楔

形文字泥板。这是第一次大量出土苏美尔材料，由此人们始知苏美尔城邦的存在。当时，法国考古学家没有注重地层关系。

2)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拉瓦特，即古代的伊姆古尔—贝尔/恩利尔(Imgur-Bel/Enlil，意思是"贝尔/恩利尔同意")，至1878年，由拉萨姆(H. Rassam)主持；1956～1957年，由马洛旺主持。地处摩苏尔东南约28公里，属新亚述时期。发现宫殿遗址和梦神妈姆(Mamu)神庙遗址，此外，这里还出土石板铭文和泥板。

1878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1845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拉瓦特，见1877 2)。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1879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胡，见1845 1)。

1)英国发掘土耳其/叙利亚境内的卡赫美什，即现在的卡尔卡美司/杰拉布鲁斯，至1881年。1911～1914年及1919～1920年，英国大英博物馆再次发掘，先后由贺加斯、汤普森和吴雷主持。英国驻阿勒颇领事亨德森(P. Henderson)也参与早期发掘。最早的遗址属哈拉夫时期，约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才发展为城市。卫城靠近幼发拉底河，上建库巴巴神庙。在城内发现一座宫殿遗址的圆柱门廊、"王门"和"游行街"。"游行街"两边的墙上饰有表现宗教题材的浮雕。1925年，遗址的大部分划归土耳其。

2)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凡卡勒希(Vankalesi)和托普拉卡尔(Toprakkale，即古代的鲁萨希尼里 Rusahinili)，至1880年，由克莱顿主持。1898～1899年，德国发掘，由勒曼豪普特和贝尔克(K. E. W. Belck)主持。1911～1912年及1916年，俄国发掘，由奥尔贝利—马尔(Orbeli-Marr)主持。1937～1938年，美国发掘，由莱克(Lake)主持。1959～1961年，土耳其发掘，由埃尔真(Erzen)主持。图什帕是乌拉尔图(Urartu)最早的都城，后被鲁萨希尼里取代。发现神庙遗址和大量金属制品，其中有著名的烛架。

3)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博尔希帕，即今之比尔斯—尼姆鲁德，至1880年，由拉萨姆(H. Rassam)主持。此前，许多早期游客到过这里并在其游记中对博尔希帕遗址做过描述。1840年，莱亚德和密特福到过这里。1850年，莱亚德又自己到此考察。罗林森也到过这里，并抄写了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建筑铭文，从而发现现代的比尔斯—尼姆鲁德就是古文献中的博尔希帕。在罗林森之后考察过博尔希帕的还有史密斯(G. Smith)。1901～1902年，德国发掘，由科尔德威主持。这时，奥地利的特伦克瓦尔德(H. Trenkwalder)亦在此做调查。这里的层塔遗存仍高出地面约45米，因此，许多早期欧洲游客把这里的层塔误认为是"巴贝尔塔"。高尔德威的发掘首先纠正了这个错误。在层塔附近发掘出被称为埃基达(Ezida "正义庙")的神庙，有80个房间。神庙区的四周有高墙围绕，依内墙建有数小间，似储藏室。

1880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卡赫美什，见1879 1)。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凡卡勒希等，见1879 2)。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博尔希帕，见1879 3)。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1881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卡赫美什，见1879 1)。

1)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库塔(今之易卜拉欣)，至1882年，由拉萨姆(H. Rassam)主

持。地处基什以北约25公里。最早见于阿卡德时期(前24世纪)文献。发现几块楔形文字泥板、楔形文字砖和刻有阿拉美亚语咒文的容器。亚当斯和吉布森对该遗址做过调查，但至今还没有人再发掘。

1882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库塔，见1881 1)。

1)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即现在的钦奇尔里，至1894年，先后由胡曼、科尔德威、冯·卢尚和雅各彼主持。直径为720米的城堡，有两道护城墙和三座坚固的城门。城堡的核心是带有围墙的卫城，上建有宫殿建筑群，皆建于公元前830至公元前730年间，宫殿的石基饰有表现宫廷生活的浮雕。它曾是阿拉美亚人建立的国家萨马尔的都城。

2)英国的拉萨姆(H. Rassam)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希帕尔，即现在的阿布—哈巴。1894年，法国发掘，由舍尔(P. Scheil)主持。1927年，德国发掘，由安德烈和约尔丹主持。80年代，伊拉克文物局发掘。出土遗物大部分属古巴比伦时期和新巴比伦时期。拉萨姆的发掘是破坏性的，不过，他发现的4万多块楔形文字泥板是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后来的发掘者亦发现泥板文书档案。

1883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1884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1)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苏萨，即现在的舒什，时有间断地一直持续至今，先后由迪厄拉富瓦(1884～1886年)、戈蒂埃(1906～1907年)、德·摩尔根、德·梅奎内姆(R. de Mecquenem)和吉尔什曼(R. Ghirshman)等主持。遗址面积约2平方公里，分为四个部分。最早的遗址属公元前4000年，即苏萨A，出土彩陶。自公元前3000年起，埃兰人以此为都，不时与美索不达米亚各国发生战争，劫掠战利品。在苏萨发现的纳拉姆辛胜利碑和汉穆拉比法典碑就是公元前12世纪埃兰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时劫运到苏萨的。公元前7世纪，苏萨毁于与亚述的战争。公元前5世纪，大流士在此建都，苏萨再兴。

1885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美国调查伊拉克境内的阿达布，见1850 2)。

1886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切米尔·帕夏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达图，见1836 1)。

1887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1)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拉格什，由科尔德威主持。1968年，美国发掘，到1974年已发掘四季，由汉森(D. P. Hansen)主持。地处纳西里耶省，位于沙特拉以东约24公里。拉格什自早王朝初期始就是个大城市。不过，发现的两个最早的神庙建筑，即伊布咖尔(Ibgal)神庙和巴咖拉(Bagara)神庙，以及围墙、庭院和大庄园等皆属早王朝晚期(约前2500年)。

1888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1)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今之努法尔，是为美国参加西亚考古之始，至1900年，先后由彼得斯、海涅斯(R. C. Haynes)和希普莱西特主持。自1948年始，美国再次发掘，先后由美国人麦科恩(D. E. McCown)和海涅斯主持。尼普尔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宗教和文化中心，是“众神之父”恩利尔(Enlil)

之城。发掘工作主要在恩利尔神庙区进行,发掘了恩利尔神庙埃库尔(Ekur)和层塔。这些神庙和层塔始建于早王朝时期,后代多次重建或修复。这里出土许多雕像和6万多块楔形文字泥板,大都是古巴比伦时期创作或传抄的苏美尔语文学作品。

1889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美国调查伊拉克境内的阿达布,见1850 2)。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1890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1)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戴尔,由巴兹主持。
2)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赫西(Tell al-Hasi),至1893年,由皮特里(Fl. Pétrie)和布利斯(F. J. Bliss)主持。赫西地处加沙东北约25公里。发掘者错误地认为该遗址是拉基什(Lachish),发现8个文化层,自早期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发现一块阿马尔纳泥板书信。1970年,美国发掘,由沃雷尔(J. E. Worrell)主持,发现铜石并用时代居址。

1891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赫西,见1890 2)。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美国调查伊拉克境内的阿达布,见1850 2)。

1892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赫西,见1890 2)。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1893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赫西,见1890 2)。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1)法国的探险家尚特雷调查土耳其境内的卡尼什,即屈尔台佩。1906年,德国的温克勒正式发掘。自1925年始,捷克斯洛伐克的赫罗兹尼发掘。自1948年起,土耳其开始发掘,由厄兹居奇(T. Özgüc)主持。卡尼什城分土著的那沙和亚述商人居住区卡鲁姆(阿卡德语,意为"贸易据点")两个部分。土著赫梯人(Hittites)居住区建在卫城上,其最早的宫殿始建于公元前3千纪末期。卡鲁姆始建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是古亚述的贸易据点,是当时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之一。这里除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雕塑品和一些稀有金属制品外,还出土大量古亚述语楔形文字泥板。
2)法国的尚特雷首次试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详见1906 1)。

1894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希帕尔,见1882 2)。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马尔,见1882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1895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1896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1897 *)德国调查伊拉克境内的阿达布，见1850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1898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凡卡勒希等，见1879 2)。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1899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凡卡勒希等，见1879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切米尔·帕夏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达图，见1836 1)。
1)德国调查叙利亚境内的古扎纳，见1911 1)。

1900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普尔，见1888 1)。
1)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法拉，即古代舒鲁帕克，1902～1903年，由科尔德威主持，发掘报告于1931年由海因里希发表。1931年，美国发掘，由史密特主持。法拉地处巴格达东南220公里。遗存年代自捷姆迭特—那色至早王朝时期。发现很多建筑遗迹和遗物，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大量的古朴泥板文书和滚印。舒鲁帕克是苏美尔创世文学中"诺亚"的故乡。

190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博尔希帕，见1879 3)。
*)奥地利调查伊拉克境内的博尔希帕，见1879 3)。
1)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戈迪翁，由克尔特兄弟(Brüder Körte)进行。自1949年始，美国发掘，由扬(R. S. Young)主持。发现弗里吉亚时期(约前9世纪)的城门、宫殿和王陵，在王陵中发现大量随葬品。公元前690年(一说公元前660年)毁于基莫利人(Kimmerians)之手，古波斯人重建，罗马时代再毁。

1902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法拉，见1900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博尔希帕，见1879 3)。
1)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穆斯延，至1903年，由戈蒂埃(J.-E. Gautier)等主持，发现萨马拉、哈拉夫和欧贝德陶器。

1903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穆斯延，见1902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考古学家安德烈考察伊拉克境内的拉尔萨。详见1932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法拉。详见1900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详见1821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达布，见1850 2)。
1)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苏拉(Kisurra，今之阿布—哈塔布 Tell Abu Hatab，"木柴之父")，由安德烈、鲍姆加腾(H. Baum-

garten)和牛尔德克主持。发现陶器、金属器、滚印和泥板等,皆属乌尔第三王朝和古巴比伦时期。

1904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达布,见1850 2)。

1905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1906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卡尼什,见1893 1)。
1)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即博阿兹柯伊,先后由温克勒(1906~1912年)、比特尔(1931~1939年)和聂费(P. Neve, 1952~1972年)等主持。哈图沙地处安卡拉以东约200公里。1834年,被泰克西埃首次发现,此后,哈密顿、巴思(H. Barth)和莫尔特曼(A. D. Mordtmann, 1858年)、佩罗(1862年)、胡曼(1882年)都在此做过调查。1893~1894年,尚特雷首次试掘,发现泥板。1966年,建立博阿兹柯伊博物馆。哈图沙是公元前16世纪赫梯帝国的都城,不过,最早的居址可上溯至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时代早期。重大发现有神庙、官府和宫殿遗址、"王门"、"狮身人面兽门"和"狮门"等。发现的泥板文书共计15000多块,成为研究赫梯历史、文化的主要文字材料。

1907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1)德国—奥地利联合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今之苏丹/Tell es-Sultan),时在1907~1909年,由塞林和瓦钦格主持。1929~1936年,英国继续发掘,由加斯坦主持。1952~1958年,英国再次发掘,由凯尼容主持。耶利哥地处死海以北约10公里。最早的文化层属中石器时代,这里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城墙和石塔被称为"世界之最",属公元前8000年,当时人们既不知农耕,也不知制陶,所以,这个阶段被称为"前陶新石器"(PPN)。在公元前7000年的前陶遗址中,出现长方形土坯住房,这时,人们已学会农耕,出土的10颗人头骨就属这阶段,它们的眼窝都有镶嵌物,面部都用泥修整过,这可能是一种祖先崇拜形式。大约从公元前4千纪末期开始,又不断有游牧部落(包括以色列人)到此定居,到青铜时代末期又被遗弃。首次发掘时遗址废墟高出地面约20米。
2)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克贾龟祖,至1912年,由加斯坦主持。发现公元前8世纪"希拉尼"(Hilani)建筑。1949年,英国再次发掘,发现新石器晚期遗址。

1908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德国—奥地利联合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见1907 1)。

1909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吉尔苏,见1877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德国—奥地利联合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见1907 1)。

1910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1)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尔迪斯(Sardis)，至1914年，由巴特勒(Butler)主持，又1958年，由韩夫曼(Hanfmann)和戴特威勒(Detweiler)主持。该城至公元前546年一直是吕底亚(Lydia)都城。

1911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卡赫美什，见1879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尔迪斯，见1910 1)。

*)俄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凡卡勒希等，见1879 2)。

1)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古扎纳，即哈拉夫，至1913年，1927～1929年，再次发掘，由冯·奥本海姆主持。冯·奥本海姆的首次发掘是在1899年。地处哈布尔河上游。发现阿拉美亚人的宫殿遗址、巨型雕像和石墙浮雕。约公元前800年，一个亚述的地方长官曾对这个宫殿进行过扩建。在这些晚期遗址下面出土了精美的彩陶，即哈拉夫彩陶。考古学上的“哈拉夫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就是以这个遗址命名的。

2)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即今日的欧赫米尔(Tell Ohemir)，至1912年，由德·热努亚克主持。1923～1933年，英(牛津大学)美(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联合发掘，由兰格顿总负责，麦凯(1923～1926年)和沃特林(1927～1933年)具体主持。80年代末，美国的吉布森(McGuire Gibson)和日本的藤井(H. Fujii)先后率领本国的考古队到此进行调查和发掘。里奇于1811年在巴比伦试掘时，也发现这个遗址丘，他称其为“小红丘”(The Little Red Hill)，但没有发掘。凯尔·波特考察巴比伦尼亚时，也看到了它。据波特的估计，当时它高出周围地面约60英尺(约18米)。1850年，法国的福莱斯内尔、托马斯和奥佩尔也在这里进行过试掘。地处希拉东北14公里，最早的居住层属欧贝德时期。在这里发现的大型建筑有宫殿、神庙、塔庙，此外，还有墓葬，其中有王陵，里面有殉葬品和人殉。据《苏美尔王表》记载，基什是“洪水”过后王权降临的第一个城市。居住区胡尔桑克卡拉马(Hursagkalamma)、王陵和塔庙皆属早王朝时期，它们的出土印证了《王表》的记载。这里除出土陶器、青铜器、石灰石、贝壳镶嵌制品和雕塑外，还出土大量楔形文字泥板。

1912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1911 2)。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卡赫美什，见1879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古扎纳，见1911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尔迪斯,见1910 1)。

*)俄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凡卡勒希等,见1879 2)。

1)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萨马拉,至1914年,由萨勒(F. Sarre)和海尔茨菲尔德主持。发现史前墓葬,墓葬中出土陶俑和陶器,后者被称为"萨马拉彩陶"。没有发现居址。

1913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卡赫美什,见1879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古扎纳,见191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萨马拉,见1912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尔迪斯,见1910 1)。

1)德国东方学会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即今日的阿尔—阿卡尔,至1914年,由巴赫曼和安德烈主持。自1986年始,德国再次发掘。发掘出阿苏尔神庙、层塔以及建在十八米台基上的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的宫殿遗址的一部分。此城由中亚述国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前13世纪)始建,不久,图库尔提·尼努尔塔被谋杀,此城随之衰落。

2)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哈马丹(Hamadan,古代的埃克巴坦那/Ecbatana),由福塞(Ch. Fosssey)主持。由于现代城市建立在古代城址上,所以,考古工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发掘结果没有发表。

1914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卡赫美什,见1879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亚述城,见182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见181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萨马拉,见1912 1)。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萨尔迪斯,见1910 1)。

1)俄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伊格迪尔(Igdyr/Igdir),由彼特罗夫(P. F. Petrov)主持。1966年,土耳其发掘,由巴尔干(K. Balkan)主持。发掘乌拉尔图的墓地,位于阿拉拉特山南坡,发现棺葬和大量随葬品。

1916 *)俄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凡卡勒希等,见1879 2)。

1917 *)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达图,见1836 1)。

1918 1)英国调查(试掘)伊拉克境内的埃利都,至1919年,由汤普森和霍尔主持;1946~1949年,伊拉克发掘,由萨法尔和劳埃德主持。早在1850年,英国的洛夫特斯考察。1855年,泰勒进一步考察。地处纳西里耶西南30公里,是铜石并用遗址。楔形文字文献把埃利都说成是最早的城市,考古结果基本证实了文献的说法(只有乌埃利/Tell el-Ueli较其更早)。考古学上有"埃利都文化"一说,上限为公元前5000年。这里的重要发现有:恩基神庙,有18个建筑层;一个欧贝德时期的居址及墓葬;两座早王朝时期的宫殿;一座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塔庙。

2)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即穆克吉尔(Tell el-Muqejjir),至1919,由霍尔主持。1922~1934年,英美联合发掘,由吴雷主持。地处纳西里耶西南20公里。最早的村落遗址层属欧贝德时期,出土的墓葬属捷姆迭特—那色和早王朝时期,其中著名

的“乌尔王陵”属早王朝后期，王陵中发现大批人殉和大量随葬品。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是大兴土木的时期，这时兴建许多大型建筑，其中包括长方形的乌尔层塔。经过多次兴衰，最终在塞流古时期被彻底遗弃(大概与幼发拉底河改道有关)。出土大量泥板文书，其中包括早王朝时期的古朴泥板。

1919 *)英国调查伊拉克境内的埃利都，见1918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1)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欧贝德(Tell el-Ubaid)，至1924年，先后由霍尔和吴雷主持。1937年，美国发掘。地处乌尔西北6公里。考古学上的“欧贝德文化”(约前4000年)就是以这个遗址命名的。在居址和墓葬中发现大量“欧贝德彩陶”。

1920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卡赫美什，见1879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欧贝德，见1919 1)。

192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欧贝德，见1919 1)。

1)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阿卡德语为古布拉Gubla)，先后由蒙特和杜南(M. Dunand，1926～1959年)负责，1960年后，由查哈布(E. M. Chahab)主持。先由法国发掘，后转由黎巴嫩文物局发掘。新石器时代就建城，公元前4千纪末期开始有城墙。发掘出3座神庙，其中的“方尖碑神庙”属公元前2千纪初期，其他两座更早。

1922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欧贝德，见1919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1)德国和土耳其联合调查研究黎巴嫩境内的纳尔—卡尔布(Nahr al-Kalb“犬河”)，由德国的魏斯巴赫(F. H. Weissbach)主持。这里共有8幅浮雕和11篇铭文，先后由亚述人、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法国人(1861年)刻划，其中有尼布甲尼撒二世铭文。

1923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1911 2)。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欧贝德，见1919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1)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巴坤(Tell-i Bakun)，由海尔茨菲尔德主持。1932年，由麦克恩等主持。1956年，日本的江上(N. Egami)发掘。在波斯波利斯附近，发现彩陶(Susa B Ⅱ)等。

1924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1911 2)。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欧贝德，见1919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1)捷克斯洛伐克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利法特，即古代的阿尔帕德，由赫罗兹尼主持。1955、1960、1964年，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发掘，由威廉姆斯(S. Williams)主持。新亚述时期遗址，曾是阿拉美亚人建立的国家比特—阿古希的都城。

2)英国的兰格顿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伊辛(Isin，今之伊珊—巴赫里亚特 Ishan al-Bahrijat)，仅仅发掘3个小时，就出土尼布甲尼撒二世铭文砖等。1926年，多尔蒂(R. P. Dougherty)路过伊辛时，在地表发现许多属公元前3000年的遗物。直到

1973年，当地居民的盗掘活动不断。1973～1976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发掘，由赫鲁达主持。地处迪瓦尼耶以东约35公里。伊辛遗址所在的“废墟丘”的面积为1.5平方公里，足以说明它曾是较大城市。它曾在历史上两度取得地区霸权，一次是在公元前2千纪初，一次是在公元前1100年前后。被发掘的主要神庙始建于早王朝时期，亦有许多泥板文书出土。

1925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1911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施隆姆博格(D. Schlumberger)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达图，见1836 1)。

*)捷克斯洛伐克调查土耳其境内的卡尼什，见1893 1)。

1)美国发掘以色列境内的麦吉多，自1925年始，先后由菲舍尔、盖伊和卢德主持。发现属公元前4000年的神庙和一个直径为7米的祭坛，以及属公元前2000年的宫殿和城门遗址等。曾是亚述的省城，于公元前500年左右毁于埃及的一场征服战。

2)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努济，至1931年，先后由谢拉、普法伊弗尔(R. H. Pfeifer)和斯塔尔(R. Starr)主持。发现神庙、宫殿遗址及大量泥板文书。此外，重大发现还有彩色壁画和精美的“努济彩陶”。居民的主要成分是胡里特人。

3)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捷姆迭特—那色，至1926年，由兰格顿主持，1928年，由沃特林主持。1988～1989年，英国发掘，由马修斯(R. J. Matthews)主持。地处马什鲁阿以东19公里，自欧贝德时期至早王朝时期，考古学上的“捷姆迭特—那色”就是以这个遗址命名的。古代名称不详。

1926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1911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捷姆迭特—那色，见1925 3)。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努济，见1925 2)。

1927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1911 2)。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古扎纳，见191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希帕尔，见1882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努济，见1925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1)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阿利撒尔，持续到1932年，先后由史密特和冯·德·奥斯坦主持。这次发掘特别注重地层关系，因此，一些学者称这次发掘是一次“研究史上的革命”。发现铜石并用时代的村落遗址和长方形房屋遗址，屋里地下是墓葬。城墙遗址属早期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起，成为亚述贸易活动的基地之一。古赫梯时期仍是一个重要城市，赫梯帝国时期其重要地位被哈图沙取代。赫梯帝国灭王后，被遗弃。后又有弗里吉亚人来此居住。

2)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至1938年，先后由施派瑟尔和布拉赫(Ch. Brache)主持。地处摩苏尔东北23公里。自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公元前2千纪中期遗址无断层，是建立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年代学框架

的主要支撑点。

3)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比拉，即古代的希巴尼巴(Shibaniba)，至1935年，先后由施派瑟尔和布拉赫主持。遗址年代自早王朝至乌尔第三王朝，出土陶器。

1928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吉尔苏，见1877 1)。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1911 2)。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古扎纳，见1911 1)。

*)美国发掘土耳其的阿利撒尔，见1927,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努济，见1925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1927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比拉，见1927 3)。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捷姆迭特—那色，见1925 3)。

1)法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达图，即现在的阿尔斯兰—塔什，由惕罗·当让主持。发现两座新亚述时期宫殿遗址，建有圆柱门廊。在宫殿遗址中发现大量产自腓尼基的象牙装饰品。此外还发现伊什塔神庙遗址，并有石雕出土。此前的发掘，见1836 1)。

2)英国发掘以色列境内的哈措尔(Hazor，今之阿尔—凯达赫 Tell al-Qedah)，由加斯坦主持。1955～1958和1968～1989年，以色列继续发掘，由雅丁(Y. Yadin)主持。地处约旦谷。大约于公元前1750年前后发展为有城墙的城市，北部的神庙也为这时始建。卫城上建有所罗门时期要塞、住房和仓库。公元前732年毁于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古波斯时期再度繁荣一时。

3)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由海尔茨菲尔德主持。1949～1954年，伊朗发掘，由萨米(A. Sami)主持。1961～1964年，英国发掘，由施特罗纳赫(D. Stronach)主持。这里的遗迹有居鲁士墓、卫城残迹和一座残桥。部分地保留至今的遗迹有由巨牛石雕守卫的大门、雕柱接见大厅和"三十圆柱大厅"等。

4)英国的加罗发掘约旦境内的苏克巴(Shuqba)。中石器、新石器遗址，山洞，地处纳吐夫，考古学上的"纳吐夫文化"(Natufian Culture)即由此而来。纳吐夫人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村落。

5)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什克特—伊—塔里克(Ashkot-i Tarik)、阿什克特—伊—奥乌(Ashkot-i Au)和扎尔基等遗址。旧石器洞穴遗址。

6)英国的加罗等人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哈扎尔—默尔德。1949年，美国的孔恩(C. S. Coon)再次发掘。地处库尔德斯坦南部，旧石器洞穴遗址。

1929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吉尔苏，见1877 1)。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古扎纳，见1911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美国发掘土耳其的阿利撒尔，见1927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

见 1843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比拉,见 1927 3)。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努济,见 1925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 1927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 1918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 1911 2)。

1)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埃什努纳,即阿斯马尔,至 1936 年,由法兰克福主持。阿布神庙遗址,明显表现出捷姆迭特—那色、早王朝早期、早王朝中期和早王朝晚期的各时期的不同特点。从居民区的遗址中,也可以看到各时期建筑方面的不同特点。此外还发现早王朝晚期的手工工场(即过去的所谓"北宫")以及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宫殿和神庙(被神化的舒辛神庙)。

2)法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蒂尔—巴尔希普,即阿赫马尔,至 1931 年,由惕罗·当让主持。这次发掘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在一座总督府里发现新亚述风格和题材的壁画。此外还发现许多陶器和金属器物。最早的居住层可上溯至史前时期。自公元前 3000 年始,成为重要的贸易城市。在亚述人统治之前,曾分别受米坦尼、赫梯帝国和阿拉美亚人统治。

3)法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乌伽里特,即拉斯—沙姆拉,自 1929 年始,先后由谢费尔、谢尼(G. Chenet)和约恩(M. Yon)主持。地处地中海沿岸。居址自前陶新石器时代至公元前 1200 年无间断。公元前 2 千纪中期,这里是埃及法老与赫梯帝国的必争之地。乌伽里特趋强弃弱,永立不败之地。相对完好地保留至今的用石料建造的宫殿和神庙遗址,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考古学家在这里还发现王室档案,使用的文字是楔形字母,是为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字母文字。

1930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吉尔苏,见 1877 1)。

*)法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蒂尔—巴尔希普,见 1929 2)。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 1921 1)。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见 1907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 1842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 1850 1)。

*)美国发掘土耳其的阿利撒尔,见 1927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 1843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埃什努纳,见 1929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比拉,见 1927 3)。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努济,见 1925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 1927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 1911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 1918 2)。

1)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海法吉,即古代图图布(Tutub,后名杜尔—撒姆苏伊鲁纳),至 1936 年。第一季由(德国的)普鲁塞尔主持,此后由德鲁加斯主持。属于由法兰克福领导的"迪亚拉盆地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有的书中写由法兰克福主持。地处巴格达以东 35 公里。发现辛(Sin)神庙,详细观察了地层(Ⅰ~Ⅹ)及其建筑特点,上自捷姆迭特—那色时期,下至阿卡德时期。在对神庙附近的居民区的发掘中也注意到各地层文化内涵的变化。重要的发现还有著名的"椭圆神庙"和 200 多个室内墓葬。"椭圆神庙"建在高台上,有两层椭圆形墙围绕神庙,因此被命名为"椭

圆神庙”，始建于早王朝时期。

2)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吉拉布，至1937年，由法兰克福主持。地处阿斯马尔东南20公里。发现早王朝中期的城市和神庙遗址。实际发掘时间是1935～1936年，由劳埃德主持。

3)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伊奇沙利(Icshali，亦作Tell Ischtchali)，属于由法兰克福领导的“迪亚拉盆地计划”的一部分。实际发掘在1934～1936年。遗址年代为约公元前2000年。

4)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加法拉巴德(Tepe Ja'farabad)，至1934年，由德·摩尔根主持。距苏萨7公里，是苏萨发掘的副产品。陶器年代早于苏萨。

5)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耶卜鲁德(Jabrud/Yabrud)，由鲁斯特(A. Rust)主持。1963～1966年，美国发掘，由苏勒基(R.S.Solecki)主持。地处大马士革以北约60公里。旧石器中期和晚期洞穴遗址。主要发现物有石器、骨器和野兽骨。

6)耶斯塔德(E.Gjerstad)在土耳其的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发掘。后来，戈尔德曼(H.Goldmann)和加斯坦也在此发掘。自1950年始，西顿—威廉斯(M. V. Seton-Williams)、梅拉特(J. Mellaart)和弗伦奇(D.French)在这个地区发掘。目前已有20多个遗址被发掘，各遗址遗存的年代不等，从新石器到铁器时代的遗存都有，但青铜时代的遗存占的比例较大。

1931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吉尔苏，见1877 1)。

*)法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蒂尔—巴尔希普，见1929 2)。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加法拉巴德，见1930 4)。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见1907 1)。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耶卜鲁德，见1930 5)。

*)美国发掘土耳其的阿利撒尔，见1927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埃什努纳，见1929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海法吉，见1930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努济，见1925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吉拉布，见1930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1927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法拉，见1900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比拉，见1927 3)。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1911 2)。

1)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波斯波利斯，至1939年，先后由海尔茨菲尔德和史密特(1935～1939年)主持。大流士一世在此留下了他的最著名的宫殿建筑。方形的接见大厅有36根圆柱，而更大的厅是“百柱厅”，它于公元前331年毁于亚力山大大帝的复仇之火。

2)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希萨尔(Tepe Hissar)，至1932年，由史密特主持。地处达姆甘东南3公里。遗址分3层，自乌鲁克晚期约至乌尔第三王朝。前两层为村落，第Ⅲ层(约公元前2500年)始有统治者居住的较大建筑。

3)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吉延(Tepe Gijan),至1932年,由康特诺和吉尔什曼(R. Ghirshman)主持。海尔茨菲尔德于1928年在此做过调查。

4)法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斯休于(Has Hüyük),由德拉波特(L. J. Delaporte)主持。

5)丹麦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马特(今之哈马),至1938年,由英霍尔特主持,由卡尔斯伯格基金会(Carlsberg Foundation)资助。地处奥龙特斯河中游。发现12个文化层,从新石器时代到伊斯兰时代。发现20多块楔形文字泥板和一些赫梯象形文字铭文残片。哈马特于公元前2000年代末臻于极盛,公元前720年毁于亚述。

1932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吉尔苏,见1877 1)。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吉延,见1931 3)。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加法拉巴德,见1930 4)。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见1907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1911 2)。

*)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见1842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耶卜鲁德,见1930 5)。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美国发掘土耳其的阿利撒尔,见1927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埃什努纳,见1929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海法吉,见1930 1)。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波斯波利斯,见1931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吉拉布,见1930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1927 2)。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希萨尔,见1931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比拉,见1927 3)。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巴坤,见1923 1)。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丹麦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马特,见1931 5)。

1)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拉尔萨(今之桑克雷,地处纳西里耶西北约30公里),至1933年,由帕罗主持。自1967年始,法国再次发掘,先后由马戈龙(1969～1978年)和于奥(J. L. Huot, 1981年)主持。1853和1903年,英国的洛夫特斯和德国的安德烈分别考察过该遗址。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拉尔萨成为苏美尔地区霸权国家。发现属于这个时期的遗址宫殿、神庙、层塔遗址和泥板等。

2)法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阿尔斯兰台佩(Arslantepe,即马拉特亚 Malatya,亚述语为美利都 Meliddu),至1933年;又1938年,由德拉波特主持。自1961年始,意大利发掘,由普格里希(Puglisi)和麦里基(Meriggi)主持。发现墙壁浮雕(前11世纪)和超过真人大小的人像等。

3)瑞典发掘伊朗境内的沙赫(Shah Tepe),由阿恩(T. J. Arne)主持。

1933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吉尔苏,见1877 1)。

*)法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拉尔萨,见1932 1)。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加法拉巴德,见1930 4)。

*)法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阿尔斯兰台佩，见1932 2)。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见1907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德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耶卜鲁德，见1930 5)。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埃什努纳，见1929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海法吉，见1930 1)。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波斯波利斯，见1931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吉拉布，见1930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1927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比拉，见1927 3)。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基什，见1911 2)。

*)瑞典发掘伊朗境内的沙赫，见1932 2)。

*)丹麦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马特，见1931 5)。

1)美国调查伊拉克境内的杰尔宛，调查者雅各布森和劳埃德。最著名的发现是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建造的高架渠。此外还发现菜园、公园和人工沼泽地。发掘者认为，高架渠、拦水坝和输水渠的建造，目的是为了满足尼尼微的用水需求。

2)法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马里，今之哈里里，自1933年始，先后由帕罗和马戈龙主持。马里始建于早王朝时期，至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时期臻于极盛，随后毁于汉穆拉比之手。发现的遗址有宫殿、神庙、学校遗址和墓葬。与汉穆拉比同时代的马里国王奇姆里利姆建造的宫殿是古代西亚最宏伟的宫殿之一，一共有300多个房间，占地2.5公顷。在宫中发现20000多块楔形文字泥板。蕴藏遗物最多的神庙是伊什塔神庙。发现的遗物有神像、陶器、青铜器和贝壳镶嵌物等。

3)英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尔帕吉耶，由马洛旺主持。1976年，伊拉克发掘，由希亚拉(I. Hijara)主持。地处尼尼微东北5公里。发现哈拉夫时期(铜石并用)遗址，蜂窠式拱顶小石房是其建筑特点。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加建长形边房。所以，发掘出来的遗址平面图就像一个个钥匙眼儿。出土大量哈拉夫彩陶。

4)法国发掘约旦境内的甲穆(al-Khiam)，1951年由佩罗发表发掘结果。1962年，厄克加里(J. G. Echegary)再次小规模发掘，属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初期(纳吐夫文化)。

5)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西阿尔克(Tepe Sialk)，至1934年，又1937～1938年，由吉尔什曼主持。

6)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于1933～1937年发掘土耳其阿姆克('Amq)平原的几个重要遗址，如屈伊德伊德(Tell Cüydeyde)、恰塔尔休于(Catalhüyük)和泰纳特(Tell Tainat)，由麦克埃文(C. W. McEwan)和布雷伍德(R. J. Braidwood)主持。自新石器时代至乌尔第三王朝。

7)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拉基什(今之杜威尔 Tell al-Duweir)，至1938年，由"大英威尔康—马尔斯通考察队"(The British Wellcome-Marston Expedition)发掘，由斯塔基(J. Starkey)主持。1938年，斯塔基被暗杀，考古计划遂终止。1966、1967年，以色列发掘，由阿哈罗尼(Y. Aharoni)主持。他去世后由乌希什金(D. Ussishkin)主持(1973～1980年)。地处耶路撒冷西南约40公里。在铜石并用和早期

青铜时代，这里的居民住在洞穴里。此后，人们出来建城，洞穴成为墓地。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曾征服此城，公元前588年又被巴比伦人征服。除建筑遗址、墓葬、陶器和装饰品外，还出土大量文字材料，其中包括埃及象形文字的棺文和楔形文字的阿卡德语泥板等。

8)有人发掘伊朗境内的哈夫塔凡(Haftavan Tepe)，至1934年，发掘者不详。1962～1968年，当地居民挖掘遗址，挪用遗址的建筑材料。1968年后，英国发掘(1968、1969、1971年)，由伯尔内(C. A. Burney)主持。地处乌尔米亚湖西北。至1971年止，尚未挖到最底层，但已达到公元前3000年居住层。属公元前1000年的遗存最丰富，其中有建筑、墓葬和青铜或珍珠首饰等。公元前8世纪末毁于大火。

1934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西阿尔克，见1933 5)。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加法拉巴德，见1930 4)。

*)法国发掘黎巴嫩境内的毕布勒，见1921 1)。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见1907 1)。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拉基什，见1933 7)。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埃什努纳，见1929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海法吉，见1930 1)。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波斯波利斯，见1931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吉拉布，见1930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1927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比拉，见1927 3)。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屈伊德伊德等遗址，见1933 6)。

*)英美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尔，见1918 2)。

*)丹麦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马特，见1931 5)。

1)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内里布图(Neribtum)，至1936年，由法兰克福主持。发现公元前19世纪的神庙群遗址，其中的长方形屋室神庙(langraumtempel)为这类神庙的最早者。

2)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塔尔苏斯(Tarsus)，至1938年。1947～1949年再次发掘，由戈尔德曼主持。自新石器时代至公元前696年被亚述军队毁坏为止，一直有人居住。一度受制于叙利亚地区强权和赫梯帝国的统治，出土赫梯印章。

3)梅斯尼尔·杜·比松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巴胡兹(Baghouz)，至1936年。新石器遗址，亦发现伊辛—拉尔萨时期墓葬。

4)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切施美伊—阿里(Ceshme-i Ali)，至1936年，由史密特主持。距德黑兰7公里，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

5)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乔威(Tepe Jowi)，至1935年。距苏萨10公里，属苏萨发掘的一部分。

6)土耳其发掘本土的格吕达奇，由阿里克主持；1968年，由提斯肯(Tezcan)主持。为新亚述时期遗址。发现城堡遗址和五脚石狮等。

1935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乔威，见1934 5)。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见1907 1)。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拉基什，见1933 7)。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杜尔—沙鲁金，见1843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埃什努纳，见1929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海法吉，见1930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奈利布图姆，见1934 1)。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波斯波利斯，见1931 1)。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塔尔苏斯，见1934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吉拉布，见1930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1927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比拉，见1927 3)。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切施美伊—阿里，见1934 4)。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屈伊德伊德等遗址，见1933 6)。

*)梅斯尼尔·杜·比松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巴胡兹，见1934 3)。

*)丹麦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马特，见1931 5)。

1)土耳其发掘本土的阿拉贾，至1949年，由阿里克主持。1962年，由科赛(H. Z. Kosay)再次发掘。发现所谓的"阿拉贾王陵"，属早期青铜时代。在王陵中发现大量随葬品，其中的青铜兽旗堪称早期青铜艺术杰作。在赫梯帝国时代阿拉贾经历了第二个繁荣期。

2)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杜尔—温塔什(Dūr Untaš)，即乔加—赞比尔(Choga Zanbil)，至1939年，由德·梅奎内姆主持。1951～1962年，法国再次发掘，由吉尔什曼主持。此城为埃兰国王温塔什·纳皮利沙(Untaš-Napiriša，公元前13世纪中叶)所建，为祭神圣地，平时无百姓居住，只有节日才有朝官百姓来这里居住。三层围墙的中心是一个层塔（是除乌尔的层塔以外保存最完好的层塔），第二道围墙内建有许多神庙，第三道围墙内才是国王的行宫。行宫下面就是王室的家墓，墓室拱顶，葬式为火葬。

3)英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沙希尔—巴扎尔(Shaghir Bazar)、阿斯瓦德和吉德尔，时间在1938～1939年，由马洛旺主持。

4)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发掘土耳其境内的泰纳特，至1936年，由麦克埃文和布雷伍德主持。出土新亚述时期建筑、青铜雕像和浮雕等。

1936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杜尔—温塔什，1935 2)。

*)英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沙希尔—巴扎尔等遗址，见1935 3)。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拉基什，见1933 7)。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见1907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埃什努纳，见1929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海法吉，见1930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奈利布图姆，见1934 1)。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波斯波利斯，见1931 1)。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塔尔苏斯，见1934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吉拉布，见1930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1927 2)。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切施美伊—阿里，

见 1934 4)。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屈伊德伊德等遗址,见 1933 6)。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泰纳特,见 1935 4)。

*)土耳其发掘本土的阿拉贾,见 1935 1)。

*)梅斯尼尔·杜·比松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巴胡兹,见 1934 3)。

*)丹麦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马特,见 1931 5)。

1)法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米达斯(Midas)城,弗里吉亚语为亚吉里卡亚(Yazilikaya),又 1951 年,由加布里埃尔(Gabriel)主持。米达斯建立的城堡。

2)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吉来兰(Girairan),由斯坦因(A. Stein)主持。铜石并用时代遗址。

3)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吉尔德(Tell-i Gird),由斯坦因(A. Stein)主持。发现路里斯坦和巴坤陶器。

4)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吉尔德伊—哈桑—阿里(Gird-i Hasan Ali),由斯坦因主持。发现欧贝德陶器。

5)美国普查土耳其阿塔伊(Hatay)省遗址,由布雷伍德主持,记录了 178 个遗址,其中 113 个具有前希腊时代遗存,一小部分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为铜石并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遗址。1932~1938 年间,美国芝加哥大学发掘了其中的许多遗址;1958 和 1963 年,土耳其的阿尔基姆(B. Alkim)又发现 24 个遗址;由森于雷克(M. Senyürek)和波斯坦奇(E. Bostanci)发掘的两个旧石器遗址马加拉奇克(Magaracik)和阿尔提努祖(Altinuzu)也属该地区史前遗址。

1937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西阿尔克,见 1933 5)。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杜尔—温塔什,1935 2)。

*)英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沙希尔—巴扎尔等遗址,见 1935 3)。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拉基什,见 1933 7)。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 1850 1)。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 1906 1)。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波斯波利斯,见 1931 1)。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塔尔苏斯,见 1934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阿吉拉布,见 1930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欧贝德,见 1919 1)。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 1927 2)。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屈伊德伊德等遗址,见 1933 6)。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凡卡勒希等,见 1879 2)。

*)土耳其发掘本土的阿拉贾,见 1935 1).

*)丹麦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马特,见 1931 5)。

1)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阿拉拉赫,即阿贾纳,由吴雷负责,至 1939 年止。1946~1949 年再次由吴雷发掘。发现两个王宫遗址,一个是公元前 18 世纪的雅里姆里姆(Jarimlim)王宫遗址,其中有受克里特文明影响的壁画。一个是公元前 12 世纪米坦尼(Mittani)时期的尼克梅帕(Niqmepa)王宫遗址。这里的圆柱门廊(阿卡德语的 bīt hilani)可能是后世流行的圆柱门廊的滥觞。

2)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余米克,即梅尔辛(Mersin),至 1940 年,1946~1949 年再次发掘,由加斯坦主持。从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 6000 年)的定居遗址始,有 33 个建筑层。这里出土的陶器的演变过程非常清楚,对陶器研究非常有价值。

3)英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布拉克,至 1938 年,由马洛旺主持。自 1976 年始,再次发掘,由两个欧茨(D. Oates 和 J. Oates)主

持。上自哈拉夫时期，下至公元前2千纪中期。重要发现是所谓的“眼庙”，内含丰富的小泥塑。阿卡德时期，纳拉姆辛在这里建造宫殿。

4)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哈基—穆罕默德(Haggi Muhammad)，至1939年，德国瓦尔卡考古队发掘，由海因里希主持。地处乌鲁克西南约18公里，发现欧贝德时期(公元前5千纪中前期)文化、“洪水层”堆积和不同时期陶器等。

1938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西阿尔克，见1933 5)。

*)法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阿尔斯兰台佩，见1932 2)。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杜尔—温塔什，1935 2)。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阿拉拉赫，见1937 1)。

*)英国发掘巴勒斯坦境内的拉基什，见1933 7)。

*)英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布拉克，见1937 3)。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余米克，见1937 2)。

*)英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沙希尔—巴扎尔等遗址，见1935 3)。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哈基—穆罕默德，见1937 4)。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波斯波利斯，见1931 1)。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塔尔苏斯，见1934 2)。

*)美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高拉，见1927 2)。

*)美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凡卡勒希等，见1879 2)。

*)土耳其发掘本土的阿拉贾，见1935 1)。

*)丹麦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马特，见1931 5)。

1)英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哈曼(Tell al-Hamam)，由马洛旺主持，发现陶器等，属公元前2000年。

1939 *)法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杜尔—温塔什，1935 2)。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阿拉拉赫，见1937 1)。

*)英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余米克，见1937 2)。

*)英国发掘叙利亚境内的沙希尔—巴扎尔等遗址，见1935 3)。

*)德国发掘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见1906 1)。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哈基—穆罕默德，见1937 4)。

*)德国发掘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见1850 1)。

*)美国发掘伊朗境内的波斯波利斯，见1931 1)。

*)土耳其发掘本土的阿拉贾，见1935 1)。

1)伊拉克和英国联合发掘伊拉克境内的格莱—雷什，由劳埃德主持。地处尼尼微以西约140公里，居住层从欧贝德时期至早王朝早期。

2)苏联发掘亚美尼亚境内的卡尔米尔—布鲁尔(Karmir-Blur)，即古代的特舍白尼(Teshebaini)，自1939年始，由皮奥特罗夫斯基(Piotrovskij)主持。乌拉尔图时期城市，卢萨(Rusa)二世建。出土大量陶器、金银器和部分铁器。

3)贝尔克和赖利(Reilly)发掘土耳其境内的提尔基(Tilki Tepe)，发现哈拉夫陶器。

附录 2：

年 代 表

注：

1. 本年表中涉及的年代均为公元前，不再一一注明。

2. 本表主要根据下列资料汇集而成：1)R. W. Ehrich (ed.), *Chronologies in Old World Archaeology*, Chicago and London 1967 (第 3 版), pp. 133-213. 2) D. Oates and J. Oates,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Elsevier/Phaidon 1976, pp. 138 - 139, Radiocarbon Determinations. 3)*RIA* 6 (1980), pp. 77 - 135, Königslisten und Chroniken. 4)J. Boese und G. Wilhelm, Aššur-dār I, Ninurta-apil-Ekur und die mittelassyrische Chronologie, *WZKM* 71 (1979) 19ff.

一 根据工具划分的文化年代

大约年代	文化名称
8000～4000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4000～3500	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
3500～2500	早期青铜时代(Early Bronze Age)
2500～1500	中期青铜时代(Middle Bronze Age)
1500～1000	晚期青铜时代(Late Bronze Age)
1000～	铁器时代(Iron Age)

二 根据陶器划分的文化年代

大约年代	文化名称	考古地层
6000～	哈苏纳文化(Hassuna)	尼尼微 Ⅰ(Nineveh Ⅰ)
5000～	萨马拉文化(Samarra)	哈苏那Ⅲ～Ⅵ(Hassuna Ⅲ-Ⅵ) / 尼尼微 Ⅱa－b(Nineveh Ⅱa－b)
4500～	哈拉夫文化(Tell Halaf)	哈苏那Ⅵ～Ⅻ(Hassuna Ⅵ-Ⅻ) / 尼尼微 Ⅱc(Nineveh Ⅱc)
4500～	埃利都文化(Eridu)	埃利都ⅩⅤ～ⅩⅦ(Eridu ⅩⅤ-ⅩⅦ)
4500～	穆罕默德文化(Hadschi Mohammed)	埃利都Ⅸ～ⅩⅣ(Eridu Ⅸ-ⅩⅣ)
4000～	欧贝德文化(Tell Obeid/Ubaid)	埃利都Ⅵ～Ⅷ(Eridu Ⅵ-Ⅷ) / 乌鲁克ⅩⅣ～ⅩⅦ(Uruk ⅩⅣ-ⅩⅦ)
3500～	乌鲁克文化(Uruk)	乌鲁克Ⅳ～Ⅻ(Uruk Ⅳ-Ⅻ)

2900～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Jamdet Nasr)	乌鲁克Ⅲ(Uruk Ⅲ)

三 历史年代表

苏美尔/巴比伦尼亚	其他地区
3300～2900	
乌鲁克Ⅳ～Ⅲ(Uruk Ⅳ-Ⅲ)	原始埃兰(Proto-Elamite)
古朴楔形文字(Archaic Tablets)	苏萨档案(Susa Archives)
捷姆迭特—那色(Jamdet Nasr)	布拉克古朴泥板(Brak Archaic Tablets)
2900～2600	
早王朝Ⅰ～Ⅱ(Early Dynastic Ⅰ-Ⅱ)	
恩美巴拉格西(Enmebaragesi of Kish)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 of Uruk)	
法拉古朴泥板(Archaic Tablets from Fara)	
2600～2334	
早王朝Ⅱ～Ⅲ(Early Dynastic Ⅱ-Ⅲ)	
乌尔王陵(Royal Cemeteries of Ur)	
古朴泥板(Archaic Tablets from Ur)	
阿布—萨拉比赫泥板(Abu Salabikh Tablets)	
埃布拉档案(Ebla Archives)	
麦西里姆,“基什之王”(Mesilim, King of Kish)	
拉格什第一王朝(First Dynasty of Lagash)	
乌尔南希(Urnanše)	温马(Umma)
阿库加尔(Akurgal)	
安纳吐姆(Eannatum)	埃纳卡里(Enakalle)
埃纳纳吐姆(Enannatum Ⅰ)	乌尔伦马(Urlumma)
恩铁美纳(Entemena)	伊尔(Ⅱ)
埃纳纳吐姆(Enannatum II)	
埃尼塔尔基(Enitarzi)	
恩利塔尔基(Enlitarzi)	
卢加尔安达(Lugalanda)	
乌鲁伊宁基纳(Uru'inimgina)	
卢加尔扎格西(Lugalzaggesi of Uruk)	
2334～2154	
阿卡德王朝	
萨尔贡(Sargon,统治56年)	

里木什(Rimush,统治 9 年)
马尼什图舒(Manishtusu,统治 15 年)
纳拉姆辛(Narām-Sîn,统治 37 年)
沙尔卡里沙里(Šarkališarrī,统治 25 年)
……(以下还有六个国王)

2150～2050

古提人统治(Gutian Period)
乌图黑加尔(Utuhegal of Uruk,约 2050)

2112～2004

乌尔第三王朝(Ur Ⅲ Dynasty)
- 乌尔纳木(Ur-Nammu,统治 18 年)
- 舒尔吉(Šulgi,统治 46 年)
- 阿马尔辛(Amar-Sîn,统治 9 年)
- 舒辛(Šu-Sîn,统治 9 年)
- 伊比辛(Ibbi-Sîn,统治 25 年)

拉格什第二王朝(Second Dyn. of Lagash)
- 乌尔宁吉尔苏Ⅰ(Ur-Ningirsu Ⅰ)
- ……(以上还有五个国王)
- 古地亚(Gudea)
- 乌尔宁吉尔苏(Ur-Ningirsu Ⅱ)
- 乌尔加尔(Ur-GAR)
- 乌尔阿亚巴(Ur-ayabba)
- 乌尔马马(Ur-Mama)
- 纳马哈尼(Nammahani)

2004～1594

古巴比伦时期(Old Babylonian Period)

古亚述语文献(Old Assyrian)
卡尼什档案(Kanesh Archives)
亚述殖民地(Assyrian Colonies)

2000～1850

伊辛—拉尔萨时期(Isin-Larsa Period)

伊辛王朝(Isin Dynasty)
- 伊什比埃拉(Išbi-Erra)
- 舒伊里舒(Šu-Ilišu)
- 伊丁达干(Iddin-Dagan)
- 伊什美达干(Išme-Dagan)
- 里皮特伊施塔(Lipit-Ištar)

拉尔萨王朝(Larsa Dynasty)
- 纳普拉努姆(Naplanum)
- 埃米苏姆(Emisum)
- 萨米乌姆(Samium)
- 扎巴亚(Zabaya)
- 滚古努姆(Gungunum)

乌尔宁努尔塔(Ur-Ninurta)
伯尔辛(Bur-Sîn)
里皮特恩利尔(Lipit-Enlil)
埃拉伊米提(Erra-Imitti)
恩利尔巴尼(Enlil-bani)
扎姆比亚(Zambija)
伊特尔皮沙(Iter-piša)
乌尔杜库加(Urdukuga)
辛马吉尔(Sin-magir)
达米克伊利舒(Damiq-ilišu)

阿比萨勒(Abisare)
苏木埃尔(Sumuel) (巴比伦第一王朝)
努尔阿达德(Nur-Adad)
辛伊丁纳姆(Sîn-iddinam)
辛埃利巴姆(Sîn-eribam)
西里阿达德(Silli-Adad)
瓦拉德辛(Warad-Sîn)

1894～1595

巴比伦第一王朝(汉穆拉比王朝)	亚述	
	普祖尔亚述(Puzur-Assur Ⅰ)	
	沙里马胡(Šalimahu)	
苏姆阿布姆(Sumu-Abum)	伊鲁舒马(Ilu-šuma)	
苏姆拉埃(Sumu-la-EL)	埃里舒姆(Erišum I)	
萨比乌姆(Sabium)	伊库努姆(Ikunum)	
	萨尔贡(Sargon Ⅰ)	马里
阿皮尔辛(Apil-Sîn)	普祖尔亚述(Puzur-Assur Ⅱ)	
	埃里舒姆(Erišum Ⅱ)	亚基德里姆(Yaggid-Lim)
辛穆巴里特(Sîn-Muballiṭ)	沙姆希·阿达德(Šamši-Adad Ⅰ)	亚赫敦里姆(Yahdun-Lim)
汉穆拉比(Hammurabi)	伊什美达干(Išme-Dagan)	亚斯马—阿达德(Yasmah-Adad)
萨姆苏伊鲁纳(Samsu-iluna)	……(下略)	奇姆利里姆(Zimri-Lim)
阿比埃舒(Abi-ešu)		
阿米蒂塔纳(Ammiditana)		
阿米萨都卡(Ammisaduka)		
萨姆苏蒂塔纳(Samsuditana)		

1550～1155

凯喜特王朝(中巴比伦时期)	赫梯档案(Hittite Archives, 17～13 世纪)
……(以上约有 14 个国王)	
卡拉殷达什(Kara-Indaš)	努吉档案(Nuzi Archives, 15 世纪)
卡达什曼哈尔贝(Kadašman-Harbe I)	中亚述时期(Middle Assyrian Period)

库里加尔祖(Kurigalzu Ⅰ)
卡达什曼恩利尔(Kadašman-Enlil Ⅰ)
伯尔纳布里阿什(Burna-Buriaš Ⅱ)
卡拉哈尔达什(Kara-hardaš)
纳吉布加什(Nazi-bugaš)
库里加尔祖(Kurigalzu Ⅱ)
纳吉马鲁塔什(Nazi-maruttaš)
卡达什曼图尔古(Kadašman-Turgu)
卡达什曼恩利尔(Kadašman-Enlil Ⅱ)
库都尔恩利尔(Kudur-Enlil)
沙加拉克提舒里阿什(Šagarakti-Šuriaš)
卡什提里阿什(Kaštiliaš Ⅳ)
图库尔提·尼努尔塔(Tukulti-Ninurta Ⅰ)
恩利尔纳丁舒米(Enlil-nadin-šumi)
卡达什曼哈尔贝(Kadašman-Harbe Ⅱ)
阿达德舒马伊丁纳(Adad-šuma-iddina)
阿达德舒马阿苏尔(Adad-šuma-asur)
美里希帕克(Melišipak)
马尔都克阿普拉伊丁纳(Marduk-apla-iddina Ⅰ)
扎巴巴舒马伊丁纳(Zababa-šuma-iddina)
恩利尔纳丁阿希(Enlil-nadin-ahi)

米坦尼王国(Mitanni Kingdom, 1550 - 1260)
阿拉拉赫档案(Alalah Archives, 15 世纪)
阿马尔纳书信(Amarna Archives, 约 1400)

埃兰人入侵巴比伦尼亚(1160)

1157～1026

伊辛第二王朝(Second Dynasty of Isin)
马尔都克卡比特阿黑舒(Marduk-kabit-ahhešu)
伊提马尔都克巴拉图(Itti-Marduk-balatu)
宁努尔塔纳丁舒米(Ninurta-nadin-šumi)
尼布甲尼撒一世(Nebuchadnezzar Ⅰ)
恩利尔纳丁阿普里(Enlil-nadin-apli)
马尔都克纳丁阿黑(Marduk-nadin-ahhe)
马尔都克沙皮克泽里(Marduk-šapik-zeri)
阿达德阿普拉伊丁纳(Adad-apla-iddina)
马尔都克阿黑埃里巴(Marduk-ahhe-eriba)
马尔都克泽尔Ⅹ(Marduk-zer-Ⅹ)
纳布舒姆利布尔(Nabu-šumu-libur)

1000～625

新亚述时期(Neo-Assyrian Period)

新亚述的主要国王:

亚述纳西帕尔二世(Assurnasirpal Ⅱ,883－859)

沙尔曼纳萨尔三世(Šalmaneser Ⅲ,858－824)

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721－705)

辛纳赫里布(Sennacherib,704－681)

埃萨尔哈敦(Esarhaddon,680－669)

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668－627)

625～539

新巴比伦(迦勒底)王朝(Neo-Babylonian/Chaldean Dynasty)

纳波婆拉萨尔(Nabopolassar,625－605)

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604－562)

埃微尔美罗达赫(Evil-Merodach,661－560)

内里格利萨尔(Neriglissar,559－556)

拉巴希马尔都克(Labaši-Marduk,556,3 个月)

纳波尼达(Nabonidus,555－539)

559～331

古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Old Persian/Achaemenid Dynasty)

居鲁士二世(Cyrus Ⅱ,538－530)

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Ⅱ,529－522)

巴尔迪亚(Bardija,522)

尼布甲尼撒三世(Nebuchadnezzar Ⅲ,522,两个月)

尼布甲尼撒四世(Nebuchadnezzar Ⅳ,521,三个月)

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521－486)

薛西斯一世(Xerxes Ⅰ,485－465)

贝尔希马尼(Bel-šimanni,482)

沙马什埃里巴(Šamaš-eriba,482)

阿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Ⅰ,464－424)

薛西斯二世(Xerxes Ⅱ,424,一个半月)

大流士二世(Darius Ⅱ,423－405)

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Ⅱ, 404－359)

阿塔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 Ⅲ, 358－338)

阿尔塞斯(Arses, 337－336)

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 335－331)

336～323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附录 3：

参考文献及其缩写

外文缩写

AAS *Annales archélogiques de Syrie*

AfO *Archive für Orientforschung*

JAC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JNES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RGS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MDOG *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Orient-Gesellschaft*

RlA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äologie*

WVDOG *Wissenschaftliche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Deutschen Orient-Gesellschaft*

ZA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WZKM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ZDM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Akkermans 1979 P. A. Akkermans/J. J. Roodenberg/M. N. van Loon/H. T. Waterbolk, "Tall Bouqras", *AfO* 26 (1978/79), pp. 152-156.

Balcer 1991 J. M. Balcer, "Erich Friedrich Schmidt, 13 September 1897 – 3 October 1964", *Sancisi-Weerdenberg/Drijvers* 1991, pp. 147-172.

al – Haik 1968 al-Haik, *Key Lists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Iraq*, 1968.

Andrae 1952 W. Andrae, *Babylon—Die versunkene Weltstadt und ihr Ausgräber R. Koldewey*, Berlin 1952.

Beek 1961 M. A. Beek, *Bildatlas der assyrisch-babylonischen Kultur*, Gütersloh 1961.

Bermant 1979 C. Bermant and M. Weitzman, *Ebla—An Archaeological Enigma*, London 1979.

Black and Green 1992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An Illustrated Dictionary*, British Museum 1992.

Bleibtreu 1968 E. Bleibtreu, "Ausgrabungen in West-Iran", *AfO* 22 (1968/69), 134f..

Borger 1982 R. Borger, *Die Chronologie des Darius-Denkmals am Behistun-Felsen*, Vanden Hoeck & Ruprecht in Gottingen, 1982.

Brackman 1981 A. C. Brackman, *The Luck of Nineveh—In Search of the Lost Assyrian Empire*, New York etc. 1981.

Braidwood 1952 R. J. Braidwood etc., "Matarra: A Southern Variant of the Hassuna Assemblage, Excavated in 1948", *JNES* 11 (1952), 1f..

Braidwood 1960 R. J. Braidwood/B. Howe, *Prehistoric investigations in Iraqi Kurdistan*.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tudies in Ancient Oriental Civilizations, No. 31, 1960.

Braidwood 1961 R. J. Braidwood/B. Howe/C. A. Reed, "The Iranian Prehistoric Project", *Science* 133 (1961), pp. 2008-2010.

Braidwood 1969 R. J. Braidwood/H. Cambel/P. J. Watson, "Prehistoric Investigation in Southeastern Turkey", *Science* 164 (1969), pp. 1275-1276.

Breasted 1933 J. H. Breasted, *The Oriental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33.

Budge 1925 E. A. W. Budge,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Assyriology*, London 1925.

Burney 1977 Ch. Burney,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1977.

Charvat 1993 P. Charvat, *Ancient Mesopotamia*, Prague 1993.

Civil 1994 M. Civil, *The Farmer's Instructions—A Sumerian Agricultural Manual*, Aula Orientalis-Supplementa, Spain 1994.

Ceram 1972 C. W. Ceram, Götter, Gräber und Gelehrte, Hamburg 1972.

Contenson 1966 H. de Contenson/W. J. van Liere, "Premier sondage a Bouqras en 1965, Rapport prelinimaire", *ASS* (*AAS* 之误) 16/2 (1966), pp. 181-192.

Contenson 1971 H. de Contenson, "Tell Ramad, a Village of Syria of the 7th and 6th millenia B.C.", *Archaeology* 24/3 (1971), 278f..

Curtis 1982 J. Curtis(ed.), *Fifty Years of Mesopotamian Discovery*, London 1982.

Curtis 1993 J. Curtis(ed.), *Early Mesopotamia and Iran: Contact and Conflict 3500-1600 BC*, London 1993.

Das Vorderasiatische Museum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Das Vordersiatische Museum*, DDR-Berlin 1987.

Dornemann 1969 R. H. Dornemann, "An Early Village", *Archaeology* 22/1 (1969), pp. 68 - 70.

Daniel 1981 G.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1981.

Ellis 1972 R. S. Ellis, *A Bibliography of Mesopotamian Archaeological Sites*, Wiesbaden 1972.

Finkbeiner/Röllig 1986 U. Finkbeiner and W. Röllig (eds.), *Gamdat Nasr, Period or Regional Style?*, Wiesbaden 1986.

Gibson 1972 M. Gibson, *The City and Area of Kish*, Miami, 1972.

Grayson 1997 A. K. Grayson, "The Resurrection of Ashur: A History of Assyrian Studies", S. Parpola and R. M. Whiting (ed.), *Assyria* 1995, Kongress Helsinki 1995, Helsinki 1997, pp. 105-114.

Hall 1930 H. R. Hall, *A season'work at Ur, al-'Ubaid, Abu Shahrain (Eridu) and elsewhere*, London 1930.

Hesse 1978 B. C. Hesse, *Evidence for Husbandry from the Early Neolithic Site of Ganj-Dare in Western Iran*, Ph. 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78.

Hole 1969 F. Hole/K. V. Flannery/J. A. Neely, *Prehistory and Human Ecology of the Deh Luran Plain*, Ann Arbor 1969.

Hrouda 1971 B. Hrouda, *Vorderasien I, Mesopotamien, Babylonien, Iran und Anatolien*, München 1971.

Hrouda 1991 B. Hrouda, *Der Alte Orient,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alten Vorderasien*, München 1991.

Ingholt 1957 H. Ingholt, "Danish Dokan Expedition", *Sumer* 13/1 – 2 (1957), pp. 214-215.

Jacobsen 1958 Th. Jacobsen, "Salt and Silt in Ancient Mesopotamian Agriculture", *Science* 128 (1958), pp. 1251-1258.

Jacobsen 1982 Th. Jacobsen, "Salinity and Irrigation Agriculture in Antiquity, Diyala Basin Archaeological Projects: Report on Essential Results, 1957 – 58", *Bibliotheca Mesopotamica* 14, Malibu 1982.

Jastrow 1980 M. Jastrow, *The Civilization of Babylonian and Assyria*, New York 1980.

Kent 1950 R. G. Kent, *Old Persian—Grammar, Texts, Lexicon*, New Haven 1950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Vol. 33).

Layard 1965 A. H. Layard, *Auf der Suche nach Ninive*, Müenchen, Nachdruck 1975 der Ausgabe 1965.

Lees 1952 G. N. Lees and N. L. Falcon, "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Mesopotamian Plain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18 (1952).

Lloyd 1943 S. Lloyd/F. Safar, "Tell 'Uqair: Excavations by the Iraq Government Directorate of Antiquities in 1940 – 1941", *JNES* 2/2 (1943), 131f..

Lloyd 1945 S. Lloyd/F. Safar, "Tell Hassuna: Excavations by the Iraq Government Directorate of Antiquities in 1943-1944", *JNES* 4 (1945), 255f..

Lloyd 1955 S. Lloyd, *Foundations in the Dust*, Bristol 1955.

Lloyd 1963 S. Lloyd, *Mounds of the Near Eas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3.

Lloyd 1984 S. Lloyd, *The Archaeology of Mesopotamia, From the Old Stone Age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Thames and Hudson 1984.

Lloyd 1986 S. Lloyd, *The Interval: A Life in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London 1986.

Lloyd 1995 S. Lloyd, "Excavating the Land Between the Two Rivers", J. M. Sasson(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Ⅳ, New York, 1995, pp.2729-2741.

Maisels 1993 C. K. Maisels, *The Near East: Archaeology in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Mallowan 1956 M. E. L. Mallowan, *Twenty-Five Years of Mesopotamian Discovery*(1932 - 1956), London 1956.

Mallowan 1965 M. E. L. Mallowan, *Early Mesopotamia and Iran*, London 1965.

Martin 1988 H. P. Martin, *Fara—A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City of Shuruppak*, Birmingham 1988.

Matthiae 1980 P. Matthiae, *Ebla—An Empire Rediscovered*, *translated by Ch. Holme*, London/Sydney/Auckland/Toronto 1980.

Meek 1961 M. A. Meek, *Bildatlas der assyrisch-babylonischen Kultur*, Gueterslocher Verlageshaus Gerd Mohn 1961.

Meldgaad 1964 J. Meldgaad/P. Mortensen/H. Thrans, "Excavations at Tepe Guran, Luristan", *Acta Archaeologia* 34 (1964), pp.97-133.

Mellaart 1965 J. Mellaart, *Earliest Civilizations of the Near East*, London 1965.

Mellaart 1967 J. Mellaart, *Catal Hüyük*, London 1967.

Mellaart 1970 J. Mellaart, *Excavations at Hacilar*, London 1970.

Mellaart 1975 J. Mellaart, *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 London 1975.

Moorey 1978 P. R. S. Moorey, *Kish Excavation 1923-1933*, Oxford 1978.

Neumann 1978 J. Neumann and R. M. Sigrist, "Harvest date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as possible indicators of climate variations", *Climatic Change* 1 (1978), pp. 239-252.

Nissen 1988 H. J. Nisse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9000 – 2000 *B. C.*,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Oates and Oates 1976 David Oates and Joan Oates,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Elsevier/Phaidon 1976.

Oates and Oates 1977 David Oates and Joan Oates, "Early irrigation agriculture in Mesopotamia", G. Sieveking(ed.), *Problem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archaeology*, London 1977, pp. 109-135.

Pallis 1956 S. A. Pallis, *The Antiquity of Iraq—a Handbook of Assyriology*, Copenhagen 1956.

Parrot 1946 A. Parrot, *Archéologie Mésopotamien. I*, Paris 1946.

Parrot 1953 A. Parrot, *Archéologie Mésopotamien. II*, *Technique et problemes*, Paris 1953.

Parrot 1955 A. Parrot, *Discovering Buried Worlds*, translated by E. Hudson from the French Decouverte des Mondes Ensevelis, New York 1955.

Parrot 1960 A. Parrot, *Sumer*, Gallimard 1960.

Pettinato 1991 G. Pettinato, *Ebla—A New Look at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ostgate 1992 J. N. Postgate, *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Potts 1986 D. T. Pott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Gamdat Nasr'", *Finkbeiner and Rollig* 1986, pp. 17-32.

Powell 1985 M. A. Powell, "Salt, Seed, and Yields in Sumerian Agricultur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Progressive Salinization", *ZA* 75(1985), pp. 7-38.

Pritchard 1969 J. B. Pritchard,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Pictur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Redman 1978 C. L. Redma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San Francisco 1978.

Reade 1992 J. Reade, *Assyrian Sculptur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Roaf 1998 M. Roaf, *Mesopotamien*, Augsburg 1998.

Rogers 1915 R. W. Rogers, *A History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 I*, New York 1915.

Sancisi-Weerdenberg/Drijvers 1991 H. Sancisi-Weerdenburg/J. W. Drijvers (ed.), *Through Travellers' Eyes—European Travellers on the Iranian Monuments (Achaemenid History VII)*, Leiden 1991.

Sasson 1995 J. M.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IV*, New York 1995.

Singh 1974 P. Singh, *Neolithic Culture of Western Asia*, London 1974.

Smith 1967 P. E. L. Smith/T. C. Young, "Excavations in Western Iran by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Kangavar-Bisutun Vally and by the University of Montreal in Ghar-i Khar and Ganj-Dare", *Archaeology* 20 (1967), pp. 63-64.

Smith 1990 P. E. L. Smith,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at Ganj-Dareh, Iran", *World Archaeology* 21/3 (1990), pp. 323-335.

Solecki 1963 R. S. Solecki, "Prehistory in Shanidar Valley, Northern Iraq", *Science* 139 (1963), pp. 179-193.

Solecki 1983 R. L. Solecki/R. S. Solecki, "Late Pleistocene-Early Holocene 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e Zagros and the Levant", Young-Smith-Mortensen (eds.), *The hilly flanks and beyond—Essays on the prehistory of southwestern Asia presented to Robert J. Braidwood November* 15, 1982. *Studies in Ancient Oriental Civilization*, No. 36 (1983), pp. 123-137.

Steiner 1991 G. Steiner, "Eine Zeitgenössische Würdigung der Entzifferungsarbeit von Goerg Friedrich Grotefend", *Sancisi-Weerdenberg/Drijvers* 1991, pp. 109-121.

Strommenger 1978 E. Strommenger(ed.), *Der Garten in Eden—7 Jahrtausende Kunst und Kultur an Euphrat und Tigris*, Mainz/Rhein 1978.

Thompsen 1929 R. C. Thompsen,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 at Nineveh*, London 1929.

Tobler 1950 A. J. Tobler, *Excavations at Tepe Gawra II*, London/Philadelphia 1950.

van Driel 1982 G. van Driel, "Tablets from Jebel Aruda", *Zikir Shumim*, Leiden(1982), pp. 12-25.

van Driel 1983 G. van Driel, "Seals and sealings from Jebel Aruda 1974 - 1978", *Akkadica* 33 (1983), pp. 34-62.

van Loon 1983 M. van Loon, "Hammam et-Turkman on the Balikh: First results of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s 1982 excavation", *Akkadica* 35 (1983), pp. 1-11.

von Soden 1985 W. von Soden, *Einführung in die Altorientalistik*, Darmstadt 1985.

Walker 1990 C. B. F. Walker, "Cuneiform",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d.), *Reading the Past—Ancient Writing from Cuneiform to the Alphab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ritish Museum 1990, pp. 16-68.

Wilhelm 1990 G. Wilhelm, "Marginalien zu Herodot Klio 199", *Lingering over Words: Studies in Ancient Near Eastern Literature in Honor of William L. Moran*, T. Abusch (ed.) (*Harvard Semitic Studies 37*), Cambridge, MA, 1990, pp. 505-524.

Wilhelm 1998 G. Wilhelm(ed.), *Zwischen Tigris und Nil—100 Jahre Ausgrabungen der Deutschen Orient-Gesellschaft in Vorderasien und Ägypten*, Mainz am Rhein 1998.

Woolley 1955 L. Woolley, *Spadework—Adventures in Archaeology*, London 1955.

Yang Zhi 1988 Yang Zhi, "The Excavation of Adab", *JAC* 3 (1988), 1 - 21.

Young 1974 T. C. Young, jr./L. D. Levinve, *Excavations of the Godin project: second progress report*, Toronto 1974.

Young 1986 T. C. Young, jr., "Godin Tepe Period VI/V and Central Western Iran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Millennium", U. Finkbeiner/W. Roellig (eds.), *Gamdat Nasr, Period or Regional Style?*, Wiesbaden 1986, pp. 212-228.

汉语参考书:

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史论丛》,三联书店,1982年。

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

杨建华(著):《外国考古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

杨炽:《〈农人历书〉》译述》,《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32~39页。

塞顿·劳埃德著,杨建华(译):《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文物出版社,1990年。

《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编写组编:《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附录 4：

名词对译表

A

阿比德诺　Abydenos
阿比亚德　Tell Abiad
阿波洛多(伪)　Pseudo-Apollodor
阿布　Abu
阿布—哥什　Abu Gosh
阿布—哈巴　Abū Habba
阿布—哈塔布　Tell Abu Hatab
阿布—萨拉比赫　Tell Abu Salabikh
阿布—沙赫林　Abu Shahrain
阿达布　Adab
阿达德·尼拉里(一世)　Adad-nirari (I)
阿达帕　Adapa
阿恩　T. J. Arne
阿尔—阿卡尔　Tellūl al-'Aqar
阿尔—贝哈　Tell al-Beidha
阿尔—哈德尔　al-Hadr
阿尔基姆　B. Alkim
阿尔—凯达赫　Tell al-Qedah
阿尔帕德　Arpad
阿尔帕吉耶　Tell Arpacije
阿尔萨克斯　Arsaces
阿尔斯兰台佩　Arslantepe
阿尔斯兰—塔什　Arslan Tash
阿尔提努祖　Altinuzu
阿尔—希巴　al-Hiba
阿法尔　Tell Afar
阿哈罗尼　Y. Aharoni
阿赫马尔　Tell Ahmar
阿胡拉·马兹达　Ahuramazda
阿吉拉布　Tell Agrab
阿贾纳　Tell Acana/Atchana
阿卡德　Akkade
阿卡都　Akkadu
阿卡尔　Tell Aqr
阿卡拉姆都克　Akalamdug
阿卡曼斯　P. A. Akkermans
阿拉伯河　Shatt al-Arab
阿拉贾　Alaca Hüyük
阿拉拉赫　Alalah
阿拉美亚人　Aramaeans
阿勒万德山　Alvand/Elvend Mts.
阿里安　Arrianos (Arrian)
阿里克　R. O. Arik
阿利斯托布尔(亚里斯托布)Aristobul (of Cassandreia)
阿利撒尔　Alisar Hüyük
阿马尔纳　Tell al-Amarna
阿姆克　'Amq
阿那克西曼德　Anaximandros
阿那克西米尼　Anaximenes
阿帕达纳　Apadana
阿奇卡尔　Achiqar
阿切姆休于 Acemhüyük
阿施纳库姆　Ašnakkum
阿什克特—伊—奥乌　Ashkot-i Au
阿什克特—伊—塔里克　Ashkot-i Tarik

阿斯马尔 Tell Asmar
阿斯瓦德 Tell Aswad
阿苏尔(神) Assur
阿塔薛西斯(二世) Artaxerxes (Ⅱ)
阿西尔山 Asir
埃安纳 Eanna
埃布拉 Ebla
埃尔德雷德 J. Eldred
埃尔真 Erzen
埃尔祖鲁姆 Erzurum
埃尔一拉赫姆 Tell al-Lahm
埃基达 Ezida
埃及 Egypt
埃克巴坦那 Ecbatana
埃库尔 Ekur
埃拉及泽 Elazig
埃兰 Elam
埃勒凡泰尼 Elephantine
埃利安 Aelianus
埃利都 Eridu
埃尼白格 Eneberg
埃萨尔哈敦 Asarhaddon / Esarhaddon
埃什努纳 Eshnunna
爱恩斯沃斯 W.F. Ainsworth
安德烈 W. Andrae
安德烈亚斯 F.C. Andreas
安纳 Ana
安纳吐姆 Eannatum
安纳托利亚 Anatolia
安努 Anu
安条克(一世) Antiochos (Ⅰ)
奥多里库斯 B. Odoricus
奥尔贝利—马尔 Orbeli-Marr
奥利维埃 G.A. Olivier
奥龙特斯河 Orontes
奥佩尔 J. Oppert
奥特尔 J. Otter

B

巴贝尔塔 Tower of Babel
巴比里欧斯 Babrios
巴比伦 Babylon
巴尔巴罗 G. Barbaro
巴尔比 C. Balbi
巴尔干 K. Balkan
巴尔米拉 Palmyra
巴格达 Baghdad
巴赫曼 W. Bachmann
巴胡兹 Baghouz
巴基尔 T. Bakir
巴咖拉 Bagara
巴坤 Tell-i Bakun
巴拉瓦特 Balawat
巴士拉 Basra
巴思 H. Barth
巴泰勒米 Barthelemy
巴特勒 Butler
巴兹 E.A.Th.W. Budge
白金汉 J.S. Buckingham
班克斯 E.J. Banks
鲍姆加腾 H. Baumgarten
鲍威尔 Powell
贝尔 E.F.F. Beer
贝尔 G. Bell
贝尔克 K.E.W. Belck
贝尔一马都克 Bel-Marduk
贝利诺 K. Bellino
贝利诺圆柱铭文 Bellino-Cylinder
贝洛索斯 Berossos (Berossus)
贝希斯敦 Behistun
本波 A. Bembo
本都山脉 Pontus

本杰明 Benjamin (of Tudela)
比阿 Tell Bi'a
比尔斯—尼姆鲁德 Birs Nimrud(Borsippa)
比拉 Tell Billa
比斯马亚 Tell Bismaya
比特尔 K. Bittel
比特—阿迪尼 Bit Adini
比特—阿古希 Bit-Agusi
彼特罗·德拉·瓦莱 Pietro della Valle
彼得斯 J. P. Peters
彼特罗夫 P. F. Petrov
毕布勒 Byblos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波麦洛伊 J. A. Pomeroy
波塞多尼乌斯 Poseidonius
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波斯人 Persians
波斯坦奇 E. Bostanci
伯尔内 C. A. Burney
伯莫尔 R. M. Boehmer
勃兰特 J. Brant
博阿兹柯伊 Boghazköy
博尔希帕 Borsippa(Birs Nimrud)
博尚 J. Beauchamps
博塔 P. E. Botta
布尔瑙夫 E. Burnauf
布拉赫 Ch. Brache
布拉克 Tell Brak
布雷斯特德 J. H. Breasted
布雷伍德 R. J. Braidwood
布里奇 Sir H. J. Bridge
布利斯 F. J. Bliss

C

查哈布 E. M. Chahab
查加尔—巴扎尔 Chagar Bazar
柴尔德 G. Childe

D

达姆甘 Damghan
大流士 Darius
戴尔 Der
戴丽 S. Dalley
戴特威勒 Detweiler
德·古维阿 A. de Gouvea
德·加尔丹 P. A. L. de Gardane
德·隆佩里埃 A. de. Longperier
德·曼德尔斯罗 J. A. de Mandelslo
德·梅奎内姆 R. de Mecquenem
德·摩尔根 J. de Morgan
德·热努亚克 H. de Genouillac
德·萨尔泽克 E. de Sarzec
德·萨西 B. A. I. S. de Sacy
德黑兰 Tehran
德拉波特 L. J. Delaporte
德朗德 A. D. des Landes
德鲁加斯 P. Delougaz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os
德塞 Deshayes
狄奥多鲁斯 Diodorus
迪厄拉富瓦 A. M. Dieulafoy
迪佩隆 A.-H. A. Duperron
迪松 R. H. jr Dyson
迪瓦尼耶 Diwanije
迪亚拉 Diyala
底格里斯河 Tigris
蒂尔—巴尔希普 Til Barsip
杜·克罗 du Cros
杜尔—比特—亚金 Dūr Bīt-Jakin
杜尔—库里加尔祖 Dūr Kurigalzu
杜尔—撒姆苏伊鲁纳 Dūr Samsuiluna
杜尔—沙鲁金 Dūr Sharrukīn

杜尔—温塔什 Dūr Untaš
杜南 M. Dunand
杜威尔 Tell al-Duweir
顿·加西亚 Don Garcia de Silva Figueroa
多尔蒂 R. P. Dougherty

E

厄尔布尔士山脉 Elburz Mts.
厄尔施莱格 A. Oelschläger
厄克加里 J. G. Echegary
厄兹居奇 T. özgüç
恩利尔 Enlil

F

法拉 Fara
法兰克福 H. Frankfort
凡城 Van
凡湖 Lake Van
凡卡勒希 Vankalesi
菲奇 R. Fitch
菲舍尔 C. S. Fisher
腓尼基 Phoenicia
冯·奥本海姆 M. Freiherr von Oppenheim
冯·德·奥斯坦 H. H. von der Osten
冯·卢尚 F. von Luschan
弗朗丹 E.-N. Flandin
弗劳尔 S. Flower
弗雷德里克 C. Frederik
弗雷泽 B. Fraser
弗里吉亚 Phrygia
弗伦奇 E. French
福莱斯内尔 F. Fresnel
福雷斯特 J.-D. Forest
福塞 Ch. Fossey
福提斯 Photius

G

盖伊 P. L. O. Guy
甘吉—达勒赫 Ganj-Dareh
冈比西斯 Cambyses
冈瓦纳大陆 Gondwanaland
高拉 Tepe Gaura
高墨达 Gaumata
戈迪翁 Gordion
戈蒂埃 J.-E. Gautier
戈尔德曼 H. Goldmann
格莱罗 G. J. Grelot
格莱—雷什 Grai Resh
格吕达奇 Göllüdag
格罗特芬 G. F. Grotefend
古布拉 Gubla
古地亚 Gudea
古尔奈 al-Qurnah
古扎纳 Guzana
贵特鲍克 B. Güterbock

H

哈布尔 Habur
哈措尔 Hazor
哈达图 Hadatu
哈夫塔凡 Haftavan Tepe
哈基—穆罕默德 Haggi Muhammad
哈克密 A. Hakemi
哈拉夫 Tell Halaf
哈里里 Tell Hariri
哈里斯河 Halys River
哈马 Hama
哈马姆—图克曼 Hammam et-Turkman
哈马丹 Hamadan
哈马特 Hamath
哈曼 Tell al-Hamam

哈密顿 W.J.Hamilton
哈琴松 Hutchinson
哈斯休于 Has Hüyük
哈苏纳 Tell Hassuna
哈特拉 Hatra
哈图沙 Hattuša
哈扎尔—古律 Hazar Gölü
哈扎尔—默尔德 Hazar Merd
海德 Th.Hyde
海尔茨菲尔德 E.E.Herzfeld
海法吉 Khafajeh
海涅斯 J.H.Haynes
海涅斯 R.C.Haines
海因里希 E.Heinrich
韩夫曼 Hanfmann
汉穆拉比 Hammurabi
汉姆迪·贝伊 Hamdy Bey
汉森 D.P.Hansen
豪尔萨巴德 Khorsabad/Chorsabad
豪普特 P.Haupt
荷马 Homer
贺加斯 D.G.Hogarth
赫伯特 Th.Herbert
赫卡泰厄斯 Hecataeus
赫拉尼科斯(勒斯玻斯的)Hallanicus (of Lesbos)
赫鲁达 B.Hrouda
赫罗兹尼 B.Hrozný
赫梯人 Hittites
赫西 Tell al-Hasi
赫西俄德 Hesiod
亨德森 P.Henderson
胡尔桑克卡拉马 Hursagkalamma
胡里特人 Hurrians
胡曼 K.Humann
胡齐斯坦 Khuzistan
霍尔 H.R.Hall

J

基底努 Kidinnu
基恩基 KI-EN-GI
基尔库克 Kirkuk
基克布莱 D.Kirkbride
基米诺斯 Geminos
基莫利人 Kimmerians
基什 Kish
基苏拉 Kisurra
基乌里(阿卡德) KI-URI(Akkade)
吉布森 M.Gibson
吉德尔 Tell Jidle
吉尔德 Tell-i Gird
吉尔德伊—哈桑—阿里 Gird-i Hasan Ali
吉尔伽美什 Gilgamesh
吉尔什曼 R.Ghirshman
吉尔苏 Girsu
吉来兰 Girairan
吉乌苏德拉 Ziusudra (希腊语:Xisuthros)
吉延 Tepe Gijan
加布里埃尔 Gabriel
加法拉巴德 Tepe Ja'farabad
加利斯色尼斯 Callisthenes
加罗 D.A.E.Garrod
加斯坦 J.Garstang
迦勒底人 Chaldeans
甲穆 al-Khiam
江上 N.Egami
杰尔宛 Jerwan
杰拉布鲁斯 Jerablus
捷姆迭特—那色 Jemdet Nasr
金 L.W.King
金内尔 J.M.Kinneir
居鲁士(小) Cyrus (the Younger)

K

喀威尔沙漠 Dascht-eKavir
卡叠什 Qadesh
卡尔胡 Kalhu/Calhu
卡尔卡美司 Karkamis/Carchamis
卡尔米尔—布鲁尔 Karmir-Blur
卡尔斯伯格基金会 Carlsberg Foundation
卡尔瓦利 Tepe Kalwali
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 Kār Tukulti-Ninurta
卡赫美什 Karkemish/Carchemish
卡拉赫 Kalah/Calah
卡拉特—舍加特 Qal'at Shergat
卡里波斯 Callipos
卡里马科斯 Callimachus
卡鲁姆 Karum
卡尼什 Kanish
卡斯尔(巴比伦的一部分) Qasr
卡特赖特 J. Cartwright
卡特纳 Qatna(Mishrife)
凯尔·波特 R. ker Porter
凯尼容 K. M. Kenyon
凯佩尔 G. T. Keppel
凯喜特 Kassite
坎宁 S. Canning
康特诺 G. Contenau
科尔德威 R. Koldewey
科依 Conon
科赛 H. Z. Kosay
科斯岛 Cos
科斯特 P. Coste
克尔曼沙赫 Kermanshah
克尔特兄弟 Brüder Körte
克莱顿 C. Clayton
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 Clemens Alexandrinus
克莱默 S. N. Kramer
克利塔科斯 Cleitarchus/Clitarchus
克罗 G. Cros
克尼多(或译尼多斯) Cnidus
肯姆普夫尔 E. Kaempfer
孔恩 C. S. Coon
库巴巴 Kubaba
库拉巴 Kullaba
库那克萨战役 Battle of Cunaxa
库塔 Kutha
库雍基克 Qujunjik

L

拉尔萨 Larsa
拉格什 Lagash
拉赫姆 Tell al-Lahm
拉基什 Lachish
拉美西斯二世 Rameses Ⅱ
拉萨姆 C. Rassam
拉萨姆 H. Rassam
拉萨姆 N. Rassam
拉森 Ch. Lassen
拉斯艾因 Ras al-'Ayn
拉斯克 R. C. Rask
拉斯—沙姆拉 Ras Shamra
拉薛 D. Le. Lasseur
莱昂 D. G. Lyon
莱克 Lake
莱特林格 G. Reitlinger
莱亚德 A. H. Layard
赖利 Reilly
兰格顿 S. Langdon
朗根内热 F. Langenegger
劳埃德 S. Lloyd
劳夫尔 B. Laufer
劳伦斯 Th. E. Lawrence
劳沃尔夫 L. Rauwolf

劳亚古大陆 Laurasia
勒布伦 Le Brun (Cornelis Le Brun de L'Aia)
勒曼豪普特 C. F. Lehmann-Haupt
勒文施泰因 I. Löewenstern
雷南 E. Renan
楞岑 H. J. Lenzen
李兹 W. Leedes
里海 Caspian Sea
里奇 C. J. Rich
里特尔 K. Ritter
利法特 Tell Rifat
卢德 G. Loud
卢克索 Luxor
卢肯贝尔 D. D. Luckenbill
卢萨 Rusa
卢特沙漠 Dascht-eLut
鲁萨希尼里 Rusahinili
鲁斯特 A. Rust
路里斯坦 Luristan
吕底亚 Lydia
罗得斯岛 Rhodos
罗林森 G. Rawlinson
罗林森 H. C. Rawlinson
罗斯 J. Ross
洛夫特斯 W. K. Loftus
洛克菲勒 J. D. Rockefeller

M

妈姆 Mamu
马尔泰 Maltai
马戈龙 J. C. Margueron
马加拉奇克 Magaracik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马可里迪 Th. Makridi
马拉特亚 Malatya
马里 Mari
马洛旺 M. E. L. Mallowan
马尼什图舒 Manishtusu
马什鲁阿 Mashrua
马探雅 Mattanja
马修斯 R. J. Matthews
迈埃尔 H. F. L. Meyer
迈斯纳 B. Meissner
麦吉多 Megiddo
麦凯 E. Mackay
麦克恩 D. E. McCown
麦克埃文 C. W. McEwan
麦里基 Meriggi
麦西里姆 Mesilim
梅尔辛 Mersin
梅拉特 J. Mellaart
梅斯尼尔·杜·比松 R. du Mesnil du Buisson
美利都 Meliddu (Malatya)
美努阿 Menua
美斯卡拉姆都克 Meskalamdug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蒙特 P. Montet
米达斯 Midas
米底人 Medians
米格南 R. Mignan
米利都 Miletus
米内特—贝达 Minet al-Beidha
米纳 al-Mina
米南德(以弗所的) Meanderus (of Ephesus)
米施利夫 Mishrife
米坦尼 Mittani
密特福 Mitford
明特尔 F. C. C. Münter
摩亨佐—达罗 Mohenjo-Daro
摩苏尔 Mosul
莫茨琴斯基 J. Meuszynski
莫尔 M. J. Mohl

莫尔特曼 A.D. Mordtmann
莫里埃 J.J. Morier
穆基什 Mukish
穆克吉尔 Tell el-Muqejjir
穆勒贝特 Tell Murebit
穆斯延 Tepe Musjan
穆塔萨里姆 Tell al-Mutasallim

N

那波尼达 Nabonidus
那布那希尔 Nabu-nasir
那布苏米斯坤 Nabusumiskun
那丁 Nadin
那沙 Nesha
纳比—优尼斯(尼尼微) Nabi Yunis
纳布里阿诺斯 Naburianos
纳尔—卡尔布 Nahr al-Kalb
纳格尔 W. Nagel
纳克什—卢斯坦 Naqsh-i Rustem
纳拉姆辛 Narām-Sîn
纳吐夫 Natuf
纳瓦拉 Navarre
纳西里耶 Nasiriyah/Nasirije
内比—门德 Tell Nebi Mend
内比—雍努斯 Nebi Junus
内里布图 Neribtum(Tell Ischtchali)
尼布尔 K. Niebuhr
尼布甲尼撒(二世) Nebuchadnezzar (Ⅱ)
尼古拉 Nikolaos (of Demaskus)
尼科 Necho
尼克梅帕 Niqmepa
尼姆鲁德 Nimrud
尼尼微 Nineveh
尼诺斯 Ninos
尼普尔 Nippur
聂费 P. Neve
牛百利 J. Newberrie
牛尔德克 A. Noeldeke
努法尔 Nuffar
努济 Nuzi
努希加恩 Nush-i Jan
诺克图雷斯坦 Nocturestand
诺里斯 E. Norris
诺亚 Noah

O

欧阿涅斯 Oannes
欧贝德 Tell el-Ubaid
欧茨 D. Oates
欧茨 J. Oates
欧赫米尔 Tell Ohemir
欧塞利 G. Ouseley

P

帕勒高拉 Palegaura
帕丽撒提斯 Parysatis
帕罗 A. Parrot
帕萨尔加德 Pasargadae
帕提亚(安息) Parthia
佩雷提 M. Péretié
佩罗 J. Perrot
佩扎尔 M. Pézard
皮埃尔·埃马努埃尔 Pere Emanuel de Saint Albert
皮奥特罗夫斯基 Piotrovskij
皮特里 Fl. Pétrie
珀贝尔 A. Poebel
普阿比 Puabi
普法伊弗尔 R.H. Pfeifer
普格里希 Puglisi
普赫施坦 O. Puchstein
普拉斯 V. Place
普林尼 G. Plinius

普鲁塞尔 C. Preusser
普萨美提克 Psammetichus

Q

奇里乞亚 Cilicia
奇姆里利姆 Zimri-Lim
奇雄 R. Czichon
恰塔尔休于 Catalhüyük/Chatal Hüyük
乔加—赞比尔 Choga Zanbil(Tschoga-Zanbil)
乔威 Tepe Jowi
切米尔·帕夏 Dschemil Pascha
切施美伊—阿里 Ceshme-i Ali
切斯内 F. R. Chesney
钦奇尔里 Zincirli
琼斯 H. Jones
屈尔台佩 Kültepe(Kanish)
屈伊德伊德 Tell Cüydeyde

S

萨尔迪斯 Sardis
萨尔贡 Sargon
萨尔曼纳萨尔 Salmanessar
萨法尔 F. Safar
萨豪 E. Sachau
萨克贾龟祖 Sakcegozu
萨勒 F. Sarre
萨马尔 Sam'al
萨马拉 Samarra
萨米 A. Sami
萨珊 Sassanid
萨威—克米—沙尼达 Zawi Chemi Shanidar
塞林 E. Sellin
塞流古 Seleukid
塞马于—埃尔马里 Semayuk-Elmali
塞斯提尼 Sestini
桑克雷 Senkere
色米拉米斯 Semiramis
色诺芬 Xenophon
森于雷克 M. Senyürek
沙赫 Shah Tepe
沙米耶沙漠 Shamiyah
沙姆希·阿达德 Šamši-Adad
沙尼达 Shanidar
沙希尔·巴扎尔 Shaghir Bazar
尚特雷 E. Chantre
舍尔 J. V. Scheil
舍尔 P. Scheil
设拉子（希拉兹） Shiraz
圣·马丁 J. A. Saint Martin
施隆姆博格 D. Schlumberger
施派瑟尔 E. A. Speiser
施特劳斯 J. J. Strauss
施特罗纳赫 D. Stronach
施托尔泽 F. Stolze
史密斯 G. Smith
史密斯 S. Smith
史密特 E. F. Schmidt
史密特 H. J. Schmidt
舒巴特—恩利尔 Shubat-Enlil
舒尔茨 F. E. Schulz
舒鲁帕克 Shuruppak
舒马赫 G. Schumacher
舒辛 Shusin
斯蒂雷特 J. R. S. Sterrett
斯塔尔 R. Starr
斯塔基 J. Starkey
斯坦因 A. Stein
斯特拉波 Strabo
斯托里 J. Story
苏丹 Tell es-Sultan
苏克巴 Schugba / Shuqba
苏拉 L. C. Sulla

苏勒基 R. S. Solecki
苏美尔 Sumer/Shumeru
苏美尔人 Sumerians
苏萨 Susa
苏什 Shush
所罗门 Solomon

T

塔尔博特 W. H. Fox Talbot
塔尔苏斯 Tarsus
塔赫提—贾姆希德 Takht-i Jamshid
塔韦尼埃 J. B. Tavernier
泰克西埃 C. Texier
泰勒 C. Taylor
泰勒 J. E. Taylor
泰勒斯 Thales
泰纳特 Tell Tainat
泰唯诺 J. de Thevenot
泰西封 Ctesiphon
汤普森 C. Thompson
忒息阿斯 Ctesias
特奥弗拉斯特 Theophrastus
特伦克瓦尔德 H. Trenkwalder
特舍白尼 Teshebaini
藤井 H. Fujii
提尔基 Tilki Tepe
提格拉特·帕拉萨尔 Tiglatpileser
提赫森 O. G. Tychsen
提斯肯 Tezcan
惕罗·当让 F. Thureau-Dangin
铁罗 Tello
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 Tukulti-Ninurta I
图什帕 Tushpa
图图布 Tutub
推罗 Tyre
托勒密·克罗丢 Ptolemaios Claudius
托勒密 Ptolemaios/Ptolemy
托罗斯山脉 Taurus Mts.
托马斯 F. Thomas
托内提 M. J. Tonetti
托普拉卡尔 Toprakkale

W

瓦迪阿拉伯 Wadi al-Arab
瓦尔卡 Warka
瓦尔—卡布德 Tepe War Kabud
瓦钦格 C. Watzinger
瓦特尔博尔克 H. T. Waterbolk
瓦特松 P. J. Watson
威尔德—布隆德尔 Weld-Blundel
威廉姆斯 S. Williams
韦斯特加德 N. L. Westergaard
魏斯巴赫 F. H. Weissbach
温克勒 H. Winckler
温塔什—纳皮利沙 Untaš-Napiriša
文森佐·玛利亚 F. Vincenzo Maria
沃尔德 W. H. Ward
沃尔夫 Miss C. L. Wolfe
沃尔夫考察队 Wolfe-Expedition
沃雷尔 J. E. Worrell
沃特林 Ch. Watelin
沃特林 L. Ch. Waterlin
乌尔 Ur
乌尔纳木 Urnammu
乌伽里特 Ugarit
乌拉尔图 Urartu
乌鲁克 Uruk
乌姆—达巴西亚 Umm Dabaghiyah
乌特纳皮施提 Utnapištim
乌希什金 D. Ussishkin
吴雷 L. Woolley

X

西阿尔克 Tepe Sialk
西底家 Zedekia
西顿 Sidon
西顿—威廉斯 M. V. Seton-Williams
西弗尔 Tell Sifr
西蒙 J. Simon
西塞罗 M. T. Cicero,
西苏托罗 Xisuthros(Ziusudra)
希巴尼巴 Shibaniba
希德尔 Khidr
希尔 Hill
希贾兹 al-Hijaz/Hedschas
希拉 Hilla
希拉尼 Hilani
希罗多德 Herodotus
希帕尔 Sippar
希帕库斯 Hiparchos
希普莱西特 H. V. Hilprecht
希普西克利 Hypsikles
希萨尔 Tepe Hissar
希特 Hit
希亚拉 I. Hijara
席尔特贝格尔 H. Schiltberger
夏尔丹 J. Chardin
谢费尔 F. A. Schaeffer
谢拉 E. Chiera
谢尼 G. Chenet
辛 Sin
辛贾尔 Jabal Sinjar
辛纳赫里布 Sennacherib(Sinnacherib)
欣克斯 E. Hincks
叙司塔司佩斯 Hystaspes
薛西斯 Xerxes

Y

雅丁 Y. Yadin
雅各彼 Jacoby
雅各布森 Th. Jacobsen
雅古特 Yaqut
雅克 E. V. S. Jacquet
雅里姆里姆 Jarimlim
雅斯马赫·阿杜 Jasmah-Addu
亚当斯 R. M. Adams
亚吉里卡亚 Yazilikaya
亚拉腊 Ararat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历山大·波利希斯托 Alexander Polyhistor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亚述(地区,帝国) Assyria
亚述巴尼拔 Assurbanipal
亚述城 Assur
亚述纳西帕尔 Assurnasirpal
扬 R. S. Young
耶卜鲁德 Jabrud
耶利哥 Jericho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耶莫 Qal'at Jarmo
耶斯塔德 E. Gjerstad
伊卜拉欣姆 Tell Ibrahim
伊布咖尔 Ibgal
伊布里斯 Tell-i Iblis
伊德里米 Idrimi
伊格迪尔 Igdyr/Igdir
伊利贾 Ilica
伊姆古尔—贝尔/恩利尔 Imgur-Bel/Enlil
伊南娜 Inanna
伊南娜—吉蒂图 Inanna Kititum
伊奇沙利 Tell Icshali/Ischtchali
伊珊—巴赫里亚特 Ishan al-Bahrijat

伊施查里 Tell Ischtchali
伊施图普—伊鲁姆 Ištup-ilum
伊什塔 Ishtar
伊斯塔尔 Istahkr
伊索 Aesop (Aisopos)
伊西多 Isidor
伊辛 Isin
英霍尔特 H. Ingholt
英加拉 Tell Ingharra
攸多克罗斯(尼多斯的)Eudoxos (of Cnidos)
攸西比厄斯(凯撒里亚的)Eusebius (of Caesarea)
尤巴(二世) Juba (Ⅱ)
犹大 Judah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于奥 J.L. Huot
余米克 Tepe Yümük
约恩 M. Yon
约尔丹 J. Jordan
约尔干 Jorgan Tepe
约塞夫·弗拉维 Josephus Flavius
约雅金 Jojachin

Z

扎尔基 Zarzi
扎格罗斯山脉 Zagros Mts.

附录 5：

古今地名对照表

古地名	今地名
阿尔帕德　Arpad	利法特　Tell Rifat
阿卡尔　Tell Aqr	戴尔　Der
阿拉发　Arrapha	基尔库克　Kirkuk
阿拉拉赫　Alalah	阿贾纳　Tell Acana/Atchana
阿舍特—阿吞　Achet-Aton	阿马尔纳　Tell al-Amarna
阿施纳库姆　Ašnakkum	查加尔—巴扎尔　Chagar Bazar
埃安纳　Eanna	瓦尔卡　Warka
埃布拉　Ebla	马尔迪赫　Tell Mardih
埃克巴坦那　Ecbatana	哈马丹　Hamadan
埃利都　Eridu	阿布—沙赫林　Abu Shahrain
埃什努纳　Eshnunna	阿斯马尔　Tell Asmar
比斯马亚　Tell Bismaya	阿达布　Adab
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塔赫提—贾姆希德　Takht-i Jamshid
博尔希帕　Borsippa	比尔斯—尼姆鲁德　Birs Nimrud
蒂尔—巴尔希普　Til Barsip	阿赫马尔　Tell Ahmar
杜尔—比特—亚金　Dūr Bīt-Jakin/杜鲁　Duru	拉赫姆　Tell al-Lahm
杜尔—库里加尔祖　Dūr Kurigalzu	阿卡尔—库夫　Aqar Quf
杜尔—撒姆苏伊鲁纳　Dūr Samsuiluna	海法吉　Khafajeh
杜尔—沙鲁金　Dūr Sharrukīn	豪尔萨巴德　Chorsabad
杜尔—温塔什　Dūr Untaš	乔加—赞比尔　Choga Zanbil
古布拉　Gubla	毕布勒　Byblos
古扎纳　Guzana	哈拉夫　Tell Halaf
哈措尔　Hazor	阿尔—凯达赫　Tell al-Qedah
哈达图　Hadatu	阿尔斯兰—塔什　Arslan Tash
哈特拉　Hatra	阿尔—哈德尔　al-Hadr
哈图沙　Hattuša	博阿兹柯伊　Boghazköy
基什　Kish/Hursagkalamma	英加拉　Tell Ingharra
基什　Kish/Hursagkalamma	欧赫米尔　Tell Ohemir/Uhaimir

基苏拉 Kisurra
基西伽 Kisiga
吉尔苏 Girsu
卡叠什 Qadesh
卡尔胡 Kalhu
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 Kār Tukulti-Ninurta
卡赫美什 Karkemish/Carchemish
卡拉赫 Kalah
卡鲁姆 Kārum
卡尼什 Kanish
卡特纳 Qatna
库努鲁阿 Kunulua
库塔 Kutha
库塔拉 Kutalla
拉尔萨 Larsa
拉格什 Lagash
拉基什 Lachish
鲁萨希尼里 Rusahinili
马拉特亚 Malatya
马里 Mari
麦吉多 Megiddo
内里布图 Neribtum
尼尼微 Nineveh
尼尼微 Nineveh
尼普尔 Nippur
尼沙 Nesha
努济 Nuzi
普鲁山达 Purušanda
萨马尔 Sam'al
舒巴特—恩利尔 Shubat-Enlil
舒鲁帕克 Shuruppak
苏萨 Susa
泰德穆尔 Tadmor
特舍白尼 Teshebaini
图什帕 Tushpa
图图布 Tutub
阿布—哈塔布 Tell Abu Hatab
拉赫姆 Tell al-Lahm
铁罗 Tello
内比—门德 Tell Nebi Mend
尼姆鲁德 Nimrud
阿尔—阿卡尔 Tellūl al-'Aqar
杰拉布鲁斯 Jerablus
尼姆鲁德 Nimrud
屈尔台佩 Kültepe
屈尔台佩 Kültepe
米施利夫 Mishrife
泰纳特 Tell Tainat
伊卜拉欣姆 Tell Ibrahim
西弗尔 Tell Sifr
桑克雷 Senkere
阿尔—希巴 Tell al-Hiba
杜威尔 Tell al-Duweir
托普拉卡尔 Toprakkale
阿尔斯兰台佩 Arslantepe
哈里里 Tell Hariri
穆塔萨里姆 Tell al-Mutasallim
伊施查里 Tell Ischtchali
纳比—优尼斯 Nabi Yunis
库雍基克 Qujunjik
努法尔 Nuffar
屈尔台佩 Kültepe
约尔干 Jorgan Tepe
阿切姆休于 Acemhüyük
钦奇尔里 Zincirli
莱兰 Tell Leilan
法拉 Fara
苏什 Shush
巴尔米拉 Palmyra
卡米尔布鲁尔 Kamir Blur
凡城 Van
海法吉 Khafajeh

图图尔 Tuttul
温塔什—纳皮利沙 Al-Untaš-Napiriša
乌尔 Ur
乌伽里特 Ugarit
乌鲁克 Uruk
希巴尼巴 Shibaniba
希帕尔 Sippar
亚述城 Assur
耶利哥 Jericho
伊姆古尔—贝尔/恩利尔 Imgur-Bel/Enlil
伊辛 Isin
比阿 Tell Bi'a
乔加—赞比尔 Choga Zanbil
穆克吉尔 Tell el-Muqejjir
拉斯—沙姆拉 Ras Shamra
瓦尔卡 Warka
比拉 Tell Billa
阿布—哈巴 Abū Habba
卡拉特—舍加特 Qal'at Shergat
苏丹 Tell es-Sultan
巴拉瓦特 Balawat
伊珊—巴赫里亚特 Ishan al-Bahrijat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No. 1

HISTORY OF ARCHAEOLOGY OF WESTERN ASIA

(1842-1939)

Gong Yushu

ISBN 7-5010-1293-8

9 787501 012930 >

ISBN 7-5010-1293-8
K · 548 定价：80元